冷战背景下的联美抗苏战略研究

张润 著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中国外交演变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60～19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197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策略/70年代的东西方缓和/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以及三个世界战略理论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冷战背景下的联美抗苏战略研究

本书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国家利益因素的增长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弱化为主要理论视角，研究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的联美抗苏外交战略的演变。本书的新意在于，从与联美抗苏战略同时存在并与该战略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诸多具体历史案例入手，基于丰富的史料，通过分析它们与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从多个历史侧面来揭示该战略的实质、影响、后果、特征、前提和所面临的制约，具体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外交中国家利益因素的复杂的复归进程，从而拓宽了这个传统学术领域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对始于毛泽东终结于邓小平的这一外交战略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的理解。




ISBN 978-7-5108-2785-3
9 787510 827853 >
定 价：52.00元

冷战背景下的联美抗苏战略研究

张润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背景下的联美抗苏战略研究 / 张润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3

ISBN 978 - 7 - 5108 - 2785 - 3

Ⅰ. ①冷… Ⅱ. ①张…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Ⅳ.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1983 号

冷战背景下的联美抗苏战略研究

作　　者	张　润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2785 - 3
定　　价	52. 00 元

目录

CONTENTS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动力，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常识。但并非每个国家在所有时期都能自觉地认识到并实践这一点。6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亦是如此。从建国伊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坚定地奉行以国家利益为旨归的和平共处外交。不过，由于冷战的客观制约和指导思想上的认识偏差，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利益的中心地位受到较大冲击。1969~1976年，也即毛泽东主政的最后岁月里，中美这两个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大国之间，存在着视苏联为共同威胁的战略合作。毛泽东去世后，两国继续了这种合作，一直到1989年苏联输掉冷战、中苏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为止。在国内外学界，这一合作，根据不同的国家立场，分别被约定俗成地称为联美制苏和联华制苏，也有称为联美抗苏和联华抗苏的。这一外交战略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利益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复归，及意识形态因素的相应淡出。40多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有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就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中的联美抗苏而言，从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这个战略本身及其过程、内容和后果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有关结论某种程度上已属学界常识。对此，后面的已有研究综述中将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重复是学术的大忌，有鉴于此，笔者何以以这段并非新鲜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迫切问题。

在毛泽东决定和实施这个战略的岁月里，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方面还发生了一些大事，这些事情与该战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具体历史案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20世纪60~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策略、70年代的东西方缓和和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及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在以往研究中，它们或是作为联美抗苏战略的背景来处理的，或自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就笔者所能涉猎的文献而言，将所有上述问题由幕后提到前台，来研究毛泽东的联美抗苏外交的，在国内外学界中，还很少见。既有研究中，大都是就上述历史案例中的某一个与联美抗苏外交的关系来展开评述的。把这些研究成果简单地加起来也能部分地提供对这一问题的近似于整体的理解，但是这种单个研究的简单加总毕竟不能等同于一个融所有上述历史案例为一体、并因而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综合性研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系统科学的常识。从整体的研究中，有可能发现和得出局部的和孤立的研究中所忽视的内容和结论。形象地说，如果说以往对联美抗苏战略的研究给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正面形象，或者是一两个侧面的形象的话，那么本研究是在正面形象的基础上，从所有主要侧面出发对这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描绘和分析。

笔者发现，如果深究所有上述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不难发现，除台湾问题外，它们都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联美抗苏战略的确立标志着国家利益因素回归的开始，进而标志着意识形态因素式微的开始。邓小平对这个战略的革命性改造标志着国家利益的彻底回归，进而意识形态因素的完全退场。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进行如上所述的基于多个具体历史案例的整体观照，无疑有助于深化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关系这一既传统又常新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认识。在本书中，这种深化是建立在对有关史实的既宏观又不乏细节、既概括又不乏具体的叙述和论证的多维历史视角的综合的基础上的。

正是上述两个考虑导致了本研究的选题。

二、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的说明

每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要涉及理论公设或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目的和研究中运用的基本概念。本书以中国外交中国家利益的回归

为研究纲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联美抗苏战略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毛泽东的这一战略为重中之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为理论视角，以与联美抗苏战略同时存在且与前者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几个中国外交史案例为主要叙述视角，以这些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为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是：通过对这一战略的前提、制约因素、实质、基本特征和后果等的揭示，及对这20年来联美抗苏战略的全貌的展示，再现中国外交中国家利益回归的复杂进程，为国家利益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国际关系主题提供一个具体案例。

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其理论公设，也叫公理，即对特定研究来说重要的、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这些公理是研究中大部分推理、分析和综合的出发点，是除经验证据以外所有研究结论的终极前提。这个问题上不同研究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研究者是自觉地意识到公设的存在，还是有关公设只是事实上存在。这种意识的有无强弱，关系到有关研究的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说服力。本研究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三个原则为公设，它们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不搞意识形态外交；及独立自主不结盟。就本研究而言，这也是理论基础。

对于同行来说，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属于常识，故这里不拟具体展开阐述。但还有三个问题需要在这里回答。首先，博大精深的邓小平思想中的哪些部分适合作为本研究的基础？基于笔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联系本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本研究以前一段提到的邓小平的三个基本思想作为基础。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这三点都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直接有关；二则是由于这三点对于本文探讨七八十年代联美抗苏战略的成就和局限、前提与制约等，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实际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之逐渐得出这三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毛泽东外交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其联美抗苏战略的成就和经验的总结与反思而提出的。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在70年代末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渐提出和完善的，以此来衡量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是否犯了非历史主义的错误？详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很大篇幅。简要的回答有三点。第一，毛泽东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固然与当时的历史大气候有关。用英国著名史家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的“革命年代”。当时把意识形态利益置于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是如此，舍此无法合理解释美国对越战的卷入。但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够主动塑造国

际格局和时代精神的大国。毛泽东作为这个大国的领导人，其主观政策选择是这个时代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看法，既是历史的真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主观认知一定程度上可以创造客观世界的理论。第二，根据众多研究者的结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至迟在60年代中后期就已露端倪，但毛泽东总的说来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个历史大趋势，依旧用战争与革命的传统理论来看世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已经内在地蕴涵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搞意识形态外交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思想，这个问题上他和邓小平的区别，仅在于他未能始终彻底地和高度自觉地意识到和贯彻这些思想。总之，如果用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标准来评判列宁的世界革命外交，那确实是非历史主义的，对于毛泽东，则不尽然。

第三个问题是，既然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关系为基本视角，为何不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学派作为公设？须知这个学派对于国家利益之高于意识形态，也有着精辟的阐述，且学理性更强。理由是，邓小平的有关思想既包容了现实主义中的合理成分，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这里当然指的是与时俱进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更切合中国实际，而没有前者中某些不合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判断。比如现实主义各派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结论是霸权和霸权企图与国力直接相关，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至少客观上，这类观点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霸权服务的。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解析

名不正则言不顺，基本概念的界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任何一项研究中，对同一概念的运用必须保持一致，否则就会带来逻辑、研究对象和结论上的混乱。这里拟对与本选题关系最为密切又容易引起歧义的几个（组）概念，依据学界的共识、笔者的理解和研究的需要进行基本界定和解析。

（一）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和外交策略

在日常语言中和纯粹的外交史研究中，政策和战略这两个概念区别不大，时常混用。学界的共识是：严格说来，两者的区别在于：首先，最一般地说，在所有的社会领域，政策是对最高和最终目标的规定，战略是达到此目标的比较具体的手段或方法，策略则又是实施战略的更具体的方法和措施。三者的区别是抽象和具体、目标和手段、长期和短期、原则性与灵活性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区别。这些区别中最本质的区别是目标和手段。已故法国战略家薄富尔

对此的经典表述是："战略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基本目的的手段。决定目的者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基本哲学的控制。人类的命运一方面要看它所选择的是何种哲学，另一方面要看它选择何种战略以来使其哲学得以实现。"① 其次，其区别和界定，往往要视具体情境而定，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和相对性。对于甲领域来说属于战略的内容，在作为甲领域的分支的乙领域则完全可能称之为政策，因为它规定了乙领域的目标。具体到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外交政策是规定一国全部外交活动或某个重要外交领域的最终和最高目标的总纲，外交战略是在仅次于此的层级和分支领域为此总目标服务的手段，外交策略则是更低层次的和更具体的、服务于外交战略的实施手段。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联美抗苏外交的根本目的，依次是：缓解以致解除中国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避免出现美苏联合夹击中国这个最坏可能，及消除中国面临的国际孤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目标，即保住中国这个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安全，相对于这些根本性基础性的目标，把联美抗苏归入外交战略范畴显然更为适当。毛泽东把联美抗苏视为权宜之计，也反映出他完全是从手段的灵活性的角度来认识和执行这个外交任务的。

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设想，主要目的之一是为联美抗苏的目的服务的，既已把后者定义为战略，所以本书就把这个设想归入策略范畴。这一用词并不否认"一条线"和"一大片"具有为联美抗苏目的服务以外的其他战略意义。换言之，称其为策略，是仅就其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而言的。

至于其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基于此理论而进行的外交活动，称其为政策、战略和策略都有理由。称其为政策，是因为该理论对于中国的国际身份、外交的中心目标等做了部分带有根本性的重新界定；称其为战略，是因为它部分地和联美抗苏处于同一个思想和操作层次，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补充，都是为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国际地位问题、敌我友的定位问题等根本性的政策目标而服务的手段；称其为策略，乃是因为它部分地还是为联美抗苏服务的一个工具，旨在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这个头号威胁，并为联美抗苏提供某种合法性辩护。鉴于本研究完全是在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补充和局部修正的意义上和限度内讨论三个世界问题的，故称其为战略。这也是国内学界通行的称呼。

① （法）薄富尔：《战略绪论》，钮先钟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年，第 167 页。

（二）联美制苏与联美抗苏

这两个概念都很流行，含义也十分接近。如果不以这个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二者可以混用也常被混用。但是对于本研究来说，澄清二者间的区别就是必要的了。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制”和“抗”这两个字眼。制是制衡，抗是对抗。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一个特定的、以苏联为头号威胁、以化解这种威胁为目的的战略。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这个战略的理解和实施是有既微妙又重大的区别的。毛泽东希望看到和不懈追求的，是一种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即联美抗苏；邓小平主政之初，也是这样理解和执行这个战略的。但是从80年代初起，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的变化，包括邓小平本人对国家利益的日渐清醒的认识，使得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从制衡而非对抗的角度来理解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中国的联美抗苏战略随即演变为联美制苏。

（三）结盟关系与三角关系

结盟关系的特点是：第一，缔结同盟的各方有着明确的、共同的和不变的外部威胁；第二，同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小于它们与外部威胁源的利益冲突；第三，就格局而言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两极态势。故联合与对抗是结盟关系的关键词，联合指的是同盟内部的关系，对抗指的是同盟与外部威胁源的关系。

三角关系的特点是：第一，三个战略力量（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缺乏一种鲜明的或压倒性的对抗或联合的性质，即不存在任何两个战略力量紧密联合以公开对抗第三方的现实态势，因为任何两个战略力量之间的复杂的、分歧和一致兼具的利益关系妨碍了这种态势的形成。第二，三个战略力量之间每两个与第三方的关系都是借重和制约的关系。用当代美国学者杰拉尔德·柯蒂斯的话来说，“三角关系的含义是，每一个国家在制定它对另外两国中的一国的政策以前，一定会先仔细考虑该政策对它和第三国关系的影响。”① 第三，三方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等距离的，也可能不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特定的两方间的关系要比它们与第三方的关系更亲密些，更少猜忌和敌意。换言之，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针对第三方的松散的、准结盟性质的关系。最后，它是多

---

① （美）杰拉尔德·柯蒂斯：《美国的对日关系》，载（美）傅高义、（中）袁明、（日）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极格局中的一种。在国际关系史上，三角关系不像以结盟为特征的两极关系和三角以上的多极格局那么常见，但也非少见。除了中美苏三角外，三角关系的经典案例还包括：19 世纪初拿破仑征服了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大陆之后和 1812 年入侵俄国以前，法国、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20 世纪初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正式形成前，德国、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前夕英法、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

（四）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外交

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最常用也最有争议的概念。最宽泛的理解是：人类生活中的所有观念都属于意识形态。最常见的理解是：它是一种不依赖实证科学的证明而被特定的社会主体所接受的价值观。这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定义。意识形态充斥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国际关系也不例外。

意识形态外交又称价值观外交，指的是一国自觉地把输出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其外交目标的现象。这个界定的要件有三：第一，它是一种自觉的政策行为；第二，它是一种主动性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第三，意识形态外交的目标是以本国的价值观为标准影响和改变他国的价值观和体现了该价值观的内部制度。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才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外交。按照这个公认的定义，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冷战时期西方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和颠覆政策，以及苏联、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而一国在对外交往中不自觉地反映出其价值观的行为，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的行为，均不属于意识形态外交。

由以上界定还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将与国际关系共始终，具有必然性；而意识形态外交则非如此。众所周知，冷战，包括美苏冷战、中美冷战和中苏冷战，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冲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特征。冷战中的美苏中三国都不同程度地推行过意识形态外交。

（五）外交革命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最少歧义。对一国以往外交政策或战略做出的具有否定性质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就是外交革命。毛泽东与此前被认定为头号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敌人的美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决策，以及此后邓小平彻底抛弃中国对外政策中残存的意识形态成分的举措，都属典型的外交革命。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是“否定”，无否定则无革命。换言之，不触动既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假设或基本方向的局部调整，不属于外交革命范畴。例如，1973 年初毛

泽东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由于主要是为既定的联美抗苏战略服务的，故虽然堪称重大的外交调整，但不属外交革命。

四、基本思路和框架结构

（一）基本思路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为理论视角，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的演变为主线，以时间为经，以与联美抗苏有关的重大事件/事态为纬，系统探析 1969～1976 年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来龙去脉，主要是这个战略的缘起、基本内容、实质与特征、毛泽东实施此战略的具体策略、战略得以确立和执行的前提、战略所面临的制约及战略实施的后果。

之所以以与联美抗苏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事态为纬，是因为毛泽东在实施联美抗苏战略的时候，还做了很多事。这些事情，有的与联美抗苏有直接关系，有的只有间接关系，有的是对国际形势的反应，有的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补充。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构成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所有这些政策、战略和策略行为对联美抗苏战略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联美抗苏战略对它们的反作用，既有助于深入了解毛泽东对于联美抗苏的真实看法，也有助于揭示这个战略的实际效力、主客观前提、受到的制约、特征和后果等，因而是研究该战略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途径。

换言之，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通过几个重要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之间的互动，达到揭示后者的比较全面的丰富的面貌的目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是互动，那么研究对象到底是谁？是联美抗苏，还是与其互动的其他问题？笔者的回答是，首先，就单个案例来说，以台湾问题为例，既研究联美抗苏战略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又研究台湾问题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才能勾勒出台湾问题视角下联美抗苏的全貌。表面看来，前者中台湾问题是研究对象，后者中联美抗苏才是对象。但前一种研究有助于揭示联美抗苏战略的某些政策动机和政策后果，这是本研究目的中历史描述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所要求的。而且，这种研究中涉及的仅仅是台湾问题中受联美抗苏影响的那部分。其次，把所有这类互动的总和加在一起（当然不是机械的相加），得到的就是由多个侧面综合而来的联美抗苏的某种全貌而非与其互动的任何其他历史案例的全貌。最后，在互动研究中，重点还是放在这些历史案例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

响上的。

（二）框架结构

首先，叙述了联美抗苏战略的缘起和概貌，初步归纳了其最基本的内容和特征。这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果说本书主要是从各个侧面进行研究的，这第一章给出的则是正面。两者合起来，才全面。正因为这一章旨在为后文的历史叙述和理论分析提供基本的知识背景，才对中美双方的战略考量和决策过程做了大致同等篇幅的叙述和研究，以后各章的叙述视角都是中国视角。这一章最大限度地简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重点叙述和分析了双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样做有三个理由：其一，后面各章都大量涉及乃至重点研究了联美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第二，促使中美走到一起的仅仅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共同利益；第三，在联合抗苏或制苏的决策和执行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主要是中方。

接着，本书用四章的篇幅讨论了彼此间不无关系的八个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战略间的互动。各章的顺序、每一章讨论哪些问题，既基于这些问题的时间顺序，也基于它们之间的经验联系和逻辑联系。

这个战略一开始就受到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困扰，在这两个方面美国都是中国的敌人。首先单章论述的是联美抗苏与台湾问题的关系。1972 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联美抗苏战略的正式确立。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只是在美国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做出了“断交、废约、撤军”的承诺后，毛泽东才同意公开接待尼克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对毛泽东来说是联美抗苏战略得以成立的最起码前提。从时间看，其他事件和事态要么发生在台湾问题上的妥协达成之后，如越南战争的结束；要么作为一个客观事态，虽然与台湾问题同时存在，但其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要到 1972 年以后才完全显露，如“文革”时期的国内政治和革命外交。台湾问题与其他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又十分重要，涉及中美间的重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这是单章安排的理由。部分地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拒绝全面履行在《上海公报》发表前做出的“断交、废约、撤军”的有约束力的承诺，毛泽东采取了限制中美军事交流的举措。这是中美战略合作长期停留在务虚和默契层次的一个原因。

第三章专章处理印度支那战争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这样安排的理由是：70 年代初仍在持续的印度支那战争，和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间接为敌状态，不可能不影响双方的抗苏制苏战略合作。印支问题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困扰，随着 1973 年 1 月《巴黎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基本结束。更密切的中美合作，随之

而来，其表现是，印支停战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提出了旨在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一条线”策略。在既已先后明晓美国卷入印支战争的防御性动机和退出印支的意图之后，特别是在面临着几乎不可逆转的苏越接近的趋势、觉察到越南控制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抱负之后，毛泽东依然大力支持越南抗美统一战争，主要出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考虑。这种使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在帮助越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完成民族统一的正义事业及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便利了苏联从南边包围中国的意图的实现，后者与联美抗苏的政策意图是有冲突的。但毛泽东在美越谈判的最后阶段对中国立场的微妙调整，帮助美国部分实现了其体面退出印度支那的意图，为毛泽东强化其联美抗苏战略，即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提供了前提。总之，毛泽东的印支政策对于其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是复杂的。

“一条线”和“一大片”是中国特色的对苏遏制和孤立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它的实施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中国与众多国家的友好关系，继联美抗苏战略的提出和初步实施之后，彻底结束了中国的国际孤立。由于中国与有关国家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性的不同估计，和与此有关的不同的国家利益，毛泽东基本未能实现其孤立苏联的初衷。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视角看，这一策略的局部受挫与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苏联的不妥协立场（注意，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妥协，而非国家间关系方面的不妥协）有关。表现为，一方面结束了以反美划线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又部分地实行以反苏划线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是比美国更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认同这个判断。

缓和是“一条线”未能建立起来的直接原因。70年代，美欧日基于其不完全与中国一致的安全利益、对苏联威胁的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和与苏联共有的避免核大战的愿望，在维持冷战格局的前提下，对苏奉行长达十年的缓和政策。这种政策之得以推行和部分成功，还在于1972年以来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所占据的比中国更主动的地位，这种地位使美国同时减少了来自中苏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所坚持的、同时基于反修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考量的对苏联威胁的高估及相应的对苏立场。这一立场使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缺少足够的弹性，进而使中

国失去了本应拥有和一度拥有的三角关系中的最主动地位，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经验的和逻辑的联系，本书把“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缓和与大三角问题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放在同一章处理，即第四章。

第五章依次分析了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和三个世界战略理论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淡化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能够与此前的头号意识形态对手实行战略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追求，包括支援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政府革命武装，支持国际上几乎一切反苏力量。在支持反苏力量这一点上，世界革命逻辑和国家安全逻辑达到了一定的统一。但革命外交客观上也疏远了“一大片”策略所欲联合或中立的国家，因而也影响了联美抗苏战略效力的最大化。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既使得毛泽东拒绝具体的中美军事合作，也为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提供了合法化辩护，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反帝反修为目的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其一，削弱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地位，妨碍了中美军事合作和中国对西方的开放，故对联美抗苏战略有消极影响；其二，由于“文革”路线强调反修防修，这一点又便利了联美抗苏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最后，由于中美最高领导人是在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合作的，故意识形态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都是很有限的。总之，联美抗苏战略本身的实施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但毛泽东对其的理论阐释和辩护乃是基于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战争与革命理论和他本人的反修防修理论，这个现实主义战略也受到毛泽东依然部分坚持的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的影响。考虑到革命外交和“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内在联系，故合在一章。

部分基于对“一条线”外交策略和革命外交的反省而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强调反霸甚于反帝，是毛泽东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跃，缓解了革命外交与联美抗苏之间不协调的关系。其放弃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思维与联美抗苏的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其强调苏联威胁甚于强调美国威胁的明显政策意味，为联美抗苏提供了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间接的战略辩护。出于上述理由，也由于时间上它是最后出现的，故作为最后一个历史视角，放在第五章中。

最后一章从与毛泽东进行比较的角度，对邓小平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调整和与此相关的外交革命进行了简要回顾和理论总结。这种比较是为客观、丰富和

全面地理解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所必要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在本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最直接也最典型地体现在这一部分里。

本书的附录是对从中共九大到十三大的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与联美抗苏有关的内容的文本分析，包括对历次报告中若干重要概念的出现频率的统计分析。它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就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即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外交指导思想的演变的角度给出从毛泽东的联美抗苏到邓小平的联美抗苏的变迁轨迹，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地位、意义和局限性。笔者本来考虑将其放到正文里，仅仅出于结构上的考虑，才作为附录。

上述思路和结构也鲜明地突出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关系这个研究主线。

第一章

联美抗苏战略的缘起与概貌（1969～1976）

综合已有研究，上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出现的中美联合制苏抗苏的战略格局的宏观背景包括：60年代后期起出现的美苏冷战中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亟欲脱身而不可得的战略困境，中苏论战的加剧和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巨大压力，及以“左右开弓”为特征的世界革命外交的受挫使中国面临的严重的国际孤立。这种战略合作的地理基础在于如下事实：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而美国与中国远隔重洋。

具体到毛泽东的心理层面，驱动因素主要有：美国政府特别是尼克松政府多次释放的善意信号，包括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做出并信守的不入侵越南北方和中国的事实承诺对他的触动；避免出现美苏合作对抗中国这个最坏局面的意图；他本人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借机解决台湾问题的考虑；对革命外交屡遭挫折的失望和反思。

总之，促使毛泽东做出联美抗苏决策的因素是多样且复杂的，但无非两类：国家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

以上提到的越南因素、台湾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将另有专章论述。本章旨在阐释与联美抗苏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两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联合美国抗衡苏联？1969～1976年联美抗苏战略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是什么？

第一节　苏联威胁的缘起

一、捷克事件前毛泽东对苏联的威胁认知

在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的一系列问

题上的判断越来越严重，但始终没有突破以下底线：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判断是：苏联是修正主义而非帝国主义；对苏联对华威胁的判断是：意识形态威胁大于国家安全威胁；对美苏关系的判断是：苏修主要是美帝帮凶而非竞争对手。

中苏交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归纳起来学术界有两派意见。沈志华、李丹慧和杨奎松等认为，是意识形态分歧和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冲突。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逐渐积累，两党论战愈演愈烈。这种分歧除了理论是非外，还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人的个性、毛泽东和中共与赫鲁晓夫和苏共夺取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的冲突交织在一起。① “大跃进”运动名为超英赶美实为赶超苏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一定程度上是其夺取领导权战略的一部分。② 其次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矛盾尤其体现在核问题、台湾问题和苏联将中国纳入其对外战略轨道的企图和毛泽东争取完全摆脱苏联束缚、追求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努力上。继 1958 年春夏的长波电台事件和联合核潜艇舰队事件之后，1958 年 8 ~9 月的金门炮战进一步暴露了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严重分歧，这些事态促使赫鲁晓夫决心以停止核援助的强硬手段迫使毛泽东调整政策。③

李捷则认为，中苏交恶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核心是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被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苏论战使中国真正脱离了苏联的

---

①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 年，第 265 页。又：关于领导权问题，笔者的理解是，根据马克思所提出、主要由列宁所发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世界革命的战略理论，以反帝反资反殖为主要任务、以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客观上必然要求有一个世界性领导中心，担负这个中心角色的特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义务和付出最大的牺牲。不论称其为国际共运领导权或领导中心，还是世界革命根据地或世界革命的中心、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等等，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述的不同方式，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从十月革命胜利至迟到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苏共和苏联是公认的中心。根据 1949 年底在莫斯科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分工，中共主要承担了支援发展中世界，主要是亚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事实上这是两党领袖一次协商一致的领导权的部分转移，同时国际共运的最高领导权依然在苏联肩上。随着对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结论的逐渐得出，毛泽东逐渐地得出了世界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共和中国身上的结论，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党和中华民族当仁不让、责无旁贷的权力、责任和义务。苏共一贯反对这一理解，由此客观上引发了两党两国争夺领导权的事实。

②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 237 页。

③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 232 ~236 页。

轨道，开始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战略地位。当然负面影响也不小，表现为国内政治的日益“左倾”和外交政策的严重偏差，还有对中国安全的消极影响。①

笔者看法是，真理在两者之间，中苏国家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实难做出孰主孰次的简单判断。

至迟到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已经得出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明确结论。这时的他依然相信苏联是反美的，中苏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② 从1964年开始，随着美国加大对越南战争的卷入和中苏边界争端的逐渐显露，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侵华的可能，但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前，并没有做出确切结论。在此期间，他反复向兄弟党领导人和在华外国专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可不可能美苏共同对中国开战呢?”③ 越战升级后，毛泽东认为，与美国的战争迟早要打，④ 此后逐渐得出了反帝必须反修的结论，进而为中国外交规划了建立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任务。1965年3月，苏共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坚持召开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即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一争执说明，中苏两党分歧与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有关。1965年9月29日著名的中外记者招待会⑤后，陈毅说，西方国家的敌意才是苏联面临的真正威胁，一旦西方与苏联发生激烈冲突，中苏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将不复存在，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合作一定会重新恢复。⑥ 这番话

---

① 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98～499页。

② 石志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③ 转引自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10月，第9页。

④ 毛泽东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964年8月6日，就明确认为：“要打仗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⑤ 在这次招待会上，陈毅说了一段引起国际轰动的话，大意是，即使美帝、日本、台湾当局、印度、苏联等从四面八方一起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不怕，他一直在等这一天，头发都等白了。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当时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的评估。

⑥ 陈昊苏：《他在外交史上留下了英名》，《世界知识》，2001年第16期，第30～31页。

可能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对于苏联回到他认为正确的轨道上来，还抱有一线希望。周恩来在1966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一席话反映了捷克事件前毛泽东关于中美苏关系及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考虑。周恩来说："国际统一战线，主要矛头是打击美帝，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要称霸世界，是美帝为主。""苏联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是它的主观愿望，它实际是美帝的帮凶、别动队。"① 既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又加上主宰世界的愿望，苏联从而具备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中的两个要件。但是这时的他尚没有明确得出苏联已是帝国主义的结论。1966年3月22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表示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国内学界一般以这件事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性事件。为反修防修，即为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他身后"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动了"文革"。

总之，在苏联侵捷前，毛泽东更强调苏联的意识形态错误即修正主义，不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始终把美国锁定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在理论表述上，这一认识表现为不认为苏联是帝国主义。反帝反修的口号中，②"帝"指美国，"修"指苏联，而且"帝"在前"修"在后，这就间接表明：第一，苏联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第二，苏联不是中国的头号威胁。这反映了毛泽东的判断：苏联的社会主义外衣使其美帝帮凶的角色不易被世界人民和各国革命力量所识破，对苏斗争不利会妨碍反美斗争。但是捷克事件促使毛泽东对苏联的角色做出了新的判断。

二、捷克事件和珍宝岛事件后对苏联威胁的认知

（一）"社会帝国主义"判断的提出及其含义

1968年8月21日，苏联等华约五国侵捷。周恩来立刻指示外交部研究处理方案。这时他发现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日，后者此时被苏联视为另一个眼中钉，面临兵临城下的形势，齐奥赛斯库希望中国给予支持。毛泽东遂指示周恩来出席招待会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外交部立刻起草讲话稿。22日，周恩来在起草小组会议上说：要从世界战略的高度，从美苏勾结

① 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3页。

② 《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

企图主宰世界来批判苏修侵捷。他随即举出勾结的实例：出兵前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打了招呼，得到了美国默许后才动的手。23 日，先后发生了三件事。先是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中国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捷克事件后的形势，决定对苏联严厉谴责。会后周恩来向林彪通报了会议情况。① 当天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第一次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当晚，周恩来在罗马尼亚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也做了同样表述。② 这种定性显然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表明毛泽东开始真正担心苏联会像对待捷克那样对待中国，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定性背后国家安全方面的潜台词。③

（二）急剧增加的军事威胁

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在中苏友好的条件下，这一地理形势是中国安全的保证；在中苏交恶之后，它就成了中国安全的心腹大患。1966 年前，中苏边境大体保持军事均势，双方军力都少。中苏边境的苏军总额，1964 年为 12 个不满员的师。在新疆对面，苏军人数多些；在东北，中国军队人数占优势。当然，苏军在质量和后勤上一贯占优势。1966 年初，苏联开始把驻东欧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调到远东，可以发射核弹头的地地导弹也出现了。1966 年 1 月，苏蒙签署了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条约允许苏军驻扎蒙古和设置基地。此前由于中苏中蒙友好，在蒙古没有苏联驻军。1969 年 3 月的珍宝岛事件后，两国关系迅速滑向战争边缘。苏联领导人和军事首脑不断放出战争威胁言论，同时进行军事部署，包括：大量增加军费；在中苏、中蒙边境增修了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在边界进行军事演习；向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1970 年底时已有 40 个现代化的师，其中驻蒙苏军增加到八个师。④ 1969 年 8 月 13 日，在新疆与苏联的交界处，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8 月 18 日，苏联驻美大使馆官员询问美国同行，

---

① 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51 页。

② 蒋本良：《“苏联侵捷事件”与中国策略》，《世界知识》，2001 年第 4 期，第 42～43 页。

③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92 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陈瑶华、方辉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第 220～221 页。

如果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① 西方媒体也传出消息说苏联情报人员在向美国试探"外科手术"的可能性。② 这年夏天，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外交官正向西欧和东欧各国进行频繁的口头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1969 年 8 月下旬，苏联空军在远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停飞待命，"它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一场紧张的神经战中的严酷警告"。④ 1971 年 5 月，苏联又向中蒙边界增兵，使总兵力达到 44 个师，迫使中国也大量增兵。⑤

（三）苏联孤立中国的外交努力

此时的苏联也不忘在外交上进行孤立中国的努力。1969 年 4 月 3 日，多勃雷宁对基辛格说，现在还有时间由两个超级大国来指导事态的发展，但是，不久它们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力量了。⑥ 同年上半年，苏联先后派出 20 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国家游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⑦ 同年 6 月 8 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对毛泽东和中共进行大肆攻击，并且再次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诚如基辛格所言，这样一个体系只能是针对中国的。六月下旬，苏联驻西欧各国大使一致行动起来，揭露中国对驻在国政府的"阴谋"，阻挠西欧各国承认北京。在这个阻挠中国打破孤立状态的努力的运动中，苏联外交官暗示，为了利于孤立中国，苏联准备避免恶化与美国的关系。⑧ 苏联还设法扩大它同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甚至向台湾伸出触角。就在前述 4 月 3 日的那次谈话中，多勃雷宁还对基辛格说，对许多苏联人来说，看来台湾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⑨

---

① （俄）贡恰罗夫、乌索夫：《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4 期，第 20 页。

②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 339 页。

③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 339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561 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9 页。

⑤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吴继淦、张维、李朝增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第 382 页。

⑥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29 页。

⑦ 宫力：《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445 页。

⑧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3 页。

⑨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29 页。

（四）中苏间的互不信任和恐惧

事实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中苏两国既互不信任又相互恐惧。正像中国从上到下普遍担心苏联可能侵华一样，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公众也担心中国可能侵略苏联。① 按照勃列日涅夫当时的外交助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夫－艾根托夫20多年后的说法，事实上莫斯科根本就没有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否恰当这一点进行过任何严肃的讨论。"当时很接近领导人的我，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听说过或者读到过这个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艾根托夫认为，完全消灭中国数量非常小的核资源并不会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即使苏联这样做了，中国数百万军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而苏联则会作为核战争的挑起者而声誉扫地。② 当时驻扎黑龙江省虎林县对面的苏军团长、后来的俄罗斯边防军总司令尼古拉耶夫大将在1997年告诉李凤林，③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没有进入备战状态，当时得到的指示是严密监视对岸的动向。④ 笔者的看法是，没有进行过严肃的讨论，并不等于没有任何讨论，因此不能排除苏联当时有过对华进行核打击的动机的可能性。更合理的推测是，苏联外交官的试探，及西方媒体的报道，主要是苏联的一种核讹诈。

三、毛泽东针对苏联威胁的对策

在此局面下，特别是1969年夏天苏联威胁进行核打击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毛泽东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反应。

一是一度判断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据此，1969年9月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⑤ 在1969年春夏，他本人、林彪和后者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均认为，苏联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总

---

① （俄）I. V. 盖杜克：《被困三角关系：苏联与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06页。

② I. V. 盖杜克：《被困三角关系：苏联与美国对中国的开放》，第106页。

③ 李凤林在珍宝岛事件时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④ （美）刘晓原编译：《冷战时期大战略三角关系下的中国和东欧关系——中国、东欧外交官对话录（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6月，第235页。

⑤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62页。

参谋长黄永胜认为中苏必有一战，有大打、中打和小打三种可能，中打是肯定的。① 从1969年6月到10月，毛泽东指示中央采取一系列备战措施。九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准备打仗的会议。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战备令，说美帝苏修正在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的祖国，边疆军民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② 中央军委在8月28日发出了备战令，9月召开全军备战工作会议。10月18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临战状态。林彪的这个命令是在没有事先请示毛泽东的情况下发出的，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③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对林彪和军委办事组采取的备战措施本身有什么异议。根据上述指令，从9月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秘密撤离北京以防突袭；各大中城市也进行疏散，修建防空洞和防核辐射掩体的工作也在全国各地火速和普遍地展开。由此开始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备战运动。9月23、29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

二是谋求降低边界紧张局势。三是试图摸清苏联的真实意图。因此毛泽东接受了苏方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于是就有了1969年9月以来两国关系的相对缓和。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急于搞清中国意图，多次表达与中国举行高级会晤的愿望。1969年9月11日，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内容包括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④ 柯西金还提出了一系列关系正常化的建议。⑤ 1969年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攻击对方的义务。9月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说：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限"，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进攻中国、包括不

---

① 刘晓原编译：《冷战时期大战略三角关系下的中国和东欧关系——中国、东欧外交官对话录（二）》，第235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62页。

③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⑤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94～395页。

会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由于苏共政治局内部的不同意见，此函没有正式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经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① 同时，双方商定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② 10月7日，新华社宣布，中国同意在副外长一级重开与苏联的边界谈判，重申愿意和平解决中苏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否认有要求归还19世纪被俄国抢占的领土的意图。③ 1970年10～11月，中苏根据北京机场协议互派了大使，恢复了年度贸易谈判，两国领导人政务载波电话也恢复了。④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⑤ 总之，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走了出来。这次机场会谈和两国总理信函往来还有一个中方当时不知道的后果。柯西金当时告诉一个与中苏高层都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说：周总理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如果有机会，请你转告，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能进攻的。⑥

这次中苏总理会谈中的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当时周恩来就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核基地一事问柯西金：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⑦ 这增加了中方对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警惕。因此战备工作在这次会晤后丝毫没有放松。柯西金的态度至少证明，苏共政治局至少无意放弃对中国的核讹诈。因此总理会谈后苏联对华战争威胁的缓解是有限的。

第四，接受周恩来、陈毅等提出的建议，谨慎地探索中美和解的可能性。

---

①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95页。
②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75～276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42页。
④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2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1～212页。
⑤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400页。
⑥ 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90页。
⑦ 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20～321页。

第二节 美国对华新判断

中美走到一起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美国更主动。

一、尼克松执政前美国对华试探和观点调整

在珍宝岛事件前，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大的威胁，这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认为中苏分裂后中国客观上成为制约苏联的战略力量，并企图对此加以利用。在西方大国中，戴高乐是第一个把中国视为必要的制约苏联的力量的领导人，他数次向美国领导人推销自己的见解。①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都曾通过第三国领导人向刘少奇主席赠送过他们亲笔签了名的《美国年鉴》。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出访巴基斯坦。在一次参观中，阿尤布汗总统陪同刘少奇夫妇坐在同一辆高级防弹保险轿车上。上车前，阿尤布汗对王光美说："这个车是特意从美国运来的，是美国驻巴大使交给巴方接待刘主席用的。"刘少奇听后并没有拒绝乘这辆车。②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67年初，泰国乃讪访华，探望在中国留学的儿女，同时肩负一个秘密使命。美国驻泰副大使委托他向中方转达约翰逊总统关于美国意欲停止越战的意图。当时特殊的严酷的政治气候使其面见周总理的口信被拒，转达的口信也被置之不理。在华两周即被驱逐出境。③ 事实上，珍宝岛事件前美国对华主动和善意的试探远不止这些。

"文革"开始时，美国政府内主流意见认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是无法预测的和危险的，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到1967年，看法有变，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文革"削弱了中国参与越南事务的能力，对邻国构不成任何威胁。虽然中国言论上没有改变，趋势上却更有防御性了；美国在越战中的实力相应增强，这就为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提供了扩展影响的机会。基于上述判断，约翰逊政府认为，中国的内部混乱可能最终导致解决越南问题。在混乱达到顶峰之后，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53页。
② 胡孝文：《王光美：共和国第一夫人》，《世界知识》，2006年第23期，第45页。
③ 靳文：《他们在新中国当"人质"——中泰关系中一段往事》，《世界知识》，2003年第16期，第51~52页。

两国可能达成谅解，甚至和睦。[①]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文章称：

> 任何美国的对亚洲政策都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永远将中国置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那里胡思乱想，满怀仇恨，威胁邻国。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上，不能让十亿可能是最能干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除非中国发生变化，否则世界就不会太平。因此，在我们能够影响事态发展的范围内，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促使中国发生变化。[②]

这篇文章当即就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③] 到了1968年，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困境的加深和中苏对抗的加剧，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成为愈来愈多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共识。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的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把与中国接触和和解列入他们的竞选纲领。例如，1968年7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洛克菲勒在其竞选幕僚基辛格帮助下起草的关于美苏关系的演讲稿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学会富有想象地同几个互相竞争的共产党国家中心打交道……我愿开始同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当我们增加对它们两家的选择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改善了分别同他们和解的可能性。"[④]

二、尼克松政府早期对主要威胁的认知变化

珍宝岛事件前，从理论上讲，尼克松和基辛格是赞成建立三角关系的。但两人的具体见解有细微差别。在1969年7～8月出访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以前，尼克松有关与中国和解的思想更多地出自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个基本观察，即美国无法也不应该孤立中国这样的大国。[⑤] 基辛格则更多地强调利用中苏矛盾使他们彼此制约的机会。然而，两人都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富侵略性的共产

---

① 姜长斌，高祖贵：《当代中美关系新视野（一）——从解密档案看中美关系》，《世界知识》，1998年第10期，第10～11页。

②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3, October 1967. p. 121.

③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84～685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18页。

⑤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3月，第11页。

党国家。① 在对中苏冲突的认知上，执政之初的尼克松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依然相信，中国的政策是扩张性的，对邻国和地区构成威胁。② 对于珍宝岛事件，他们的最初反应是，更有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③ 1969 年 3 月 14 日，尼克松在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演讲中渲染中国的导弹威胁，说这方面美苏有共同利益，声称："我可以想象，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潜在的中共威胁之下。"④ 在 7 月 25 日的著名的关岛演说中，尼克松继续称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7 月 4 日，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对记者说，如果中苏打起来，"美国最后很可能同它在二战中的盟国苏联并肩作战"。⑤

然而，随着美国对中苏冲突的真相的进一步了解，和尼克松 1969 年 7 ~ 8 月份的出访，他们的偏见很快改变了。1969 年 5 月 20 日和 6 月 20 日在新疆边境发生了两次中苏冲突之后，基辛格从地图上发现，新疆事件地点离苏联铁路线终点只有几英里，离最近的中国铁路终点有几百英里。此后，他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⑥ 在 1969 年 7 月底 8 月初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访问中，叶海亚和齐奥赛斯库说服了尼克松相信，中国不是扩张主义国家，没有威胁过任何邻国。⑦ 1969 年 8 月 13 日的铁列克提事件后，尼克松在第二天召开的一个讨论中美苏关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基辛格称之为"革命性的理论"的结论：中苏冲突中"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苏联摧垮，那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这使其内阁成员大吃一惊。⑧ 这句话颠覆了 1949 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中国比苏联更有侵略性。⑨ 至此，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初步下定了采取主动、打开对华关系以制衡苏联的决心。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27 页。

②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第 11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27 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25 页。

⑤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 年，第 210 页。

⑥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1 页。

⑦ Memorandum Conversation: Privat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Ceausescu, August 2, 1969, seen in William Barr ed., Sino – 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 1969 ~ 1972: Declassified U. S. Documents, Number 14, Source: NPMP, NSCF, box 1023.

⑧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8 页。

⑨ Report of the Sino – Soviet Task Force, April 1, 1961,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Box 22 (Z), Kennedy Library.

三、新的对华战略判断的形成

（一）新的判断的酝酿

作为尼克松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特别是对苏缓和政策和对华解冻政策方面权力仅次于尼克松的决策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大三角关系政策的最终判断对尼克松有着最大的影响力。其人的思想在其就职的头半年里也经历了一个从困惑到明确的过程。基辛格从一开始就坚信，历史告诉他，在面对两个对手时，最好的办法是与较弱的而非较强的一方结盟，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① 但是，他对以下问题依然举棋不定：第一，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是否就一定能确保与苏联取得更稳定的关系，相反的逻辑是否也成立？第二，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目标是降低与这个七亿人口的大国兵戎相见的风险，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是与苏联结盟，还是对华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第三，为什么一个处于孤立中的中国，哪怕它不挑起重大冲突，也必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为什么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必然符合我们的利益？也许一个深度介入国际事务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扰乱秩序且更加难以对付的因素。② 就这些问题，1969 年 1～5 月，基辛格责令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下属进行彻底的研究，并同后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1969 年 4 月的中共九大对基辛格的最终结论起了点作用，使其倾向于相信中国也有和解的需要。在 4 月 29 日向尼克松提交的关于这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分析中，基辛格强调了以下几点：其一，尽管这个报告的调子依然是好战的，但是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除非中国受到进攻，它不会首先发起进攻，这就减轻了我们对中国会干涉印度支那的担心”。其二，九大报告指出，苏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同等威胁，这就满足了三角外交的先决条件之一，即美国不应被视为主要敌人。其三，“贬低美国只是走走形式”，报告用了更多的篇幅和更大的火力攻击苏联。其四，报告本身和九大前后中共官方的公开言论中一点儿也没有表明中国人担心马上会同美国或者苏联发生战争。③“好战”这个词反映了其对中国依旧很深的偏见，但总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3 页

② 《1969 年 3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 368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0 页。

的说来，以上分析不无道理。

（二）基辛格的政策结论

基辛格逐渐但最终得出了以下政策结论，其要点是：美国应该抓住中苏对抗加剧提供的机会，主动但谨慎地改善对华关系，以达到同时缓解中苏对美“威胁”及在美苏中三角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的目的。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由于它的领土之大和人口之多而决不会永远如此孤立”，所以美国的一个目标是，“在中国走出孤立的过程中，确保它举止规范些”。①

第二，“中国目前的政策迫使我们部署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每年约支出150亿美元”。② 这一事实本身就提供了改善美中关系的必要性。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中国对我们的许多亚洲朋友的威胁可能会减轻”。③

第三，亚洲权力体系正在发生变化，其本质是从美国对抗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势力而形成的安全体系向美中苏日四大国互动体系转变，这种新体系与中苏对抗而造成的共产主义势力内部紧张状态密切相关；这种紧张状态随着苏联在东亚扩充势力和中国政策与实力的变化而将进一步恶化。在此情况下，该地区某些小国将可能寻求不结盟政策，日本为提升大国地位也会做出不同选择；如果美国希望在减少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参与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的重要利益，也即减少冲突与开支，掌控东亚均势，就应更加重视政策的灵活性。为此，必须改变中美之间高度对抗的僵硬局面。④

第四，不必过分重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所谓好斗，美国的现实目标“不应该是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思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在力量均衡中的作用。一个周围都是弱小国家的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不管谁在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⑤

第五，美国必须做到：“我们对中苏两者的选择比起它们彼此之间的选择余地总要大得多”，进而迫使“每个共产党超级大国都更愿意建设性地同我们打交道”。⑥

---

① 《1969年3月国安会报告》，第369页。
② 《1969年3月国安会报告》，第366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32页。
④ 《1969年3月国安会报告》，第376页。
⑤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32页。
⑥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18页。

第六，“中国可能不经美国让步而愿意靠拢我们，因为他们需要美国来抗衡苏联”。① “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过去一直成为对话主要内容的实际步骤如承认、联合国会籍、交流等，他们想要的是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使他们四面受敌的噩梦有所缓和。美国新政府准备提供这种保证。”② 这就是说，美国有可能在保持美台关系现状的同时实质性地缓和美中关系。

第七，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会破坏东亚和世界的地缘政治平衡，由此出现的严酷局面不符合美国利益，因此美国必须阻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而一旦发生中苏战争，美国有必要认真考虑援助中国对苏作战的可能性，哪怕届时美中还没有相互承认。③

第八，适度地缓和对华关系，以激起苏联对其漫长的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④

第九，同中国建立联系，需要特别注意分寸和时机。“如果我们行动太快，或者太张扬——在文化革命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我们行动太迟缓，有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苏美勾结，这可能促使他们只好与莫斯科做现实的交易。”“我们选择中国可能有助于使苏联实行克制；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不要操之过急而刺激它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⑤

第十，美中关系解冻不可避免地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国造成冲击。美国决不能牺牲这些盟国的利益；为此，必须“再一次向太平洋盟友保证”，使其相信美国没有在他们背后出卖盟友。⑥ 同时，美国必须使其朋友们理解，尽管“使亚洲的自由国家反对中国在十年前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与其说美国能在排挤中国的亚洲扮演更有效的角色，不如说美国能在包容中国的亚洲起到更大的作用”。⑦

以上见解和结论中依然不乏对中国的偏见。但从中也不难发现，虽然美国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18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35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31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32页。
⑤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32页。
⑥ 尼克松特别强调这一点。
⑦ 姜长斌、高祖贵:《当代中美关系新视野（一）——从解密档案看中美关系》，第11页。

需要中国的合作以抗衡苏联，它从一开始所追求的就是三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而非简单的中美结盟关系。

四、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目标

基于上述结论，1971 年 2 月，在中美秘密接触已有相当进展的背景下，尼克松批准的《国家安全研究第 106 号备忘录》确认了美国对华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报告谈到了“文革”结束后中国试图打破外交孤立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抛弃台湾的趋势及联合国在 1971 或 1972 年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可能，承认美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现实也不适宜。报告认为：任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其自身实力也在增长的国家继续相互对抗，既不可取，也隐含着潜在的危险。①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报告确认：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4～8 年）政策目标是：1. 避免美中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2. 致力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为美国在东南亚取得可以接受的战争解决办法建立支撑。3. 威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非共产主义邻国的侵略。4.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默认的形式）承认美国在亚洲具有发挥作用的正当性。5. 鼓励北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6.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更为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包括参与其不断增长的贸易。7. 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8. 防止北京与莫斯科建立针对美国或美国的亚洲盟友的进攻性联盟。

报告所确认的短期目标（1～3 年）是：1. 劝阻海峡两岸对对方使用武力。2. 通过包括重启华沙会谈或其他中美对话等方式扩大联系，以期缓和两国紧张状态。3. 减轻北京对美苏合作打击或包围中国的忧虑。4. 尽我们所能使得北京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问题的谈判，包括军控和裁军。5. 开启一个可控的直接经济关系。②

撇开其中对中国的偏见不谈，今天来看这个文件，证诸后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以上长远目标基本上都达到了，而且多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达到的。近期

① 《国家安全研究第 106 号备忘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 380～383 页。

② 《国家安全研究第 106 号备忘录》，第 386 页。

目标达到了三个，只有4、5两个目标没有达到。总的说来，备忘录的分析是清醒的，目标是现实的。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的目标部分中只有一处涉及美国联华制苏的企图。这固然说明美国解冻对华关系的动机是多样和复杂的，但并不能说明联华制苏不是美国对华新政策的头号目标。这一点在前述基辛格的政策结论中已经有所表露。对此目标的初步阐释如下。

五、对尼克松基辛格对华政策动机的初步阐释

在初步阐释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意图以前，有必要提及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的1972年2月14日，基辛格对他说的一番话。基辛格说："我们现在关注中国，主要是要用它作为制衡俄国的力量，并非考虑它的区域政策。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策，它目前还没有实施一个全球政策的力量。所以，要阻止俄罗斯吞噬它。假如俄罗斯控制了中国，那将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① 这番话表明，即使中国继续对周边国家奉行反美反帝的革命外交，在全球层面上尼克松当局依然会坚持联华制苏。因为美国主要关注的不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意图，而是中国的实力。至于两国关系的未来，基辛格说他同意法国作家马尔罗的看法，中国将会控制东南亚，使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手段是颠覆，也通过文化影响。② 因此，"从长期历史视角看，他们要比俄国人更加难对付，我觉得，20年后你的接任者，如果也像你一样英明，就会依赖俄国人去制衡中国人"。③

从上述谈话可知，进一步离间中苏关系，联华制苏，是最重要的动机。基辛格认为中国是未来的主要威胁，但不是现在。那么如何看待上一节中所提到的美国政府正式的对华政策目标中，很少涉及这个意图的现象呢？笔者看法是：第一，最高决策者之间的私下谈话，比正式的、哪怕是不公开的政府文件，更能真实反映决策者的意图，这是常识。第二，在存在着中美苏三角格局、美国视苏联为最大威胁和中美长期对抗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任何一点改善，中美相互敌意的任何一点减少，客观上都对苏不利而对美有利，因而都是联华制苏战略的一部分。第三，这与中美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的默契和务虚的特征有关，

① 《尼克松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年2月14日》，《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3月，第406页。

② 《尼克松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年2月14日》，第405页。

③ 《尼克松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年2月14日》，第404页。

这两个特征特别是前者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当时特殊的三角关系包括美国对这种关系的看法的产物。前述基辛格的政策结论对此已有比较透彻的说明。

当然还有其他动机。从上述政策文件中不难看出至少两个动机。一是在短期内不可逆转的苏攻美守的战略颓势的制约下，设法在大三角的权力游戏中居于主导地位，造就一种使中苏双方都有求于美国的格局。换言之，联苏制华也是美国新政策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中国是最弱的一方，且中苏对抗大于中美对抗，美国决策者才在这场均势政治角逐中更多地倾向于借重中国抗衡苏联而非借重苏联约束中国。二是，体面地代价最少地结束越战，也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强烈且迫切的动机。这一点与联华制苏也有很大关系。总之，表面看来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动机是多重和复杂的，但实质是相对简单的。

第三节　中国对美苏的新判断

一、联美政策的最初信号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和后期，基于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双重考虑，毛泽东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左右开弓”战略。在“文革”高潮中，这个战略进一步发展为“打倒帝修反”的激进战略。随着捷克事件和珍宝岛事件的相继发生，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个战略的不足。诚如杨奎松所言，“在中苏关系严重危机时孤立无援的境遇，和多年输出革命毫无结果的困惑，使他重新拾起以往的统战策略。当然，美国这个时期在印度支那战争上的困境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也便利了毛泽东态度的转变”。①

在 1969 年初尼克松就职以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注意到美国在卷入越战的同时尽力避免扩大战争规模的事实，包括：将地面作战局限于南越，对越南北方只进行空袭，竭力避免对中国国土的攻击。另外，早在捷克事件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注意到美国可能调整对华政策的迹象。如前所述，尼克松在 1967 年决定参选总统之后，在《外交季刊》上发文阐述自己的对华外交新理念，其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507 页。

中谈到，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他如当选，将采取主动缓和两国关系。[①]如前所述，这篇文章引起毛周二人的高度重视。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再次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演说。[②] 国内研究者都把这个举动视为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和中国国内干部群众发出的意味深长的信号。笔者以为，这件事确实算得上是毛泽东后来自称的“与尼克松吊膀子”[③] 的开始，但是这个信号太微妙太弱，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和中国基层读者注意到了这个暗示。部分原因是，《人民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发了一篇题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的评论员文章，对尼克松的演说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辛辣的讽刺，攻击和讽刺使用的是那个时期国内外早已熟悉的、中国媒体进行革命宣传时常用的风格。考虑到近两年后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的又一个更明显的信号美国人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更是情理之中。后者指的是，《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5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于当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这一天《人民日报》报头右侧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④] 当然，在“文革”高潮中，作为政策转弯的第一步，也不可能发出更强烈更直接的信号。总之，这两个史实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毛泽东当时已在重新思考对美政策的有力证据。

在珍宝岛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召开的九大上，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五段之多。又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李丹慧认为，这个报告以此向美国发出信号：美苏对中国构成同等危险，但事实上苏联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⑤] 笔者同意这种解读。九大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是当时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此报告的上述倾向可以说完全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

---

①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3, October 1967, p. 23.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25页。

③ 这句话是毛泽东1970年12月19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见：吴旭君：《毛泽东思考着中美关系的五步高棋》，人民网，2003年12月12日09：38，http：//www.sina.com.cn.

④ 《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5日第一版。

⑤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91～392页。

思想。如前所述，这个信号被基辛格捕捉到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放出了愿意与美国和解的最直接的信息：

外交部要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①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②

二、新的大三角战略判断的形成

以上信号只能说明毛泽东正在重新考虑外交战略，不能说明他的最终判断和政策。形成后者的一个重要触媒，是陈毅等四位元帅做出的战略结论。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当面布置陈徐聂叶四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③ 这时珍宝岛事件尚未发生。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意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又当面说：“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④

当时的形势是，这四位老帅同众多老干部一样，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虽然在九大中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也都选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还选为政治局委员，但都处在靠边站、“接受再教育”的状态。当时军委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28页。
②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2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41页。
④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43页

大权在林彪手中，日常工作由军委办事组主持，其核心成员是黄永胜等林彪的心腹。因此，四位元帅开始时并没有能够领会毛泽东的深意，为此询问周恩来：对外方针“九大”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主席还要他们研究？深谙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做了解释：“主席布置你们这个工作，说明主席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鼓励他们大胆思考，不要拘泥于九大报告的套路。① 显然，毛泽东虽然在与“文革”有关的内政问题上不再信用他们，但考虑到对美苏的政策主要涉及民族利益，而且兹事体大，他还是对老帅们的丰富经验和把握战略全局的能力寄予厚望。请陈毅牵头，既是因为陈毅长期担任外交部长，显然也是因为陈毅早在1968年12月就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尽管有越南战争，美国的战略重点没有东移，依然在欧洲，也不同意过分强调美苏共同反华的一面，断定美苏矛盾不可调和。这个结论当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②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四人从3月5日到10月18日进行了23次战略务虚讨论。③ 7月11日和9月17日，四位老帅分别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报告送交周恩来，并经后者转交毛泽东。前一份报告于1969年7月20日作为中央内部文件下发中央负责人。

两份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国际上客观存在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第二，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来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苏修进行

---

①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01页。

② 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③ 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说法。正文所述是《陈毅传》编写组的说法，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383页。而按熊向晖（时任总参二部副部长，是周恩来所委派的这些战略务虚会的秘书和协调人）的说法，四老帅的讨论会从5月中旬到10月18日共进行了近20次。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86～204页。

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

第三，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矛盾不可调和。“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第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以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以找到反华的打手。”“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1. 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2. 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3. 美帝想把亚洲人推向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苏修的胃口比实力大。苏修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多顾虑和困难。在美苏矛盾更尖锐、苏修正忙于与美帝竞争并且双方都以欧洲和中东为战略重点的态势下，苏修如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将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仅仅是以战争相威胁，如果不能事先得到美帝的批准，也是有后顾之忧的，这个“忧”就是两面作战的风险。“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除非这一情况得到解决，否则苏修不会将其注意力专门转向中国，只能首先力争欧洲和进行战略武器竞赛。另外，从能力上讲，苏修还远远没有完成侵华战争的准备。因此，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低。①

最后，在目前美苏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为防止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应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葛罗米柯反华的调门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

① 即使1969年8月发生了更严重的铁列克提事件，及苏联在欧美的外交官纷纷放风说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元帅们的报告依然认为苏联不可能对中国发动核外科手术或大规模战争。见 Chen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Press, 2001, pp. 246, 248.

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自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①

在历经数月的研讨行将结束时，陈毅还特别强调，即使不发生中苏战争，中国也有必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

> 为此，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
>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②

这个想法，没有写进报告，而是由陈毅在递交第二份报告的当天，当面向周恩来做了口头汇报。

以上结论回答了毛泽东周恩来最关注的几个战略问题：三角关系中的两两矛盾中，哪一个是最主要的矛盾？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在哪里？美苏两家中谁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苏联单独发动和美苏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各有多大？据说毛泽东读了这两份报告后未置一词。③ 但以后的事态间接表明，以上基本

---

① 以上报告内容和笔者对报告内容的归纳源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86～204页；Chen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Press, 2001, pp. 246, 248. 另外，有些研究者断言四老帅还提供了名为《从世界森林看一颗珍宝树》的报告。见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研究纲要》，载《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8页。根据直接当事人熊向晖的回忆和《毛泽东传（1949～1976）》（下），这不是事实。见《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191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25页。

② 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③ 宫力：《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48页。

结论都被毛泽东接受了，或者说和毛泽东的思想不谋而合，加强了毛泽东已有的判断。应该说，老帅们的结论对于毛泽东下定联美抗苏的决心，是一个不小的推动。报告还表明，元帅们对中美苏关系是三角关系而非结盟关系的实质，是清楚的，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表述。

基本上，从1969年10月老帅们完成他们的研究，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关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基本战略判断没有实质性变化，有的只是细节上的变化。对此进一步的讨论如下。

三、中苏战争可能性评估与对苏联威胁的具体担忧

除了从捷克事件到1969年下半年这个短时期外，对于苏联无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包括对中国核设施的所谓“外科手术”），毛泽东一直有着足够的自信。即使在那个例外时期，毛泽东的担忧也是有限的，他更多地是出于做最坏打算、有备无患的战术心理，而非对中苏大战的不可避免的战略认知，采取一系列备战措施的。冷战后披露的一系列中外史料以及中外学者据此进行的研究大多表明：珍宝岛事件从战术上讲是中方挑起的。① 其目的包括内政考虑、自卫反击和试探苏联和美国的反应。适度加剧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在毛泽东看来有助于结束个别地区尚存的武斗等无政府状态以及进一步营造反修防修的氛围，这两者都是为九大的成功召开和九大精神的贯彻所必需的。②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人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③ 这席话表明，虽然挑起珍宝岛事件是毛泽东面临苏联不断在边境滋事的压力之下做出的自卫反应，同时也是为了试探美国的反应，摸清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有多大。毛泽东不怕打仗，但也绝非好战。对于苏联不会大举侵华这

---

①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② 李丹慧认为，中方抓住珍宝岛事件大做文章的政治动机大于安全动机。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87～393页。杨奎松认为，1969年8月23日和8月28日的中共中央战备令有很大的对内考虑，是毛泽东周恩来借机整顿国内无政府秩序的一个手段。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第447页。

③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645页。

一点有相当的把握，和他需要进一步试探苏联的意图和胆量也并不矛盾。珍宝岛事件也有威慑的意图。他的一贯信念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越软弱，对手就越嚣张；和平是斗出来的，不是乞求来的。如前所述，在珍宝岛事件后半年内中苏之间战争气氛剧烈之时，毛泽东关于中苏大战可以避免的信心一度有所动摇。但这时元帅们依然认为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极低。这是一个英明的判断，很可能使毛泽东恢复了中苏大战可以避免的信心，虽然中国在当时不可能了解苏联的决策内幕。

对此还可以补充几个证据。珍宝岛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① 1969 年 9 月 11 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双方边界驻军脱离接触等协议，双方由此基本摸清了对方无意首先侵略自己的真实意图，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事实上，认定苏联不可能大举侵华的想法，不独毛、周和老帅们有。据李凤林回忆，珍宝岛事件后，西方传媒散布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之时，中国驻苏使馆的看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不会进攻。②

在中苏冲突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都基本自信苏联不会大举侵华，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剩下时间（1970～1976 年），他的这种信心自然更强了。近来，有俄国学者认为，虽然中苏边境冲突演变成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早期一直以较小的可能性存在着，中国领导人并不明显地为之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们与美国人的谈话中，更多地是将中苏边境冲突用作一种心理手段，来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是冲突的受害者而非挑起者。③ 众多史实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必须指出，中国领导人所欲使美国人相信的，是事实而非谎言。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当基辛格谈到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④ 毛泽东对中苏矛盾和中苏战争可能性的判断，只有一点是有偏差的，即高估了苏联的侵略意图。事实上，只要苏联确信中方没有侵略苏联的意图，苏联不仅没有侵华

---

① （俄）贡恰罗夫、乌索夫：《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第 16 页。

② （美）刘晓原编译：《冷战时期大战略三角关系下的中国和东欧关系——中国、东欧外交官对话录（二）》，第 235 页。

③ （俄）I. V. 盖杜克：《被困三角关系：苏联与美国对中国的开放》，第 109 页。

④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669 页。

的实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①

既然不那么担心苏联的直接的战争威胁，那么，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到底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撇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暂且不谈，在国家安全方面，直到去世，毛泽东的忧虑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担心苏联意图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把中国变为近似东欧的卫星国，这是对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的威胁。这种担忧由来已久，苏联的这种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沈志华、李丹慧基于对原始档案的研究，试图表明，在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上的中苏分歧，并非源于苏联控制中国的企图，而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际关系中盛行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国家间平等原则之间的天然冲突以及毛泽东对主权和自尊的敏感有关。② 笔者以为，对此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地看。中苏分歧确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国家间平等原则之间的冲突有关。但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及中苏国家间关系方面的其他问题上，考虑到中苏相对实力的明显差距、苏联习以为常的大国主义外交风格、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等，毛泽东对主权和平等地位的高度敏感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在这两个具体案例中，即使赫鲁晓夫主观上没有恶意，如果毛泽东不做出表面看来是过分的反应，苏联方面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寸进尺，届时中国的主权真有可能受到伤害。其二，担心苏联建立包围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两国间极度互不信任且相互之间恐惧很大的既定情势下，这个担忧是有根据的。苏联确实在这么做。其三，担心美苏之间达成牺牲中国利益的“祸水东引”的妥协，即美苏缓和其在欧洲的矛盾从而使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届时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可能的了。这个忧虑是有其合理成分的。所有这些，连同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就构成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③ 的全部内容。以上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后文将有详细讨论。

四、美苏争夺大于美苏勾结

美苏关系是以合作④为主还是以争夺为主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毛泽东

---

① （俄）贡恰罗夫、乌索夫：《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第 20 页。

② 沈志华、李丹慧：《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③ 这是那些年中国对内对外宣传的最重要主题之一。

④ 又称妥协，当时中国政府和媒体更喜欢用“勾结”一词。

关于矛盾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所赋予的。如果美苏勾结大于争夺，其矛盾就是非主要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政策上这种矛盾为我所用的空间就有限，即美苏不大可能被分化，其中一方不大可能成为统战对象。如果美苏争夺大于勾结，其矛盾就更可能是主要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与其中一方建立某种统一战线以对付另一方的可能就大得多。

1963 年以来，毛泽东一直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视为国际战略格局的主要特征。这个判断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是在 1965 年 6 月。这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第一次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① 中苏交恶的一大根源，就是毛泽东断定苏联已经走上与美国妥协以共同主宰世界的错路。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扑灭世界革命烈火和反华的事业中，美苏勾结为主，争夺为辅；苏联是美国的小伙伴、帮凶，但又不甘心这个地位，想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以上就是从 1963 年直到 1968 年捷克事件为止毛泽东对苏联的国际角色和美苏关系的性质的主要判断。②

认为美苏有妥协有争夺，但争夺是主要的，这个判断是捷克事件以后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认识的形成过程中，1968 年 12 月陈毅的报告，和 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四位老帅的研究结论，显然都对毛泽东的思考起了作用。1969 年 9 月 7 日，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将尼克松意欲改善中美关系的口信转告周恩来，这时距珍宝岛事件已有半年，而周恩来还是沿用此前的一贯思路，说美苏的对外政策是要联合起来，主宰世界。③ 这说明，虽然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但显然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政策，因此周恩来尚不便告知外宾。当然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也有另一个可能，即毛、周出于策略考虑决定暂不急于向外界包括美国转达其缓和中美关系的新考虑。1969 年 11 月 21 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出访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国际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

---

① 《人民日报》1965 年 6 月 14 日，第一版。

② 1963 年 7 月美苏英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此举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毛泽东据此第一次做出美苏合作妄图主宰世界的判断。

③ 外交部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5～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539 页。

么看不到矛盾呢?"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基本接受了陈毅等人的分析，放弃了传统的"美苏勾结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1973 年九月中共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再次强调了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的观点：

> 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②

说美苏争夺是绝对的和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就等于断言美苏矛盾本质上不可妥协。之所以如此，还在于美苏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苏联侵捷事件和苏联提出以"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为核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毛泽东就把苏联的角色定位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根据毛泽东所笃信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之间围绕重新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本质上是不可妥协的。这一判断，屡屡见于 1969～1978 年的中国媒体，特别是著名的两报一刊。③

五、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

仅仅判定美苏争夺的一面大于勾结的一面，并不足以为中美合作以对付苏联提供充分理由。如果中美矛盾比中苏矛盾还要大，即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比苏联构成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不管美苏矛盾如何尖锐，中国也绝无可能联美抗苏，联苏抗美倒是自然的选项。同样，如果中美矛盾大于美苏矛盾，美国也没有任何理由联华制苏，而应该是联苏制华。在这个问题上，陈毅等提出、毛泽东所接受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为中美合作制衡苏联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关键条件。因为这两个判断必然逻辑地导出第三个判断：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样一来，苏联就成为中美两家共同的头号威胁，中美合作抗衡苏联于是成为必要。从以上判断中还可以推出如下判断：既然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则中国只是苏联的第二号敌人；美苏矛盾又大于中美矛

---

①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334 页。

②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 年 9 月，第 22～23 页。

③ 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盾，则中国也只是美国的二号敌人；进而美苏互为头号敌人；所以在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美苏竞相讨好的最主动地位。这也正是陈毅的推理。于是联美抗苏不仅必要，还有了可能，这还意味着，在中美相互利用抗衡苏联的博弈中，更有可能是中国利用美国，而非美国利用中国。

六、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和中东

60 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其具体目标，一是巩固对西欧的控制，遏制苏联对西欧的渗透，二是结束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1964～1965 年美国全面卷入越战以后，对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否东移，即与中国为主要对手，毛泽东一度举棋不定，一度认为与美国的战争迟早要打。在他看来，一方面美苏勾结大于争夺，其表现之一就是美苏在欧洲的争夺趋于和缓，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两次柏林危机那样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重兵卷入越南，其意图显然是为以后发动侵华战争准备跳板。1966 年 4 月 10 日周恩来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领导人转达的四句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忧虑。传话的内容见第三章第一节。1964 年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对草拟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做了重大修改，从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善民生为主转为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为主，以准备应付美国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

在做出美苏争夺大于勾结和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的结论之后，美国侵略重点的问题就转化为美苏争夺重点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认定重点在亚太，即中国和中国周边，那么无论谁在这场争夺中取胜，都是对中国的威胁。因为，第一，二者都是中国的敌人，只是严重程度不同；争夺又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很难置身事外。第二，鉴于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矛盾难于妥协，争夺很可能导致美苏在中国周边打起来；在当时情势下，最有可能是美苏在印度支那直接兵戎相见，而战争的结果很可能将是美苏中的一方控制印度支那。在上述情况下，中国的处境将极其被动。

如果认定美苏勾结大于争夺，而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都比美苏矛盾尖锐，并且美国战略重点在亚太，那么，发生美苏联手反华的可能性就极大，发生美苏联手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恰恰就是越南战争升级后直到珍宝岛事件为止中国领导人几乎就要得出的基本判断，当时中国对内对外宣传都强调这个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对于这一点始终不是那么肯定。1965 年中美就

越战问题进行的信息传递，此后近一年美国在越南的困境的初步显露和美国恪守不把战火烧到中国的承诺的事实，使毛泽东对于越南战争不致导致中美战争有了信心。在捷克事件、珍宝岛事件、美国在越南的困境呈深化和长期化态势、美国亟欲从越南脱身的迹象日益明显以及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等一系列事态发生后，以及这些事态促使毛泽东得出了以上所述的关于三角关系的一系列矛盾的基本判断之后，再坚持说美苏争夺的重点在亚太、在中国周边，就非常勉强了。既然美苏矛盾比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都要大，美苏之间又是矛盾多于合作；美苏都把中国视为二号对手，而中国的核心利益集中在周边，在欧洲没有什么重要和直接的利益，倒是美苏在欧洲的利益非常集中而且重要；并且1965年以来有关越南战争的事态发展和中美间的秘密接触至少初步证明美国尚无认真的侵华动机，那么，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而非亚太，就是很自然的结论。这就是陈毅等得出美苏争夺重点在欧洲不在亚洲的结论并被毛泽东接受的基本理由。考虑到美苏矛盾不可妥协，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美苏在欧洲的矛盾也是不可妥协的。

毛泽东得出或接受了这个结论后再也没有动摇过。鉴于中东的地缘战略地位、石油储备和当时中东因阿以冲突和美苏在其中各助一方所致的长期紧张态势，他也接受了老帅们把中东列为美苏争夺的第二个重点的结论。1971年5月29日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尼克松政府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而不是远东。"①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对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②

七、联美抗苏的政策结论

由以上判断为基础得出的具体的战略推理和政策结论如下：

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可能性，以及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小于美苏争夺以

---

① 陈东林、杜蒲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3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56页。

致爆发美苏热战的可能性。由于美苏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这场战争最有可能首先在欧洲爆发。如果美国和西欧不做好准备，针锋相对，欧洲大战将难以避免。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苦于力量不足，正在退出亚洲，以求在欧洲和中东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大于美国对华威胁，但苏联大举侵华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苏联因为灭亡了中国而坐大。苏联在征服欧洲或与美国达成战略妥协以前不大可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它担心这样会陷入两面作战的泥潭。至少在理论上，不同程度上两两为敌的三国都有两面作战的风险，都力图避免这个风险。① 由于美苏矛盾最大而中美矛盾最小，如果说存在两面作战的可能性的话，苏联陷入与中美同时两面作战的可能性最大。为了缓解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压力，防止苏联发动侵华战争这个不大但最坏的可能成为现实，有必要也有可能打美国牌。虽然也存在美国对中国打苏联牌、对苏联打中国牌以及苏联对美国打中国牌、对中国打美国牌的可能，由于在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最主动的地位，中国打牌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以上战略判断逻辑上就预示了中国在外交上利用美苏矛盾、调整和突破中美关系的政策前景。② 快到1970年1月底的时候，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这一秘密渠道接到1969年年底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报告说：大使发现，周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至于美国，周明确认为是一个次要威胁；这位大使的印象是，周恩来似乎已经准备好，只要美国采取主动，便举行高级会谈。③

综上，到1969年底1970年初之际，通过多年来的相互试探、摸底、观察和思考，中美形成了重叠的战略共识。其内容是：无论在相对意义还是在绝对意义上，苏联的军事实力都在上升，而美国在相对下降；就战略态势来说，由于实力明显增强，扩张性依旧存在，苏联依然是西方安全的头号威胁，国际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在现阶段，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外交并不构成对美国利益的实际威胁，在地缘政治上对西方也不构成威胁，既没有这样的意图，更没有能力；在彼此借重平衡苏联上升着的威胁方面，中美有共同利

---

①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指出："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8～79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第325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37～338页。

益。这些共识完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虽然在苏联威胁的程度和其动机等具体方面，美国决策者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判断，以上共识已足以支撑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合作。

但是对于美国究竟是否完全放弃了与中国为敌的意图，在与美国决策者面对面打交道之前毛泽东还不能完全做到心中有数。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他与基辛格第一次会谈的汇报后，指示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① 毛泽东这里的意图之一是摸美国的底牌，以便做最后的战略取舍。第二次会谈中，基辛格听完周恩来的上述"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以及准备美苏日印一起瓜分中国的话后，立刻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进攻中国。美国和自己的盟国与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至此，毛泽东进一步确信美国没有威胁中国的动机。② 在这次会谈以及1971~1972年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多次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还向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表示了美国希望尽早从越南撤军、结束越南战争的迫切愿望，并要求中国方面向越南北方做工作，敦促后者放弃以推翻南越亲美政权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的立场。毛泽东由此进一步确认了美国结束越战的诚意以及无意入侵越南北方、无意从南边包围中国的事实，进一步坚定了联美抗苏的决心。

第四节　中美外交革命与战略默契

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第一个公开信号是在1969年五一劳动节发出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众多外国驻华使节及代表团，包括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表达了愿意改善和发展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的友好关系的愿望。6月，陆续恢复派出驻外使节。在那以前，从1967年年初起，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国参加"文革"。③ 中国与多数建交国的关系要么恶

①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41~42页。

② 符浩、李同成：《外交风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64~65页。

③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03页。

化，要么名存实亡。

1969 年 9 月 11 日的中苏总理会晤及 10 月重开的中苏边界谈判使尼克松一度紧张，担心出现中苏和解乃至联手对付美国的态势。基辛格向尼克松提供了他对此事的分析，说中国态度变化可能有两个因素：越来越担心苏联的进攻，周恩来代表的务实派重新控制了外交政策。同时向尼克松保证说，这丝毫不代表中苏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仅仅是双方为避免谁都不想要的战争而采取的战术行动。① 必须承认，这些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一、基辛格访华前的中美战略默契

中美之间的战略默契甚至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就开始了。这些早期的默契进一步深化了双方各自的战略判断，为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特别是后者铺平了道路，构成了中美合作抗衡苏联的格局内中美各自的第一批收获。归纳一下，中方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尼克松暗中鼓励西欧承认中国

就在就职后第五天，尼克松还因为意大利与中国建交而发怒，抱怨美国驻意大使无能。1969 年 6 月下旬，苏联驻西欧各国大使一致行动起来，攻击中国对驻在国政府的政策，企图阻挠西欧各国承认北京。尼克松得知此事后立刻指示基辛格，要求巧妙地鼓励所有被苏联敦促不要与北京建交的国家去建立外交关系。诚如基辛格所言，“这是一个戏剧性变化”。②

（二）美国拒绝苏联鼓吹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1969 年 6 月 8 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虽然他没有细说，但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明白，这将是一个反华体系。美国自始至终反对这个倡议，并且游说其亚洲盟国和友国不要参加。在 1969 年 7 月下旬的环球旅行中，尼克松告诉印尼和泰国领导人，完全不同意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③ 美国的态度是这个体系始终没有建起来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美国反对此议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这也是苏联意图把影响扩展到东南亚的一个手段。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43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3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35 页。

（三）美国拒绝美苏共管的安排和姿态

出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雄心，以及恫吓西欧、分化美欧关系和孤立中国的考虑，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苏联以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为由，不懈地试图说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给予它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待遇，以便形成美苏共管世界的格局，至少也要给外界营造这种印象。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和中国，对于这种可能始终非常敏感和反感。美国也深知这一点。约翰逊时期，为了维护大西洋联盟的团结，美国比较注意尽可能不让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有机可乘，除非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但是鉴于中美尚处在尖锐对抗之中，美国没有多少动力在这个问题上照顾中国的利益和感受。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下定联华制苏的决心之后，开始注意不要被苏联利用，造成对美国有害无益的美苏合作对付中国的印象。1969 年 12 月，在得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很快就要恢复之后，美国前驻苏大使汤普森要求向多勃雷宁通报美国与中国的一切接触，国务卿罗杰斯也希望“总统能有机会考虑”这个建议。基辛格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第一，“苏联人从来不向我们通报他们与中国或其他国家接触的情况，我们没有理由给它单方面的礼遇或无代价的保证”。第二，“没有必要给俄国人机会，使他们可以向北京夸耀说我们向他们通报了我们同北京接触的情况，从而从一开始就增加中国人的怀疑”。尼克松采纳了基辛格的意见。① 1970 年 2 月发表的总统对外政策年度报告的中国部分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希望改善关系不是想要利用中苏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我们认为这一冲突的加剧对我们毫无好处，因此，我们不打算袒护任何一方。美国也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任何一个。”② 1970 年 10 月 25 日，尼克松在白宫请即将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话：我们认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我们决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第二天，他向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提出了同样内容的传话请求。③ 1971 年，勃列日涅夫一再呼吁举行美苏英法中五个核国家的外长会议或首脑会议，以讨论均衡核裁军问题，中国视其为孤立中国和剥夺中国的核自卫能力的阴谋，断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47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339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353 页。

然拒绝。勃列日涅夫转而建议其余四国开这个会。这个会议的召开势必使中国陷入孤立。美国理解和同情中国的立场，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但其公开理由是：只有五个核国家都参加，这种会议才有意义。①

1969 年 11 月开始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当时举世关注的大事，也是美苏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际社会，特别是严重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西欧、日本和其独立的核力量被苏联视为眼中钉的中国，自然十分担心美苏达成有损他们基本利益的交易。美国在此问题上比较注意照顾其盟友和中国的感受。

1969 年 10 月 7 日，中国发表政府声明，表示了不怕任何核威胁的严正态度。美国随后通过秘密的巴基斯坦渠道，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友善态度向中国做了通报。1969 年底和 1970 年初，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谈中，苏联都向美国代表提出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问题。美国断然拒绝讨论这个问题。1970 年 6 月 25 日，苏联首席谈判代表谢苗诺夫给了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史密斯一份文件，其内容是防止意外核战争协议的基本想法。其关键条文是：如果第三国正准备进行核挑衅，双方应相互通知；如果出现挑衅行动，双方有责任对挑衅国家采取报复行动；双方应就这些问题定期磋商。基辛格断定：“苏联实际要求我们让它放手对付中国，这是两国统治的明目张胆的表现。”他和尼克松一致认为必须立刻拒绝这个建议。虽然美苏在 1971 年 9 月 30 日还是达成了旨在防止意外核战争的协议，但在美国的要求下，这已是一个真正的防止意外核事故的、不针对任何其他核国家的协议。② 1970 年 7 月 13 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再次提醒说，不要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给人以美苏共同统治的印象；苏联人无疑希望给人这种印象；中国人无疑有这种担心，“他们料想苏联西部战线将出现全面缓和，并可能怀疑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即美国让苏联放手对付中国”。尼克松深以为然。③ 1971 年 5 月 20 日，美苏宣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程序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将同时谈判进攻性和防御型战略武器问题。这是莫斯科让步的结果。尼克松担心这会让中国不安，特意批准基辛格把将要正式发表的声明副本经叶海亚转给中

①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杨静予、吴继淦、刘觉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第 48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157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150 页。

方，同时附有一个保证："美国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并保证在基辛格即将进行的秘密访问中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和有关问题"。①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所有美苏共管的事实和印象。当它感到需要对盟国和中国施加某种影响或压力的时候，它还是乐于制造这种印象的。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就坦陈：对于中国人对美苏勾结的疑虑，"我倒不那么担心——显示我们左右逢源往往是一种本钱——我倒认为这是向北京表明同美国联系有好处的机会"。② 部分因为如此，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盟国和中国始终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

（四）用一个半战争战略取代两个半战争战略

两个半战争战略是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实施的。这个战略计划设想的形势是，中苏同时向美国在亚欧大陆的重要盟友发起全面战争。根据这个战略计划，和平时期美国部署的常规部队的质量和数量需要满足以下需求：第一，在苏联对西欧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足以进行9个月的有效抵抗；第二，同时进行持久防御战，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韩国的进攻；第三，同时还要能够对付别处发生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显然，在中苏严重分裂之后，这个计划已经过时了。1969年10月，尼克松接受基辛格的建议，实行一个半战争战略。即：美军常规部队规模只需维持在以下水平上：足以进行北约框架内的针对苏联入侵的初期防御战，或者足以对付中国对韩国或东南亚的全面进攻。③ 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致国会的1969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公开提出了新的战略。有关内容如下：

> 我们力求理论和能力协调一致，选择了最恰当地称之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我们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一般任务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
> 选择这个战略是基于如下考虑：
>
> ——我们的战略和战区核部队的核力量起着遏制苏联向北大西洋公约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88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88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88页。

组织的欧洲部分发动全面进攻或中国向我们的亚洲盟国发动进攻的威慑力量的作用；

——俄国和中国在两条战线上向我们的盟国发动配合一致的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因为这既有核战争的风险，而且中苏合作大概是不可能的。①

表面上看，新的战略依然把苏联威胁和中国威胁等量齐观，只是不再假设中苏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以及美国国内多年来围绕这个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公开和私下的辩论，已经向世界发出了清晰的信号：新战略的实质是，西欧而非亚洲才是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地区，美国更担心苏联威胁。② 这就向中国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姿态。

（五）美国阻止苏联对中国开战的可能企图

如前所述，1969年6～8月，苏联驻美国、西欧和东欧的外交官频繁试探驻在国政府，要它们对苏联对中国的可能的核打击做好心理准备。为了阻止苏联对中国开战，以及防止中国认为美苏在这个问题上有勾结，美国做出了一系列反应：包括公开宣布多项解冻两国关系的主动措施，高官们公开讲话含蓄地警告苏联。最直接的有两次。一是，1969年8月27日，中情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一次记者午餐会上，公开透露了苏联就其向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向东欧试探一事。二是，9月5日，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年会上说了下面这段话：

谈到共产党中国，不断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我们不打算利用苏联和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来谋求我们自己的好处。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可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关注，这种争论的不断升级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破坏。我们不能不深表关切。③

虽说苏联的试探主要是对中国的心理战，而非认真的战前舆论准备，美国的这些公开姿态依然是有意义的。其一，它们有助于阻止苏联当时和后来可能有的、尽管不是非常认真的任何侵华企图；其二，向中国和世界间接挑明了美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89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89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40页。

国改善对华关系的立场。

（六）美国制定应对中苏战争的秘密计划

鉴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间的战争气氛，特别是苏联在远东军事力量的迅速集结，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致认为，万一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美国有必要援助中国，甚至不排除直接参战的可能。按照尼克松的指令，在1969年下半年，基辛格一直设法使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部际机构制定一些应变计划。但是，各机构都认为可供美国选择的任何方案都可怕得难以想象，因此只是制定了谨慎回避的方案。1970年初，基辛格要求他直接管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制定“我们自己的计划”，结果写成了一个长篇研究报告，执笔人是罗杰·莫里斯。此后好几年这个报告都是美国的基本计划文件。①

以上六点，只有第一点和第六点可能是当时的中国所不知情的，其余都是中国当即就知道的。比如“一个半战争”问题，珍宝岛事件后不久，“一个半战争”尚未成为正式政策的时候，毛泽东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们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② 即使是中国可能不知情的那两点内容，其结果也是对中国有利的。这六点事实表明，即使在中美接触尚处在秘密阶段的早期，中国就已经收获了与美合作的红利。这些红利归纳起来无非两条：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缓解了中国的孤立处境。这些举措同时也是向中国的试探。在这些战略性的示好兼试探之外，在尼克松第一任期的头两年半即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前，美国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解冻中美关系的其他举措，主要涉及贸易禁令和人员往来禁令的放松。后者属于战术性的示好兼试探。所有这些无疑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形成和完善前文所述的新的战略判断的重要背景，促成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决定。

美国的这些信号和姿态并非单向的，中国同时也做出了一些友好的表示，包括释放若干在押的美国人，以及公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正因为存在着只做不说的互动，所以说是战略默契。美国在这种默契中获得的最大收益，首先是得到了中国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邀请。为什么说这个邀请是美国的最大收益呢？笔者将在第二章中回答这个问题。其次，影响了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45页。

②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第644~645页。

谈判中的立场。对于这个会谈，美国的主要动机是冻结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而苏联的主要动机是冻结双方的防御性战略武器即反弹道导弹，同时继续放手扩充自己的进攻性核武库。谈判之初，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1971年4月，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发生了。苏联的立场马上就软化了。5月，苏联接受了美国关于谈判议程的立场：同时谈判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①

二、中美战略合作的最终确立

（一）战略默契的必要与局限

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以前，中美之间只有默示的战略合作即默契，没有明示的战略合作。如前所述，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同时具有信息传递和试探的功能，也是可以随时撤销的。同时，两国各自采取的公开的改善关系的举措在表面上也具有单方面、非对等的性质，同样也是可以单方面撤销的。由于中美长期严重敌对，互不信任极深，并且敌对的根源首先是无法妥协的意识形态对抗，② 因而，在迫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共同利害而开始合作的时候，这样一个阶段是必要的。其必要性在于，其一，一旦一方发现自己对对方的意图判断有误，善意得不到回报，进而默契根本不存在的时候，可以不失面子地退却；其二，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起到积累互信和彼此进行战略摸底的作用，这种互信和摸底是两国公开和直接的最高层对话的成功的必要条件。其三，在公开的战略合作关系建立以前，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对抗的双方，两国都需要在内部初步统一思想，以尽可能降低这一外交革命对内部政治稳定的冲击。

对于任何稳定的战略性的国家间合作来说，公开的、面对面的和开诚布公的高层对话特别是最高层会晤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美这两个特殊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而，中美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关系的最终确定有赖于高层会晤。

（二）“尼克松冲击”

所谓“尼克松冲击”，即1971年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同年10月基辛格的公开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的正式访问，特别是2月21日他和基辛格与毛

---

① 卿文辉：《霸权与安全——美国导弹防御史话》，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134页。

② 似乎也有理由说中美敌对的根源是台湾问题，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和顽固支持台湾的立场源自其意识形态偏见。

泽东的会谈。其主要作用就是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互信以及最终确立了抗衡苏联的战略合作关系。具体说来，“尼克松冲击”所取得的下述成果确立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关系。

第一，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搁置了台湾问题，进而避免了这个无法完全妥协的难题对中美战略合作的干扰。对此的深入分析见第二章。

第二，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了事实上的谅解。表现为两点。其一，将印度支那问题与中美关系分割处理的默契，即：美国默认中国继续支援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默认美国有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努力。换言之，双方都不把对方放弃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作为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的条件。其二，中国最终确信了美国从印度支那彻底脱身的诚意，并向美国承诺中国无意出兵印度支那与美国直接交战，也无意填补美国撤军以后留下的“真空”，而美国也相信了这个承诺。这就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中国武装干涉印度支那。① 对以上两点的深入分析见下文及第三章。

第三，中国承诺并使美国相信，中国无意威胁日本和韩国这类美国的主要盟友。根据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的中方记录，有如下对话：

> 尼克松：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
> 毛泽东：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
> 周恩来：任何国家都不威胁。②

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高度权威的保证。③

第四，除印度支那问题以外，中国承诺并使美国相信，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重大利益。有关记录如下：

> 尼克松：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18 页。

② 《1972 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转引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 年，第 287 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四册，范益世、殷汶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第 16 页。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①

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到了周恩来此前此后反复和基辛格表达过的另一个观点：

毛泽东：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微笑）：就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泽东：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笑）：就没有靶子了。②

据基辛格回忆，这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正如基辛格所理解的，联系到毛泽东关于韩国、日本和印度支那的保证，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与美国领导人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承诺不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提出挑战，从而使得美国可以全力应付苏联威胁。③

第五，双方在《上海公报》中承诺彼此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第三方建立这种霸权的企图。在谁都不会弄错的当时的特殊情境下，这个第三方指的是苏联。这是中美在头三次高层会谈后分别公开发表的三个公报中唯一暗示双方将联合抗衡苏联的表述。

以上相互承诺中的一些，特别是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保证，在尼克松冲击以前秘密的、间接的、低层次的接触（如华沙会谈）中，中美各自都向对方提出过，而且不止一次。但由于互信不够以及层次不够，双方都不愿和不敢相信对方的诚意。双方高层会谈，特别是最高级会谈，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中美严重对抗了20多年以后，以及在美国依然承认台湾当局而不承认中国、继续维持美台军事同盟和在台驻军的情况下，中国愿意接待尼克松公开访华的事实本身，就是两国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已达

①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转引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286～287页。

②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转引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289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18页。

相当高度的一个证据、体现和成果。

如上成果之取得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双方都能够诚实地承认双方的原则分歧特别是意识形态分歧。中美双方，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始终做到了开诚布公，都不讳言双方的深刻分歧乃至对立，并且主要是在中国方面的坚持下，将双方的相互冲突的原则立场写进了《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所载明的、为美方所不能接受的中方立场包括：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等。① 把双方的分歧用各自的语言公开写进最高级会谈公报这样的外交文件中，这在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美方起初还不理解、不接受这种方式，基辛格在看了中方以上述方式起草的中美最高级会谈公报草稿后，觉得难以接受，对乔冠华说，美国不可能在一个像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但是在中方的坚持和解释下，基辛格认识到，这种风格的文件的好处是，使双方的共同利益更加突出，更显得珍贵；使每一方都避免了对对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利于双方说服各自盟国相信，共同的原则和它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使双方的合作更务实，更有效。②

第五节　联美抗苏战略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一、基本内容

（一）《上海公报》发表前中美合作的基本内容

冷战的氛围、中美关系的特殊性③和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特殊性，很自然地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两国关系的改善本身就是对苏联的制衡。虽然中美领导人当时在不时的公开表态和私下与苏联接触时都否认中美关系解冻有针对第三方的意图，这种否认并不坚决，双方都认为过于坚决的否认将削弱联合抗衡苏联的政策效果。正如基辛格一贯认为的那样，否认针对第三方就等于告诉第三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8 日，第一版。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66 ~ 67 页。

③ 这与中美各自的实力和两国长期尖锐对抗的历史有关。

方，这种关系是有可能针对它的。① 苏联对此的疑虑、不安和警告说明，它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是后面将要讨论的双方合作的默契特征的一个表现。

考虑到这一特征，前文提到的中美间所有改善双边关系的举措自然构成了联合制苏抗苏的战略合作的内容，前文中提到的直接和间接针对苏联的合作、默契就更不用说了。出于叙述的完整性的考虑，这里不妨再归纳一下到《上海公报》发表为止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内容：

美国间接地私下地鼓励其盟国抛弃台湾，承认中国；

美国拒绝苏联倡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美国含蓄地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发动战争；

美国着手拟定应付中苏战争的秘密计划；

在美苏关系中美国尽可能地拒绝赋予这种合作以针对中国的意味；

美国用一个半战争战略取代两个半战争战略；

在美台关系依旧、美国依然不正式承认中国的前提下中国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

双方同意不让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敌对妨碍战略合作；

美国承诺从印度支那彻底撤军；

中国承诺不以武力威胁美国的所有盟国；

在《上海公报》中明确反对第三方在亚洲谋求霸权的企图。

（二）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合作

在《上海公报》发表前，两国在 1971 年 10～12 月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也进行了秘而不宣的合作，避免了西巴基斯坦的被肢解。

除了印巴矛盾，这场战争的国际背景是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和中美接近的势头所引起的苏联和印度的危机感。苏联决定帮助印度进一步削弱巴基斯坦，以便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像巴基斯坦这样的中国的友邦暴露中国的“软弱”，进而抑制因中美和解所致的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势头，顺便对在中美秘密接触中扮

---

① 基辛格是玩弄此法的老手。1971 年 4 月 12 日，也就是美国乒乓球队仍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扩大对华贸易和人员交流的计划，4 月 14 日白宫宣布了这个计划。此前一天，基辛格召见苏联驻美临时代办伏龙索夫，提前通报了此事，并强调说，这并不反映有什么反苏意图。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370 页。

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的巴基斯坦进行惩罚。① 越南战争造成的美国的内外交困，使得苏联和印度都断定美国无心也无力实质性地帮助巴基斯坦，因此印巴战争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直接交火的可能性及美印直接交战的可能性有限。印度暗中支持孟加拉的分离运动、肢解巴基斯坦的企图由来已久，所等待的只是合适的时机。1971 年 8 月 9 日，苏印签署了为期 20 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第九条规定：缔约国不得援助同另一缔约国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国，并保证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立即进行磋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②“条约的全部目的是：如果印巴发生战争，苏联将反对中国进行干预。”③ 1971 年 11 月初，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告诉她的同事们说，如果中国动刀动枪，苏联已答应采取适当反击行动。美国所获得的情报表明，这意味着在新疆对中国采取牵制性行动。④ 此时，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在印度的支持下已经升级为公开的暴乱，巴基斯坦政府军在镇压中的暴行激起了国际社会包括西方舆论的谴责，东巴的混乱造成数百万难民涌入印度，这就为印军以人道主义之名入侵东巴提供了借口。最后，印度之所以选择在这年 10 月才动手，也是考虑到喜马拉雅山脉在冬季的严酷环境降低了中国出兵的可能。

战争的结果是巴基斯坦的惨败和孟加拉的独立。这场战争及其结局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苏攻美守、美国因越战而虚弱、中国因“文革”内乱而虚弱及苏联营造反华包围圈的客观形势。尽管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事实上的盟国，但是，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文革”和林彪事件的困扰、战场离中国国境尚远的地理现实和冬季里中印边境的严酷环境，决定了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中国所能做的并且实际上做到了的，就是与美国进行外交合作，以阻止西巴基斯坦遭到进一步肢解这个最坏的结局。而这正是印度的第二个战争目标。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基辛格为此在战争期间进行了多次秘密会晤。11 月中旬东巴战事结束以后，印军主力迅速西移至印巴边境，准备对西巴开战。12 月 10 日，美国征询中国的意见：是否同意美国准备在安理会提出的印巴就地停火、然后双方立刻开始谈判的动议，美国认为这是挽救巴基斯坦不被进一步肢解的唯一希望，因为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任何军事卷入。12 月 11 日，尼克松致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46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174 ~ 175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47 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218 页。

柯西金，要求苏联对印度进一步加压，促其就地停火并立刻开始谈判，否则可能发生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12 月 12 日上午，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带着中国的紧急答复，求见基辛格。在得知求见要求但尚不知道中国答复的具体内容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猜想，可能是中国决定出兵支持巴基斯坦的通报。如果是这样，根据美国得到的情报，苏联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就要对中国使用武力。尼克松认为，如果苏联羞辱中国的行动得逞，保持世界均势的前景都会化为乌有。他决定，一旦苏联威胁中国，美国将不袖手旁观，援助的具体内容将视当时情况而定。为了进一步给苏联和印度加压，尼克松这时命令西太平洋上的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实际上，中国回电的内容是表示同意美国的就地停火方案。美国随即在安理会提出了这个提案，并立即获得中英法三国的支持。苏联迫于中美英法的联合压力，特别是美苏可能发生热战的前景，被迫接受这个动议，印度未能实现其最高战争目标。①

（三）《上海公报》发表后的中美合作

首先是联络处的互设。

1973 年 2 月，中美决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此举实质性地提升了两国关系。此前，中美之间的接触，在 1971 年 10 月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前，是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和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这两个间接渠道进行的。1970 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和 1971 年重返联合国以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镇和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美国高级官员（主要是基辛格）之间的接触成了主要渠道。从 1971 年 8 月 1 日到 9 月底，基辛格与黄华和黄镇交换的信件比过去 20 年中美之间交换的总和还要多。② 随着两国战略合作的日趋重要和交往的逐渐密切，这种形势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鉴于美国当时还没有下决心抛弃台湾，与中国建交，建立半官方的联络处势在必行。早在 1971 年 5 月 29 日，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就提出了这个设想。1973 年 2 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期间，中美就此达成一致。③ 1973 年 3 月 17 日，尼克松宣布，5 月 1 日将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戴维 · 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3 月 29 日，新华社宣布，驻加大使黄镇将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此二人都是“各自国内最有能力和声望、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228 ~ 230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48 页。

③（美）亨利 · 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张志明、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第 80 页。

最得领导人信任"的老资格外交官。① 1974年8月接替布鲁斯的乔治·布什，更是美国著名政治家。这些任命显示了两国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视。联络处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是事实上的大使。随着联络处的设立，中美之间建立了比它们各自与大多数建交国的关系还要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情报交流。

早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以前，美国就不定期地将其认为中国可能感兴趣的关于美苏关系和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等方面的情报提供给中国。尼克松访华前夕，他授权基辛格私下将美国掌握的有关苏军在中国边境部署的情报给周恩来。② 尼克松冲击后这一交流一直维持着。它基本上是单方面的，这一来是因为双方情报搜集能力上的差距，二来囿于意识形态和外交传统，中国对于与这个不久前的头号敌人进行情报交流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情报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双方，特别是美国，对自己行将采取的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外交决策和举措提前向对方通报、解释乃至征询意见。在基辛格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1970~1976年，这一交流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

第三，美国继续完善发生中苏战争时援助中国的秘密计划。

1973年1月结束越战的《巴黎协定》签署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开始秘密制定在中苏战争中美国大规模援助中国并参战的计划。预案中的选项包括：美军使用部署在关岛的携带核弹头的B-52战略轰炸机、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机、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北极星导弹等手段，打击中国境内被苏联控制的机场、中国境内的苏联核武器、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等。③ 同时，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继续研究类似方案。1973年7月6日，基辛格把这件事告诉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④ 故可以肯定毛泽东至少是知道后面这件事的。

第四是军事交流。

同样是在《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后，1973年2月初，尼克松批准向中国出

---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81页。

② 《尼克松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年2月14日》，第403页。

③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98页。

④ William Burr, ed.,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 143~144.

售包括4架飞机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中美军事合作由此开始。① 从这一年起，中国就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的军用高技术。由于美国方面的因素，直到1976年10月，福特才批准向中国转让两台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高性能计算机。② 总的说来，由于后文中将要谈到的诸多因素，毛泽东时期中美具体的军事交流成果极为有限。

最后是高层访问。

由于美台依然维持着“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拒绝去华盛顿，高层接触的形式是美国人到北京来。1972～1976年，基辛格单独访华六次，陪同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访华各一次。1975年12月初，福特访华。福特受到了病重中的毛泽东主席的公开接见，会谈涉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从中东到日本，从北约到安哥拉。而非福特原以为的礼仪性的会见。③ 单独访华的基辛格三次会晤了毛泽东（1973年2月和11月，1975年10月）。这些访问不仅具有维持两国合作的象征性意义，也是中美进行战略合作所必需的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的重要渠道。基辛格的访问尤其具有实质意义，毛泽东对他的接见打破了外交惯例，尤其表明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另外，尼克松冲击以前就已开始的双边的经贸和人员交流得到延续并有所扩大，美国也继续其反对苏联孤立中国的企图的努力。

二、基本特征：默契和务虚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着归纳直到1978年年底中美建交为止中美战略合作的特征了。和外交史上大多数战略合作的案例相比，这段时期的中美合作有着两个鲜明的与众不同之处：默契和务虚。

（一）默契：以中东问题为例

作为合作双方，中美没有相互间的正式承认和外交关系，没有任何条约的约束，没有明确的对对等性的要求，双方的一切公开的官方表态都没有明确提到这种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合作，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敌人，这一点特别表现为：中方依然继续其传统的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抨击。有的只是心照不宣和秘

①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98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25页。

③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第24页。

而不宣的合作，这种合作出于双方并行不悖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巴战争是一个例子，中东问题是另一个例子。

考虑到多数伊斯兰国家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持强烈的敌视态度，以及以色列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密切关系，中国长期拒绝与以色列发展官方关系，并在道义上、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阿拉伯有关国家针对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以色列基本上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始终不承认台湾，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早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就多次私下劝说美国改善对华关系以遏制苏联。① 双方都明白，中以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是受意识形态冷战和阿以关系“株连”的结果，并非缘于两国利益的直接冲突，两国相互都没有威胁对方的核心利益。朝鲜战争爆发后，鉴于以色列支持美国的立场和阿以关系的复杂尖锐，毛泽东决定对以色列采取一定时期内不承认不建交的方针，但不做永不承认、永不建交的承诺。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被占领土的正义斗争，但从不支持阿拉伯激进派消灭以色列国的目标，这一点毛泽东周恩来都明确坦率地对阿拉伯领导人讲过。② 中东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苏在阿以对抗中各支持一方，其中中国和苏联支持的都是阿拉伯激进派国家，同时苏联也不支持消灭以色列的目标。在中国确立了联美抗苏的战略以后，阿以关系问题就和中美苏大三角问题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了。

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把苏联影响排挤出中东的目的，开始积极斡旋阿以冲突，先后促成了埃以和叙以停火（1973年11月）、《埃以脱离军事接触协定》（1973年12月）和《叙以脱离军事接触协定》（1974年5月）。这些协定使得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反以前线国家收复了他们此前用对抗手段所未能收复的部分失地，美国在包括激进派阿拉伯国家在内的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苏联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中国一直与激进派阿拉伯国家保持着正常乃至友好的关系，“尼克松冲击”以来又与温和派即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陆续建交并建立起友好关系。在整个70年代，中国一直尖锐抨击两个超级大国对中东的争夺，抨击美国偏袒以色列侵犯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指责苏

① 达州：《戴维·本－古里安与中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世界知识》，1992年第4期，第24页。

② 闻兆祥、王小庄：《毛泽东关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联对阿拉伯事业的支持是假支持真叛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当时的中东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安全利益或经济利益，中东地区也没有一个中国的意识形态盟友，中国的中东外交只有两个基本并行不悖的利益：首先是尽可能把苏联排挤出中东，其次是保持和扩大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友谊。出于这些意图，虽然公开宣传上很冷淡甚至尖刻，中国实际上支持基辛格的中东外交，因为这一政策在中国看来减少了对以色列的偏袒，部分满足了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并因而把苏联排挤出中东和谈之外，削弱了苏联的影响。最后这一点是中方最看重的。美国领导人也明白，除了为保持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而必须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包括对部分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物质援助、在美国看来无足轻重的军援、道义支持和不承认以色列等）以外，中国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妨碍美国的中东利益的事情，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公开的反美反以宣传，基本上是毛泽东所谓的“放空炮”。这是中国与苏联的中东政策的区别。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不谋求控制中东，二是中国乐于看到苏联影响的退出，并且认识到，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还意识到，在整个70年代，除了台湾问题和印支问题，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中国对美国的攻击基本上都是言辞上的，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采取实质性行动；苏联的言论没有中国那么浓的火药味，但苏联有意图有能力也确实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

中美在中东的默契在1973年11月10日～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表露无遗。

在11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对美国于十月份为阻止苏军进入中东以拯救被围的埃及第三军而宣布的全球美军戒备状态这一强硬举措表示钦佩，赞扬美国为削弱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而做的努力。他承认，他原以为美国在埃及总统萨达特1971年驱逐苏联专家的时候没有及时向埃及伸出橄榄枝是错过了机会，现在了解到美国的战略是等待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有利时机。周恩来对于基辛格撇开苏联由美国一家斡旋埃及和以色列的停火也极为满意。基辛格解释了美国关于日内瓦会议的策略，即利用这个名义上由联合国发起、由美苏担任共同主席的全体会议重申大家已经熟悉的“以土地换和平”的论点，真正的谈判将在会外，在美国的赞助下由各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双边基础上进行。周恩来对此没有表态。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展示了其战略远见。他提醒基辛格说，苏联人从埃及被赶出来后以伊拉克作为他们中东政策的枢纽，美国需要防止伊拉克取得波斯湾的霸权；还说伊朗国王是一个了解世界局势的富

有远见的领导人。周恩来对阿富汗的达乌德政变上台表示严重不安，说接近达乌德的军官们是亲苏的，阿富汗的动乱很可能尚未结束；阿富汗针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收复失地的要求即使不是苏联挑动的，也会为苏联的阴谋服务；它将削弱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地位，使莫斯科获得一条通往印度洋的通道；敦促美国加强援助处于严重危险中的巴基斯坦。① 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些分析，但也坦陈说，鉴于美国国会在越战失败后孤立主义的影响下不同意援助巴基斯坦，美国最多只能用加强伊朗的办法来支持巴基斯坦。②

11 月 12 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中东问题时，毛泽东称赞他说："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③ 毛泽东回顾了基辛格在宣布全球美军警戒那天为向中国通报和解释此举而同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谈话。由于基辛格的通报是突如其来的，无法及时得到国内指示的黄镇重申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批评美国的行动。毛泽东说，黄镇正确地谈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目标的支持，但是他不了解"美国抵抗苏联的重要性"；中国"欢迎"美国"把苏联置于困难境地，使苏联无法控制中东"。接着，毛泽东几乎逐一分析了中东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强调指出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对阻遏苏联扩张的重要性。他对日益亲苏的伊拉克和南也门表示不安。④

（二）务虚

务虚与默契是有联系的。直到 1978 年中美开始认真地就建交事宜进行谈判为止，联美抗苏框架下的中美合作主要是一种战略姿态：没有建交，没有结盟，没有条约，鲜有具体的军事交流，几乎没有军火采购。中美各个层级的对话，特别是高层对话，其内容主要是双方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致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奥克森伯格做出如下判断：1977 年前的中美关系更多地是一种想象而非现实。⑤ 基辛格在其卸任后的回忆录中，对此的表现和原因有如下比较精辟的描述和分析：

---

① （美）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刘丽媛、马德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第 321 ~ 325 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26 页。

③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29 页。

④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33 页。

⑤ Michael C.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 180.

这些会谈是以独特的间接方式和微妙的暗示来进行的，中国人尤其如此。没有相互承诺，没有尝试规定协调的行动。一种奇特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这种关系正因为从未正式明文规定而更为有效。两个大国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协调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协调它们与此有关的利益来寻求合作。在尼克松访问期间，以及在我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或中国大使的会见中，讨论中心都是均势的必要性，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长期趋势。双方都理解，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自然会形成一种并行不悖的战略；如果观点不一致，即使就个别问题达成了策略性的决定，那也会是临时性而缺乏成效的。①

当两国关系还无法取得多少具体成就，还取决于一些难以捉摸的因素时，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我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建立起来的。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相同的，虽然由于明显的原因，即考虑到苏联人的敏感，不能公开这么说。②

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促和在一起，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根源。台湾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道，不足以成为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主要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③

概要说来，在中美建交、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它们大体上同时发生）以前，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这个问题上，中美战略关系之所以呈现默契和务虚的特征，原因是多样和复杂的：台湾问题的制约，中美之间的长期敌对造成的惯性影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美国政界主流对美苏缓和的强烈期待，双方对各自的盟友的传统承诺和友谊的考虑，包括朝鲜越南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0～31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322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18页。

等社会主义政权对中美接近的疑虑和反对，西欧和日本对缓和对苏关系的强烈呼吁等。后文将进一步解释这些因素。

与毛泽东打过多次交道的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过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① 无论是从基辛格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立场看，这都是对毛泽东的褒扬，反映了毛泽东在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可能会危及安全这个最高国家利益的关头，他是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因为现实主义，即所谓尼克松式外交手法，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众多关于尼克松第一次访华的史料都提到了两个细节：周恩来在首都机场欢迎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时，及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尼克松时，双方的握手都长达约一分钟。这两个一分钟传递了众多信息，但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信息是：握手的双方和他们所领导的国家是彼此敬重的敌人，而对双方来说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正在使他们同时也成为彼此敬重的朋友。

接下来，笔者将对中美战略合作得以建立和维系的两个具体前提，即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中美妥协进行深入分析，以回答中美战略合作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两个分析同时也给出和解释了中美战略合作所受到的两点制约。

---

①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 年，第 672 页。

第二章

台湾问题与联美抗苏

对于晚年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意图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都只强调联美抗苏的一面。90年代以来，随着有关档案的解密和随之而来的进一步研究，台湾因素和与之相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结束印支战争的考虑，逐渐进入中外研究者的视线。迄今为止，学界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说中美接近是为了对付苏联威胁，既深刻又过于简单；联美抗苏、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是毛泽东决定解冻中美关系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动机。本章旨在依据已经公布的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通过综合、系统归纳和重新解读，阐释台湾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试图回答如下问题：毛泽东在台湾问题和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和政策与美国决策者在这个方面的考虑和政策之间的博弈与中方的联美抗苏战略之间，有哪些相互影响？

第一节　《上海公报》发表前的中美妥协

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美国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悬殊，及台湾海峡的存在，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明显增大，通过与美国的谈判扫除祖国统一的外部障碍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1955～1967年对话达133次，期间，从1960年9月的第101次会谈开始，中国始终坚持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就不解决。所谓大问题，

就是台湾问题，小问题，就是中美互派记者、直接贸易及人员、科技、教育、文化交流问题。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一贯要求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必须断绝与所谓“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美国必须从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军队；美国必须承认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此不做任何干预。美国政府立场正相反，一是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断交、废约和撤军”的立场，先是不承认中国，后来倾向于搞“双重承认”即“两个中国”；二是主张：鉴于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要求暂时搁置这个难题，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前提下终止敌对状态，进行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一、基辛格访华前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妥协

1969 年以来，随着联美抗苏战略的逐渐成形，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在台湾问题与中美交流方面的既定政策。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对斯诺说：

>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①

1971 年 4 月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主动提出访华的要求以后，毛泽东最初是同意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暂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意见的，但他在最后关头收回前议，决定邀请。② 之所以有如此反复，联系到前述对斯诺的谈话，原因就在于邀请就意味着改变已经执行了十多年的、以美国接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双边交流的前提的传统政策，这是台湾和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

1970 年 10 月，尼克松先后通过叶海亚汗和齐奥赛斯库向中国传递善意。11 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得到这两个口信。随即，周恩来也通过巴、罗两国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在 11 月 14 日与叶海亚汗总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36 ~ 437 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631 ~ 1632 页。

统会谈中谈及上述口信时，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这个口信只字不提台湾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① 1971 年 4 月 21 日周恩来发出的、4 月 27 日基辛格和尼克松收到的口信，第一次正式表示愿意在北京接待包括尼克松本人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信中只谈到台湾问题：

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②

收到周恩来这封信的当晚，基辛格和尼克松电话分析这封信，基辛格叫道："他们不可能从我们这里骗走台湾，他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认识。"③ 1971 年 5 月 9 日，基辛格起草的、没有签名的、尼克松致周恩来的信，对于会谈的内容和目的表述如下：

尼克松总统同意，为了解决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隔开的问题，有必要举行直接高级会谈。因为尼克松总统十分重视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准备接受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请他访问北京以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直接会谈的建议。在这样一种会谈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④

6 月 2 日周恩来经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转给尼克松的复信送达白宫。这封 5 月 29 日发出的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毛泽东主席指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在中美之间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走的问题。⑤

由上可知，毛泽东至迟是在 1971 年 4 月，也就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

---

①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628 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XVII, China 1969 ~ 1972,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p. 301.

③ FRUS, Volume XVII, China 1969 ~ 1972, p. 305.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385 页。

⑤ FRUS, Volume XVII, China 1969 ~ 1972, p. 332.

时候，下定决心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这表明，他愿意在美国没有明确承诺接受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以前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这是中国立场的又一重大调整。但是这时他建议的会谈题目依然是台湾问题。尼克松的回信要求同时讨论每一方所关心的其他主要问题，也就是美国迫切想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大三角关系问题。5 月底，毛泽东再一次做了让步，接受了美国关于议题的意见，即不仅仅讨论台湾问题。根据基辛格的回忆，表达这一信息的信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激动万分。使他们异常惊喜的原因是，其一，毛泽东同意在美国没有就台湾问题做出断交和废约的承诺的前提下会晤尼克松；其二，毛泽东暗示在这种会谈中可以讨论联合抗衡苏联的问题。①

毛泽东于 1971 年 5 月 29 日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时中方的原则立场和有关对策：1. 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事先不能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2. 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涉。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3. 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4. 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5. 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6. 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7. 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8. 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②

上述八点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再次表明不再坚持把美台断交甚至美方做出这一承诺作为中美高层交往的前提。其二，没有一个字提到苏联。由此报告可看出，虽然毛泽东同意在高级会谈中讨论所有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但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在他心目中仍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似乎比联美抗苏战略的地位还高。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现象。之所以不提联美抗苏这个因素，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中美战略合作的默契性质有关。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389～390 页。

② 《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 年 5 月 29 日）。转引自：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101～102 页。

二、1971 年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双方妥协

在 1971 年基辛格的两次访华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私下做出的但有约束力的承诺，即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断交和撤军，为尼克松访华扫除了障碍。

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彻底满足中国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1 年 2 月拟定的"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政策目标（4～8 年）"是：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短期目标（1～3 年）则是：劝阻海峡两岸对对方使用武力。① 在 1971 年 7 月 9 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台湾问题、越南问题和国际战略形势是三个重点。基辛格表示：1. 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2. 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留到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去解决，并且肯定能够解决，这一进程现在就可以开始；但是，在今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绝不可能以正式的方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3. 美国接受从台湾全部撤军的目标，但这是与结束印支战争相关联的；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时间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因为这部分军队仅仅是为印支战争提供后勤支援才驻扎台湾的。4. 印支战争的结束将加速美中关系的改善，而战争继续下去将会干扰美中关系。② 基辛格试图以此压中国对河内施压。

当晚，毛泽东听取周恩来的汇报时说："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啊！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③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把越战问题摆在台湾问题之前，作为中美和解的第一大障碍。这个问题下一章将深入分析。当听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

---

① 《国家安全研究第 106 号备忘录（1971 年 2 月）》，第 386 页。

② 《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9 日》，Chou En－lai，HAK，et al，Memorandum for Henry A. Kissinger，from Winston Lord，Subject："Memcon of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Chou En－lai"，July 29，1971，NSC，Folder 3，Box 1033；《国安会报告（1971 年 10 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 396 页。

③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情》，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 41～42 页。

猿，尾巴不长。”[1] 就是说，台湾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有进展，问题不大，毛泽东更关心世界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问题。

第二天，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的问题。但是，尽管你们现在占着台湾，那里没有战争，越南则仍在打仗，在死人，每天都还有人受伤。为此，如果印支局势不能缓和下来，我们就必须继续援助印支人民，首先是援助越南人民。周恩来接着提出了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即一个中国、断交、废约和撤军，提醒基辛格，如果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他的访问成果是什么？中国方面不是以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为总统这次访问的条件，但是作为访问的成果，中美双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周恩来由此表达了一个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两国关系正常化应该是主要的会谈议题。[2] 此话意图显然在于对美国施压。在关于将公开发表的这次访华的会谈公报的谈判中，毛泽东在 7 月 10 日晚指示说：“公报中也不要写我要见（尼克松）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3] 这就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加大了对美方的压力。中方最初的会谈公报草稿说，尼克松访华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以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基辛格拒绝了。[4] 最后双方在北京时间 7 月 15 日同时发表的公报没有一字提到台湾，也没有一字提到苏联。关于尼克松访华目的，公报中只有一句话：“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5]

美国决策者在估量形势之后，决定坚持自己的立场。1971 年 10 月，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前夕，尼克松在给他的指令中说：

> 中国人在确认宣布你的临时访问日期时，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希望总统对关系正常化和撤军问题做出正式承诺，建议你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避免任何类似的承诺，那将会相当于让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脱离我们的

---

①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三），《世界知识》，2001 年第 2 期，第 44 页。

② 《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10 日》，Chou En - lai, HAK, et al, Memorandum for Henry A. Kissinger, from Winston Lord, Subject: " Memcon of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Chou En - lai", July 29, 1971, NSC, Folder 3, Box 1033；《国安会报告（1971 年 10 月）》，第 398 页。

③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三），第 44 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26 页。

⑤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37 页。

掌控，并且发展非常之快，以至于我们失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主动权。……总统不希望发生出卖盟友的行为。你应当重申：总统将在其第二任期的前两年内解决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①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敲定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在10月20～25日基辛格与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和乔冠华等的会谈中，中方再次明确表示，希望在尼克松总统到访期间，两国关系正常化成为主要的会谈议题。② 双方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的中美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进一步明确了两个共同立场：反对霸权主义，承诺使双边关系正常化。③ 在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只是敲定了基本内容，其中涉及中方让步的地方包括：中方同意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字不提，只要求美军撤走；中方同意写上有关美方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表示关注的内容。不少细节来不及解决，只好留待尼克松访华时再做决定。这些细节上的分歧主要是：中方要求美方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方的“希望”，基辛格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要用“重申”一词，以表明这是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方要美方答应无条件撤走全部美军，基辛格只肯把撤军说成是目标，而且要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④

三、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对台湾问题的表述

1972年2月14日，尼克松与基辛格就即将开始的中国之行，确认了中美会谈中尼克松将向中方确认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五点立场：1. 不鼓励“两个中国”；2. 在越战结束后撤出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之后在一个不固定的时间内逐渐撤出其余三分之一；3. 不鼓励台湾方面任何对大陆的进攻；4. 反对日本军队在美军撤离后进驻台湾；5. 不鼓励台湾“独立”运动。⑤ 实际上，这些立场中的每一个，在1969年以来的中美秘密接触中，特别是在基辛格的两次访问中，美方都已向中方承诺过。其中的第三点，早在60年代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美方就已做过承诺。⑥ 第四点的出现，乃是由于中国方面当时十分担心，与台独势力

---

① 《国安会报告（1971年10月）》，第399～400页。
② 《国安会报告（1971年10月）》，第398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783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2页。
⑤ 《尼克松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年2月14日》，第408页。
⑥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88～90页。

有暧昧关系、经济迅速崛起、同时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异常密切的日本有可能在美军退出台湾后在美国的纵容下插手台湾，而向美国提出的要求。美国也并不希望出现这个前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中，美方对台湾问题的私下表态，除了以上五点，就是重申了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与台湾当局断交和与大陆建交的承诺。

在1972年2月21日与尼克松的会谈中，毛泽东只字不提台湾问题。① 但间接提到的有三处。一是，毛泽东对尼克松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② 这就是说，大陆在相当时期内不会武力进攻台湾。二是：

> 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③

在这里，毛泽东再次确认了中方的新立场：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关的一切不再与两国的贸易和交流问题挂钩。第三处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由此引起了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就国共两党彼此如何骂对方为"匪"的有趣的问答。④

然而，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乔冠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交锋十分激烈。1972年2月25日，乔冠华和基辛格就公报中台湾问题部分中的美方立场措辞达成妥协：美国承诺撤出全部美军，中国不反对美国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同意使用"重申"一词。⑤ 这天深夜，双方敲定行文如下：

>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17页。

②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三），第44页。

③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载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281页。

④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第274页。

⑤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4页。

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①

尼克松这次中国之行中另一个与台湾问题有关的重要细节是，2 月 27 日，基辛格在上海展览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事先征得中方同意之后，第一次在中国大陆领土上，重申了美国对台湾防务所承担的义务。②

第二节　对上述妥协的分析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毛泽东的考虑：祖国统一不是解冻中美关系的第一位动机

完成祖国统一是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重要动机之一，但始终不是唯一动机，而且从一开始就不是第一位的动机。杨奎松认为，到 1971 年上半年为止，中方考虑中美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想借机解决台湾问题。其次，才是远交近攻，联美抗苏。③ 联系到以上史实以及第一章中提到的大量事实，这个看法很难说是准确的。诚然，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中方先后两次表示同意接待美国领导人访华的密信中，对于会谈议题，第一次只谈到台湾问题，第二次把台湾问题列为主要议题。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问题，综合目前已知的所有史料，下面这种解释更合理。

首先，毛泽东最初认为，既然美国在联合抗苏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美国领导人迫切要求访华这个事实中，中国可以借此压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更重视苏联对华威胁问题，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进而决定不让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阻碍中美战略合作大局。这就确立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8 日，第一版。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38 页。

③ 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第 14 页。

底线，限制了中方的讨价还价能力。舍此无法解释到尼克松访华结束为止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再让步。

其次，中美关系改善本身就是对苏联的威慑，无须刻意强调；很可能对这一点的意识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与中美接触有关的书面文件中更强调台湾问题的一个因素。

然而，相反的解释，即中国在中美接触的早期强调台湾问题主要是一种政治上更安全的幌子，中国的唯一动机就是联美抗苏，也不准确。基辛格就持此论。这种看法在其卸任后的两部回忆录《白宫岁月》和《动乱年代》中有关中美关系的部分中几乎随处可见。

二、美国的意图：保住台湾与联华制苏兼顾

尼克松、基辛格从一开始就下了决心，虽然为了联华制苏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但决不能因此而彻底牺牲台湾。这既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信念所决定的，也是迫于美国国内强大的亲台舆论的压力。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不因为美中关系而彻底抛弃台湾是几乎所有美国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的共识。至今如此。另外，此二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实现这个联华制苏和维持美台官方关系兼得的目标是可能的，因为中国也需要美国帮助它对付苏联，而且很可能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有关证据前面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材料。基辛格在 1971 年 3 月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美国能够在保住台湾的同时打开对华关系，因为“中国人想要减少两面作战的威胁，想要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要进攻中国还是接近中国，而且也许还想使苏联对北京更圆通一些。他们特别想要我们做出美苏不要相互勾结的保证”。①

美国两者兼得的目标之得以实现，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的实力远逊于美国。第二，中苏间的相互敌视甚于美苏间的相互敌视，苏联对华的客观威胁大于苏联对美威胁，中国对美苏妥协的担心大于美国对中苏妥协的担心，而这一点与毛泽东同时基于意识形态考虑和国家安全考虑而对苏联的高度警惕和强硬的态度和立场直接相关。这就在客观上影响到了台湾问题上中国的谈判地位。直到 70 年代末美苏矛盾明显尖锐之前，这种根本态势始终没有改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44 页。

变。以上因素注定了台湾问题不可能在毛泽东在世时解决掉。这不是任何高明的外交艺术所能改变的。

美国在中美接触的早期就明确承诺将最终从台湾完全撤军，这个承诺还写进了《上海公报》。但是始终不愿公开和正式地答应中国要求的废约和断交。这个问题到 1978 年底中美建交时才解决。这一事实与下述因素有关。1. 相当多的驻台美军确实是因为越战而派驻那里的，而美国早已确认了从越南战争中彻底脱身的目标；故越战结束为美军撤台搬掉了一大障碍。2. 美国在亚太的其他驻军、特别是其海军实力和远程打击能力使美方自信足以确保即使在没有军队驻台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阻止大陆攻台。3. 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美台间的外交关系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更能体现美国对台湾当局的保护义务和美台间的意识形态纽带。

从根本上说，中美都把联合抗苏制苏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利益，因此在台湾问题上都做了妥协。这种妥协使双方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成为可能。

三、台湾问题与印支问题的挂钩

双方都把台湾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联系起来，但动机不同。

美国迫切需要从越南体面地撤军，但越南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撤退，拒绝给予美国这个“体面”。考虑到中国是越南进行战争的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后援，且中国在台湾问题和应对苏联威胁问题上都需要美国的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一面在谈判中屡次试图说服周恩来劝说越南改变强硬立场，一面坚持在越战结束后才能撤退驻台美军，理由是有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是为越战服务的。这也是事实。中国在谈判桌上坚决拒绝了美国的挂钩战略，拒绝承诺对越南施加影响。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挂钩策略，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啊！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这句话只能理解为：即使美国满足了中方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与台湾问题有关的条件，只要美国还待在印支，正常化就不可能。1972 年 3 月初周恩来去河内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时，向越南方面承诺说：“如果印支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无法实现的。”① 这句话所希望向越南传达的，应该也是同一个意思，即把美国

---

①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138 ~ 139 页。

从印支完全撤出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这样一来，中美立场就有了相当大的重合：都把印支战争的结束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基本解决的前提。这就在事实上使中国有了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去设法尽速结束越战。这在客观上对美国更有利。因为美国的最紧迫的利益（注意：不是最重要的利益）是结束越战，其次是联华制苏，第三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见第三章。

第三节 1973 年以来的台湾问题僵局与联美抗苏

1972 年美国就正式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但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的 1978 年底，中美才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与毛泽东、周恩来最初的预期相距甚远。这个僵局对中美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有一定影响。

尼克松访华之后，直到中美建交，越战的结束、水门事件及涉及美国内政的其他因素、美苏缓和、中国复杂的国内政局和联美抗苏战略继续的必要性等五大因素共同影响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决定了这个问题的延宕不决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有限制约。

一、1972 ~ 1973 年毛泽东的乐观预期

1973 年 1 月 27 日，美越签署了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协定使美国至少在纸面上和暂时地达到了从越南体面脱身的目标。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这是中国一贯的不可动摇的原则；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美国从越南体面脱身，这是美国自 1969 年以来的一贯立场；美国结束对印度支那的干涉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又一前提，这是中国自 1971 年以来的新立场；越战结束后驻台美军中因为越战缘故的那部分将撤军，这是中美的共识。[①] 所有这些，使得越战的结束成为美国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进而中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不可逾越的前提。

如今越战终于结束了，加上美国需要中国帮助以对付苏联，以及尼克松、基辛格曾经一再承诺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头两年里实现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在

---

①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续），《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2 期，第 40 页。

越战结束后初期对于台湾问题的基本解决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一度寄予很大期望。这种期望与蒋介石的年龄和健康有关，因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显然希望力争在蒋介石健在时解决统一问题，担心蒋死后会有变数。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就曾毫不隐讳地提到这一点。不言而喻的是，毛泽东在有生之年解决统一问题的愿望随着他的高龄和健康恶化而日益迫切。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毛泽东产生乐观情绪，那就是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同是反共的资本主义大国，同样面对共同的威胁苏联，日本能做到的，美国也应该能做到。

毛泽东的这种情绪在三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在1973年2月17日接见基辛格时直截了当地要求美国仿效日本：“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① 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在晚年与美国人的见面中极少提到台湾问题，直接督促美台断交只有两次，这次是第一次。二是，这次访问中毛泽东接受了美方早已提出的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的建议。在1971年5月底他批准的《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中，就把互设联络处作为双方建交前的临时措施而提出来过。在后来的中美会谈中，鉴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拒绝立刻撤军、断交和废约，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中方搁置了这个想法。如今这个想法复活并且很快成为现实，一个较大可能是毛泽东对于中美不久将建交的乐观预期。

第三个方面涉及毛泽东对台湾政策的调整，即事隔多年以后重提和平统一。鉴于此事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从略。

二、美国国内政治与台湾问题僵局

就在1973年2月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会见中，基辛格以国内政治为由说不可能很快解决建交问题。“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美国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② 从那时起，直到1978年，在中美各个层级的接触中，美方总是以国内政治阻力过大为由，为推迟建交和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辩护。相当程度

①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68～1669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68～1669页。

上这也是事实。美国民意和统治精英中的亲台反共情绪之顽固而根深蒂固，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当时未能充分估计到的。据统计，从尼克松访华到他 1974 年 8 月辞职为止，美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保证美国继续履行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达 52 次之多。① 1973 年 2 月和 4 月，美台两次签署军售协议，台军由此共获得约 350 架先进战机和 3 艘驱逐舰。② 1974 年 2 月，美国任命了新的驻台"大使"。③ 当年，福特政府又批准台湾当局在美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使台湾当局在美"外交领事机构"多达 15 个。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以色列、法国、德国和日本等美国的盟国。④ 这些严重破坏中美互信的举措，理所当然地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按照许多学者的看法，如果没有水门事件的干扰，中美是有可能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进而建交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长达一年半的水门事件使得尼克松的政治形象和权威严重受损，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内，事件耗去了他的几乎全部精力，迫使其在第二任期不到一半的时候辞职，自然无力在这个政治风险极大的问题上兑现承诺。其继任者福特，既不是依靠选举上台的总统，又受制于水门事件的后遗症，也不可能在这个政治上极有争议、弄不好会毁了他的政治生命的难题上做出决断。⑤

1974 年 11 月 11 日，基辛格第七次访华。对邓小平说，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美国将在 1977 年撤完全部驻台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邓小平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倒联络处方案，不能接受。⑥

三、美苏缓和与台湾问题僵局

美国迟迟不愿抛弃台湾，以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于停滞，与当时国际

---

①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台海出版社，1998 年，第 136～137 页。

②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 30 年》，台北《中华时报》印行，第 344～346 页。

③ William Burr, ed.,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 267～268.

④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第 143～149 页。

⑤ 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0～51.

⑥ 柴泽民：《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载张神根、端木清华编：《改革开放 30 年重大决策始末，1978～2008》，四川出版集团，2008 年，第 84 页。

上的美苏缓和也有极大关系。1972～1977年，由于美苏矛盾明显缓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相对下降，美国按照中国的条件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动力显然没有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么大了。在苏联威胁更大进而更有求于中国的时候尚且不肯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条件，遑论苏联威胁减弱之后。

在尼克松和福特任上，美国一直注意保持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开始就设定的两个平衡的原则：一个是在改善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与安抚“中华民国”之间保持平衡，另一个是在改善对华关系和缓和对苏关系上保持平衡。美国在对华军品出口方面的谨慎，与这两个平衡的原则有很大关系。美国担心中美走得太近会刺激苏联铤而走险，以致中美和苏联之间发生热战，希望中美关系保持在使苏联因为对美国有所期待而行为更加规矩的尺度内。这两个问题又是有联系的：只要美苏关系能够控制，实现基本稳定，美国就没有必要和中国走得太近，也就不必在台湾问题上完全满足中国的期望了。学者李群英还认为，维持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平衡的做法，与基辛格一贯秉持的均势理念不无关系；因此，70年代的海峡两岸状态也反映了美国牵制中国的某种需要。① 这是有道理的。

美苏缓和同样导致中方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冷漠。在财产索赔、贸易和技术引进等纯粹的国家间关系问题上，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到1973年11月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中方立场越来越灵活。此后的趋势是复归强硬。这些问题，特别是财产索赔问题，本来在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时双方已经原则上解决了。② 中方有关立场的变化，与这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一口气签了13个协议这件事有关，这次访问使美苏缓和达到高潮，而令中方极为不满。

四、台湾问题僵局对联美抗苏战略的有限制约

台湾问题的长期僵持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控制中美间的国家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发展速度。在尼克松到访前夕，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③ 联系到后来中美关系的停滞，对毛泽东的这句话只能做如下理解：他需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也

---

① 李群英：《基辛格是一把钥匙》，《世界知识》，2008年第6期，第21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2册，第338页。

③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54、255页。

即美国停止阻挠中国统一，来加强他联美抗苏战略的合法性，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将对于将苏联定位为世界和平、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提供更大的合法性。与一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尖锐对立并且阻挠自己国家统一、承认内战中的对手而非自己的国家合作，以对付一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那么大、承认自己且不阻挠自己的统一事业的国家，而且，合作者曾被长期视为头号敌人，这种选择毕竟是不那么自然的，是需要解释和辩护的。即使是国家安全面临的巨大威胁，及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不能完全消除解释和辩护的必要性。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1974～1976年，虽然中美战略默契依然维持着，但也没有深化。毛泽东于1973年11月拒绝了基辛格给予中国提供某种核保护的试探性建议。1974年11月，在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期间，毛泽东一反常态地没有接见他。这时基辛格已是国务卿。而在此期间毛泽东接见过一些地位更低的外宾。原因是中国领导人断定，基辛格只对“争取时间”感兴趣。因为他提的建交方案比日本更苛刻，他希望中国发表一个和平统一的声明，要求中美建交后允许美国在台湾有一个联络处。面对国内的牵制和苏联的机会主义扩张，基辛格需要营造美中合作正在进展的假象。于是，他提议中国邀请福特访华，还不经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就同意英国向中国出售劳斯莱斯飞机引擎，以暗示中美军事合作已经开始。中国最初暗示，没有邦交正常化，就不会接待福特访华。为说服中国同意福特访华，基辛格于1975年11月来华，结果双方就年底前福特访华及其日期达成一致。这次访问结束前，当基辛格要求讨论福特访华结束时将要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草案时，乔冠华外长建议发表一个明确指出中美分歧的声明，这意味着向莫斯科暴露中美紧张关系，基辛格拒绝了。乔冠华说，也许不应该有任何声明。结果，在没有就是否发表联合声明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基辛格怏怏而去。其后，当华盛顿发现北京不准备举行符合规格的盛大欢迎时，就缩短了福特访华日程。① 在这次福特访华前，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台湾问题解决前，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② 1975年12月初，来访的福特总统向毛泽东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反对苏联。毛泽东拒绝了，说，这不过说说而已，在关

① 以上史实见：罗伯特·罗斯：《美国的对华关系》，傅高义、袁明、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重庆出版社，2009年2月，第53～79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68页。

系正常化以前，在明后两年，我们两国之间不会有什么大事情。① 这次访华也没有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方的上述态度，与毛泽东1973年两次会见基辛格时称美国是朋友、称赞美国中东外交、提出“一条线”构想的热情相比，反差是明显的。总之，由于福特政府承认但拒绝兑现尼克松做出的与台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承诺，福特的中国之行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果。

与台湾问题僵局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有关的又一个事实是，1973年底1974年初毛泽东对台政策又趋强硬。1973年11月12日会见基辛格时，毛泽东就断然否认了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五天后，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针对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说台湾问题有和平解放和武力解决两种可能性的话，毛泽东再次强调：“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② 1974年“二二八起义”纪念会的主旨与一年前的同类会议相比明显变化，不再提中美就台湾问题而言关系已有所改善。对台宣传的重点也从一年前以呼吁和谈为主转为暗示武力解放为主。③

从纯粹策略的角度看，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是将统一大业进一步推迟的一个委婉的表述。因为在当时联美抗苏和美国支持台湾抗拒统一并存的格局下，若要把武力统一的政策付诸实施，必然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进而从根本上危及联美抗苏战略。更何况从能力上讲，在美国卷入的情况下，中国取得军事成功的可能性有限。所以，重拾武力统一的口号，是典型的毛泽东式的“放空炮”。美国决策者特别是基辛格在当时和以后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并不认为这会对两国战略合作构成实质性干扰。

第四节 毛泽东在僵局中的正确选择

在不利的客观制约之下，毛泽东的英明在于，始终没有让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失望和不满发展到危及中美战略合作的地步。一个选择和利益是结束中国与

① William Burr, ed.,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 402.

② 转引自：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671页。

③ 李群英：《基辛格是一把钥匙》，第20页。

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的严重孤立和不安全处境，代价是容忍美国事实上继续玩“两个中国”游戏和祖国分裂局面的继续；另一个选择和利益是最坚决地维护中国在主权和统一问题上的尊严，代价是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和祖国分裂的持续。对毛泽东来说，没有第三个选项。毛泽东做出了“台湾事小，世界事大”的判断，做出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1973 年 11 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当时水门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在 11 月 12 日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说，如果美国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说他也不相信台湾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因为台湾领导人毕竟是“一群反革命”。① 毛泽东接着说：

> 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一百年以后再来。至于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我想不要一百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我们跟苏联建了交，跟印度也建了交，就不那么好啊！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呢。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问题。

他还把台湾问题同香港、澳门做了比较，说中国对香港和澳门也不着急，台湾问题不重要，“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②

自那以后，如同此前一样，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不对美国人直接施加压力。基辛格回忆说：

> 在所有我与毛的会谈中，对于台湾，毛从来没有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多次向我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想法，周和邓的看法也是这样。毛和周邓一样，会谈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③
>
> 同大家的看法相反，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受到压力。④

---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32 页。
② 转引自：王永钦：《毛泽东与基辛格》，《党的文献》，1997 年第 1 期，第 93 ~ 94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17 页。
④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32 页。

毛泽东在 1975 年 10 月 21 日接见基辛格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①

1974 年 4 月，邓小平赴美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期间，在纽约与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基辛格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尚未想出办法来。邓小平答道，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②

在美苏矛盾有所缓和的同时，中苏矛盾依旧，中苏和中蒙边境的苏军继续在增加。在不可能实质性调整对苏政策进而缓解苏联安全压力的既定前提（其原因后文将有详细讨论）下，毛泽东只能维系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战略默契，而被迫听任台湾问题长期维持现状。这是他的无奈，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无奈。直到今天，在中国迅速崛起、综合国力与“文革”后期不可同日而语的有利态势下，我们依然不得不面临美国的超强实力所造成的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有人说，如果没有水门事件和缓和，在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有可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话不无道理。但是完全可以断言，即使如此，当时也绝无可能解决中国统一问题。1978 年卡特之所以痛下决心以牺牲台湾为代价实现邦交正常化，其主要背景是，苏联在地缘政治渗透和战略武器竞赛方面在美中两国看来咄咄逼人的攻势使美国放弃了缓和的幻想，迫切需要加大联华制苏的力度。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依然迫使邓小平吞下了一个苦果：容忍美国成为唯一的既与中国建交又向台湾当局售武并且事实上承担了“保卫台湾”的义务的国家。换言之，从尼克松访华到毛泽东逝世，恰好是美苏关系最缓和因而美国对联华制苏的需求相对最弱的时期，与此同时，中苏矛盾的严重程度没有明显变化。由此造成的一个战略后果就是：在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讨价还价的客观条件方面，毛泽东的处境明显不及后来的邓小平。总之，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主要缘于客观情势，与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关系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1973 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妥协的不仅是中国。尽管有美苏缓和，由于美国依旧把苏联锁定为最大威胁，为了防止中美战略合作严重倒退，美方也做了一些让步，部分兑现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承诺。福特政府上台之初，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妥协。1974 年 8 月，刚上任的福特致信毛泽东，称对他来说没有比“加速正常化”更优先的问题了。他于 1974 年 10 月 25 日签署

---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XVII, China 1973 ~ 1976,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pp. 387 ~ 388, 788.

② 宫力：《美国水门事件与中美关系》，《文史天地》，2004 年第 2 期，第 10 页。

了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力”。这项法案撤销了美国国会1955年1月通过的关于“防卫台湾”的决议案。① 福特于1975年12月访华时向邓小平承诺：在1976年连任后，将着手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说：按日本方式也就是说，美国要做到我们所说的断交、废约和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非官方联系可以继续。福特对这一理解未提出异议。② 越战结束后，驻台美军明显减少，到1975年底时，已降到不足1400人。

综上，完成祖国统一与联美抗苏对毛泽东来说是两个基本上相互独立的政策目标。由于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问题上中美的相互妥协是联美抗苏战略得以确立和长期维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妥协的有限性或不彻底性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制约是有限的。其原因在于，虽然台湾问题在双方看来都是独立于联合抗苏制苏战略的重大利益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利益又有难以妥协的一面，但是，双方都把联合抗苏制苏作为解冻两国关系的最高目标，而将台湾问题上的妥协视为为此目标服务的手段。在1971～1973年这约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在那以后，他被迫放弃在有生之年统一祖国的夙愿。统一目标与联美制苏目标相比在毛泽东的政策天平上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对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的主要影响就是使得这种战略长期停留在务虚和默契层面。但是联美抗苏战略的这两个特征并不仅仅是由台湾问题僵局所导致的。对此的进一步论证见后文。毛泽东“台湾事小，世界事大”的判断和有关政策，反映了他对不同的国家利益之轻重缓急的关系和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他实施的是一种把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联美抗苏外交切割开来即并行不悖的政策。鉴于双方分别把台湾问题和关系正常化问题与印支战争挂钩，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把视线转到印度支那问题上来。

---

①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65页。

②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第三章

印度支那问题制约下的联美抗苏：毛泽东的战略两难

在1973年1月越南战争结束以前，毛泽东在酝酿、确立和执行联美抗苏战略的时候，始终受到这场战争的困扰。因为他大力支持的越南北方，同时也是苏联的盟友；越南的胜利很有可能扩大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中美一方面联合抗苏，一方面在越战中间接为敌。如前所述，这个问题与台湾问题又有联系。本章旨在通过描述和分析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基于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的双重考虑所面临的战略两难处境，以回答如下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和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与其联美抗苏战略之间，有哪些相互影响？

第一节　中越分歧的发展

一、毛泽东支持印支革命和越南统一战争的动机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研究得比较充分，达成了较大的共识。具体的动机或意图包括：防止美国把印度支那作为包围、颠覆和入侵中国的基地，保卫南部边疆安全；支援世界革命（包括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坚定地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的斗争，向亚非拉人民证明中国是他们的真正朋友，是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言人；越南在中国支持下实现民族统一，不但可以证明毛泽东军事战略的正确性，更能证明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的正确和成功及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错误，换言之，可以借此揭露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背叛世界革命的本质，进而有助于与苏联争夺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鉴于苏联自1965年以来加大了援越力度，这样做也是出于与苏联争夺越南以防止其在中苏分裂中倒向苏联的需要；以上意图的实现，还有助于建

立中国为首的广泛的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由于他认为中国革命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对印度支那革命的支持也有助于鼓舞国内人民投入到国内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去。多数学者还认为，世界革命而非国家安全，才是毛泽东支持越南民族统一战争和印支革命的主要考虑。①

美国冷战史专家翟强认为，其动机是四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因素：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的认识，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承诺，批判苏修外交政策的需要和改变中国社会的国内需要。② 这个观点涵盖了学者们提出的所有具体意图，可以视为对上述观点的高度概括。

笔者同意以上看法。同时以为，毛泽东的政策动机，也可以做如下解读，即具有捍卫国家安全，推迟和避免世界大战，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支援社会主义革命，支援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以及反修防修六种内容。因为，中国一度的判断是：美帝干涉越南战争的动机之一是从南边包围中国，构筑未来侵华战争的基地；与美帝在越南打一场有限战争，有助于避免和推迟中美之间的大战，而这场大战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越南的民族统一战争也是典型的民族解放运动；南越人民和老挝、柬埔寨人民的解放斗争由于是共产党领导，因此其性质无疑也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苏论战中的立场以及与苏联的关系与朝鲜类似，因此对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支持，在毛泽东看来有反修防修的意义。

二、中越分歧的发展

中国支持越南统一战争和印支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是中越分歧累积的过程。这一分歧主要集中在下述问题上。

（一）在越南的地区霸权抱负问题上的分歧

越南素有支配印度支那的抱负。1954 年 4 月，日内瓦会议前夕，由于中国领导人对老挝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接受了越南党的看法和方案，认定老挝人是

---

① 以上对毛泽东的动机的综述，来自：牛军：《60 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背景》，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第 207 页；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续）》，第 45 页；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7 月，第 215～223 页。

② Zhai Qiang, Beijing and the Vietnam Conflict, 1964～1965: New Chinese Evidenc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Issue 6～7, Winter 1995/1996, p. 237.

越南的少数民族，印支三国问题应该一体解决，以便建立一个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① 但这一主张在日内瓦会议上遭到强大的阻力，周恩来通过与各方代表，包括老挝王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的接触，认识到三国一直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老柬都已独立，且都得到30多个国家的承认，也被本国人民视为合法政府，因此，如果接受越南北方的建议，否认老柬两王国政府是合法政府，只承认越共支持的巴特寮②和柬革命力量组成的两国抗战政府，不接受英法提出、老柬支持的三国问题分开解决的提议，是非常困难的，将把中立的老柬政府完全推向西方。另一方面，在老柬两国，抵抗力量主力都是越南人民军，若接受分开解决，越南人民军就成了外国军队，必须撤出，两国领土将完全处于亲西方但中立的王国政府控制之下。这是中国第一次意识到和应对越南的地区扩张主义问题，及在印支面临不干涉内政原则与支援世界革命之间的冲突。周恩来建议解决办法必须严格建立在越老柬是三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获得中苏两党中央认可。③ 出于避免美国干涉越南战争以致中美在印支直接冲突的前景，以利于为国内建设营造和平环境，中国也不主张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法国撤退后继续对南越的统一战争，建议采纳大多数国家都同意的政治解决方案。鉴于越南对中国的严重依赖及胡志明和越共在南北方人民中获得的普遍拥戴，对于和平统一有着某种乐观预期的越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日内瓦协议就是在以上基础上达成的。后来由于美国的干预，南越政府始终拒绝举行日内瓦协议所要求的统一的选举，和平统一的目标流产。越方不少领导人早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就对中方的立场表示怀疑。因为美国干涉毕竟只是个假设，而人民军有能力迅速解放南越和老柬全境则是一个事实。其后美方和南越撕毁协议的行动更使得他们对中国耿耿于怀，④ 认为中方的妥协不仅牺牲了越南的民族统一大业，也妨碍了越南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

自那以后，越南控制印度支那革命的抱负一直是中越关系中的一个微妙敏

---

①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② 老挝语中，巴特是国家，寮即老挝，巴特寮即老挝国。这个词起初是老挝国内对爱国阵线领导的各类武装的称呼，后来被国际舆论用来统称包括老挝人民革命党、爱国阵线和其领导的反政府和反美武装在内的老挝革命力量。爱国阵线是人民革命党领导的公开合法的、类似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26页。

④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9页。

感的问题。为了支持东南亚革命，中共必须与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柬埔寨共产党①直接打交道，而越南党实际上反对这种联系，要求中共通过越共与老柬革命力量发生关系，包括提供援助。最终，越南实现了自己控制老挝党和老挝革命的企图。其最终结果就是老挝革命1975年成功之后越南对老挝的全面控制。柬共则一贯抵制越南的控制企图。越柬两党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最终导致了1975年柬埔寨革命成功后两党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和1978年底越南出兵推翻波尔布特政权（民主柬埔寨）、建立亲越的韩桑林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胡志明小道的存在也是越南的地区野心的一个曲折的反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确立了老挝和柬埔寨两王国的中立地位，1962年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再次确认了老挝王国的独立和中立地位。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后，为了支援南方革命以便完成民族统一，越南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条向南越革命力量输送援助物质和人员的秘密通道。这条路起自邻接中越边境的越南一侧，纵穿老挝东部，然后经柬埔寨东北部进入南越解放区。作为南越革命的生命线，这条秘密通道在越南抗美统一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印支三国革命的生命线，这条路也为老柬反政府的革命力量接受包括中苏越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交通命脉。老柬两国的解放区实际上是胡志明小道的延伸。这条路完全在越南的控制下，大批北越正规军常驻这条路上，其使命有三：在美国的轰炸和南越政府军的威胁下保护通道，支援老柬革命，控制老柬革命力量。如果严格地解释两次日内瓦会议的精神，不能不承认胡志明小道的存在侵犯了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老柬两国政府力量弱小，不得不容忍和默认这条路的存在。②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小道及其周边的解放区，成了变相的越南领土。这条路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中越两国推进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抱负。越南同时又把这条路用作地区霸权主义的工具。毛泽东对此的认知有两种可能，或是没有充分意识到越南的地区野心，或是出于世界革命大局而暂时容忍了这

---

① 柬埔寨共产党成立于1960年，其军事组织红色高棉成立于1967年，后来西方舆论用“红色高棉”一词统称柬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和其于1975年建立的全国政权。

② 例如，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没有能力驱逐1962年以来就盘踞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越南军队，后者把胡志明小道的终点所在的柬埔寨东北部变成国中之国及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渗透部队的后勤基地。对于美军和南越军队偶尔越境打击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基地，西哈努克假装不知道，以便维持对其有利的表面中立，实际上欢迎美国人这么做，因为红色高棉正是在越南北方的军事支持下才得以生存的。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0～34页。

一事实。

（二）50 年代中后期在南方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分歧

日内瓦会议后四年左右，毛泽东一度接受并公开宣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主张。对此他的公开和私下解释是一致的，即中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需要广交朋友以进行工业化。他甚至一度公开保证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反政府武装斗争，涉及的国家包括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和马来亚。① 在这一背景下，在 1959 年前毛泽东也反对越共重开南方武装斗争。而没有中国援助，武装斗争毫无胜利指望。越共中央认为，在美国支持下的南越傀儡政权坚拒日内瓦协议关于统一选举的规定，并对南方的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保护南方革命力量，才能实现民族统一。因而对于中共中央的态度，越南方面颇有怨言。

（三）越战升级时的中美默契

第三个不满与 1964 ~ 1965 年越战升级时中美默契有关。美国此时大规模卷入越战只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南越政权，而非出于对北越和中国的进攻意图。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中国领导人既不愿意放弃对越南抗美统一战争的支持，又希望避免与美国的不必要的大规模战争。约翰逊政府也有同样强烈的避免第二次朝鲜战争的愿望。因此之故，中美之间进行了一次事后证明有效的秘密和间接的信息传递。

1965 年 4 月 2 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请求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总统向美国领导人转达中国的四点立场：1.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3. 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了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 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② 由于阿尤布汗推迟访美，中国又通过英国、坦桑尼亚等多种渠道发出了同一信息。以上信息既表明了中国支持世界革命而绝不只为自身主权与安全考虑的决心，又暗示了中国无意在印度支那与美直接交战。约翰逊政府很快

---

① 李丹慧：《中国和印度支那战争》，第 29 ~ 30 页。

②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第 160 页

收到了这个信号以及中方力图避免中美直接交战的其他暗示，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自身安全，同时力图减少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只要美国维持有限战争，即：不对越南北方进行地面入侵，不轰炸中国本土，中国作战部队就不大可能进入包括南北方在内的整个越南与美军作战，中国将仅仅以物质援助确保南越革命的成功；恪守这个红线符合美国利益。① 随后美国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等多种渠道成功地把这个承诺传达给中方。在整个战争期间，美方严格遵守了这个承诺，白宫始终抵制了军方要求地面部队推进到北纬 17 度线以北的要求。②

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对战争的参与局限于：1.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抵抗力量进行道义和物质援助；2. 解放军的非作战部队进入越南北方从事后勤工作；3. 中国防空部队进入越南北方参加防空作战。美国的战争参与形式则主要是：美军地面部队在北纬 17 度以南的越南领土即南越作战，对越南北方和老挝、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进行轰炸，对越南北方港口进行封锁；轰炸和封锁的目的是阻止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北方的援助及这些援助经胡志明小道到达南越、老挝和柬埔寨革命力量手中。这样一来，中美在印支战争中仅仅处于间接对抗状态。1965 年 6 月，中越两军曾经达成中国空军直接参战的协议，方式是中国向越南派出志愿飞行人员帮助操纵越南飞机，并向越南机场派遣飞行员和飞机；或者中国战机直接从中国机场起飞参战。7 月 16 日，中方总参谋部以“时机不合适”为由拒绝执行这个协议，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避免中美直接冲突。越南失望之余转向苏联求救。③ 对于偶尔进入中国领空的美军战机，中央军委先是禁止打下来，后来它命令可以击落，但不允许中国战机在追击时越过边界进入越南北方。④ 越方认为，中美间的默契使美国得以放手侵略南越并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是中国对越南统一事业的背叛。

---

① 姜长斌、高祖贵：《当代中美关系新视野（一）——从解密档案看中美关系》，第 11 页。

② 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

③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II: The Making of a Limited War, 1965 ~ 1966*, p. 171；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 ~ 1973）》，第 204 ~ 205 页。

④ 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 4 页。

（四）“联合行动”问题上的分歧

“联合行动”问题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关。1965 年以前，中国是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的几乎唯一的外援提供者。苏联对越南奉行脱身政策，援助很少。所以河内在中苏对立中一方面试图不偏不倚，一方面与中共保持了更紧密的关系。苏联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中国则抨击苏联背叛世界革命。为了摆脱困境，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迅速改变政策，1965 年初开始加大对越军援力度。① 1965 年 2 月 7 ~ 10 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与越南签署经济和军事合作协定。苏联援助物质特别是军援从此开始源源不断流入越南。② 1967 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一半是给越南的，其中近 60% 是军事援助。虽然苏联对越援助的总额还低于中国，但其中军援部分大大超过中国。到 1968 年，苏对越军援总额超过苏联援越总额的 2/3，同年苏联对越援助总额超过中国。③ 1965 ~ 1968 年，苏联援越总额几乎是中国援越总额的三倍。④ 在此背景下，苏越关系急剧升温。中国自然不愿看到这种事态。中国领导人一再告诫越南领导人，说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三是要改善苏美关系，四是离间中越关系，五是给中越制造麻烦：“中国过去面临同样的问题，依靠他国，特别是苏联，结果当苏联停止援助时，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⑤

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部分援助都要取道中国，苏中又是最大的两个援助国。河内一直希望中苏能够联合行动，建立一个统一的后勤保障系统，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同情越南的国际左派力量也有这个要求。由

---

①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 366 页。

②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 ~ 1973）》，第 221 页。

③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 ~ 1973）》，第 321 页。

④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年，第 488 页。

⑤ 《周恩来、邓小平与胡志明的谈话，北京：1965 年 5 月 17 日》，Working Paper，No. 22，p. 87；《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北京：1965 年 10 月 9 日》，Working Paper，No. 22，p. 89；《周恩来、康生与越南南方代表团的谈话，北京：1969 年 4 月 12 日》，Working Paper No. 22，；《周恩来与黎笋的谈话，北京：1966 年 3 月 23 日》，Working Paper，No. 22，p. 93. 以上谈话记录皆出自：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于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目标未能达到。① 对于越南来说，联合援助越南应是国际共运的头等大事，而中国依然强调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顺利进行反帝斗争的条件是“必须彻底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② 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拒绝联合行动，是不顾大局。③

（五）越美谈判问题上的分歧

到1968年春，美国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南越的大规模地面作战已经三年，北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美国也一直对北越大打谈判牌。1968年4月，出于缓解美国军事压力、争取国际舆论等多重考虑，在美国已承诺部分停炸的前提下，北越同意在巴黎与美国进行谈判。此举遭到中国的激烈反对。

毛泽东为什么不赞成美越和谈？综合学者们的已有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从革命理念和中共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出发，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才会有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否则就极可能中美国的圈套，使抗美救国事业半途而废。二是从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考虑，只要美国还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就不希望美越妥协，而是希望把美国长期拖在越南，尽可能消耗其国力。三是担心此举将扩大苏联的地区影响。这最后一点担心不无道理。“关于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便开始就越南问题在巴黎进行谈判的倡议等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呼吁书，是约翰逊政府通过苏联政府传递的。”④ 中国在越南问题上一直比苏联激进，而差不多从插手越南问题开始，苏联就倾向于和平解决。1965年2月11日，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柯西金要求中国帮美国人想办法退出越南，中国领导人则警告苏联不要用越南问题与美国讨价还价。⑤ 回到莫斯科后，柯西金建议召开一个关于印支问题的、类似日内瓦会议那样的国际会议，以求政治解决。中国对苏联的动机再次表示谴责，认为

---

① Douglas Pike, *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 Anatomy of an Alliance*, Boulder, CO: Westview, 1987, pp. 54 ~ 55. 又：1965年3月，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到中国谈援越的联合行动，先与同刘少奇、邓小平谈，基本上谈出了一个协议。毛泽东在最后一刻出现，说你们讲话不算，我讲话算，我不同意。Chen Jian, *China,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Sino – American Rapprochement, 1968 ~ 1973*，未刊稿，p. 186.

② 《人民日报》评论员：《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③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76页。

④ 《苏联驻越使馆关于越美接触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1971年9月1日》，载于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⑤ 谢益显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 ~ 197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4页。

在越南问题上苏联只想谈判不想斗争，苏美密谋企图出卖越南。① 中国领导人多次向越南领导人警告说，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就曾对美国妥协，企图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② 在越方看来，中方反对和谈，一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越南的极端困难的处境，毕竟流血牺牲的是越南而非中国；二来构成对越南内政的干涉。

不可否认的是，中越关系的逐渐恶化还与作为小国弱国的越南对比邻的大国强国的天然戒心有关。也与越南北方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古代中国与越南多次冲突的历史有关。

第二节 中苏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力竞争

一、复杂的中苏越三角关系

由上可见，中越分歧的发展，根本说来，与越南对整个印度支那的野心和中苏争夺对印度支那的影响这两大事态有密切关系。两者同时涉及中越苏三方的国家利益冲突，后者还涉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无论是出于对主权原则的尊重，还是出于自身安全，中国都不可能接受越南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野心。地理因素则决定了苏联对于越南的地区野心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自 1965 年苏联开始大举援越以来，在长达至少 20 年的时间里，为了把越南从中国的怀抱中拉过来，进而从南面包围中国，苏联对于越南的地区抱负一直持默认态度。由于国力的差异，苏联援越力度很快超过中国，特别是向越南提供了中国所无力提供的先进常规武器。对于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由于越南直接面临美国对其统一事业的阻挠，越南党本来更同情中国党的激进立场，但出于自己独立的理论思考和国家利益，一直不能接受中国关于苏联已经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帮凶的判断。以上四类因素（中苏对越南的地区野心的不同态度，援助问题、谈判问题和意识形态争论）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越南对中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大，苏越关系则越来越密切。只是由于抗美战争还在继续，民族统一

---

①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 222～223 页。

②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 230～232 页；李丹慧：《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2001 年 9 月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牛军：《60 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第 211 页。

尚未完成，仍然需要中国的援助，越南暂时压制了对中国的不满，而采取在中苏之间骑墙的态度，以便从中苏竞争中谋求最大的好处。① 尽管如此，中方不可能不察觉到双方的裂痕。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共不能听任苏联将反帝大旗从自己手中拿走；从国际地位上说，不能听任苏联取得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从国家安全上说，更不能听任越南投向苏联的怀抱而失去南部安全屏障，出现“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恶果。② 为此，1964 年以来，中方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二、中国争取越南的努力

中国阻止苏越接近的努力有三：说服、施压和援助。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11 月初，在周恩来应邀即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之时，中共中央建议越共中央也派人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看看苏联新领导人的政策是否有所变化。1965 年 3 月 1 日，也就是在苏联已决定大规模援越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周恩来告诉胡志明，他非常失望，因为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使他相信，苏联新领导人与赫鲁晓夫没有什么两样。显然，周恩来想要胡志明在中苏论战中完全站到中国一边。③ 1965 年前，在中苏论战中，越南更多地站在中国一边。此后，越南开始偏向苏联，令中国很不安。周恩来、邓小平在 1965 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党有人公开提出要警惕来自北方的威胁，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因为苏联正在那边威胁我们。④

1966 年 5 月，黎笋在莫斯科发表“苏联是我的第二故乡”的言论。几天后，中国方面拒绝了越方请援越部队第二支队在完成原定任务后继续留驻、担负其他任务的请求。几天后黎笋访华，毛泽东一反常态，始终没有接见。⑤ 1968 年 10 月 6 日，为表达对越南接受美苏建议、与美国进行谈判的不满，周恩来借口

---

①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 ~ 1973）》，第 223 页

②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 366 页。

③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5 ~ 1975）》，第 438 页。

④ 沈志华：《中国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1966 ~ 1972）》，http：//www. shenzhihua. net.

⑤ 洪永宏等：《中美军事冲突前前后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年，第 178 ~ 179 页。

国内事忙，婉拒越南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① 中共九大后不久，黎笋访华，与毛泽东会晤，范文同和长征也先后来华与林彪会晤。在这三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都指责越党领导人支持苏修路线。② 在1969年上半年，中国只完成了年度援越协议的31.4%。③ 部分地作为中越关系恶化的结果和表现，1969年2月至1970年7月，中国援越部队陆续全部回国，军援也大幅削减。④

60年代中期起中国总的说来不断扩大对越南的援助，目的之一也在于防止越南完全倒向苏联。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后不久，邓小平秘密访问河内。他告诉越南领导人，美苏正勾结破坏越南抗美救国事业，许诺只要越南割断与苏联的关系，中国愿意每年援助10亿美元。⑤ 1972年2月2日周恩来告诉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防止北京与河内关系恶化所需的最低限度；如果中国还想把苏联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话，就不得不支持越南。⑥

三、中国对越影响力的下降与毛泽东的困境

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国领导人发现自己对越南北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小。1967年在河内举行的五一节集会上，越南领导人发表讲话感谢苏联的援助，而只字不提中国。⑦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对越南北方的空袭范围局限在北纬20度以南。越南没有与中国进行任何磋商，就于4月3日宣布将与美国进行谈判。4月19日，周恩来就此事严厉地批评范文同，遭到坚决反驳："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作战，我们应该有权决定外交和军事行动。"⑧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河内不仅拒绝听从北京的建议，而且不再向北京通报某些关键性的决定和行动。1968年5月3日，河内宣布将于5月10日后与美国在巴黎进行和谈，决

---

①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62页。

②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324页。

③ 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405页。

④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第15页。

⑤ Nayan Chanda, Secrets of Former Friend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June 15, 1979, pp. 38～39.

⑥ （美）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1989）》，丛风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4～65页。

⑦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第488页。

⑧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北京：1968年4月19日》，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 C., 1998, pp. 126～127.

定宣布2小时前才通知中方。① 同年，越南媒体在报道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实际上持赞成态度。珍宝岛事件后，越南官方和媒体对于苏联对华威胁一字不提。② 实际上，这时越方对中方的敌视已经到了中方所不敢想象的地步。早在1969年前，黎笋就多次警告越南军事干部，指出中国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联手，要研究将来与中国打仗的问题。③ 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印支后，越南于当年就向中方提出领土要求，涉及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北部湾和陆地边界的划界问题。④ 而当时的越南尚未完成统一，依然在接受中方的巨大援助。

越南与苏联接近的难以逆转的趋势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不难想象毛泽东的失望、吃惊、愤怒和困惑。抗美援越这件事，中国付出了很大代价，而且在内外宣传上十多年来已经给越南抗美事业和中国对其的支持给予了极高的意识形态评价。如今越南不领情，义无反顾倒向苏联，还视中国为威胁。这种态势下，无论怎么对待越南及其抗美统一战争，对于毛泽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越南党是不是正在变成或者已经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如果是，还要不要继续支持其抗美斗争？如果不是，如何解释越共与苏联越走越近？如果继续支援，统一后的越南会不会成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基地？如果放弃支持，如何向国际反帝力量解释？因为越南毕竟是在抗拒头号帝国主义。在毛泽东下定联美抗苏的决心之后，如何对待与苏联结盟同时与美国对抗的越南，就更成为一个复杂棘手的难题。

四、印度支那问题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1954～1975年的印度支那问题同时具有四个层面的内容，合起来交织成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一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争夺，表现为南越和其后台美国与北越和其盟友中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苏越所支持的老挝、柬埔寨国内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与这两国的非共产党政府之间的矛盾。二是中苏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争夺。三是越南的民族统一问题，表现为北越在和平统一无果之下武装统一的选择和弱势的南越在美国支持下对这种

---

① 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

②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第489页。

③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366页。

④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第490页。

统一的抗拒。四是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诉求与老挝、柬埔寨两个中立而弱小的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独立的努力。美国对越战的卷入，主观和客观上都有维护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独立的意图，只不过这种意图在美国的认知里是和对抗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扩张”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1968年下半年以来，在逐渐下定联美抗苏的决心的同时，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大决策：一是同时执行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及支持印度支那革命的政策；二是转变对越美和谈的政策，以图尽早结束越南战争。

第三节　毛泽东对印支问题与联美抗苏的切割政策

一、美国借助中国体面撤退的意图

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前，美国在越战中始终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中国如何反应。虽说中美有心照不宣的默契，鉴于中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宣传上的激进，美国并没有避免中美直接冲突的绝对把握。二是如何体面退出越战。到1968年即约翰逊政府的最后一年时，美国朝野已经一致得出结论：美国无论如何打不赢，应该及早考虑从越南脱身。分歧只在于撤出的条件：是无条件撤出，还是有条件撤出？反战势力主张前者，这也是越南的立场。

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均主张后者。其条件是：

第一，印支三国同时停火，并且所有外国军队均从印支三国即南越、老挝和柬埔寨撤军；因此，不仅美军要撤出来，北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队也应全部撤出。北越认为，美越谈判与老柬无关，停火只能是越南全境的停火，撤军只能是美军从整个印度支那的无条件撤军。美国认为，只有同时在老柬停火并撤出老柬的北越军队，老柬两国的独立和中立才有保障；在那之后两国政府与其反政府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就是纯粹的内战，美国将不干涉这两场内战的结果。美国之所以持此立场，出于三点考虑。其一，美国认为老柬的革命主要是外部势力煽动起来的，失去了外部干涉特别是越军的直接卷入，两国共产党武装绝无推翻政府的可能。其二，约翰逊和尼克松均认为美国无论如何必须维护自己的自由世界领袖的形象和权威，如果接受北越和国内反战势力的相当于无条件投降的停战条件，就等于彻底背叛和抛弃自己的盟友，美国的自由世界领袖地位将不保，西方甚至可能因此而输掉冷战。其三，如果老柬共产党果真在

名副其实的内战中胜利，美国愿意承认这个现实。经过越战的惨痛教训，美国早就没有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四处伸手对抗共产主义的雄心，尼克松主义的实质之一，就是让盟友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共产主义扩张”。

第二，北越必须承认南越政权的合法性，至少在停战协定的纸面上要保证不以武力推翻南越政府，在决定南越政治前途的进程中南越现政权必须参与。越南一贯认为南越政权只是美国的傀儡，没有任何合法性；美国的这个要求是对越南内政的无理干涉。美国认为南越是合法的主权国家，越南坚持武力推翻该政权才是干涉内政。对于越南来说，如果答应美国的这个停战条件，20 多年流血牺牲就失去了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考虑的主要还是面子。即使越南在表面上接受了这个条件，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越南实际履行这个协议也不抱幻想，对于南越政权在与北越的单枪匹马的内战中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存更不抱幻想。1971 年 1 月，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如果越南人在他们自己之间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妥协，而以后如果北越与南越之间再度爆发战争，那就与美国人无关了；那将是越南人自己的事。① 1972 年 2 月 14 日，在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说：“我认为，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设法从越南撤军，但保留一段过渡期，以致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盟友直接送进狼口。”②

面对上述两个难题，特别是体面撤军难题，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苏都寄予厚望。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通过缓和对苏和对华关系营造三角外交，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但并非最紧迫的任务；迅速结束在国内外都不得人心、无望取胜并严重消耗美国的硬国力和软国力的印度支那战争，才是当务之急。但两者之间确有关系。在基辛格看来，对苏缓和、对华解冻及三角外交的实现，将苏中都纳入美国主导的大国协调战略中了，在此基础上，如果通过关联战略使苏中都有利益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北越的两个强大后盾就会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自然会约束北越行为，促其妥协。③ 这里的关联战略指的是，用联华制苏、美国从台湾岛撤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交换中国对越南施压；用扩大苏联与西方的贸易和承认苏联在战略武器领域与美国平等的地位来

---

① Robert Dallek, *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7, p. 257.

② 《尼克松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 年 2 月 14 日》，第 406 页。

③ 龚洪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 月，第 294 ~ 295 页。

交换苏联对越南施压。如果中苏两大国有一个能够对越南施压，越南就将不得不妥协，因为越南的战争努力几乎全部依赖中苏的援助。苏联和中国分别是越南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援助国；越南的军事装备主要来自苏联；苏联对越南的援助主要取道中国。

事实上，美国可能高估了中苏对越南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外力能够改变河内统一的决心。① 美国人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80 年代末老布什曾经感慨道："我们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在战争中的角色，忽视了中越之间长期的历史问题。"② 美国也低估了如下事实：中苏对于世界革命领导地位的争夺以及在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争夺，使得谁都不敢轻易削减对越南的援助。但是，今天看来，美国的如下判断可能还是成立的：如果中苏美都断绝对印度支那冲突中各方的一切援助，越南武力统一全国和控制印度支那的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将极其困难。

二、联美抗苏与援越抗美并行的切割政策

（一）切割政策的确立

对于中国，美国政府首先希望有机会当面向中国领导人坦率地说明美国彻底从越南撤军的诚意，及无意颠覆北越政权和无意从南边威胁和包围中国的意图，以打消中国任何可能有的直接出兵印度支那的意图。其次，希望中国劝说越南软化其谈判立场。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中美直接的高层接触，摸清美国在越战问题上的底牌，再在此基础上确认中国在越战问题和联美抗苏问题上的具体政策。由于长期隔阂，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美国政治运作机制不甚了解，中国往往误判美国在越南的真实意图，做出过激反应，进而刺激美国做出过激反应，使得双方在越南问题上的对抗愈演愈烈。③ 通过 1965 ~ 1970 年的多次华沙会谈和 1969 ~ 1971 年 7 月的多次间接的信息沟通，中方基本确认了美国退出越战的诚意。1970 年 2 月 22 日，也就是第 136 次中美会谈（也是最后一次华沙大使级会谈）后的第二天，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给基辛格打电话说，叶海亚总统说，中国人现在"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

---

① 龚洪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第 302 页。

② Bill McCloud, *What Should We Tell Our Children about Vietna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p. 22.

③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 ~ 1973）》，第 368 ~ 369 页。

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很小了。”基辛格对此的解读是，第一，周恩来理解我们了，知道我们即将从越南脱身；第二，他还明确无误地暗示，中国无意直接参战，也无意因为越南战争而攻击美国的其他切身利益。① 1971 年基辛格的两次来访，使中方对美国退出印支的意图再无任何疑问。

在确认了美国的意图之后，毛泽东做出了支持印支三国抗美战争及革命和联美抗苏并行不悖的决策，学界称其为切割政策。这一决策直接反映在他于 1971 年 5 月 29 日批准的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中。报告指出：中国依然坚持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战的立场；只要三国人民坚持持久战，各方再给予大力援助，必将获得最终胜利。关于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支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报告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会谈，因为尼克松政府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而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有利于支援印支抗战。”②

（二）切割政策的执行

切割政策的执行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拒绝对越施压，敦促美国无条件撤军

在 1971～1972 年的中美高级会谈中，中方始终拒绝美国要中国对越南施压的请求，反而敦促美国加速无条件撤军。早在 1971 年 7 月基辛格访华前，尼克松政府就从与中方的直接和间接的信息交换中注意到，中国方面明显地将越南问题与中美关系切割，并不将美国的印支政策作为缓和中美关系的条件和议题。③ 在 1971 年 7 月、10 月与基辛格的会谈中，1972 年 2 月初与亚历山大·黑格的会谈中，及 2 月下旬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谈中，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表明了如下立场：

第一，一切外国军事力量，包括追随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必须立即、完全、无条件地撤出印支。

第二，美国必须放弃对朗诺政权和阮文绍政权的支持，让印度支那人民自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340 页。

② 转引自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1 期，第 13 页；及：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 344 页。

③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第 13 页。

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包括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也绝不会干涉他们的选择。

第三，美国撤军后，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那里去填补所谓“真空”，也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第四，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防止北京与河内关系恶化所需的最低限度；如果中国还想把苏联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话，就不得不支持越南。①

第五，战争拖住了美国，使其力量不能用在世界上其它更为重要的地方，战争也给了苏联在印度支那扩大影响的机会，因为越南严重依赖苏制武器，因此战争的长期化只会对苏联有利。②

第六，中国没有资格和能力解决越南问题，中国不想干预也无权干预美越谈判；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会谈，但也绝不介入和谈；美国撤军日程表应该与越南人民协商，而不是与中国磋商。

第七，只要战争不结束，中国就会继续支持越老柬人民的斗争；中国只有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内部事务的权力。

第八，至于北越军队是否撤出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那是印度支那人民自己的事情，有关问题他们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上有所规定，中国不

① 这句话是1972年2月2日周恩来亲口告诉黑格的。见：（美）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1989）》，丛凤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4～65页。

② 周恩来在1972年2月21日第一次与尼克松会谈时就告诉他，防止印度支那被苏联控制的最好办法，就是美军尽快撤出，否则只会帮助苏联扩大影响力。"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FRUS, vol. XVII, p. 710.

干涉。①

关于中方拒绝干预越美谈判一事，还有两个插曲值得一提。

一是，1972 年 1 月底，基辛格以尼克松的名义致信周恩来，向中方详细通报了美国的谈判建议屡次遭到河内拒绝的情况。信中并没有提出要中国劝说河内。周恩来回复了一封言辞尖锐的信，指责美国人想把中国拉到越美谈判中来。②

二是，《上海公报》中有如下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③ 周恩来在公报发表后对越南领导人通报中美最高级会谈时解释说："这一条很重要，说明我们不代表越南、柬埔寨、老挝、朝鲜进行谈判，我们不希望双方有秘密的针对第三方的默契。这是苏联和日本担心的事。有了这一条，说明我们没有任何秘密交易。"周恩来还说，我们向尼克松说明，只要侵越战争不停，我们一定要支持你们打到底，取得胜利需要多久，我们就支持多久。即使美军走了，它的傀儡还在打，我们仍支持印支三国人民。④

事实上，中国兑现了自己支持印支人民打到底、直到彻底胜利的诺言。中国对越南统一和印支三国革命的援助并没有因为美国退出印支而结束，一直持续到 1975 年越南完成统一和老柬革命成功。

---

① 以上八点内容系笔者根据下述文献归纳而成：《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9 日下午 9 ：40 ~ 11 ：00》，《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10 日上午 10 ：35 ~ 11 ：55》，《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10 日下午 12 ：10 ~ 6 ：00》，《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9 日下午 4 ：35 ~ 11 ：25》，Chou En – lai, HAK, et al, Memorandum for Henry A. Kissinger, from Winston Lord, Subject: " Memcon of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Chou En – lai", July 29, 1971, NSC, Folder 3, Box 1033; FRUS, Volume XVII, China 1969 ~ 1972, p. 379. p. 38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FRUS, vol. XVII, p. 710；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第 14 页；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 ~ 1989）》，第 64 ~ 65 页；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30 页；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 70 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 1971 ~ 1973》，第 102 页：黄华：《亲历与亲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163、166 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505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5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9 日。

④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 85 页。

总的说来，中方在私下会谈中的立场与公开宣传的立场同样强硬，没有多少变化，使基辛格和尼克松非常失望。但是，美方在双方关于印度支那的会谈中并非一无所获。他们从会谈中直接间接地得到了有关中国立场的如下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美国后来为压迫越方接受美方谈判立场而大胆地做出强化对北越的军事压力的决定并坚定地执行这个决定起了作用。

第一个信息是，只要美国恪守此前与中国的默契即不空袭中国领土和不地面入侵北越，不管美国怎么加大对越南的军事压力，中国也会继续恪守不直接参战的立场，满足于做印度支那的“大后方”。在 1971 年 7 月 9 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中国在越南没有作战部队，只是向越南提供了筑路、架桥方面的技术顾问，为了保护他们，才派去防空部队，一旦完成任务，他们将全部撤回，这和朝鲜战争完全不同。①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表示中国无意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五周以后，当越南人向我们发动攻势时，这一了解对我们十分有益，特别是莫斯科也做了类似的保证。”②

第二个信息是，只要中美不直接交战，不管越战怎么打，打多久，至少就中国方面来说，中美战略合作不会受到明显影响。1972 年 2 月 28 日，在与尼克松话别的时候，周恩来说：“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证，去年七月以来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那里（指越南），总统先生、毛主席和我本人都明白这一点。”③ 与此有关的一个事实是，1972 年 5 月 8 日，尼克松发表广播讲话，重申了美国退出越战的诚意和其关于停战条件的立场，并宣布将强化对北越的轰炸并封锁北越海岸线，直到北越做出让步为止。当天晚上，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向美方询问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福特和另一位众议员访华的技术安排，这次访问将在 6 月底进行。④

第三个信息是，在美国退出后，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无意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无意乘美国之危在东南亚搞势力范围。这一点前文已述。毛泽东希望由此推动美国尽早撤军。

---

① 《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9 日下午 9 ：40 ~ 11 ：00》，pp. 33 ~ 35.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25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47 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179 页。

这几个例子明白无误地向美国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越南战争与中美合作无关。

中方从中美高层接触中也有收获。除了更加确认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防御性意图和撤军的诚意之外，还有两大收获。一是发现美国对中国也搞切割政策。在1971年的两次访华中，基辛格都表示美国希望但不强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①]当然，中方的这个确认同时也来自1969年以来中美联合抗苏制苏的战略默契几乎没有受到中国援越的任何影响这一基本事实。基辛格的表态进一步增强了中方使援越抗美与联美抗苏同时进行的决心。[②] 二是发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体面撤军的问题上意志坚定，中方无力改变。随尼克松访华回国后，基辛格告诉多勃雷宁，总统向中国人发出了警告，说河内用尽其军事手段都不可能赢得战争，尽管河内能使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来。[③] 这一发现，与毛泽东后来改变绝对不干涉越美和谈的政策不无关系。

在1969～1972年的中美和解过程中，中美在越南问题上有没有秘密交易，即中方以承诺减少对越援助和压越南松动谈判立场来交换美国承诺从台湾撤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联华制苏？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当时和以后，苏联都宣传说中国背叛了越南。当时和以后的越南也深信这一点并极为不满。冷战结束后全部解密的有关中美高级会谈的美方档案和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表明，中国领导人确实言行一致，没有背叛越南。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中国并没有拿原则与美国做交易。[④] 相反，在为会谈做准备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考虑到要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作。[⑤]而且在会谈中确实尽了力去说服美国尽速撤出印支。为此，毛泽东甚至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撤出印度支那挂钩。为了减轻和打消越南和朝鲜肯定会有的对中美会谈的疑虑和不满，在1971年与基辛格的两次会谈后和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周恩来都立刻飞往河内和平壤，详细通报会谈情况，解释中国的立场并

---

①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98页。

②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98页。

③ Anatoly Dobrylin,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1986),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1, p. 241

④ 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30～231页。

⑤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http://www.shenzhihua.net/yueshierone.htm.

反复重申中国坚定支持印度支那革命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可以想象，考虑到越朝两党与苏共的友好关系和这两国与苏联的盟国关系，与美国的尖锐敌对关系以及中美战略合作的默契而非明示的特点，周恩来不大可能把中方联美抗苏的真实意图坦率地告知对方。

周恩来的解释工作对越南没有任何效果。这从越方的两个反应中可见一斑。一是，在1971年7月13、14两日周恩来向黎笋、范文同就基辛格秘密访华进行通报后，越方还是在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的破产》，影射中美会谈。① 二是，在1971年11月通报与基辛格的第二次会谈时，黎笋对周恩来说了下面这席严厉的话："同志，你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仍然不会听你的。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们的，根本不是你们的。"②

2. 继续援越

切割政策的第二个表现是，在越战的最后两年即1971～1972年以及停战协定签署、美国完成撤军的当年即1973年，中国对越援助不降反升。这三年是中国援越最多的时期。③ 虽然军事援助所占比例不大，但这主要是因为越方对于中方落后于苏联的装备不感兴趣的缘故。

与此同时，直到1975年4月越南统一南方、印支战争彻底结束，中国在官方表态和公开宣传中始终没有降低支持印支三国人民战争与革命的调门。197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会后周恩来访越，在河内的群众大会上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④

①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469～470页。

② 沈志华、李丹慧：《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http：// www. shenzhihua. net/yuejiutwo. htm.

③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348页。

④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441页。

第四节 毛泽东对越美和谈的政策调整

在形成和执行切割政策的同时，1968年以来，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政策也在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这一变化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从反对和谈到支持但不干涉和谈的转变，第二次是从绝对不干涉到有分寸的劝和的转变。

一、第一次调整：从反对到不干涉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68年11月。这年11月13日，范文同在北京还不断受到警告，不要被美帝和苏修的阴谋所欺骗。几天后他再访北京时，中国的态度已经转为谨慎认可和有限支持。在与范文同的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认同了越南同志在谈判中与敌人斗争的总战略。① 原因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在11月14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与范文同第一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指示，应该"让越南人自己决定一切事情"。② 17日，毛泽东接见范文同。一开始就做自我批评，说自己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他接着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处理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过早地与法国谈判，从而失掉了一次统一越南的机会。③ 1969年9月7日夜，周恩来在与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的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的谈话中表示，关于越南问题，是继续抗战，还是巴黎会谈，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情。④

二、第二次调整：劝说越方软化立场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7月13日，周恩来在

①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313页。

②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66页。

③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83页。

④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19页。

河内对越南领导人说，越南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先解决美国撤军问题，而推翻西贡傀儡政权则需要时间。这就改变了对越美和谈绝对不干涉的政策，暗示了对越方以推翻阮文绍政权为停战条件的立场的异议。① 中国自此不再强调“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策略，而是劝告越方灵活处理，适时结束谈判。② 1972 年 7 月初，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临时共和革命政府外长阮氏萍，说服她接受了美国关于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分开解决的建议。③ 所谓分开解决，是针对越方的合并解决而言的。后者是越方传统立场，即坚持否认阮文绍政府的合法性、以废黜其政府为停战前提，达到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同时解决。1972 年 7 月 10 日，就这个问题，周恩来告诉主管越美谈判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中共政治局已经做出结论，“我们确实认为阮文绍是美国的傀儡，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参加由三方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将商讨美军撤出后遵守协议和控制局势的基本原则。美国在看到阮文绍将在该政府中分享权力后，就比较容易接受政治解决”。黎德寿极力反对。④ 但最终越方接受了中共的建议，于 1972 年 9 月 11 日在巴黎谈判中公开提出了建立一个包括阮文绍在内的三方联合政府的方案，巴黎谈判由此出现重大转机。

由于西贡坚决反对，美国被迫撕毁基辛格黎德寿已经达成的协议，要求越方再做让步。对于美方的出尔反尔，越方断然拒绝。为此，从 1972 年 12 月 18 日开始，美国对北越进行了 12 天的空前绝后的大轰炸，越方损失惨重，不得已同意重新谈判。中国这时也不愿看到在越战问题上再出现反复了。12 月 29 日，毛泽东对阮氏萍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南越，而且北越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⑤ 12 月 31 日，周恩来会见越南国会主席、政治局委员长征时说：“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当然也要准备谈不成，中间会有一些波折。”⑥ 1973 年 1 月 3 日，周恩来对黎德

① S. T. Ball,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ecturer in Modern History*, University of Glasgow, N. Y., London, 1998, p. 140.

②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 337 页。

③ 肖宗志：《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第 83 页。

④ 叶江：《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1968～1973）》，载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670 页。

⑤ 《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1972 年 12 月 19 日）》，Working Paper No. 22,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 C., 1998, p. 185.

⑥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 571 页。

寿说："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① 部分由于中方的影响，越南再次让步，美越终于在1973年1月27日达成停战协议。

第五节 对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和印支政策之关系的思考

一、已有研究结论

毛泽东实行使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及两次调整对越美和谈的政策，与联美抗苏战略有何关系？国内外学界对此主要有以下观点。

关于切割政策。毛泽东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要美军撤出越南，把这作为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越南问题的最终解决。在联美抗苏战略确立之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与其说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不如说是为了避免越南完全被苏联所控制。这在主观动机上与联美抗苏战略并不冲突。随着胡志明的病重及去世，越党领导权已经完全被亲苏派控制。越方看重的是中方的联美政策而非中方继续支援其统一努力和国内建设的事实，结果切割政策进一步拉大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倾向，使得后来的越南联苏反华不可避免。因此切割政策的实际后果之一是间接削弱了联美抗苏战略的效力。

关于和谈问题上的立场调整。在联美抗苏战略确立之后，中国希望尽快停战及赞同和谈的灵活态度，毫无疑问主要是为了避免妨碍联美抗苏的大目标。越南战争直接加深了中美间的对抗，尽快结束越战、解决越南问题客观上是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确实促进了中美缓和。中方对于越美和谈的政策转变，与美国战略调整有直接关系。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后，美国宣布从1968年11月1日晚8时起停炸北方的事实，减轻了中国的安全压力，促使中方逐步相信美国退出印度支那的诚意，进而对尽速结束战争，以及通过谈判促成美国撤军逐渐有了真正的兴趣。由于美国把体面退出越战作为从台湾撤军的前提，同时中方又把美国彻底撤出印度支那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1969~1972年与美国的接触又使中国看清了美国在

①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59~660页。

阮文绍问题上不会让步，为了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转变立场，委婉地劝越南同志在西贡政权方面做让步。中国方面把对待越美和谈的态度作为中美和解的一个筹码，而中美和解显然有利于联美抗苏。①

笔者基本接受上述结论。同时，从联美抗苏战略的角度看，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毛泽东实施切割政策的意图

越南与中国和1968年以后被中国确认为头号敌人的苏联同时结盟，并依靠这两个巨人的援助与美国进行战争，在此过程中与中国越来越疏远而与苏联越走越近；中美在对抗苏联这个具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上进行合作，同时在印度支那战争这个局部问题上又是对手；越南在民族统一的事业中夹带了地区霸权主义的私货；中国在中苏对印支的争夺中又处于明显的颓势。所有这些事实使得如何处理印支战争问题成为毛泽东顺利推行其联美抗苏战略时绕不过去的难题。这个难题有两个方面，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

毛泽东原本认为支援世界革命和维护中国安全是相互促进的，至少是并行不悖的关系，越南倒向苏联的趋势对这个信念多少是个打击，肯定是促成其联美决策和调整对印支政策的一个重要触因。仅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如果因为预见到统一后的越南将弃华投苏，其地区抱负又极可能便利苏联包围中国意图的实现，而停止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其最可能的后果是：越南更快更坚定地倒向苏联而仇华反华。考虑到世界反帝力量中的多数不完全接受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完全否定性的评价，中国在世界左派中将大失人心，中国也将可能失去毛泽东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根据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后盾的地位。鉴于毛泽东

---

① 以上结论见：宫力：《中国援越抗美的历史回顾》，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319～320、325、351～352页；肖宗志：《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06～507页；S. T. Ball,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ecturer in Modern History*, University of Glasgow, N. Y., London, 1998, p. 140；《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39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第102、110页；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续）》，第39、42页；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第14～15页；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1期。

从来就没有完全抛弃革命外交,① 这肯定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结局。从意识形态方面看，中国此前二十年对越南统一的代价巨大的支持将前功尽弃。

但是这个意识形态上是灾难性的选项却最符合国家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在联美抗苏战略确立后，中国的明智选择，是放弃对越南统一战争的支持和对老柬两国革命力量的支持，即：停止对印支三国共产党的一切援助，也阻止苏联和其他国家经中国给印支三国共产党的援助过境，同时也放弃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反政府的共产党武装的支持,② 承认和支持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亲西方或中立的政府。由于中国在印支三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后援地位，这么做很有可能长期维持越南的分裂局面，恢复和长期维持老柬两国的独立、中立的地位及印支地区的均势，也即彻底摧毁越南的地区野心。这也是美国和东南亚地区除越南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梦寐以求甚至不敢奢望于中国的。美国长期卷入越南战争不外是追求这个理想化的目标，因此以上局面也就消除了美国军事力量继续待在印度支那的一切理由。面临着中美两大国对除越南以外的所有东南亚国家的独立、中立或亲西方地位的支持和对自己武力统一南北方的努力的反对，四处受敌的越南也不大可能坚定地选择联苏反华的政策，即使这样做，对中国的威胁也有限。以上局面还将加大苏联以越南甚至整个印度支那为反华基地的图谋的困难。由这个纯粹假设可以看出，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中国对印支政策确有可能妨碍了联美抗苏战略的效力的最大化。

笔者的基本结论是，联美抗苏战略确立后，在印支问题上，毛泽东政策的实质依然是兼顾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两者都是他所理解的、必须维护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意味着以上选择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中国在印支问题上的理想目标只能是：第一，越南完成民族统一；第二，老挝和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第三，三国共产党政权对华友好包括在中苏对峙中支持中国；第四，老挝和柬埔寨保持真正的独立即不被越南控制；第五，美国势力彻底退出印支；第六，苏联势力彻底退出印支。通过目标一至三和目标五的实现而有效维护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的形象。为了实现以上六个目标中的五个（一、二、三、四、五、六），中国必须在联美抗苏的同时继续支援印支革命和抗美战争，也就是实现切割政策。

---

① 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后文。

② 这一点正是1979年以后邓小平的选择。

那么，如何解释周恩来对黑格说的那句话，即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防止北京与河内关系恶化所需的最低限度；如果中国还想把苏联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话，就不得不支持越南呢？这句话无疑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但这句话不能证明联美战略确立后中国继续援越已无世界革命的考虑，最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无意放弃对印支革命的支持，只能在这个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兼顾国家安全。因此，前文提到的完全排除意识形态考虑的纯粹地缘政治的最优选项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可能的。进而，把苏联影响减到最低限度的唯一现实的选项只能是在联美抗苏的同时继续援越。

很可能在毛泽东看来，在兼顾世界革命这一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切割政策最有利于联美抗苏大局，至少是不妨碍这个大局。首先，美国的言辞和行动都表明，它不会因为中国继续支持印支革命而放弃联华制苏战略。美国这样做是无可奈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其次，如前所述，毛泽东周恩来一贯认为印支战争的长期化只对苏联有利，因为越南严重依赖苏联武器，因此战争的长期化意味着苏联的地区影响的长期化和深化；进而，继续大力支援越南的战争努力，促美抛弃幻想加速从印支撤军，是防止苏联完全控制越南所必需的。第三，前面说过，1969 年中国就断定美苏争夺重点在欧洲，其次是中东。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明确指出："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会谈，因为尼克松政府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而不是远东。"中美均认为，印支战争使得美国的国力无谓地消耗在没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小小的印支半岛上，妨碍了美国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在全球层面的挑战及在欧洲和中东的地缘政治挑战。为达到使美国尽快退出印度支那从而集中力量于全球层面的及欧洲和中东的战略目标，光靠谈是不够的，还需要把美国打痛。第四，在印支战争持续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有利于苏联抹黑中国的形象，中国将始终面临着联美抗苏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也将拉大中越的距离及拉近苏越的距离。因此印支战争越快结束越好。为达此目的，也需要把美国打痛。最后，尽管有切割政策，中美在越南间接为敌的气氛总归不利于中美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为了尽早结束这个局面，也必须把美国打痛。只有打痛了，美国才有可能痛下决心，退出印支。总之，对毛泽东来说，执行切割政策正是为了尽快结束切割政策，撤出印支后的美国，将是中国实行抗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更理想的伙伴，将大大增强联美抗苏战略在世界反帝力量和国内干部群众面前的合法性。

三、毛泽东对越美谈判的政策调整的意图

在中国对美国卷入印支问题的真实意图有了清楚的了解和下定了联美抗苏的决心后，印支战争和台湾问题就成了中美战略合作所必须克服的两大障碍。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能因小失大。对他来说，就像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一样，越南事小，世界事大。尽快地、代价最低地解决这个问题，必然是毛泽东在联美抗苏和印支战争的关系问题上思考的焦点。在确认美国对中国安全已无恶意和确立联美战略以前，利用印支战争尽可能削弱美国这个头号敌人的实力，是符合中国利益的，这里的利益，包括世界革命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因此中国需要越战的长期化，而不是谈判。而在那以后，中国的利益在于尽可能保存美国的实力和使这种实力更多地针对苏联，因而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对中国有利。打谈结合比单纯的打，更有利于达到尽快结束战争的目标。就是说，实行切割政策的理由同时也是调整和谈政策的理由。

和谈政策调整的目标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尽可能保存美国的实力，二是尽可能维护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形象，三是尽可能减少政策调整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很可能，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在阮文绍政权问题上的妥协以尽快结束战争有利于这三个目标的实现。1971 年以后，中苏都已经明了美国保全南越政权的要求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美国已经向中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绝不干预撤军后的越南内战，因此在中苏继续援助北越的情况下，南越政权的垮台和越南的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实际上不反对美军撤出后中苏继续援助越南，同时《巴黎协定》规定美国有权继续援助南越。鉴于南越在美军直接参战的情况下都无力赢得战争，美军撤出后仅靠美国的物质援助，南越赢得内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越南方面通过与中苏的沟通对此也非常清楚。中苏也都承诺在美国撤军后继续支援越南的统一事业。因此毛泽东自信对美国和南越的这个妥协不会重蹈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覆辙，中国也因此能够保住自己支援世界革命、不背叛印度支那人民的信誉。尼克松政府为了达到体面撤军的目的，在其第一任期内动用了除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之外的一切手段，并且不惜数次扩大和强化战争，显示了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国力，这一点无疑促使毛泽东相信，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必须给美国人这个台阶。

至于由于中国转变立场必然引起的越方的不满和猜疑，中国领导人的心态显然有三个方面。

第一，事实胜于雄辩。前面提到，在周恩来赴河内通报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不久，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的破产》，影射和攻击中国。对于是否在国内转载此文，周恩来批告主管宣传的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由于张春桥反对，此文终未转载。①

第二（笔者对此还缺乏直接证据），中国领导人知道，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比中国灵活，苏联从来没有允许其印支政策妨碍其对美缓和战略，苏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苏越之间的怨言不比中越之间少。② 因此越方没有理由格外怨恨中国。

第三，对于越南因而最终走上依靠苏联反华的道路的可能性，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有关论证见后文。

四、毛泽东的新政策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

切割政策和对越美和谈政策的两次调整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前者是主要的。

（一）积极影响：搬掉了联美抗苏的一大障碍

对印支战争的新政策因为满足了尼克松政府体面撤退的需要，达到了使美国尽快退出印度支那的目标，从而搬掉了联美抗苏的一大障碍。如果不在阮文绍政权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对越战的直接卷入不可能那么早就停止，联美抗苏战略也就不可能进一步深化。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中方的政策调整对于越方改变立场进而《巴黎协定》

---

①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469～470页。

② 1972年5月8日，尼克松发表公开讲话，重申了美国退出越战的诚意和其关于停战条件的立场，并宣布将强化对北越的轰炸并封锁北越海岸线，直到北越做出让步为止。讲话后不久，尼克松出访莫斯科，此行的直接目的是签署美苏间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河内方面对于美国扩大战争之际苏联继续其对美缓和政策极为不满。在尼克松讲话后和赴苏前，河内公开、间接地警告其盟友不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世界革命利益之上"。5月21日，在尼克松基辛格去莫斯科的路上，一位苏联发言人明确表示，莫斯科知道河内指的是谁；他警告说，河内"极为专断地解释了"苏联对北越的义务，并且指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中国，都赞成"和平共处"。此后，自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以来，河内不断间接地攻击会谈及其达成的协议。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20页。

在1973年初的签署究竟起了多大作用？笔者以为，中方政策调整只是促成越方政策改变的四个因素之一。其他三个因素是：美国的实力和不惜一切代价体面撤军的意志、越方自身军事政策的失误，以及苏联的政策调整。而中方政策调整可能也并非四个因素中最重要的。

为了体面撤军，尼克松政府对北越施加了比约翰逊时期大得多的军事压力，越方由此在1969~1972年蒙受了比1964~1968年大得多的损失。越方不顾中方劝告，几次改变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对南越军队和美军发起常规攻势，其后果事实证明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在1972年春季攻势的失败中表现得尤其明显。[①]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越方被迫放弃强硬立场的根本原因。[②]

苏联对于和谈的政策一直比中国温和和灵活，但由于美国与苏中同时对抗的大格局的存在，中苏在越南的影响力竞争，以及中方对越南的传统的强硬立场的支持，越南始终能够抵制苏联要其松动谈判立场的压力，同时并不担心这会导致苏联减少援助。进入70年代后，中美苏美关系同时开始缓和的态势，及中方对于和谈的政策调整，合起来对越南的谈判地位和士气构成了打击。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我们的外交，克服了一切不利的情况，已经把河内孤立起来了”。[③] 事实很明显，在美国实际上已经承认失败、要的只是一张面子的情况下，中苏都不可能因为越南而实质性地损害自己与美国的关系，后者无疑是更重要的利益，无论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怎样钟情于世界革命。1972年，也即越南承受越战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压力的时候，苏联却削减了军事援助。在那以前，在改变对越美和谈的态度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从越南撤军。1969年开始撤出自1965年夏轮流派往越南的工程部队和高炮部队。1970年7月，最后一支部队回国。[④] 面对北越的春季攻势，1972年5月8日美军开始大规模布雷和轰炸。对此，尼基二人最担心的是中苏的反应。但中苏反应比美国预料的要温和，没有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原因是，第一，北越的这次攻势并非中国或苏联鼓动的；第二，由于中苏对立的牵制，双方都不得不更加现实地对待美国的战略诉

---

① 1969年4月12日，针对苏联武器比较先进，适合于大规模常规作战的情况，周恩来告诉越南人，目前组织大规模战役是不可行的。《周恩来、康生与越南南方代表团的谈话》（1969年4月12日），第156~158页。

② 龚洪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第301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47页。

④ 曲爱国：《中国志愿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载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01页。

求，特别是当美国的政策并不危及中苏自身根本利益时。第三，如龚洪烈所言，中苏都对北越利用中苏分裂谋求利益的行为持警惕态度。①

总的说来，1969～1972年，在尼克松为了压越南放弃推翻阮文绍政权的强硬撤军条件而对北越多次加大军事压力之时，中苏对此均反应克制，没有增加对越军援，越南大失所望。越方之所以拒绝给予这个面子，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美国的不信任，因为有了第一次日内瓦协议被美国撕毁的教训，担心美国人故伎重演，说话不算数。在越美谈判问题上越方对苏联的怨恨不比对中国的少，只是出于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考虑和中苏对于越南的地区野心的不同态度，才使得越南选择了依靠苏联对付中国。而苏联之所以能够容忍越方的这个野心，地理因素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中方的政策调整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不是把越南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的一个筹码？很自然地，美国、苏联和越南一直是这个看法。②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中方这样做和苏联这样做一样无可非议。中国学者如今也不讳言中方一定程度上确实把对越政策当作了对美政策的筹码。另一方面，中方主观上已经尽其所能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自己的联美战略对越南的伤害。越南又何尝不在利用中苏两大国的竞争作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筹码？

1973年1月27日越美签署《巴黎协定》，紧接着中美合作就上了一个台阶。在《巴黎协定》签署前，在中美领导人的历次会谈中，双方在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问题上的言论要比协定签署后克制和委婉得多。双方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台湾问题和印支问题。中方的这种态度尤其明显。在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没有一个字涉及联合制苏问题。尼克松试图探讨这个问题，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会谈就此结束。有记录为证：

在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之后：

> 尼克松：我们也不威胁别人，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认为你们也懂得美国不想统治中国。同时，我相信，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

---

① 龚洪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第287页。

② 对于中美和解，越南始终认为，中国拿越南与美国做交易，对华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366页。

家，它们都不想统治世界。正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相同，所以我们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泽东：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周恩来：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泽东：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①

《巴黎协定》签署后不到一个月，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就破天荒地称中美现在是 friends。毛泽东还对基辛格说：

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 in hand。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②

以如此直率的语言表述中美合作的实质，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在这次基辛格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及当天早些时候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两人都向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也即“一条线”的建议，这是中方第一次提出联美抗苏的具体战略设想。也就在这次访问中，中方同意两国互设联络处。另外，如第一章所述，《巴黎协定》签署后，中美具体的军事交流开始了，美方也着手制定在中苏战争中援助中国的秘密计划并告知了中方。这些突破显然与《巴黎协定》的签署直接相关。这些都标志着中方联美抗苏战略进入了更有实质意义的阶段。

（二）消极影响：刺激了越南的联苏反华

中方的政策调整没有达到挽回中越关系的初衷。切割政策和承认南越政权合法性的新的和谈政策的部分后果是：便利了越南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增加了其反华的资本即完成民族统一和控制印度支那，加深了越方对中方的仇视，最后导致中越关系不可避免的彻底破裂。事实是，只要中方坚持联美抗苏战略，坚持把苏联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坚持不支持越南支配印度支那的目标，那么，无论如何援助越南都消除不了其反华意图。中越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本质上是

---

①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转引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288页。

② 转引自：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三），第45页。

不可能妥协的。联美抗苏是为了国家安全，切割政策的后果却是在一个局部问题上削弱了安全。

（三）先支持印支革命，再应对苏越威胁：毛泽东的未雨绸缪？

考虑到对印支的新政策在挽回中越关系方面的失败，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支持印支各国革命包括越南统一战争的同时，中国有没有为日后与越南的可能冲突预做准备？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由于资料的匮乏，学术界的研究也极少。比较有意思和有代表性的是牛军的看法。他认为，尼克松政府之后中美在东亚地区有意义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即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以及随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中美和解一年后美国撤出了印度支那，七年后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军事打击，后来双方又合作解决了越南侵柬造成的问题。共同解决柬埔寨问题成为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剧变后中美依然维持住基本关系的重要原因。可以推测，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和解和关系正常化的基础的理解，也是建立在中美在印度支那地区合作的基础上的。中国在中美建交后立即的作为即对越作战，是建立在基辛格所理解的“心照不宣地结盟阻止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的基础上的。① 综观全文，牛军暗示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有了武力惩罚越南地区扩张主义和投苏反华的打算，但又语焉不详。

笔者以为，这个观点逻辑上是站得住的，但是缺乏直接的证据。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在《巴黎协议》签署后，及在中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愈益显露和苏联与越南越走越近的形势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越关系的？1975年越南撕毁《巴黎协议》实现统一是否是毛泽东乐意看到的？他是否把支援印度支那各国革命包括越南民族统一与维护国家安全分两步走，即不管越苏结盟的不可阻挡的势头，先支持印支革命到底，以维护中国在世界反帝阵营中的地位，然后再惩罚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邓小平1979年惩罚越南，是不是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毛泽东的临终意图？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史料的进一步披露和相关研究。

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的公开史料相当少，笔者只接触到四个间接材料，转录一下，聊胜于无。

1972年1月4日，周恩来会见为尼克松访问打前站的黑格。会谈中黑格转

---

①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第3～9页。

达尼克松和基辛格关于越南战争的口信说："我们的结论只能是：东南亚战争的继续进行只能给莫斯科提供机会，使它得以加强它在河内的影响，从而发展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计划。"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插手印支问题是因为中美要接近，中国准备承担这个后果，并不感到有什么意外。① 这席话可能间接暗示了后来中国教训越南与苏联合作、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可能性。

1973 年 1 月 12 日，周恩来会见红色高棉领导人英萨利。后者对越军借支持柬埔寨革命之机长期待在柬境内感到不安，担心越南在革命胜利后会威胁柬埔寨的独立。周恩来安慰英萨利说："越南总是越南人的，柬埔寨总是柬埔寨人的，老挝总是老挝人的"。"你不信，我可以签字。"② 联系到在当时的中美会谈中中国拒绝把美军待在越南和越军待在老柬两国相提并论，认为后者是印支人民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英萨利的类似于保证的话可能反映了毛泽东的独特思路，即既然要无条件地支持越南民族统一和老柬革命成功，那就必须接受越军暂时驻扎这两国的事实，因为老柬革命力量自身弱小，胡志明小道需要保护。而一旦革命成功，如果越南还想不顾老柬的意志继续驻军，企图变后者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将采取措施挫败其企图。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动乱年代》里披露，6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军队一直在临近中老边界的老挝的深山密林中修路。越战期间，美国人以为这条路是为了给巴特寮送补给，数度计划炸这条路，后来美方发现，这条路从来没有运送过补给给巴特寮和北越军队，而且位于向前推进的北越军队的侧翼，因而始终未实施轰炸计划。老挝政府首脑富马亲王拒绝公开表态说这条路是未经授权而施工的。在 1973 年 2 月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这条路的存在理由问题，并质疑中方这样做是否干涉了老挝中立。关于它的战略用途，周恩来拒绝正面回答，也否认这样做侵犯了老挝的中立。基辛格向周恩来转告说，泰国对这条路可能会是针对它的表示担心，周恩来说中国愿意与曼谷保持友好关系，筑路行动将持续下去，但修到离泰老边界很远的地方就会停下来。于是基辛格判断，这条神妙莫测的路的唯一目的就是威胁和遏制河内。③

最后，在《巴黎协定》签署后半年多的时间内，中美曾经试图就迅速结束

---

①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续）》，第 38 页。

② 《周恩来与柬埔寨特使英萨利的谈话，1973 年 1 月 12 日》，载《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第 661 页。

③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 75～76 页。

在柬埔寨和老挝的内战，组成由包括两国革命力量和现政府在内的、中立的和真正独立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进行过紧张的但秘而不宣的外交活动。在1973年2月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在两国分别建立由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老挝现国王沙旺·瓦达纳和中立主义政治家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希望这两个政府是真正中立和独立的。为此，在老挝问题上，周恩来希望王国政府与巴特寮的谈判成功，欢迎早日停火，高度评价老挝国王，称他是一位诚实的爱国者。而当时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为了老挝革命彻底成功，及考虑到越共与巴特寮的密切关系，越南不喜欢这位国王和富马亲王。关于柬埔寨，尽管美苏都承认朗诺政权，中国则坚定地支持既反对越南控制又反对朗诺政权的红色高棉，周恩来还是说了下面这番话："我并不是说他（指朗诺）所代表的力量不算数。……我们理解我们各自的方针。因为柬埔寨目前完全赤化是做不到的。如果硬要这样做，结果将造成更大的问题。"此次会谈后，对于基辛格发出的多个请求中美合作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公开和秘密的照会。周在1973年5月18日接见美国驻华首位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做了实质性答复："解决的唯一办法是有关各方充分实施巴黎协定第二十条的全部附属条款。"而按照这些条款，所有外国军队，包括北越军队，应当撤离柬埔寨和老挝领土。周恩来又说，尽管中美两国看法不同，但都愿意实现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事实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和平、中立和独立"；中方也希望整个东南亚沿着和平、中立的道路发展。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上述言论的理解是，中国实际上支持美国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主张，即成立一个独立于河内的中立、和平和彻底独立的、包括所有政治力量在内的联合政权。由于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因素，包括印支各国革命力量坚决推翻南越政府、朗诺政府和富马政府的决心，西哈努克的犹豫不决，特别是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断然拒绝批准行政当局恢复在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行动的事实，① 中美的上述外交默契未能奏效。②

---

① 1973年6月29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法案，规定8月15日为最终停止在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行动的最后期限。被水门事件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尼克松无力否决这个法案。这个法案使印支各国革命力量彻底消除了对美国继续武力支持印支各国亲美或中立政权的担忧。见：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455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74～77，314～462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5页；William Burr, ed.,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pp. 105～106, 111～113.

联美抗苏战略与中国对印支战争和印支革命的政策是有一定矛盾的，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两难处境。这个矛盾和这个处境是毛泽东外交革命的不彻底的产物和反映。他的做法是兼顾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其结果，一方面，他与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默契帮助美国实现了其体面撤军的意图，避免了美国国力的无谓消耗，搬掉了妨碍他深化与美战略合作的一大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默契构成联美抗苏的又一前提。另一方面，他的援越抗美政策又妨碍了其联美抗苏战略效力的最大化。表现为，由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复杂性，援越抗美政策在帮助越南完成其民族统一的正义事业的同时，客观上也便利了苏联扩大其在印支的影响，进而加大了对中国安全的压力。在此意义上，他的印支政策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其联美抗苏战略的某种制约。由于援越政策主要出自世界革命考虑，这种制约也是意识形态因素对联美战略的制约的一个典型反映。尽管如此，由于美国也实现切割政策，他的援越抗美政策没有妨碍联美抗苏的大局。

第四章

联美抗苏战略的深化与受挫

第一节　“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联美抗苏战略的深化

一、策略的提出和背景

（一）策略的提出

“一条线”策略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在1973年2月17日与第四次来华的基辛格的两次会谈中首次提出的，因为周恩来与他的会谈在前，所以严格说来还是周恩来先提出的，但无疑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两人的会谈中，周恩来要美国带头组织一个反苏同盟，从日本经中国到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欧，连成一条线。① 但是毛泽东对此的表述无疑有最高的权威性。当时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 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 in hand。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②

接着，毛泽东说：

> 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72页。
②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三）》，第45页。

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①

何谓“一条线”？从毛泽东当时的表述和其后对此策略的执行来看，“一条线”所提及的国家都是苏联地缘政治企图的现实和潜在的受害者，其中不少是苏联的邻国。因为这些国家基本处在同一纬度上，故被毛泽东称为“一条线”。毛泽东的意思是要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与苏联的扩张主义做斗争。

近一年后，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会谈中再提“一条线”，首次提出“一大片”：“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共同抵制苏联扩张。②“一大片”包括哪些国家？从这个表述和后来的执行来看，指的是除苏联和“一条线”国家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苏联的所有盟国。这些国家的特点是：或者受苏联控制，或者与苏联保持正常乃至友好关系，或者在反苏和亲苏之间犹疑不定。“一条线”里的国家是中国的依靠力量，“一条线”策略的目的是坚定这些国家的反苏立场；“一大片”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此策略的目的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站到反苏的立场上来，至少使其中立。

“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是联美抗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的对苏遏制政策，目的是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鉴于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一生对敌斗争时屡试不爽的法宝，“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构想的提出，几乎是联美抗苏战略提出后迟早必然出现的策略。建立这种国际统一战线的另一个重要的、显然也被中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的一个背景性事实是：万一苏联入侵，中国并没有可以求助的强大的朋友。③ 毛泽东周恩来有充分的理由对美国届时大力援助中国的诚意持一定的保留和怀疑态度。

（二）策略的背景

关于“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提出的背景，邓小平的解释是最权威的。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奥地利总统时指出：

> 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

---

①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节录），转引自：宫力：《重构世界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第150页。

② 外交部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当代外交史》，人民网－港澳频道，2010年07月09日12：27.

③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pp. 350～356.

> 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于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①

总之，基本背景是整个70年代苏攻美守的国际战略环境、中美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和已经确立的联美抗苏战略。

至于其提出的具体背景，到1973年初为止中美战略合作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度乐观的预期，越战的结束和70年代初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可以提供充分的解释。关于1973年前中美战略合作的顺利发展，第一章已述。关于台湾问题，第二章已述。关于越战结束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第三章已述。关于国际地位的提高，中美和解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外交孤立。与中国与“一条线”范围内的西欧的关系为例。1970年以前，西欧国家只有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挪威、法国、英国和荷兰与中国有邦交。1970～1972年三年间，9个西欧国家与中国建交：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西德、卢森堡和圣马力诺；英荷两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另外，1972年全年，共有18个国家与我建交或外交关系升级。②

二、策略的实施

（一）对美国争霸政策的微妙支持

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由于自身的国力和与苏联的矛盾，中美是“一条线”策略的核心角色，其中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最坚决而美国拥有最强的抗衡苏联的实力。在公开谴责的同时，私下里默认乃至鼓励美国放手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是“一条线”策略进而也是联美抗苏战略的最重要内容。

1973年2月17日深夜，在与基辛格和洛德的会谈中，也就是提出了“一条线”策略的这次会谈中，毛泽东说：美国在海外派驻军队很有用，只要这些军队部署得当。他批评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说兵力分布得“太散了”。毛泽东强调美国与“一条线”上的其他国家加强合作的必要性，特别号召美日欧之间

---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334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42页。

加强团结："至于你们和欧洲及日本，我们希望你们互相合作。在一些事情上有些争吵也无妨，但是必须在根本问题上实行合作。"① 根据基辛格的回忆，中国领导人默默地鼓励美国在菲律宾和泰国驻军，而且在支持平壤的基本路线的同时，并未真正促使美国从韩国撤军。"我每次访问时，中国领导人总是劝我们密切注视具有关键意义的欧亚大陆南部边缘地区的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的亲密朋友，它们的安全阻碍着苏联向印度洋扩张"。"中国正确地认为，美军在上述地区的存在对于保持亚欧均势至关重要"。② 在结束其 1973 年 2 月的访华后，在回国途中草拟的向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这样概括他此行得出的结论："毛和周敦促美国更放手地干，希望我们在各处反击苏联的图谋，同我们的盟国保持紧密联系，维持我们的防卫态势。"③ 直到 1982 年邓小平提出不结盟政策、结束"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时候，中国对于美国针对苏联的全球竞争政策的真正评价才开始改变。

（二）对西欧联合自强的敦促

中国实施"一条线"策略的第二个举措是在与西欧关系普遍改善的基础上，敦促西欧加强内部团结和与美国的团结，对苏联实施强硬政策。1973 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1975 年，与欧共体建交。1971 ~ 1976 年，多数与中国建交的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和重要的在野政治家都来过北京。敦促西欧团结起来，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是中国领导人在与西欧领导人的会谈中最主要的和不变的话题。诚如基辛格所言："几年来，中国对西欧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起来的关心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不禁半开玩笑地把人民共和国称作我们较强的北约盟国之一。西欧领导人在北京听到的关于大西洋防务重要性的大课肯定只能比他们在北约会议上和与美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听到的更严厉。"④

（三）对日政策调整和对美日同盟的支持

第三个举措涉及与日本的战略合作和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在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对日政策迅速变化，从警惕和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转变为鼓励日本扩军，还公开支持日本收复北方四岛，间接承认日美同盟的积极意义。1971 全年，中国媒体都把日本描述为第二大安全威胁。在 1971 年与基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 87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50 页。
③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 91 页。
④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50 页。

辛格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反复指责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和获取核武器的意图，指出美日同盟应对此负责。1971 年 7 月出访前，基辛格在致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说："虽然日本在中国人眼里越来越成为对手和潜在威胁，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美国继续保持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对他们有好处。"① 在这一年的两次访华中，基辛格本着这一认识试图说服周恩来承认美日同盟对中国的价值。在 1972 年的中美峰会上，尼克松对周恩来做了类似的说服工作：

> 美国可以从日本这潭水边抽身而去，但其他人仍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真的任凭日本脆弱而又毫无防卫能力，他们就会不得不转向其他人求助，或者发展自卫能力。如果我们不和日本达成防卫协议，我们也就不会拥有对日本的影响力。……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那么我们的抗议不论有多么响亮，都像是在打空炮。我们将没有影响力，因为数千英里的距离已经远得让人什么也听不见了。②

尼克松的意思显然是，没有美日同盟对日本的保护和束缚，日本很可能早就成为核武器大国和军事大国了，这对东亚稳定未必是好事。这不仅仅是说辞，尼克松和基辛格并不相信日本离开美国保护就会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但作为现实主义者，绝对相信经济强国一般必然成为军事强国。③

毛泽东周恩来事实上接受了美国的这个观点。在 1972 年 9 月 26 日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的会谈中，田中提出，希望两国恢复邦交不要影响与第三国的关系，尤其不要改变日美现存关系。对此，周恩来指出：关于日美安全条约，客观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尼克松 - 佐藤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已不适用；为不使美日为难，这次可以不涉及这一条约。周恩来还说，这样做并不表明中国对它没有意见。田中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可以认为双方在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上实际上达成了一个重要的默契。④ 1973 年 2 月基辛格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表示，日本坚持抵制苏联和印度的压力，因而是中国的一个"初级盟国"，美日条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4 页。

② Richard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78, p. 567.

③ （美）杰拉尔德·柯蒂斯：《美国的对日关系》，第 109 页。

④ 张沱生：《中国的对日关系》，载于（美）傅高义、袁明、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 152 页。

约有助于日本对抗苏联的压力。① 在1973年2月17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承认美国抑制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提请基辛格注意北京已经停止了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攻击。② 在1973年11月12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毛泽东赞扬基辛格在回国途中在东京停留几天的决定，说一定不能让日本感觉美国在怠慢它，它生来就感到不安全；他保证中国不会强迫东京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那样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现两极分化，肯定会加剧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首先需要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其次才是我们。"还说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毫无拘束的日本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因为这会加强沙文主义情绪。毛泽东对基辛格个人还提了一个要求："他们怕你。你应该努力减少他们的畏惧。"③ 综上，在中国领导人眼里，美日同盟不再是促使军国主义复活的帝国主义同盟，而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工具和对抗苏联的有用资产。

在1973～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竭力要求加上反霸条款，是中国把日本纳入"一条线"策略的努力的重要一环。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这个条款只可能有一个含义，即针对苏联。对此问题的具体阐述，将在后文中涉及"一条线"策略的受挫时展开。

（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局部改善

中国实施"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第四个举措涉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局部改善。由于多种原因，包括美国在东南亚营造反华包围圈的传统政策，漫长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影响，华侨问题，作为小国和邻国的东南亚诸国对于中国的传统的基于地缘政治的误解和恐惧，以及中国支持东南亚各国内部反政府的共产党武装斗争的世界革命政策，在70年代以前，约半数东南亚国家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与中国的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甚至敌对之中，始终视中国为头号威胁。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东南亚非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有过波折。"文革"期间中缅关系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而一度恶化。1965年的"九三零"事件结束了中印（尼）友好关

① （美）罗伯特·罗斯：《美国的对华关系》，载于（美）傅高义、袁明、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56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72页。

③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333页。又：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不无幽默地说："按照毛主席的吩咐，到离职时我访问东京的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主要国家的首都。"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73页。

系，使后者成为最反华的东南亚国家，1967 年两国断交。在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和 1979 ~ 1980 年中国逐步放弃对东南亚的世界革命政策以前，由于苏联与东南亚相距遥远，苏联影响尚未在印度支那占支配地位，东南亚非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把苏联视为重要威胁。

“美中和解向东南亚发出了强烈信号，即与中国合作比顺从苏联更有价值。”① 中国出于联美抗苏的考虑而把东南亚放在“一大片”之列，开始局部调整对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部分减少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美国也鼓励这些国家缓和对华关系。在上述背景下，部分出于牵制已初露端倪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企图，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调整了对华政策。② 1970 年，中缅恢复大使级关系。1974 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1975 年，泰国、菲律宾与中国建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大都在 1971 ~ 1976 年访问过中国。新加坡虽然直到 1991 年才与中国建交，但李光耀总理在 1975 年及以后多次访华。这些接触，为 1978 年以后双方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反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战略合作的全面展开埋下了伏笔。

（五）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

70 年代中国实施“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第五个领域涉及中国与亲西方的乃至对内奉行反共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全面改善。在那以前，由于美国的影响和中国的以反帝反资为主要内容的世界革命外交，这些亲美右翼政权与中国的关系大都不睦，很多没有建交。60 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这些国家的政府都被中国列入“各国反动派”之列，与帝（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修（指苏联和追随苏联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列为中国的革命外交的对象。除前面提到的东南亚国家外，“一条线”上的伊朗和土耳其，以及扎伊尔、埃塞俄比亚、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大部分拉美国家是这类国家的典型。50 ~ 60 年代，承认中国、接受中国援助和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除少数例外，都是对内不同程度地实施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政策（主要衡量指标是国有化）、对外奉行反帝反殖政策的国家。印度尼西亚（1965 年以前）、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肯尼亚等是这类国家的典型。

---

① （美）罗伯特·罗斯：《美国的对华关系》，载于《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 ~ 1992）》，第 54 页。

② （美）罗伯特·罗斯：《美国的对华关系》，第 53 ~ 79 页。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老挝、柬埔寨、阿富汗这三个在东西方冷战中奉行中立政策的君主制国家都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除“文革”早期那段特殊时期外，与中国关系始终友好。巴基斯坦自1954年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时起就是美国的盟国，1963年以来也一直是中国事实上的盟国。印度在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奉行中立政策，在80年代以前其国内经济政策也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59年以前中印关系堪称友好，自那以后由于边界问题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因此之故，60年代中期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印度成为苏联事实上的盟国。所以印度也被列入“各国反动派”之列。

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的鼓励和中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使得中国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突出地表现为建交国的激增。除了南非、以色列和韩国外，中国把所有发展中国家不是视为“一条线”上的国家，即既被认为受到苏联威胁又愿意抵制这种威胁的国家，就是视为“一大片”上的国家，即不管其与苏联的关系如何，都力争与其改善关系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争取疏远其与苏联的关系的国家。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这三个“一条线”国家的共同点都是对外反苏对内反共。70年代此三国与中国的关系堪称亲密友好。众多“一大片”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和印度等的对华关系也在70年代早期和中期得到改善，表现为外交关系升级或建交。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改善进程始于1968年，首先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纠正“文革”中极左的外交政策的努力的一部分，其次是1969～1972年毛泽东在确立联美抗苏外交战略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淡化革命外交的政策努力的一部分。1973年以来，在联美抗苏战略深化的背景下，所有这些政策调整在政策操作上都被纳入“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中。其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属于“一大片”。而中国最重视的是“一条线”国家——亲西方和反苏的国家，即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给它们以援助，竭力鼓励其抵抗苏联威胁。之所以如此，一则因为这些国家都奉行坚定的反苏政策和亲美亲华政策，二则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认为它们的政策走向对于阻止苏联实现其南下印度洋、控制波斯湾和中东的战略至关重要。7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如77国集团、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关系也有实质性改善，中国这样做的动因也与“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有关。当然，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的全面改善的另一重要背景是三

个世界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六）对民族解放运动政策的微妙调整

"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第六个方面是中国对发展中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中部分右翼的支持。冷战的前35年即1945～1979年同时也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美苏中三方都试图利用这股潮流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甚至法国、古巴、以色列、南非这些重要的地区强国也加入了这场争夺影响力的激烈而复杂的游戏之中。争夺导致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内部派别丛生。这个现象在70年代的非洲独立运动中尤其显著。大体上，70年代以前，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往往是同一类派别，即反帝的左派。美国、西欧、以色列和南非则支持亲西方反共反苏的右派。1973年以后，中国的政策出现明显调整，开始不事声张地个别援助反共反苏的右派，以致出现了中国和美国、法国、以色列乃至南非不约而同地支持同一派别的现象。一个典型事例是，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的民族解放组织一直分为三派。1974年5月起，中美试图联合阻止亲苏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取得行将独立的国家政权，中国为此开始为在中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提供军援并培训了约5000名战士，同时向坚决反苏反共亲美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提供援助。后者则一直在接受美国、以色列和南非的援助。①1975年8月，在古巴军队的大力援助下，安人运独家掌握了政权，中国一直不承认这个亲苏政权，同时始终支持安解阵和安盟的反政府内战，直到1983年。这一现象，连同中国改善与反共反苏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现象，反映了安全外交局部取代革命外交的政策取向和以反苏划界取代以反美划界的新的政策标准，表明国家利益考虑对意识形态考虑部分地占了上风。60年代中期和后期，中国一直指责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左翼的支持是"假支持真叛卖"，但在中国看来，苏联"假支持"的对象和中国真支持的对象是同一个，即真正的革命力量，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逻辑。中国现在把这些按以前逻辑本应视为革命力量的部分左派作为敌人来对待，支持其右翼对手，这一事实表明，纯粹反帝反修的革命逻辑已遭削弱，中国更多地在以国家安全逻辑行事。

---

① （美）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1989）》，第90页。

（七）与东欧关系的局部改善

“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局部改善。按照当时中国以反苏划界的分类标准，东欧国家包括两个集团，一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三国。其中，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眼里是反帝反修最坚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属于“一条线”。中国自 50 年代后期起就不再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其是比苏联资格更老的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在苏联侵捷事件特别是联美抗苏战略确立之后，毛泽东看待南斯拉夫的眼光有所变化，虽然依旧坚持对南斯拉夫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判断，但也非常赞赏铁托抗衡苏联压力、维护民族独立的气魄，说铁托“不怕压力，像铁一样坚强”。中南两国关系据此得以恢复，1970 年 9 月恢复了大使级关系，此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因此南斯拉夫实际上也被视作“一条线”上的国家。罗马尼亚的情况又有不同。1960 年 6 月至 1962 年底，罗马尼亚工人党在中苏论战中站在苏联一边，中罗关系一度恶化。1963 年后，罗马尼亚同苏联的矛盾有所发展，罗有借助中国抵抗苏联压力的要求，拒绝追随苏联的反华政策，因此中罗关系迅速好转，中国始终承认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罗同时依然不能接受中国对苏联的完全否定性的评价，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仍有不少差异。罗马尼亚还在中美解冻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桥梁作用。故中国可能视罗马尼亚为介于“一条线”和“一大片”之间的国家。其余东欧国家，即经互会和华约的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保加利亚，构成第二个集团，属于“一大片”中最亲苏的集团，同时与苏联又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国在 1971 ~ 1977 年改善了与这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希望依此拉大它们与苏联的距离，但党际关系依旧处于中断状态，因为中国依然视其为修正主义。

（八）“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不公开特征

前面提到阿南罗三国在“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中的归属时，笔者使用了“应该”、“实际上”和“可能”这三个词。这是因为，“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实施，当时是不公开的。就笔者已经查阅的文献看，1973 ~ 1981 年，国内没有任何公开报道和公开的官方文件提及这个策略。① 1982 年彻底结

① 有学者认为“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写进了中共十大政治报告，见：（美）翟强：《建立反对前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1972 ~ 1979 年）》，载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4 页。据笔者查阅，没有这回事。

束这个策略的时候及其后，也是做得多说得少。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才公开这件事，进而才纳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因此，某个国家究竟是"一条线"上的还是"一大片"上的，只能根据毛泽东的那两次著名的谈话、实际的政策实施和其他背景资料来粗略地判断。之所以如此，与台湾问题僵局、世界革命思维和"文革"路线等影响下整个联美抗苏战略的默契性质有关。由于中美关系迟迟不能正常化，也由于毛泽东始终没有完全放弃革命外交，顾忌到与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社会主义盟国的关系（这种顾忌本身也与革命外交直接相关），中国当时一直公开地同等地谴责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与举世公认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合作以对付一个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眼里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于毛泽东来说绝非轻松。而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依然是中国的重要利益所在。故"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和整个联美抗苏战略一样，只能是只做不说。换言之，其不公开特征是联美抗苏战略的默契特征的一个反映。

第二节　"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受挫与缓和

国内外学界的比较普遍的结论是：就孤立苏联而非结束中国的国际孤立局面这一目的而言，"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是不成功的。这一策略所谋求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既不符合中国国力，也不切合当时的国际斗争实际。① 笔者同意这些看法。下面简要论述这一策略受挫的表现及原因。

一、在发展中世界的受挫

就发展中世界而言，根本原因在于，属于"一大片"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于独立判断和自身利益，不认同中国对苏联的全盘否定式的评价，其对苏联

① 杨奎松：《中国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第11页；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645页。

的评价和政策也基本上不是中国所能左右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放组织不同程度地接受苏联的援助，感受不到苏联的威胁或叛卖。就利益而言，中国缺乏足够的物质实力诱使对苏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放组织背弃苏联。所有视苏联为威胁进而认同中国的抗苏政策的国家，如埃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约旦、苏丹、索马里（1977 年以后）、扎伊尔（1975 年以后）和智利（1973 年右翼军人政变后），也都是因为自身利益使然。

埃及总统萨达特在 1971 年驱逐苏联顾问和 1973 年以后改行亲美反苏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苏联无力帮助埃及恢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而美国有这个能力。土耳其和伊朗作为与苏联有历史宿怨的邻国，为自身安全计一直是美国的盟国。巴基斯坦由于与印度的克什米尔冲突和宗教分歧而选择美国和与印度不睦的中国为友，苏联在印巴冲突中站在印度一边，因而被巴视为间接威胁。1979 年苏军进驻阿富汗更被巴基斯坦视为对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因而采取了更坚定的联合中美对抗苏印的政策。约旦王室一直受到阿拉伯激进势力的威胁，而苏联一直与激进势力关系密切。索马里原本对中苏都奉行友好政策；1977 年该国与邻国埃塞俄比亚因欧加登归属问题发生冲突，苏联最终选择了支持埃塞俄比亚，因为后者在 1977 年 2 月门格斯图发动政变以后对内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对外奉行亲苏政策，该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也远远超过索马里。在领土争端中受挫的索马里遂采取亲美亲华和反苏的政策。扎伊尔［当时名为刚果（金）］在 1960 年独立之时就发生严重内乱，结果导致亲社会主义阵营的卢蒙巴总理被亲西方的军阀冲伯和蒙博托杀害，扎伊尔自此后一直是非洲最亲美最反共的国家之一。1975 ~ 1977 年扎伊尔与邻国刚果就盛产铜、钴的加丹加省的归属问题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刚果对内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对外一直执行亲东方的政策，苏联在这场冲突中支持刚果，古巴出于世界革命抱负还直接出兵帮助刚果对扎伊尔作战。后者则依靠中美的援助对抗古巴和刚果。

“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一大积极成果，是在经历了“文革”高潮时期的摧残后，中国与上述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的确立或进一步深化。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中国在“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实施中执行以反苏划界的政策的结果，不必要地疏远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放组织，也就是那些亲苏但不反华的国家。奉行反帝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放组织中的大部分左派是亲苏的，而反苏的国家和组织大都是反共亲美的右派，选择有限的中国只得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反共右翼，由此得罪了左翼，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例如，中国与几内亚一向友好，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60~70年代是享誉世界的奉行反帝反殖政策的政治家，与中苏都保持友好关系。1975年起中国一改以往政策，支持扎伊尔的以亲美反共著称的蒙博托总统和安哥拉的以亲美亲南非著称的安盟的做法，使其困惑和气愤，于是在1975年11月16日把中国大使钱其琛召来发泄了一通。① 中国与几内亚的友好关系和与杜尔个人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中国也无力改变杜尔对苏联的友谊和其对中国这一政策的不满。

另一方面，对于"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负面效应也不能估计过高。严格说来，70年代中国的以苏划界策略也还是有例外的，例外的对象不仅包括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的亲苏国家，中国也始终保持友好关系。

二、在东欧的受挫

"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在东欧的执行成效更有限。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联美抗苏战略遭到阿尔巴尼亚的坚决反对，这个问题后文中将有详细讨论。阿尔巴尼亚剧变后，前最高领导人阿利雅回忆说：根据三个世界理论，中国领导人向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巴卢库提出建议，阿尔巴尼亚应该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盟，以便对抗被称为第一世界的苏联。由于南阿两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宿怨，二战结束以来阿一直把南斯拉夫视为永久性的威胁，因此阿党认为该建议"对我国的自由和独立是有害的，这个建立共同战线的建议引起我方领导人的不信任和怀疑"。②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尚没有看到更多的史料，阿利雅的回忆是否如实，不敢妄断。如果属实，中方的建议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实施"一条线"策略的举措，因为三个世界战略和"一条线"策略在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统一战线方面是一致的。

第二，中国基于反修意识形态拒绝恢复与东欧多数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和承认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此，1971~1977年间虽然中国与东欧关系较60年代后半期要好一些，但依然冷淡，因为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与国与国的关系完全分开，由此殃及国家间关系，双方间的摩擦不断。

---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51~254页。

② 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第57页。

最后，东欧国家的切身利益和处境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如中国希望的那样疏远苏联，它们希望在不触动对苏关系的前提下和苏联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发展对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利益共同点很少。

三、在日本的受挫

1974～1977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因反霸条款而陷入停滞，表明“一条线”策略在对日关系中也遭受挫折。在1972年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中方最初坚持把1952年的《日台和约》是非法的这一立场写进《中日联合声明》，还要求在《联合声明》中宣布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日方认为，虽然从单纯的国际政治方面看中方立场是合理的，但一来，《日台和约》已经正式宣布结束日中间的战争状态，再次宣布结束两国战争状态在法律上说不通；二来，如果采纳中方立场，就等于说日本国会批准了一个非法条约，将给田中内阁和自民党造成严重的国内政治麻烦。中方做了让步，最后的妥协是：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只宣称结束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并宣布建交，以后再谈判签署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以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并对两国关系的性质、目标和基本准则做出规定。① 1974年底开始谈判，最初双方都很乐观，但当中国提出反霸条款时，日本拒绝了。所谓反霸条款，其内容大意是：双方都不谋求在本地区和世界上的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谋求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句话最初是出现在中美《上海公报》中的，而且是美方草案中最先提出的。②《中日联合声明》中也有这句话。担心过分得罪苏联的日方最初不同意写上这句话，最后双方都表现出了灵活性，中国同意在反霸条款之外加上“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国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③ 在当时的背景下，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国家都知道《上海公报》和《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这句话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中中国再次要求写上的同一句话是针对苏联的。

中方认为，既然《中日联合声明》中已经写进了这句话，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就没有理由不写进这句话，否则就是从《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后退。

---

① 王新堂：《从血仇到友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1997年5月，第132～138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67页。

③ 张沱生：《中国的对日关系》，傅高义、袁明、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日方认为，中日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如果一定要写上反霸条款，就会在日苏关系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于停滞。综合学界研究，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盟国，已有盟国，除巴基斯坦外，实际上都不接受中国联美抗苏的战略，意识形态和独立自主的考虑使得中国又不愿意与美国或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式结盟。因此与日本这样的重要邻国、经济强国和地区大国签署的条约中加上反霸条款，对于中国非常宝贵，有很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是“一条线”策略成功、苏联被孤立的重要象征，虽然严格说来条约中的反霸条款并无法律约束力。

第二，日本的处境和利益与中国不同，致使70年代中日对苏政策有区别。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事实上视苏联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日本有可靠的盟国即美国，因此它并不需要这种无谓地刺激苏联而又没有明显可见的安全好处的文字。它应对苏联威胁的政策风格一贯是多做少说。在1979年阿富汗事件终结了东西方缓和以前，70年代日本的国策之一是对中苏实行等距离外交。为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田中首相在1973年访问莫斯科，日苏缓和进程开始。日本希望从苏联获得能源以摆脱能源危机，希望日本对西伯利亚的投资有助于说服苏联归还北方领土。① 对于日本来说，共同反对苏联霸权的需要只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次要原因，两国关系本身因素，包括相邻的地理事实，近2000年的友好历史和文化联系，50~60年代“以民促官”的累积效应，日本产业界对于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浓厚兴趣，和日本国民对于历史的歉疚，才是日本实行邦交正常化的决定性因素。② 写入反霸条款，在日本国内普遍被认为将妨碍日苏关系改善，而且认为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外交受中国的牵制。③

第三，70年代中后期中美僵局的影响。由于1972年以来美苏缓和的影响，美国对联华制苏的热情减退，致使中美关系停滞。日美关系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石，在对华关系中，日本不能明显偏离美国的对华路线，既不想落在美国的后面，也不想走在美国的前面。尼克松冲击使得日本落在了后面，这是田中内阁迅速实行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反霸条款的重要背景。而

① （日）中西宽：《日本的对美关系》，载《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137页。

② 张沱生：《中国的对日关系》，载《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163页。

③ （日）中西宽：《日本的对美关系》，第137页。

今，鉴于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的限制，重申中日之间针对苏联的安全合作将把日本推到美国的前头，这是日本极不愿意的。当时有迹象表明，如果写上这个条款，较早达成协议，华盛顿可能会感到不快。中国既已确信美日联盟不危害中国安全，当中美关系停滞时，中国就希望拓展对日关系。对中国来说，中日关系改善有可能迫使美国加速邦交正常化步伐，也可部分抵消美国的敷衍给抗苏战略造成的停滞。这样一来，只有等到美国改变政策，中日关系才能有突破。福特本人希望巩固中美关系以对付苏联，却因国内因素而受阻。卡特没有国内政治妨碍，但其上台后头一年里，既不像前任那样专注于对抗苏联，也不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当务之急，因而继续拖延。直到卡特相信与中国合作是针对苏联的必要战略反应时，才积极起来。这才影响到日本对反霸条款的态度。①

反霸条款上的僵局表明，在中苏争夺日本的这场拉锯战中苏联暂时占了上风。莫斯科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说北京正在引诱日本加入反苏联盟，日本必须抵制这一阴谋，以免给中国当枪使。② 这种威胁不仅没有使日本政府和舆论反感，反而深有同感。而正是苏联的赤裸裸的威胁和日本的退却，使得毛泽东和继承其“一条线”策略的后任更加看重反霸条款的意义，更不愿意让步。

四、缓和与“一条线”策略在美欧的受挫

“一条线”策略在西方受挫的直接原因是东西方缓和的存在。

（一）缓和的动因和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就是冷战背景下的缓和。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直到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东西方冷战在欧洲较为平静，双方的战略对峙在那里最为稳固。这一时期美苏争夺的主要领域是核军备竞赛，以及在中东、印度支那等第三世界地区的势力范围争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挑战的失败使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接受了教训，认识到苏联尚没有能力在欧洲和美国的后院向美国的主宰地位挑战，其外交政策的冒险倾向大大收敛，而把主要精力用于能力建设即在核军备方面追赶美国。苏联的欧洲政策的实质自斯大林以来一直是保守的，

---

① 这一段内容是笔者对罗伯特·罗斯观点的转述，见：（美）罗伯特·罗斯：《美国的对华关系》，载《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61～62页。

② 罗伯特·罗斯：《美国的对华关系》，第61页。

以保住自己在二战中赢得的地盘即新获得的领土和对东欧的控制为主要目标，并不想冒险在欧洲与美国打一场胜负难料代价惨重的热战。自赫鲁晓夫以来苏联越来越坚信核大战中没有胜利者，而在欧洲挑战西方的核心利益极有可能引发毁灭性的美苏核大战。西欧国家在看到苏联的对西方政策日趋稳健之后，维持现状的和平主义主张逐渐占了上风，缓和成为压倒性的民意和政策，对美国的对苏政策形成越来越有力的牵制。与此同时，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与苏联正面对抗的意志严重减弱，迫切需要缓和与苏联的关系。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增长，欧美对于核大战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

总结起来，1963 年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稳健趋势，北约和华约长期的、难以撼动的和大体均衡的对峙，西欧的长期繁荣和畏战情绪，战略武器领域苏联与美国的差距的缩小趋势，美苏欧三方对核浩劫的恐惧，以及越战对美国的重创，是导致东西方缓和的根本原因。与中美关系解冻同时进行的 1969 ~ 1979 年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1969 ~ 1974 年西德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和 1975 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就是除中国之外冷战对峙中的各方共同的承认现状、缓和对峙、相互妥协、避免热战的利益和意图的结果，也是缓和的主要内容。

（二）美国的缓和动机

1972 年以来，与毛泽东不同，包括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在内的美国决策者并不把苏联威胁看得很紧迫。在他们看来，苏联是战略性的即长期的和全局的威胁，但绝不是一个必须主要使用和立刻使用对抗手段加以平衡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缓和是至少应该与遏制同等重要的影响苏联的手段;① 苏联威胁的彻底解除，或者说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应该是缓和、遏制、和平演变和苏联自身严重的制度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天的到来将是遥远的。更准确地说，在 1972 年 5 月尼克松访苏、与勃列日涅夫签署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及 1973 年 1 月美国达到其体面撤出越南的目的以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苏联的缓和诚意，进而对自己所设计的缓和战略能否成功，还有很大的疑虑。为此，他们迫切地需要打中国牌以迫使苏联让步。在那以后，他们对于缓和的成功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进一步改善对华关系的兴趣也就有所减退。美国担心中美走得太近会刺激苏联铤而走险，恶化与自己的关系，乃至主动攻击中国，

---

①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 第 5 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 3 月。

这样一场中苏战争很有可能演变为核战争。由于美国的利益不允许中国失败，中苏战争势将迫使美国援助中国，在70年代苏美核均势的背景下，因此可能导致的美苏核大战将是所有各方的噩梦。因此，美国决策者希望中美关系保持在使苏联因为对美国有所期待而行为更加规矩的尺度内：既不太热也不太冷，既非正式结盟也非冷战。只是到了1978～1979年以后，苏联在战略武器竞赛和地缘政治扩张方面在美国看来毫不收敛的势头，才使得美国对苏联威胁的看法和中国的看法接近起来，把苏联锁定为紧迫性和战略性均为头等的安全威胁。① 缓和就此终结。

（三）苏联的缓和动机

缓和的盛行也与当时苏联的意图和利益有关。苏联的缓和意图包括：避免核大战；获得西方对其对东欧控制的合法性和二战中获得的领土的合法性的承认；拉住美国以避免出现中美正式结盟对抗自己这种最为不利的战略局面；减轻军备竞赛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获得西方的民用技术、市场和粮食，由于体制缺陷和军备负担所致的愈益停滞的经济使得这种需求越来越迫切；为国内建设谋求长期和平和友好的国际环境；谋求美苏主导世界的事实和印象以满足其大国自尊，恫吓中国、西欧和日本；在战略武器领域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通过与西方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对西方经济利益的满足换取西方对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大影响的努力的默认；削弱西方与苏联对抗的意志；孤立中国，最好是获得“教训”中国的行动自由。②

在冷战结束已20年的今天看来，客观地说，西方和中国所感受到的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是事实和想象的结合，是苏联与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苏联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误解、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苏联超群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其巨大的版图、历史形成的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苏联的世界革命理想、其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抱负、习以为常的大国主义外交风格和

①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3月。

② 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美苏交往中，苏联领导人和外交官利用几乎每一个机会向美国同行渲染毛泽东的“好战”，力图说服美国相信中国是两国的共同威胁，还多次试探美苏联手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的可行性或美国允许苏联单干的可能。这促使美国人越来越肯定，结成打压中国的美苏同盟，或至少说服和交换美国默认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是勃列日涅夫搞缓和的一个重要动机。见：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第433页。

地缘政治抱负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绝对不是像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那样的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国家，它对和平的威胁，既不像它自己以为的那样少，也不像西方的鹰派和1968~1981年的中国所认为的那样大。所谓苏联威胁，部分是事实，部分是西方和中国出于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而建构的结果。至于事实和想象在建构苏联威胁方面各占多大比例以及这种建构的其他细节，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另一方面，以上看法固然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但也有很强的“事后诸葛亮”意味，即苛求历史人物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设身处地看，当时西方所谓对苏“鹰派”和毛泽东所处的特定情境，使其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今日的学者那样“客观”地、中立地和心平气和地评估在他们看来咄咄逼人的苏联威胁。

（四）缓和的结果和影响

通过缓和，美苏都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都没实现其不战而胜的最高目标。缓和达到了美苏双方避免核浩劫的共同目标，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共同利益所在。仅此一点，缓和就功大于过。苏联部分获得了西方的技术、粮食和资金，缓解了经济困境。西德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和1975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承认了苏联在二战中获得的领土和其对东欧控制的合法性，这是苏联长期追求、梦寐以求的目标。1969~1979年美苏战略武器谈判所达成的两个军控条约给予了苏联在战略武器领域与美国平等的地位。但是，苏联没有达到对西方不战而胜的目标，因为美国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军备竞赛、对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地缘政治争夺和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对美国来说，缓和使其在相对国力跌入最低谷时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部分遏制了苏联在战略武器数量方面咄咄逼人的势头，但未能诱使苏联满足于核均势，停止扩充其战略力量，也没能阻止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渗透。

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方面，缓和是毛泽东的旨在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一条线”策略受挫的根本原因。今天看来，当时美欧日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侵略

性和冒险性的评价比中国更现实。① 美国对苏联打中国牌以促成缓和的动机是缓和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美苏核均势的存在，毛泽东所希望的西方与苏联的全面对抗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利益。由于缓和的存在，70 年代美苏关系总体上与中美关系处在同一水平。最后一点的理由如下：从纯粹的国家间关系来说，由于美国方面的缘故，中美没有外交关系而美苏有；由于中国方面不感兴趣，中美在经贸科技文教等事务性方面的来往极少，而美苏之间这种往来很多，达到冷战历史上最高水平。但从战略上讲，美国对中国基本没有防范但对苏联有强烈的防范心理，美国借助中国制约苏联的政策力度明显大于借助苏联制约中国的力度。② 总之，美国基本实现了基辛格所规划的与中苏保持等距离的政策目标。

第三节 毛泽东对缓和的反对和无奈

一、毛泽东、周恩来对缓和的质疑和反对

对于缓和的忧虑和反对，是毛泽东周恩来 1972 ~ 1976 年会见来访的西方领导人时的一个主要话题，也是他们执行“一条线”策略的重要内容。1972 年 7

---

① 在 1969 年 2 月底美法峰会上，戴高乐力促尼克松实行缓和政策时表述的下述看法，很典型地代表了 1969 ~ 1978 年西方关于缓和的见解。对于苏联，戴高乐一方面坚持要有坚强的防御，同时又提出缓和的必要性的广泛历史观点。他说，俄国还存在，共产主义还存在，危险还没有过去，但是共产党人已不再能够征服世界。时间太晚了，动力没有了。俄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有悠久历史、巨大的资源、自豪感和未必是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如果美欧削减他们的防务，俄国会高兴的，但是他们也不大可能向西方进军。如果那样做，就会引起一场大战。莫斯科知道，在这场大战中，他们胜不了。美国不能让它征服欧洲，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征服亚洲，并且把美国孤立在美洲。在一场战争中，莫斯科可能在开始取胜，但是美国最后会倾其全力，摧毁俄国。戴高乐说，苏联的主要顾虑是中国。俄国人是着眼于他们与北京的问题来看待与西方的关系的。因此，他们小心谨慎，再加上西方采取某些灵活态度，他们很可能采取与西方和解的政策，以保证西方不会在他们背后与中国打交道。因此他们是诚心希望缓和的。缓和对西方也有好处，包括贸易、东欧的自由。因此，戴高乐赞成美苏缓和，认为这是实行他已经在执行的原则。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144 ~ 145 页。

② 研究基辛格的美国著名学者威廉·伯尔根据解密了的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记录所做的研究指出：“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小心地低估对北京的偏向。……但实际上，基辛格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美国的北约盟友一样，他对苏联人绝非如此。” William Burr, ed. ,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p. 29.

月10日，毛泽东提醒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①

1973年2月17日，在与基辛格的会晤中，周恩来问道，既然美国在欧洲遏制苏联的方针没有变，在亚洲你们是否也打算强调遏制方针？还是企图通过让中国和苏联斗得两败俱伤来获得自己的安全？如今越战已经结束，你们是否准备与苏联扩张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打算安抚苏联，企图把苏联这股祸水东引？② 周恩来还表示对欧洲各国在防务上的软弱态度难以理解：为什么欧洲那么不愿意把自己的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非要依赖一个远方盟国不可？周恩来赞赏了蓬皮杜总统加强法国军事力量的政策，并强调，一个强大的法国还能牵制德国不被莫斯科拉过去。这里周恩来表达了对勃兰特总理的新东方政策所包含的绥靖主义风险的担忧。周恩来还表示了对英国首相希思的高度重视，他说中国更喜欢右派而非左派的领导人，因为右派不大容易上苏联的当，在加强防务方面也较少遇到国内阻力。周恩来表示，他担心欧洲也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向东引。③

当天深夜，毛泽东会见基辛格。会谈中，他警告西方不要上假缓和的当，以免放松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斗争及造成各国人民思想混乱；美国和欧洲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这是要不得的战略，因为到头来西方自己也会被这股祸水淹没的。④

1973年11月12日午后较晚时候，毛泽东会见了第六次访华的基辛格。双方有如下对话：

基辛格：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

毛泽东：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7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68页。

③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74页。

④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86~87页。

基辛格：可能是这样。①

毛泽东一贯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使毛泽东感到不快。② 他在一个多月后接见中央军委成员时回顾这次会见时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③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苏联的扩张主义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最近宣布戒严时已经证明的那样。他委婉地批评说，美国外交喜欢"打太极拳"，而他的战略是以比较直接的打击作为基础的。基辛格回应说：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毛泽东说："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接着，毛泽东提到了"你们最近同苏联进行的交易"。他指的是当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时双方达成的范围广泛的13个协议。基辛格如实地说：我们同苏联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们不会同克里姆林宫进行一种如果透露出去就会使我们陷入孤立的谈判，否则等于把自己抵押给他们了；我们同苏联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向北京做了充分的通报，以后将继续这样做。毛泽东说：莫斯科虽然表面强大，实际上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它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它还在欧洲面对另一条战线，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边境上；因此，苏联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而如果一切遭受苏联威胁的国家携手合作，就可以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苏联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不合作，大家都会陷入险境。然后，毛泽东按照这种观点评价了欧洲各国的态度，表示了一个信念：虽然西欧由于各种原因而犹豫不决，他们最终决不会受苏联人的甜言蜜语的诱惑，从而抛弃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暂时令人恼火的策略同长远趋势混为一谈；即使美国的有些朋友犹豫不决，只要美国保持坚定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从美国的领导中得到勇气。接着谈到水门事件。他"怀疑"如果民主党总统上台可能会使孤立主义死灰复

①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69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69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69～1670页。

燃。基辛格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的主要政策方针都将取决于现实。毛泽东对美军可能如民主党参议员要求的那样撤出欧洲感到特别不安。基辛格说，我们两党在面临挑战时立刻采取强硬行动的意愿上也许存在差别，但无关大局。毛泽东说：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辞令，你实际上是指冒战争风险的意愿。他接着大笑着说，虽然他以战争贩子著称，但他希望发生战争时仅限于使用常规武器。基辛格说："无论怎么说，我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毛泽东对这句话显然并不满意，警告说："苏联欺软怕硬。"①

1974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指出："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法国的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② 1974 年全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强调："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③

当时的态势是，美国试图既通过联合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随时摆出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姿态制约中国，以此加强美国在三角关系中的主动权。这令毛泽东在 1973～1975 年几次当面指责基辛格"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担心美国是要将"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④ 1975 年 10 月 21 日，毛泽东接见了第八次来华的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抗苏联扩张方面太软，批评美国说：苏联是美国的政策重点，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中国是老五。你们踩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些肩膀没有用了，我们是老五，是小拇指。还说，欧洲在对待苏联方面太软了，太分散了。基辛格表示赞同，说美国希望有一个联合的强大的欧洲。毛泽东对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访问日本而未访问中国表示遗憾，希望他在年底福特访华时一起来，

---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28～331、334 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03 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695 页。

④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5 年 10 月 21 日》。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 401 页。

并表示要请他去访问东北、内蒙古和新疆，要让苏联人看看。① 他还把在全世界满天飞的基辛格比作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阻止它却是困难的。"②

1975年10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德国总理施密特说："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洲太弱。欧洲不团结，对战争又怕得要死，尤其是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美国人基本上也是如此。也许南斯拉夫人和德国人的抵抗精神强一些。如果欧洲在今后10年内依然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为什么6000万西德人就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③ 会谈结束时，施密特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西方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意义。"毛泽东既冷静又黯然地说："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④

二、西方的辩护：以基辛格为例

在这些会谈中，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质疑、劝告和批评，西方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其缓和政策做了辩护和解释,⑤ 试图打消前者的疑虑，以其中最具战略素养的基辛格的辩护和解释最为典型。在1973年2月17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向周恩来强调了以下几点：

尼克松和我都不对苏联动机抱有幻想，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因为我们的某些策略动作而产生误解。关于苏联的缓和动机，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是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二是苏联采取比较灵活的战略以达到以下目的：通过散布和平幻想麻痹西欧，利用美国技术来克服苏

① William Burr, ed.,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pp. 373, 391 ~ 400; 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 ~ 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施莱辛格因为批评福特和基辛格的对苏缓和政策，于11月被解职，其职务由拉姆斯菲尔德接任。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15页。

③ （德）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5月，第294 ~ 295页。

④ 施密特:《伟人与大国》，第296 ~ 297页。

⑤ 前文注释中戴高乐关于缓和的观点其实也不妨视为针对毛泽东的批评的一种辩护。

联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之间的不平衡，通过制造缓和空气来阻挠美国维持其军事实力，把不受这种缓和欺骗的敌人如中国孤立起来。现在看来对苏联意图的第二种解释可能最符合实际。我们的战略是：首先，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显著成就，这样才能团结我国人民，树立我们能够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的信誉。第二，必须在不致使美国丢面子的情况下结束越南战争。第三，改进我国军事系统，特别是战略力量。第四，终归要设法使苏联暴露其挑衅者的真面目。第五，有必要使美国人民习惯均势政治和必要时援助中国的必要和事实。在对苏谈判中，我们事先会向你们打招呼，我们将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绝不搞针对中国的协定。我们准备同苏联搞以下三类协定：第一，有助于缓和像柏林这样的危险地点的紧张局势的协定；第二，限制战略武器方面的协定；第三，技术上有用处但对双方都不具重大政治意义的协定，如文化科技贸易协定，当然对这些协定也要有严格的战略控制和一定的政治条件。周恩来这时插话说："但这也可以讲这是与苏联企图使西欧丧失斗志的政策一致嘛。"回答是："我承认这一点，双方都在对某种趋势赌博。苏联相信它可以使西欧丧失斗志，麻痹我们。我们则相信这会使我们赢得行动自由，这种行动自由是我们在那些最可能受到进攻的地方进行抵抗所必需的。"①

在1973年11月12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表示：

> 我毫不怀疑苏联力图利用紧张局势的缓和来涣散西方的团结，削弱西方的防务；我们则认为时间对我们有利。苏联的制度似乎需要一种人为的危机感，我们能够比他们更好地经受缓和的考验。我们将反对苏联利用国际危机扩大自己影响的任何企图；在出现侵略行为时，我们将果断行动，但我们需要事先证明是别人在向我们挑衅；我们在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欧洲领导人已经习惯于以东西方之间调节人的面目出现，他们在本国公众面前装得比美国更爱好和平，心里明白不管他们怎么做，我们都会坚守阵地，反对苏联的；他们内心深处都懂得我们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由于国内原因只能言不由衷。因此，特别在事后，他们常常采取一种同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大相径庭的公开立场；而当美国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时，欧洲领导人就不得不更严肃地对待本国防务问题，会担心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69～71页。

我们与苏联做出单独安排，这会使他们大伤脑筋。①

基辛格注意到，对于他的这番解释，周恩来没有表态。②

三、毛泽东反对缓和的原因：认知和政策分析

（一）毛泽东反对缓和的认识根源

认知不是政策，但它往往先在和潜在地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方向、力度。毛泽东反对缓和，很可能与其下述认知有关。

首先，核武器是纸老虎的一贯信念使其对西方对核大战的恐惧颇不以为然。在1974年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

> 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③

其次，毛泽东的斗争思维使其更倾向于以斗争求和平。众所周知，无论在做人做事还是在思维方式上，毛泽东都更强调斗争。反映在其言论中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诸规律中，他最重视的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统一战线中，他也一贯强调以斗争求团结，"斗而不破"。斗争而非妥协、合作是其终生不变的第一位的个性和思维定式。他警告基辛格，说"苏联欺软怕硬"，嘲讽美国的对苏缓和是"太极拳"，对于西方政治家特别是基辛格关于缓和的利弊得失的比较精辟的分析，不为所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深蒂固的斗争思维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与其对苏联的过于强烈的不信任和恶感有关。历史上，苏联及其领导人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国党和他个人，有可贵的支持，但也有不小的伤害。俄罗斯和苏联还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有过伤害。他在与基辛格的会

---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323～324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324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95页。

谈这种重大国事活动中竟然称苏联是“王八蛋”，这件事足以证明他对苏联的极度反感。

最后，与其对二战教训的认识有关。根据二战教训来思考冷战，在冷战的各方中是普遍现象，非中国所独有。当时在世界各国反对对苏缓和的人士几乎都把缓和比作绥靖政策，把苏联比作纳粹，把奉行缓和政策的西方政治家比作张伯伦、达拉第。毛泽东作为二战的亲历者及非常熟悉历史、非常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政治家，更不例外。

（二）毛泽东批判缓和的政策原因

1. 转移锋芒的策略

首先，他对缓和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意在通过激化苏联与欧美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减轻苏联对中国的压力。理由有二。

第一，从当时的战略格局来看，中美合作使苏联陷入不利的两面受敌的困境，中美双方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很自然地都想让对方承受更多的来自苏联的压力。就力图挑起苏联与对方的战争而自己坐收渔利而言，可以肯定双方都没有这个意图；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如果苏联真的对对方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自己就岌岌可危了。但就转移苏联锋芒来说，双方都有这个动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说西方想祸水东引是对的，西方说中国想把祸水西引也未尝不对。在整个70年代，在苏联对中国和欧洲哪个威胁更大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一直有分歧。这种分歧，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抬高自己地位的策略考虑。如果能够说服西方相信苏联的进攻矛盾主要针对欧洲，对西方的缓和攻势和在中苏边境陈兵近百万只是苏联声东击西的阴谋，就像当年纳粹一样，对中国显然是有利的。出于这个意图，在70年代与西方领导人的交往中，毛泽东也多次说过他喜欢西方的右派。毛泽东第一次见尼克松时就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喜欢这些右派当政。”① 他在1972年9月与田中首相的谈话时也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② 毛泽东想表达的意思是，第一，西

① 《毛泽东同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3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1993年，第439～440页。

方的右派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者，因此他们与苏联这个帝国主义进行争霸时特别没有顾忌，而这恰好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希望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激化，转移苏联的视线，以便减轻苏联对中国的压力。第二，西方的所谓左派，就是社会党这类人和亲苏的各国共产党，他们和苏修一样，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者。西方左派反苏没有右派坚决，甚至支持苏联，这在客观上就会缓和西方与苏联的矛盾，助长苏联侵华的动力。

第二，从前文中毛泽东的言论可知，虽然毛泽东坚信缓和是苏联的阴谋，但并不真的认为西方会无可挽回地上当，对西方终将坚定起来，出于自身利益抵抗苏联扩张，有起码的信心，这与他对西方的利益的深刻洞察有关。

2. 真实的担忧

其次，毛泽东对缓和的批判在较次程度上也是一种真实的担忧，因此不断提醒盟友不要上当。这与他对西方最终不会上当有着起码的信心这一事实，并不矛盾。这是为国家安全计不得不做最坏打算的现实主义逻辑决定的，为此他不能把宝全部压在西方自身的战略远见和对华善意上。从前文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归纳出他们对于缓和的四种真实的担忧。一则认为它是苏联麻痹西方意志的慕尼黑式的“声东击西”的阴谋，担心已是中国的准战略盟友的西方上当；二则担心苏联在西方通过缓和得手之后会腾出手来对付中国；三是担心“祸水东引”，怕软弱、自私加反共的西方用缓和来部分满足苏联在欧洲的利益，以诱使苏联将进攻矛头指向中国；第四，担心形成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局面，更担心这种局面发展成为美苏联手夹击中国的结果。在他看来，只要中美都不妥协，西欧日本也就会坚定起来，苏联就无计可施。这是确保以上四种可能不会成为现实的最好办法。这个推理是成立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即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缓和动机中究竟对中国有哪些不利的方面？在地缘政治方面，毛泽东当时对于苏联的意图估计主要是两点，意图称霸世界和“亡我之心不死”，认为缓和只是苏联达此目的的手腕而已。就第二点而言，如第一章中所言，毛泽东的忧虑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担心苏联意图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把中国变为近似东欧的卫星国；其二，担心苏联建立包围中国的势力范围；其三，担心美苏之间达成牺牲中国利益的“祸水东引”的妥协；第四，如果届时中国依然不听苏联的指挥棒，毛泽东坚信，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三）苏联威胁的建构与评价

毛泽东的上述估计是否过于严重？这是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是，70 年代苏联对外政策是保守的、防御型的，还是修正主义（这是西方学者爱用的语言）的和进攻型的呢？这也是几十年来国际冷战研究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以上问题，应该从国际政治的理论逻辑、70 年代的国际战略格局和苏联的具体言行三个方面看，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逻辑来看，中苏互为敌人的现实是双方的认知和政策共同建构的，就是说，这种现实，特别是 70 年代那种互视为头号威胁的严峻局面，不是必然的。但是，一旦这种现实被稳固地建构起来，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现实主义的逻辑起作用，这是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都承认的。在中苏领导人彼此视为头号敌人的既成事实下，双方的最自然最容易的做法，就是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也就是说搞远交近攻、遏制、孤立、结盟、三角外交、两面夹击这一套，并且成为安全困境的俘虏。故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四点担忧和对其缓和意图的怀疑，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合理的。二是，双方或其中的一方采取政策主动，发起外交革命，打破互为敌人的认知，突破安全困境。这种可能，建构主义承认，现实主义不承认。但这种可能现实中确实存在。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时期中苏关系的改善，就是这样来的。但这条路很难，后文将要谈到，毛泽东不可能走这条路。

从国际战略格局看，说苏联试图称霸世界，确实言过其实。但这个问题不能孤立、静止地看。整个冷战时期，包括 70 年代，作为实力逊于美国的一方，苏联的意图确实是有限的。但是，在获得了西方对于苏联在二战中获得的成果的承认及对于苏美间的核均势地位的承认之后，苏联在 70 年代的实际行为是得寸进尺。苏联避免核大战包括中苏战争和美苏战争的意图无疑是真诚的，但它的无节制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力量的扩张势头也是真实的，这是美国和中国迟早不会容忍的。至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意图，所谓“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用词，今天看来是夸张了。但中国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很难对苏联的意图抱着乐观的设想。中国的周边，北部和西北与苏联和蒙古为邻，后者是苏联的坚定盟友，一百万左右的苏军和几百枚核弹摆在约一万公里的中苏中蒙边境附近；西南有印度，苏联的又一盟友；美军退出越南后，正南方的印度支那沦为苏联势力范围的趋势几乎不可逆转；朝鲜与中苏基本保持等距离，不认同中国的联美抗苏战略；通过 1973 年和 1978 年的两次政变，苏联在西部邻国阿富汗的影响正在上

升；东边的日本不肯采取旗帜鲜明的抗苏立场。可以说苏联已经基本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圈。中国的邻国中，只有巴基斯坦在对苏政策上是中国的盟友，但其国力弱小，且面临着苏联从北边和印度从南边的战略压力。如果美国和西欧真的采取绥靖政策，中国就被彻底孤立了。综上所述，毛泽东对苏联的缓和意图所做的最坏设想，是有道理的。

从苏联的具体言行来推测，苏联的意图，从全球来说，是通过缓和形成美苏合作以共同主导世界的局面。就亚洲来说，是通过在欧洲和战略武器方面与美国的妥协换取美国给予苏联对付中国的行动自由，孤立中国，以此压中国改变对苏政策，把中国的对外政策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所谓苏联的战略轨道，具体含义有二，要么是使中国成为追随苏联的东欧式卫星国，这是苏联的理想目标；要么是使中国在美苏间保持中立。这是现实目标。上述第一点是对中国安全和主权的极大伤害，是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可能答应的；就此而言，毛泽东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并没有夸大，不能把“亡我”仅仅理解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点虽然没有对中国的安全和主权构成有形的伤害，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所绝对不可能允准的。

1969 年苏联开始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1971 年苏联开始鼓吹召开五个核大国的核裁军会议，在 1969 ~ 1972 年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苏联多次提出要搞一个针对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的协议。中美都认为这些做法主要是出于孤立中国的考虑。这三件事在第一章中已经谈过了。这里再补充几个事实。1973 年 5 月 4 ~ 9 日，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一天，应勃列日涅夫邀请，在他的扎维多沃别墅附近狩猎。勃列日涅夫威胁性地和愤怒地谈到中国人，说他们事实上也许是野蛮人；现在苏联已经建立了核武库，苏联不能无动于衷，一定要做点什么；至于什么样的行动，他没有说。次日，多勃雷宁对基辛格说，狩猎谈话中提及中国的部分不可当作社交话对待。① 在同年 6 月 23 日的美苏峰会中，勃列日涅夫再次发泄了他对中国人的仇恨。他建议通过他和尼克松之间的个人渠道对中国问题秘密交换意见。他警告说，十年后中国的核项目可能同苏联 1973 年的水平相当，这是苏联无法接受的。但他没有说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措施。他说，不久后苏联将向中国提出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他肯定北京会断然拒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 293 页。

绝的，苏联将以此揭露中国的好战。① 还说，他不反对华盛顿和北京建立国家关系，但是军事安排是另一回事；苏联不打算进攻中国，但是中国同美国做出军事安排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按照基辛格的统计，这已是苏联人在六周内第三次与美国人谈中国威胁。②

可见，毛泽东对苏联的缓和意图的估计，基本上是合理的和真实的。

第四节　缓和盛行、"一条线"局部受挫的原因与三角关系

综上，6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70年代达到高潮的东西方缓和与联美抗苏旗下的"一条线"策略的局部受挫③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毛泽东在实施该策略的同时始终没有缓和对缓和的批判，竭力试图说服西方放弃缓和，但未奏效。本节拟首先对缓和盛行、"一条线"策略局部受挫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说是进一步，是因为前文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接着将分析三角关系。这是因为，"一条线"策略之局部受挫与中国在当时的美苏中三角关系格局中相对于美国的被动地位有关，因此，彻底讲清楚缓和盛行和"一条线"策略局部受挫的根源，离不开对三角关系的分析。

一、缓和盛行、"一条线"局部受挫的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政策要想成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策应当反映和满足利益，利益决定政策的方向；第二，政策应当符合现实，后者至少包括有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和意图；第三，政策只有以实力为后盾才有望成功。综合这三点，在不同政策之间的博弈中，只有以最大的相对实力做后盾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和各方利益的政策，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第四，占据最大的战略主动地位的一方，其政策有最多的成功机会。根据前文所述，各方有关缓和的政策都是自己利益的比较恰当的反映，换言之，各方何以实行或反

---

① 中国确实拒绝了。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372页。

③ 说是"局部"，乃是因为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这三个非西欧国家实际上是认同"一条线"策略的。

对缓和政策的利益方面的原因已经讨论过了。本节将重点论证两个论点，也是“一条线”策略局部受挫的两个关键原因：其一，与美国和西欧领导人相比，毛泽东的有关认知与现实有一定的脱节。中国领导人后来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① 第二，占据三角关系的最主动地位的，是美国而非中国，因此美国的缓和政策而非中国的“一条线”策略占了上风。

关于第一点，首先，苏联的侵略性冒险性总的说来没有毛泽东估计得那么高，西方的估计更接近实际。一定程度上，他低估了热核战争对国际关系和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影响和大国间战争失控为核大战的可能，错估了苏联和西方避免核战争的动机的真诚性的一面，② 低估了美苏缓和对于避免核浩劫的积极后果。由于苏联既非纳粹式的侵略成性，对峙双方又有核武器，所以他对二战教训的借鉴也是有偏差的。由于以上失误，加上对中国免于孤立的强烈追求，毛泽东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要求，实际上是要其恢复 1947 ~ 1962 年即冷战高峰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全面对抗政策。这是不现实的。

其次，西方和苏联对于它们相互关系和战略现实的认知总的说来比较清醒。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的缓和局面，首先是苏联政策调整的结果。1962 年以后，苏联对冷战的政策，主要有四点。其一，再也没有对西方的核心利益进行过如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直接挑战；其二，在欧洲地区安全和军控领域搞缓和，以谈判代替对抗；其三，在不破坏缓和大局和不突破美苏军控条约的前提下发展战略力量；其四，小心翼翼地在第三世界，也即所谓冷战的边缘地区，扩张影响。西方正视了上述现实，这使得西方各国一致认为恢复 1962 年以前的强硬政策是不必要的。进而，对于自己与苏联之间战争的可以避免，西方的信心比较足，缓和就是避免这种战争的主要手段。此时的西方对苏联威胁的评估比中国轻得多，它不十分肯定苏联是否有称霸世界的意图，倾向于相信苏联在欧洲的目标主要是防御性的，也准备有条件地给予这种承认，并且最终给了这种承认。美欧还倾向于认为，苏联大力扩张核武库的动机主要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自尊心。缓和也是美苏相对实力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使得

---

① 1979 年 10 月，华国锋总理访德，对施密特总理说：“我们认为，即使局势更加不稳定和更加紧张，也不大可能发生世界大战。”见《伟人与大国》，第 309 页。1984 年 10 月，施密特第三次访华，邓小平对他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见《伟人与大国》，第 281 页。

② 中苏分歧与这种低估有关。

西方不再认为恢复强硬的对苏政策是可能的，而是认为：考虑到美苏实力对比和意志力对比对美国不利的趋势，通过谈判承认美苏战略力量的均衡并约束苏联进一步扩张的抱负，要比正面对抗的胜算更大而风险更小。总之，美国、西欧和苏联都没有与对方正面对抗的意志、动机和能力。缓和反映了东西方对这一现实的比较清醒的认知。

以上两点，加上中美苏三方中中方实力最弱这一所有各方都承认的基本现实，美苏共同的搞缓和的意志之必然压倒中国反对缓和的意志，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关于第二点，缓和是美国在大三角中占据主动地位的结果，而美国的这个出乎中方意料的主动地位，主要不是其实力地位的结果，而与中美苏三方的政策选择有关。为了充分理解美国的主动地位，有必要首先澄清三角关系。

二、中美苏关系的实质：三角关系，而非结盟—对抗关系

绪论中已经对一般的三角关系做了理论上的界定。故这里直接进入对中美苏三角这个真实的案例的描述与分析。鉴于基辛格既是这个战略格局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其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阐释又被公认为最具学术上的权威性，我们的分析就从其人的有关阐释开始。基辛格认为：

> 美中共同利益所在是防止苏联利用任何手段——包括进攻中国——来破坏全球力量平衡。但是，永远同莫斯科处于敌对状态对美国不利，除非莫斯科向国际平衡挑战。作为核超级大国，我们还有义务减少核对抗的危险。北京无疑希望看到一个更简单的格局，即华盛顿和莫斯科公开敌对，这样能使北京少绞脑汁，并且提高它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更为复杂。北京国内的需要把它推向对抗；我们则需要向我国公众和盟国表明，冲突并非由我们所引起，否则国会就会裁减我们的防务，盟国也会离开我们。我们只有采取和解性政策，才能得到支持，以便在危机时刻采取坚决行动。我们不能让苏联对美中关系拥有否决权，同样也不能让中国对美苏关系拥有否决权。这是一场三度空间的游戏，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显得犹疑不决或者倾向于莫斯科，就会逼得北京与苏联言和。如果我们采取中国的立场，并不能给北京帮忙；事实上，我们这样做很可能促使苏联先发制人，进攻中国。届时我们将面临极其危

险的决策。①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参加角逐的人本来的动机和倾向去发挥作用。这种外交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正在利用竞争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否则你就有遭到报复或讹诈的危险。我们要同中苏双方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要比他们彼此的关系更密切些，只有这样，中苏互相敌视的关系才能最好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其余的事就只有让事件本身产生的动力去决定了。②

三角外交要求灵活机动。我们不必用多大力气，而是像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质量顺势把他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搞得好，我们就可以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他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少；当然也总会有与双方对抗的风险。③

在以上阐述中，基辛格点出了中美苏三角的实质、三角外交的关键和美国在这种关系中的利益所在。三角关系的实质不是结盟，因此不能用类似结盟的手段处理与关系更密切的中方的关系，不能与苏联直接对抗。三角外交的关键是灵活机动，而结盟会妨碍这种机动性。灵活机动的目的是确保美国对中苏双方的主动地位（表现为更多的选择余地）。美国在其中的利益是：和中国一起防止苏联破坏全球力量平衡，同时要防止与苏联处于永久和明显的敌对状态，那会有引爆核战争的危险。如果把三角关系简化成与中方的结盟关系，美国将同时面临被中方敲诈和被苏方报复的危险。基辛格在字里行间还透露出：在这种三角关系中，美国与中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更需要防范的是苏联。

不仅美国，苏联和中国不同程度地都认识到三角关系的存在和三角外交的必要。苏联时刻不忘营造美苏共治的印象，就是为了制约中国。1969～1978 年，中苏边界谈判持续了九年，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在当时严重对立的氛围中也不可能取得突破。但双方为了影响美国，都需要维持谈判的表象。中国响应苏联边界谈判的建议，除了谋求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外，意图之一是要利用谈判打苏联牌，以利用美苏矛盾，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在最初几次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与苏方会晤后的每次汇报中，周恩来最先询问的不是谈判情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 33 页。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 370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 44 页。

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①

三、中国在三角关系中主动地位的丧失

（一）中国本应处于主动地位的理由

三方都力争在三角外交中的主动地位。历史地看，这种主动地位的取得，与实力对比没有必然联系，取决于客观的利害关系格局和主观的政策操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苏中越之间存在着比三角关系更复杂的四角关系，越南最弱，但最终和最大的胜家是它，因为它据有最主动地位。在冷战后的朝鲜核危机中，在中美俄日韩朝之间的六角博弈中，目前为止最主动、最成功的一方也是最弱的一方。这都要归因于成功的政策操作。如果省去政策操作这个变量，只考虑客观的战略利害关系，那么在中美苏三角中，谁应该是最大的赢家呢？或者说，谁最有可能取得战略主动呢？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在具体分析前，有必要指出的是，就中美苏三角关系而言，省去政策操作这个变量也就是省去了意识形态因素，因为政策操作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有无强弱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省去这个变量也就是假设：各方都同等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清醒和灵活地按照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和实施政策。

中国在大三角中本应处于最主动地位的判断及其理由，在1969年陈毅等四老帅提出的两份报告中早就精辟地阐述过了。报告指出：当时的战略态势是：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矛盾不可调和；在美苏矛盾更尖锐、苏联正忙于与美国竞争并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态势下，苏联如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将承担巨大的两面作战风险；在目前美苏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三组矛盾关系的判断，二是美苏争夺重点的判断；联美抗苏的结论和中国的战略主动地位的结论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判断的基础上的。

从非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也即国家利益的视角看，以上判断和结论都是成立的。

---

① 李捷与王荩卿的谈话记录，1997年12月。后者当时是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成员。转引自：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98～499页。

为什么说欧洲是美苏争夺重点呢？除了本土安全，欧洲是美苏最关注的、志在必得的战略区域。尼克松主义的重要意图之一，就是从东亚收缩，全力保欧洲和中东。这一点，加上美国从越南的撤军，和中美和解，表明美国已经承认其对中国长达20年的遏制政策的失败。当时的苏联固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挑战十分恼怒和恐惧，但是正如四老帅在其报告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的批准，苏联不敢贸然对中国开战。故70年代的东亚已不是美苏争夺的重点。对于本土安全，双方都以核威慑作为最后保障。这个恐怖均势不打破，各自国土自然无虞。苏联在欧洲的目标和利益，最低是西方对其对东欧控制的承认，最高是西欧的芬兰化，即分化西欧和美国的同盟。对于第一点，美国的部分势力准备予以承认，这就是美国支持缓和的那些人有条件地采取的立场。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愿意承认的，加州州长里根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派就不愿意承认，这令苏联十分恼火和恐惧。对于第二点，任何美国政治家都不会接受，大部分西欧政治力量也都不会轻易接受。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和目标，最低是维持现状，阻止苏联影响的继续扩大，这是缓和的倡导者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至少暂时接受的目标，进而是美苏缓和的基础。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看，任何大国控制西欧都是对美国本土安全这一最高利益的致命挑战。美国的最高目标是“解放”东欧。这是40多年冷战中美国两党都没有放弃的目标。两党及其内部各派只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策略上有分歧。说欧洲是争夺的重点而亚洲不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西欧在抗衡苏联的意志上比中国软弱得多，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美苏争夺欧洲的动机。因此，说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且不可妥协，是成立的。

关于三组矛盾关系的判断。首先，美苏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而且它们在欧洲的最高目标是不相容的，双方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最高目标。其次，美苏都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国，中国只是个地区大国；美苏都有按自己的意志支配世界的抱负，这在双方都是一种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抱负；中国则没有类似野心。毛泽东固然有世界革命的抱负，但这是纯粹意识形态领域的抱负，他从来没有想到把世界革命抱负用作地缘政治扩张的手段。苏联则不然。按照现实主义逻辑，除非美苏双方中至少一方实力锐减或放弃全球性抱负，其矛盾无法妥协。第三，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只追求狭义的安全。经历了越战以后，中美矛盾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统一诉求对其的威胁与苏联的全球扩张的威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完全排除意识形态，中苏矛盾首

先是一个边界问题，其次是相邻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这与苏联与美国的全球性冲突是不能比的。中美远隔重洋，因而两国间的安全困境比中苏间的要小得多。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又实质性地消除了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因此，美苏矛盾最大而中美矛盾都要小。

以上两点，加上美苏大体势均力敌而中国又是实力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战略力量的事实，使中国客观上处于美苏都有所求的最主动地位。

（二）中国丧失最主动地位的原因

前文已经反复谈到一个论点，即在70年代的大三角关系中，总的说来中国并没有占据最主动地位，占据这个地位的是美国。这是国内外学界的比较一致的观点。笔者也基本认可这个观点。何以如此？综合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章百家、李捷、宫力诸家的研究，这个结局与中苏分裂的根源、毛泽东选择联美抗苏而非联苏抗美的缘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意识形态分歧至少是与国家利益冲突同等重要的中苏分裂的原因。章百家认为，中国反对苏联的理由，主要是指责苏联支援世界革命不利，反对美帝国主义不坚决，幻想美苏缓和，企图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① 对于苏联1956年以后提出和采取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外交和意识形态战略，在确保不发生核大战的前提下有限地支持世界革命（主要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和与西方（主要是美国）缓和关系的政策，以及苏共在国内政策上对斯大林的部分否定及针对斯大林模式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毛泽东逐渐得出的判断是：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采取了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背叛世界革命和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② 这一背景使毛泽东逐渐确立了为中国党争取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领导权的目标。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双重考虑，苏共丝毫无意放弃其传统的领导权。国际共运中领导权的必要和客观存在的理由在第一章已经分析过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由此决定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际关系状态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

---

① 章百家：《中国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载《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22页。

② 林蕴辉：《中苏关系恶化与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分歧》，《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期。

各国间的国际关系，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由此不可避免地殃及两国关系。[①] 1964年2月开始的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到7月时已经取得突破，苏联接受了中方的几个重要的划界原则，包括以界河的主航道中心线为国界线的原则。恰在这个时刻，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第一次提出：沙俄和苏联侵占了欧洲和中国的大片领土，“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呢”。[②] 谈话内容的公布带来的冲击是谈判于8月破裂的重要原因。根据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等的分析，毛泽东此番谈话丝毫没有向苏联提领土要求的意图，而主要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由此带来的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其为反修防修所愿意付出的代价。[③] 毛泽东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都采取了反修防修政策。对内，他发动“文革”，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立为最危险的内部敌人，进而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社会主义时期新阶级斗争理论；对外，他把苏联当作比美国更威胁的敌人，“反帝必反修”，实际上是“反帝必先反修”。[④]

沈志华、李丹慧认为，在中国面临美苏合击的可能的形势下，毛泽东采取联美抗苏而非相反的战略，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与苏联的妥协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政治合法性危机高于与美国妥协的同类代价。中苏同盟破裂后，长期以来具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国际共运旗手形象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基础相同的中国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场。由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尤其当他们在中国领导核心中卧有代理人时，这种政权替代威胁也就成为现实。故毛泽东对苏联这个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威胁的忧虑大大超过了对美国的忧虑。联苏抗美，或同时实质性地缓和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可能会危及“文革”的合法性和他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换言之，由于两党的重新团结关系到以谁的理论、路线为统一标准、谁为国际共运领袖的大问题，意识形态分歧已和两党政治命运和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分裂命运也就难以扭转。总之，到60

① 沈志华、李丹慧：《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谈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端》，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毛泽东会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第437页。

③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78页。

④ 沈志华、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第21~22页。

~70年代之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对苏妥协的空间。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死结。① 李捷也有类似的看法，即和苏联威胁相比，美国威胁要简单地多，仅仅是外部威胁。在毛泽东心目中，苏联威胁不仅是有形的，而且是无形的；不仅是外部压力和武装入侵问题，而且是修正主义向中国渗透并寻找代理人的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危险。②

中国未能取得三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盖源于此。李丹慧指出，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点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战略地位。但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结果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③ 宫力指出，毛泽东联美抗苏的决策，总的说来没问题，但是对苏联威胁估计过高，对苏外交和备战反应过度，灵活性不够，影响了中国在大三角中讨价还价的地位，使美国处于更有利地位；中苏则两败俱伤。④

笔者基本接受上述结论。但有几点补充和异议。

第一，中国力图走出中苏同盟的阴影，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独立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决定了中苏同盟破裂的必然性。但是两国关系恶化到反目为仇的程度直至走到战争边缘，确实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使然。毛泽东对中苏意识形态分歧采取的不妥协立场，与两国两党关系的完全破裂是有相当关系的。但是，苏联领导人同样采取的不妥协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习以为常的大国主义风格，至少要负同等责任。

第二，毛泽东晚年极其看重“文革”，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了”。⑤ 对苏关系这件事，在他看来关

---

① 沈志华、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世界知识》，2006年第17期，第21页；马骏：《两极格局下的无奈与选择：毛泽东大战略思想研究——兼论毛泽东调整对美政策动机》，《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第71页。

② 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99、505页。

③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401~402页。

④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三）》，第45页。

⑤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45页。

系到中国革命（包括“文革”）和世界革命的成败，妥协不得。坚持“文革”路线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对付苏联威胁的一种手段。在苏联内外政策没有毛泽东所期望的剧烈改变的前提下，和苏联重修旧好，哪怕是部分的，在他看来简直就是让苏联控制中国的同义语。这是他万万不能答应的。为此，他一再拒绝苏联的口头修好示意，也就不难理解了。早在“文革”前，他就多次拒绝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要求中苏停止论战的劝和。例如，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毛泽东说，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90%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① 1970～1976年，苏联向中国多次表示善意，均遭拒绝。②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主要成员的时候，透露说：“苏联最近又来信了，要和好。我们的回答，还是那几条，他们要彻底承认错误，从二十大开始。把边界的军队撤回去。”

第三，毛泽东的对苏不妥协立场仅仅涉及意识形态和两党关系，而非国家关系。他接受苏联举行两国政府首脑会晤的请求，他始终没有要求苏联归还历史上侵占的中国领土，就是明证。他要求苏联大规模裁减中苏中蒙边界的军队，要苏方用行动而非言辞来证明自己的善意，是完全合理的要求，并非什么不妥协。这两条，也是后来邓小平对于中苏关系正常化所设定的前提。这一区分不容模糊。在两国安全关系问题上，不妥协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倒是说了句公道话：“苏联自从1969年以来沿中国边境大量增兵，还拥有大规模毁灭力的先进武库作后盾，这绝不表明它有和解的意图。”③ 考虑到中苏明显的国力悬殊特别是军力差距，在彼此互视为威胁的安全困境中，客观上中国感受到的苏联威胁显然大于苏联所感受到的中国威胁。当然，毛泽东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两党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到两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是把捍卫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

今天的局外人很容易产生下面这个疑问：既然与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头子都可以妥协，与苏联这个列宁主义故乡、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妥协？何况

---

① 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http：//gbook. netor. com/m/gbook/adindex. asp? boardid = 16000&newid = 4310730.

②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399～405页。又：另外，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苏联东欧一直是支持中国的。

③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63页。

妥协可以不涉及意识形态是非，只涉及共同反美的安全利益？这种质疑犯了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归根到底，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可能性而非抽象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决定了历史人物的选择范围。

第四，中国在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主动地位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结论，这种主动地位要成为现实，有赖于政策的高度现实性和灵活性。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在对美政策上表现出高度清醒的现实感和灵活性的同时，在对苏政策方面反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中国只是很有限地尝试过打苏联牌，并没有用与解冻中美关系相同的力度解冻中苏关系。结果是使美国获得了比中国更主动的地位。美国的这种最主动地位，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既喝茅台酒，又干伏特加"，①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则是，"踩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表现为：一方面，美国以中美合作的事实和中美联合抗苏的前景成功地敲诈了苏联，使中美和解成为其推行对苏缓和的工具，迫使苏联在战略武器谈判和赫尔辛基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基本成功地按照预定意图实现了与苏联的缓和。另一方面，美国用美苏缓和的现实和这种缓和可能牺牲中国的前景牵制了中国，使中国被迫坚持联美政策，还避免了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这样一来，美国就用与中苏关系的同时改善消解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自己的相当一部分战略压力。总之，"一条线"局部受挫的原因在于：误用结盟的手段来处理本质上属于三角的关系。

第五，虽然美国占据了主动，但并没有出现中苏两败俱伤的局面。中国的安全得到了实质性的维护。苏联输掉了冷战，而中国和美国一样赢得了冷战。联美抗苏战略的实施还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历史契机。这是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最后，中国曾经一度拥有大三角关系中的最主动地位。时间是从 1969 年 9 月的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到 1972 年 5 月的尼克松访苏。中苏总理会晤使中苏关系局部改善，而使美国产生了紧迫感。当时的美苏都有缓和彼此关系和对华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对于中国做何反应，对于美苏关系中对方是否合作，中国在美苏对峙中站在哪一边，都没有把握。于是就出现了四老帅报告中美苏竞相打中国牌的局面，结果是苏联主动提出举行中苏高级会晤，会晤后中苏紧张关系的局部缓解，中美关系的全面解冻，包括美国在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

---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 90 页。

的让步，美国在中美《上海公报》的磋商中率先提出反霸条款，以及尼克松首先访华然后访苏的日程安排。1972 年 5 月尼克松访苏成功，双方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反弹道导弹条约》，标志美苏缓和的重大突破。两个超级大国对于对方缓和的诚意进而缓和取得成功的信心，有了一定把握。缓和进程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却没有相应的调整。于是中国逐渐失去了三角关系中最主动的地位。

综上，陈毅和毛泽东的判断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第一，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从而使中国能够足够清醒地认识到三角关系的实质，与时俱进地、足够灵活地根据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因素，毛泽东否认三角关系的存在，① 要想有意识地利用它就很难了。第二，美苏的政策失误导致缓和的破产。缓和最终是破产了，但由于美苏对各自利益的比较清醒的认识，1972～1977 年出现了缓和盛行的局面。就 45 年冷战全局来说，美苏矛盾比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都大；但在缓和达到高潮的 1972 年 5 月至 1977 年年底，事实是：中苏矛盾大于美苏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表现为：中苏势不两立，而美苏和中美彼此搞缓和，且美苏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明显大于中美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中国因而失去了从 1969 年到 1972 年 5 月尼克松访苏为止一度拥有的并为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所清醒地意识到的最主动的战略地位。

四、1972 年以来真实的三角关系及其战略后果

为了更精确严密地理解这个问题，下面以简约的逻辑推演方式来论证这个问题。

（一）真实的三角关系的逻辑演绎

前提一：根据战略集中或统一战线的原理，三角关系中的任何一方一个时期有必要集中力量对付最主要的那个对手；由此，在敌对关系不明朗的两两制衡的关系中，每一方为制衡第三方而与第二方妥协是必要的。

前提二：根据前提一，在敌对关系不明朗的两两制衡的关系中，有三种三角关系的可能模式，即：1. 美 - 苏——中，2. 美 - 中——苏，3. 中 - 苏——美。

① 见 1970 年 6 月 19 日毛泽东同艾南希的谈话，转引自：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 年第 1 期，第 10 页。

其中，“－”表示相互借重关系，“——”表示对手或制衡的关系。由于两两互为对手，不存在明确的结盟关系，所以三种模式是并列关系而非排他关系。

前提三：在三角关系中，如果有两国彼此矛盾尖锐到无法妥协的程度，则他们之间彼此借重以制衡第三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借重要求妥协。

前提四：中苏矛盾大于美苏矛盾。

前提五：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

前提六：中苏矛盾远大于中美矛盾，到了难以妥协的程度。

推论如下：

推论一：中美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和强度最大，中苏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和强度最小；美苏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和强度居中。

根据前提二、三、六和推论一，可得：

推论二：只存在两种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即：1. 美－苏——中，2. 美－中——苏；换句话说，几乎不存在中苏彼此借重以制衡美国的可能性。

推论三：对于中美来说，苏联都是头号对手，所以，中美彼此借重以制衡苏联的可能性和强度最大。

推论四：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二号对手，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是头号对手，所以，美苏彼此借重以制衡中国的可能性和强度次于推论三。

推论五：由于美国可以借重苏联制衡中国，中国则几乎不可能借助苏联制衡美国，所以，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更有利的谈判地位；或者说，中国让步的可能性更大；在互有让步的情况下，中国的让步更大。

推论六：由于美国可以借重中国制衡苏联，苏联则几乎不可能借助中国制衡美国，所以，在美苏关系中，美国处于更有利的谈判地位。

推论七：中苏都可能借助美国制衡对手，但由于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国更愿意帮中国制衡苏联，所以，在中苏关系中，中国处于更有利的谈判地位。

由推论五、六、七可得：

推论八：在三角关系中，美国处于最有利的谈判地位，苏联处于最不利的谈判地位。

以上推理不涉及历史细节，只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学和对 1972～1977 年也即缓和高潮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来说最具本质性的极少数规定而做的纯逻辑的推演。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而且充满了偶然性，而逻辑属于必然

性的领域。因此，这些推演与真实的历史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这些推演所依据的毕竟是最具本质性的历史事实，即中苏矛盾大于美苏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因此，这些推理是对真实历史的抽象，是省却了细节的历史。无数研究表明，以上推理的结论与缓和高潮时期大三角关系的经验事实是相符的。

以上推论，和陈毅等提出的战略结论不完全一致，但是同样可以得出中国应该利用美苏矛盾拉美国制衡苏联的结论，推理一、三、七中都部分蕴涵着这个结论。因为中苏矛盾最深，而中美矛盾最弱。不过从这个结论中得出的其他推论与毛泽东和陈毅的结论就不完全一致了，特别是，中国失去了在老帅们的报告中理所当然的最主动的战略地位。

（二）“一条线”和缓和的失败与联美抗苏战略的成功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条线”策略上来。正是由于美国在对华关系和对苏关系中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体现其利益和意志的缓和政策才能够挫败中国的“一条线”策略而占上风。

尽管“一条线”策略受挫，值得称道的是，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放弃中美合作。作为大战略家，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现实：既然他决不愿意牺牲其珍爱的意识形态原则，中国又是三国中最弱的一方，为确保国家安全，就只有联美抗苏这一条路可走。因此，尽管对缓和有诸多不满和疑虑，他还是顶住了一切来自国内外的“左”的干扰，和台湾问题的困扰，始终坚持了联美抗苏战略。换句话说，中国和西方在缓和问题上的认知和利益差异，并没有摧毁基本的战略共识，没有严重到根本动摇双方战略合作的地步。60 年代中后期国际战略形势的特点是中美苏彼此对抗而基本没有合作，这是毛泽东能够既反美又反苏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在 1969 年以来美苏缓和的形势下不复存在，这使毛泽东非常担心会出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对付中国的局面。1970 年 7 月 13 日，他在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团时表示：我们这类国家叫作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叫作“夹肉面包”。法国客人提出，要防止苏美两个大国一致行动，对中国造成威胁。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许。① 牵制美苏缓和，至少使美苏缓和不致于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是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主要考虑；中美关系改善客观上推动了美苏缓和，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但它避免了美苏缓和带给中国的最不利后果，即美苏合

---

① 《毛泽东会见以贝当古为团长的法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1970 年 7 月 13 日》，转引自：李捷：《物极必反：60 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第 520 页。

击中国这个最坏局面。[①] 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就是这个意思。

尽管毛泽东在世时缓和盛行，他始终认为由于美苏矛盾不可妥协，缓和终将破产；美苏“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②] 他的联美抗苏决策部分地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基础上的。1978年后缓和的终结，证实了这个判断深刻性的一面。

毛泽东去世前后美苏争夺加剧。苏联从1977年起在东欧开始部署瞄准西欧的SS－20中程导弹。美国针锋相对，于1981年推动北约做出了著名的“双重决定”。据此决定，1983年开始在西欧部署战斧式巡航导弹和潘兴－2中程弹道导弹。70年代中期起，苏联的影响就开始逐渐进入西南非洲、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亚丁湾、阿富汗和中美洲。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了亲苏联的政变；6月，古巴支持的南也门军队控制了北也门，并处决了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的南也门总统。1978年底，在苏联纵容下，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底苏军进入阿富汗。这个事件成为压垮缓和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美国得出结论：苏联试图南下印度洋，控制西欧和日本的石油供应，从侧翼包围欧洲。而这个观点是整个70年代中国领导人始终坚信并反复试图说服西方领导人接受的。据此，美国提出了旨在保卫中东特别是波斯湾的“卡特主义”。美苏关系逆转，缓和终结。

苏联的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动作是如毛泽东、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各自孤立的、简单的见缝插针的机会主义行动？这是一个从当时直到现在都争论不休的问题。现有证据倾向于支持后一种看法。苏联解体后公开的史料表明，入侵阿富汗显然是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四个人匆忙做出的决定，以免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即共产党）政权被该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阿国内反对人民民主党的激进改革的叛乱者推翻。这个决定在苏联决策层一直有争议。而且，就像此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那样，

---

① 马骏：《两极格局下的无奈与选择：毛泽东大战略思想研究》。

②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23页。

决策者根本没有料到西方和中国会有那么严重的解读和那么严厉的反应。[①] 认定苏联有一个一以贯之、精心构建、锲而不舍的南下印度洋、控制波斯湾和包围欧洲的长期战略，这个想法就像所谓“彼得大帝遗嘱”一样，恐怕是子虚乌有。然而，话又说回来，地缘政治有自己的客观逻辑。苏联这些零散行为的无意识的总和，恰恰构成了中美两国所特别在意、不能容忍的客观态势。在这里也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一样，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

综上，美国在大三角格局中的主动地位是影响联美抗苏战略效果的根本性的地缘政治因素，它既限制又维持了毛泽东的联美抗苏外交，因而同时构成这个战略的前提和制约。制约表现为“一条线”策略的局部失利和缓和的盛行，前提表现为在三角格局中美国更多地要倚重中国压苏联而非相反。这一点，以及毛泽东在意识形态原则问题上不妥协的对苏立场，决定了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的实质在地缘政治上是三角格局下的准战略同盟。由于毛泽东对苏不妥协的意识形态姿态是美国取得本应属于和一度属于中国的主动地位的直接原因，三角格局对联美抗苏的制约也是意识形态制约联美抗苏战略的一个表现。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妨碍。

① （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 年，第 259 ~ 274 页。

第五章

世界革命、“文革”政治、三个世界理论与联美抗苏

本章旨在回答以下问题：毛泽东始终奉行的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理论和世界革命理论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和国内政治中极左的“文革”路线与联美抗苏战略有何关系？三个世界的理论与战略与联美抗苏战略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鉴于毛泽东在制定和实施这个决策的同时依旧坚持“文革”路线和部分延续了世界革命外交，而前者和后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以及毛泽东在其实施联美抗苏战略的最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又提出和实施了三个世界战略，而这个战略与世界革命外交和联美抗苏战略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此，本章所考察的内容对于完整客观地理解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的影响，实属必要也十分重要。

在世界革命、国内“文革”政治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问题上，已有的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以李捷为代表，认为可以用“物极必反”来概括这两类因素对联美战略的影响。1958~1968年，中国的国内政治日益“左”倾，它和“两面开弓”、树敌过多的革命外交战略一起，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1968年这种极左错误达到顶峰，其消极影响充分暴露。驱使毛泽东对内外政策进行调整，最终导致了中美和解和联美抗苏战略的确立。一方面，毛泽东反修重于反帝的实际政策选择便利了联美抗苏的战略选项，另一方面，这时的中国外交还不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周恩来、邓小平等代表的联美抗苏和对外开放的正确意见，不能不受到江青集团的有力牵制。①

二是以美国部分学者如基辛格、罗伯特·罗斯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

① 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第498~499页。

1969年以来，毛泽东实际上奉行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实主义外交，其世界革命言辞仅仅是掩护国家利益外交的意识形态策略，国内的“文革”政治与其联美战略几乎完全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也即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这一观点突出表现在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和罗伯特·罗斯的《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1989）》等著作中。

实际上两派见解并非完全对立，彼此都包容了对方的部分观点。几乎没有学者完全否认革命外交和“文革”这类意识形态因素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分歧很大程度上在于侧重点的不同。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有两个明显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意识形态因素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这种影响是复杂的，远非简单的“积极”或“消极”这两个词所能概括的。

第一节　国家安全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重新权衡

一、联美抗苏战略实施前的革命外交及其反思

（一）“文革”前的思考

对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在中国的对外利益天平上的重新权衡，是毛泽东酝酿和决定联美抗苏战略时的重要考量。这里拟通过两个典型案例来展示“文革”前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思考过程。50、60年代毛泽东把美国视为中国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既是国家安全意义上的，也是世界革命意义上的。因此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始终是围绕着美国和中美关系这个轴心展开的。

1. 毛泽东对李普曼《苏联的挑战》一文的批注

1958年，毛泽东对美国政论家李普曼《苏联的挑战》一文做了批注。此文写道：

> 苏联的疑心的内在动力是这样一种看法：美国和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决不容许——除非被迫——俄国和中国来完成它们在亚洲和非洲所领导的革命。在莫斯科——无疑在北京也是如此，当我们坚持说德国和土耳其的重新武装以及维持一个军事基地包围圈的做法是防止它们进行军事侵略的防御措施时，它们不相信我们的话。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之后的批注是：“不见得。我是基本上相信的。”①

联系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笔者以为，从中可以得出五点推测：第一，毛泽东承认，包括重新武装德国和土耳其在内的、美国针对中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军事和政治部署，主要是一种防御措施，并无针对中苏的进攻性意图。第二，毛泽东认为，西方所担心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很大程度其实指的是中苏所推行的世界革命战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攻势，而西方处于守势。第三，鉴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很大程度是分不开的，可以认为当时中苏在地缘政治中也采取了攻势，并且毛泽东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第四，毛泽东用了“基本上”一词，其含义应该是，毛泽东不认为中苏会采取直接的国与国之间的武力进攻方式作为世界革命的手段，也不同意这样做，并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苏有误解。最后，中国公开宣传的所谓德国重新武装是西德军国主义复活和美国侵略政策的体现，主要是一种政治策略。

有证据表明以上推测的真实性。1960 年，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② 1961 年 9 月 28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但并不排除帝国主义可能冒险，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软弱。③ 可见，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安全政策具有很大的防御性质的事实，并非毫无了解。同时，大量事实表明，这一事实激励而非抑制了毛泽东在世界革命问题上采取攻势。

2. 1960 年毛泽东与斯诺的一段对话

1960 年 10 月 22 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双方有如下问答：

> 斯诺：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

① 毛泽东：《对李普曼“苏联的挑战”一文的批语和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卷，1990 年，第 603 ~ 604 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98、508 页。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321 页。

毛泽东：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仅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①

这个稿子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并于一周后（28日）才以书面形式交给斯诺，② 这一细节表明，毛泽东的这席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与美国的一次战略沟通。郭树勇对此的分析是：第一，中苏关系恶化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即中国需要既反美又反苏呢？还是对苏斗争，对美缓和呢？第二，这段话向美国传递了以下信息：中国希望在合适的时候得到美国的承认；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对国际法与世界秩序有一定尊重；中国不主张世界大战，也不希望通过局部战争来解决争端；希望中美两国都不要用战争政策来解决国际问题包括中美之间的问题。③ 笔者同意这些解读，同时以为，这席话表明毛泽东仍在继续思考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即推进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

（二）革命外交及其受挫

1. 革命外交的实施

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牛军、宫力、陈兼、谢益显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顽固坚持对华敌视、封锁和遏制政策，顽固阻挠中国统一，也由于中苏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毛泽东对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的思考的结果是，在50年代末，中断了1954年以来执行的以部分承认现存国际秩序也即部分放弃世界革命为特征的和平共处外交，恢复了建国初期大力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外交政策。这种革命外交试图兼顾世界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时甚至把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以中法关系为例，诚如杨奎松所指出的，法国维持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利益就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而言并不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50年代初，法国政府多次表示，只要中国放弃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物质和军事援助，就可

① 毛泽东：《同斯诺的一段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第322页。

② 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

③ 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第190～191页。

以抛弃台湾而承认新中国，但毛泽东断然拒绝。1954 年法国势力退出印度支那以后，中国又开始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戴高乐政府在此问题上也向中国提出了类似要求，毛泽东依旧不为所动。① 直到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后的一年多后即 1964 年 1 月，中法才建交。整个 60 年代中国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包括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在国际上进行反修防修外交，援助新兴独立国家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及支持泰国、印尼、马来亚、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共产党武装斗争。② 这个方面最激进的表述，莫过于“各国反动派”的提法。这个说法始于 1963 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该文提出：“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③ 按照这个标准，几乎所有走上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的当权者，乃至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都有可能列入“各国反动派”之列。当然，中国的实际做法并没有像言辞那样极端。总的说来，从 50 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夕，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重点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包括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建设。在这方面，中国的主要目标，一是彻底终结殖民体系，二是鼓励民族解放组织和新兴独立国家独立于美苏的影响，第三才是在可能的条件下，鼓励它们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但总的政策趋势是越来越激进。1965 年是中国革命外交走向极左的标志性的一年。这年 1 月 5 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世界革命”口号和三个“反对”的任务：“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世界革命、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④ 到了“文革”早期即 1966 ~ 1967 年，激进的革命外交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唯我独革、输出革命的极左外交，给中国外交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2. 革命外交的受挫

早在“文革”前，多年努力的结果就已使毛泽东失望。世界革命外交的失

① 李群英：《中法建交过程中的阿尔及利亚因素》，《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32 ~ 34 页。

②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第 504 ~ 505 页对毛泽东在 60 年代支持东南亚革命的考虑和言行，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③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9 页。

④ 转引自：宫力：《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第 439 页。

利在毛泽东于1965年3月在陈毅外长的一次出访汇报上做的批语中可窥一斑。一些亚非国家"同情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但对越南人民能否打败美国缺乏信心，均认为以和平解决为上策"；在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上，陈毅所访问的这些亚非国家"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般都不积极，对会议的基调、开法、会址等也是态度各异"；在中苏论战方面，"普遍认为中苏争论削弱了世界反帝力量，不分是非地要求中苏和解"；在外援方面，"巴基斯坦要求我给予有力的军事支援，但又怕我支援'过于有力'"；总的看来，"对我采取反帝、反修立场，以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支持并在经济上援助新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钦佩、重视，但又认为我过于革命，不讲究策略，怕引起中美大战……"① 从这些批语中看不出毛泽东有改变政策的想法，但间接反映了中国革命外交的受挫。

实际上，1965年是革命外交受挫的关键年份。首先，在尼赫鲁和铁托的影响下，亚非运动明显地朝着亲苏方向发展，与毛泽东的愿望背道而驰。其次，6月，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被政变推翻。这两个事态使毛泽东试图通过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式领导权的努力归于失败。再次，8月，印巴就克什米尔再起冲突，巴基斯坦战败，致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受损，中苏矛盾加深。9月，西哈努克被亲美力量政变推翻，扰乱了中国推动西哈努克参加印支反美统一战线的战略。10月，印尼共产党在9月30日发起的政变失败，致使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苏加诺总统权力被剥夺，30多万印尼共产党人和华人被杀害。② 革命外交受挫的根源在于，中国同时反对美苏的政策和输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超出了国力，也没有得到多数亚非国家的赞成。③

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出访巴基斯坦。在一次只有刘少奇夫妇、陈毅夫妇、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出席的小型宴会上，刘少奇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我们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也就会变。"④ 这句话无疑与印度支那问题上中美苏越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关，至少表明最高领导层内有人已经开始思考，在不无冲突的世界革命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孰轻孰重？

---

① 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陈毅出访五国概况汇报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468~469页。

②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第219页。

③ 宫力：《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第439页。

④ 胡孝文：《王光美：共和国第一夫人》，第45页。

（三）“文革”中的反思

1967 年是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达到高潮的一年，出现了“三砸一烧”，① 中国的对外关系降到谷底。这些严重事态促使毛泽东开始支持周恩来批判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1968 年 12 月 5 日，周恩来指出：“不能一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事斗争是极其复杂的。”② 1970 年 9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与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地区司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当前世界革命的潮流中，掺杂着无政府主义、托派的思潮。有些人本人还是要革命的，只是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暗杀。另一方面，也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就我们一家，眼里没有别人，光中国就把世界革命包办了，怎么能包办得了呢？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③

1885 年，在给维拉·查苏里奇的信中，恩格斯说：“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④ 60 年代中国输出革命的成效，大抵也是如此。晚年毛泽东对此是有一定自觉的。1972 年 2 月 21 日会见尼克松时，针对尼克松的恭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⑤

毛泽东毕竟是一个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革命的豪情和务实的精神在他身上都不缺乏。从 1968 年开始，毛泽东对支援世界革命、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外交政策，做了两大调整：一是更加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明显减少了无偿外援；二是对外宣工作提出不要强加于人的要求。这时的毛泽东虽然依然坚持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但是也不忘提醒有关部门“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⑥ 他认真研究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意见，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

① 1967 年 7、8 月间，造反派冲砸了缅甸、印度和印尼驻华使馆，烧掉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揪斗了英国驻华代办。

② 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236 页。

③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 39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51 页。

⑤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636 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430 页。

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① 不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以及"大国沙文主义"这个用词表明，他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和世界革命意识开始淡化了。

一些中国寄予厚望的受援国由于中国对外战略的咄咄逼人反而与中国拉开距离，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反而倒向苏联，以及一些新兴民族国家革命的失败，令毛泽东不得不反思"输出革命"的成效和代价。多年输出世界革命无果，反而由此带来严重的国际孤立和安全威胁，这一严峻事实对毛泽东触动很大，在九大前夕的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谈话时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② 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亲华的外国共产党等革命组织的援助。③ 以上挫折，加上苏联对华军事压力的激化，促使毛泽东决定局部牺牲他心爱的世界革命，效仿古代中国战略家"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的传统，与世界革命的头号敌人进行安全合作。④ 这也直接反映在1972年2月21日他与尼克松的如下对话中：

> 尼克松：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
>
> 毛泽东：就是喽。⑤

---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3页。

② 李捷：《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282~284页。

③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52页。

④ 杨奎松在《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和《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1949~1973）》两文中对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有详尽的分析。后文载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

⑤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转引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287页。

综上，对革命外交和极左的“文革”意识形态的一定的反思和淡化是毛泽东能够推行联美抗苏战略的重要前提。

二、毛泽东对革命外交与联美抗苏之关系的理解和辩护

（一）为联美抗苏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阐释和辩护的必要

诚如章百家所言，虽然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策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国内威望，但这在他并非迫切的政治需要，反而要冒一点国内风险。此举完全出乎国内广大干部群众的预料，但相当平静地接受了。大部分人接受了中央的说法：尼克松访华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美国长期奉行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的破产”；只有少部分人心存疑虑，弄不清以反修防修为己任的中国怎么可能与帝国主义头子和解。有迹象表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都不大情愿接受这一变化，特别是前者。但他们没有公开反对。① 在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下，也不可能公开反对。在陈毅等四老帅受毛泽东之托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时，林彪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也在进行同一类研究，并得出了中国与美苏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② 当阿尔巴尼亚党中央于 1971 年 8 月来信表示坚决反对拟议中的尼克松访华之时，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李作鹏在政治局会议上称赞这封信是一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③ 据曾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回忆，林彪曾在私下里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不会有好结果。在黑格访华为尼克松打前站的时候，江青也通过其亲信于会泳提出过，不应允许美方用电视直播的手段“宣传”美帝头子尼克松。④ 林彪和江青集团间接反对毛泽东此议的动机是多重的，包括不愿意看到周恩来的地位由此而提高，但从极左立场出发，认为不应该向美帝低头，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⑤

这里有必要提及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的一段对话：

---

① 章百家：《中国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载《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 21 页。

② 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第 237 页。

③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49 页。

④ 宫力：《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676 页。

⑤ （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姜长斌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676 页。

毛泽东：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克松：是的。

毛泽东：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点头)

基辛格：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泽东：就是了。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苏联就在那里挖尸。①

最后这句话说的就是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也曾向毛泽东委婉地提出疑问，说革命不能妥协。

在国际上，兄弟党对此异议也很大。1969年9月底10月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斯卡赴京参加国庆20周年庆典，在会见周恩来时，转达了霍查和阿党中央对于9月中苏总理会晤的意见：劳动党把同苏联人的任何接触都视为"严重的失误"。周恩来表示异议。② 这种事情霍查都难以理解，其对后来的中美公开接触之强烈反感也就毫不令人意外了。1971年7月15日中美会谈公报发表后，周恩来很快约见阿驻华大使罗博，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自己"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做交易。③ 一个月后，霍查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信毛泽东，这是一封万言长信。信中说，阿党一向主张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不能抱任何幻想，只能坚持不调和的斗争；不能依靠帝国主义去反对修正主义，也不能依靠修正主义去反对帝国主义，应左右开弓，全面出击；中国党的做法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来信最后说：

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种会谈的许多例子，但历史上

① 熊向晖：《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载《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279~280页。

② 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第31页。

③ 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第34页。

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你们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①

霍查的这封信和李作鹏对这封信的称赞引起毛泽东的不悦。据吴德回忆，1971年9月12日，南巡归来的毛泽东在丰台的专列上接见了吴德、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当李德生汇报他不久前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时，毛泽东显得极不耐烦，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② 当月，中共中央通知阿共，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③ 笔者尚没有看到朝鲜、越南领导人对此的异议，但是完全可以肯定，他们不会不对中国党的做法提出激烈的异议。

正如翟强所指出的：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国家统一等各个方面，美国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联合美国，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在重视理论解释的各国共产党人中不可避免引起了某种混乱。对毛泽东来说特别严重的是，世界各国许多原本与中国一起反对本国“修正主义”的党，或高举反帝旗帜的革命组织，也纷纷与中国分道扬镳。原来以中国为首的反帝反修的世界左派阵营，迅速瓦解。④

在这种局势下，尽管毛泽东在国内有着绝对权威，作为大战略家，他也不乏做这件事的勇气和魄力，他依然感受到为此事进行意识形态阐释和辩护的无形的和巨大的压力。面对兄弟党，这个压力就更大了。作为一个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也需要对这一战略决策做出意识形态上的阐释。

（二）意识形态阐释和辩护的内容

为此，他的反应是诉诸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革命的妥协理论和他本人的统一战线和反修防修理论对这一战略进行阐释和辩护。

1968年11月30日，即中国同意恢复华沙会谈5天后，周恩来在与柬埔寨

① 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第33~34页。

②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等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③ 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第32页。

④ （美）翟强：《建立反对前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1972~1979年）》，《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80页。

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潘巴会谈时说，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应特别注意政策和策略。“在执行总体战略时，应采取灵活的策略以便各个击破敌人”；“在特定时期应该确定主要敌人及其同伙，把他们作为斗争的主要靶子”。同时，“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同考虑，不仅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够联合的革命群众，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也要利用与主要敌人有矛盾的一切力量，把他们作为间接联盟”。① 可以合理推测，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已开始考虑联美抗苏的可能性一事，是这番话的背景。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为了统一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1 年 5 月 26 日周恩来专门就此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有人担心中美会谈会影响美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经过分析，最后经周恩来整理、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报告指出：

> 美国群众运动，在尼克松上台后，确是高涨，重点在反战和反种族歧视。有人说，运动处于抛弃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之中。我们正好以从越南撤军和从台湾撤军、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动员美国群众，影响当权派和反对派的政策，增强群众的斗志。而且，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战争，中美人民往来和两国会谈，正是动员美国群众、考验群众领导的好机会。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 ~ 19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这段历史可供参考。②

1972 年 2 月底送走尼克松后，周恩来 3 月 4 日到河内，通报时强调了以下几点：同美国谈判也是斗争的一种必要形式；这次中美会谈是多年来大使级会谈的继续；中方一直坚持原则，同时也有必要的灵活性。周恩来再次就中国曾经反对越南在 1968 年与美国开始谈判一事承认错误。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与敌人谈判，周恩来举了毛泽东 1945 年与蒋介石的重庆谈判，胡志明与范文同在 1945 年“8 · 19”革命胜利后在枫丹白露与法国的谈判，中朝在板门店与美国

---

①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下，第 267 页。

② 李捷：《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姜长斌、（美）罗伯特 · 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 697 页。

的边打边谈，结论是：可以同敌人谈判，但不要丧失原则。①

1972 年 3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通知，就中美联合公报和新的对美策略进行阐述。指出：尼克松应邀访华，对我们来说，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② 这样的解释，在当时中央文件和国内报刊上，比比皆是。

1973 年 7 月 4 日，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针对阿尔巴尼亚对中美解冻和双方在越南问题上的妥协的批评，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阿共和江青：

> 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美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明灯说的。③

这次谈话中，他还诉诸列宁的权威为自己辩解：

> 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被杀死，要么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④

在这里，毛泽东可能也是在含蓄地警告张王二人，不要附和阿共和江青对中美解冻的批评。这次谈话的影响之一，就是在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在周恩来做的政治报告中，有如下内容：“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与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接着是引用了毛泽东 7 月 4 日谈话

---

①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81～83 页。

②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 88 页。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506 页。“文革”时期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舆论称为“欧洲最亮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④ 《毛泽东 1973 年 7 月 3 日与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纪要》，转引自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中国外交》，2002 年第 7 期。

中提及的列宁关于与强盗妥协的那段话。然后指出："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①

在这次谈话前，1973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对负责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周恩来说，政治报告要指出时代的特点。② 于是，十大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③ 十大开幕式上，当周恩来读到政治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④ 出于对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理论的坚持，1975 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把原来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改为"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⑤ 写进执政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宪法中的话，绝不可能仅仅是幌子。

以上公开和不公开的表述，可以做多种解读，既可以理解为对联美抗苏战略的纯策略性质的意识形态辩护，也即一种经过意识形态包装的现实主义；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认为打开中美关系最终有利于包括美国革命在内的世界革命成功的真实心态的表露，也即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屡试不爽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国内学界对此已经得出比较一致的认识：毛泽东同时是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和地缘政治的框架内理解和执行联美抗苏外交的，当然他也不反对必要的策略性辩护。

至此，我们可以对毛泽东对于联美抗苏战略及其与世界革命外交的关系的理解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了：

我们的时代，依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 年 9 月，第 26 ~ 27 页。

② 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党的文献》，2002 年第 5 期，第 72 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659 页。

④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664 页。

⑤ 颜声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长征出版社，2002 年，第 54 页。

之间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之间围绕重新瓜分世界而起的矛盾。①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因此美苏争夺迟早会引起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美苏之间又有区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险性。② 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因此比美帝国主义更有侵略性和冒险性；苏联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有一定的欺骗性。③ 美苏与中国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这两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重新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有时候要比它们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还要尖锐，难以妥协；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比它们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可能性还要大。④ 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可能和必要。列宁曾经利用协约国和同盟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保住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斯大林也曾经利用英美法等老牌帝国主义与德意日这三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就冒险性和欺骗性而言，苏联既是世界和平包括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是世界革命的最大敌人；美国只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二号敌人。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像列宁斯大林那样，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联合二号敌人美国反对头号敌人苏联，结成反对苏霸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既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也即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赢得备战时间；也符合世界革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保住了中国，也就保住了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国家安全和世界革命是分不开的。进而，与美国的合作是暂时的、策略性的、不得已的和局部的，是为了对付当前的敌人而与未来的敌人的合作，为了对付头号敌人而与第二号敌人的合作。这种合

---

① 196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针对苏联侵捷事件，第一次将苏联公开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说侵捷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同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这个判断。见"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② 《两报一刊》1972年10月1日社论。

③ 《人民日报》编辑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④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毛泽东在1976年2月23日与下野后的尼克松的会谈中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第284页。

作的性质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打击世界革命的头号敌人苏联。在这个领域以外，在诸如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中美依然是敌人。

以上表述，主要依据是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当时就已公开的毛泽东的言论、中共中央文件、十大政治报告和“两报一刊”上的表述。众所周知，“文革”时期，“两报一刊”上所有重要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都是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的。当然，毛泽东的实际想法要比以上所述的还要复杂，不时有自我否定。比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晚年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说过，避免大战是可能的。1976 年 2 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说，保持世界和平 25 年是可能的。① 但总的说来，他给外界（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印象是：大战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战争必然引起革命；避免大战这件事值得做，但很难；世界大战终究不可避免。

根据以上理解，很自然地，在毛泽东看来，林彪集团反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言论就是一种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行径了。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和其秘书纪东的回忆，在中央已确认林彪叛逃方向是苏联之后的头几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采取了紧急备战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内防政变，外防苏联趁机入侵。1971 年 9 月 13 日下午，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的作战会议，总参的五位副总长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说：“要准备打仗，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② 从中可以看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理解中，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关系链条：林彪鼓吹极左路线——林彪反对联美抗苏——林彪叛逃苏联——苏联发动侵华战争。

三、使联美抗苏和世界革命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

综上，虽然世界革命的受挫使他沮丧，加上国家安全的危局，迫使他联美抗苏，但他只是淡化而非抛弃世界革命思想。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奉行使联美

---

① 傅耀祖：《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外交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第 27 页。

②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 107 ~ 108 页；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86 ~ 187 页；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史出版社，2007 年，第 196 ~ 199 页。

抗苏和革命外交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① 70 年代的中国继续其传统的支持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包括：继续在道义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阿拉伯反以斗争、支持东南亚共产党武装斗争、支持非国大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支持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及支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革命。这里仅举数例。

“文革”中中缅关系受到很大冲击，后来在中国外交调整和“尼克松冲击”的影响下，缅甸主动表现出改善关系的积极姿态。1971 年秋，毛泽东决定邀请吴奈温访华。同时又明确向缅共领导人表示，将继续支持其武装斗争，甚至认为缅共武装斗争的成果越大，越会促使奈温有求于中国，进而靠近中国。②

马来西亚从 70 年代初就向中国表示了建交愿望，但有几个条件，即中方取消马共设在中国境内的电台，取消马共中央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并公开否认与马共的关系。中方不予理睬。后来马方做了让步，不再要求在建交公报上提与马共有关的问题，两国才于 1974 年 4 月建交。③ 同年 5 月 28 日，毛泽东会见了访华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谈中，拉扎克再次要求毛泽东放弃支持马共反政府武装斗争，说这是干涉内政。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共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外国共产党，并不妨碍与东盟各国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国共产党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至于你们各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的。”④

1970 年 3 月西哈努克亲王被亲美的朗诺推翻后长期流亡中国，并在中国的劝说下与其传统政敌红色高棉一起建立流亡政府，在中国大力支援下与越南、越南南方革命力量和老挝革命力量一起展开反对印支各国的亲西方或中立的政权和美国的武装干涉的斗争。1975 年 9 月西哈努克回国前夕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身体已十分虚弱，仍然努力劝说西哈努克不要辞去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职位，以在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表明对红色高棉政权的支持。⑤ 从中

---

① 丁诗传、王超的论文《“一条线”战略与“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评析》和沈志华、李丹慧的论文《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从不同视角论证了这个观点。前文载于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后文载于《美国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 109 页。

③ 丁诗传、王超：《“一条线”战略与“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评析》，第 74 页。

④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00 页。

⑤ （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法）伯纳德·克里歇尔：《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王爱飞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第 63 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基于其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和何为社会主义的理解而对红色高棉的一贯支持。

美国十分敌视红色高棉，坚定地奉行联美抗苏政策的毛泽东却同时坚定地支持红色高棉。缅甸、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是中国联美抗苏战略所要争取的力量，属于“一大片”，但这并没有妨碍毛泽东支持两国内部的反政府革命武装。

正是基于世界革命的考虑，在利用联美抗苏这个统战策略为中国赢得最大利益即安全的同时，他也不忘尽可能地为社会主义盟友的利益敲诈美国。如前所述，中美接触之初，他坚持把美国退出印度支那作为比台湾问题更重要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毛泽东对这个原则的坚持，对于促使美国撤军起到了一定作用。朝鲜战争结束后，由出兵组成前联合国军的美国及其盟国成立了一个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这是一个敌视朝鲜的机构，中朝一贯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周恩来说，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应该取消。尼克松说，我们正在探讨这种可能性。中方这一要求写进了《上海公报》，后来美国确也取消了这个组织。① 总的说来，虽然中苏都始终支持世界革命，也都注意不让对世界革命的支持严重危及国家安全，为此实用主义地与美国改善关系。但是比较而言，同样是支持反帝革命和民族解放，苏联有更多的机会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毛泽东则有更多的革命的原则性。

第四章曾提到，在毛泽东与尼克松的第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说：“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这番话明显的意图是想与毛泽东讨论双方联合对付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理会，只是委婉地暗示会谈该结束了。笔者在前文中对此的解释是：鉴于在台湾问题和越战问题上美国还没有做出足够的让步，作为一种策略，毛泽东拒绝与美国领导人具体讨论这个话题。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回避态度还可以做如下解释：毛泽东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对反帝反资的世界革命的支持，因此，他不可能无保留地赞成尼克松所谓的各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

---

①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71页。

四、从"放空炮"看毛泽东基于世界革命对联美抗苏的理解、辩护和切割

为了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在思想和政策上对联美抗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有必要解释在当时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交往中的所谓"放空炮"现象。

（一）"放空炮"现象

所谓"放空炮"，即当时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经常表达的革命言辞。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把这个现象称为"放空炮"。在中美交往中，这种空炮屡见不鲜。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刚住进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发现每个人的房间里都有英文的反美宣传册，他们统统搜集起来交给礼宾司的一位官员，第二天，周恩来对基辛格说，你们应该注意我们的行动，而不是言辞；那些反美标语是"放空炮"。①

1972年2月4日，周恩来两次接见黑格。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口信说中国面临苏联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了威胁，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周恩来立刻让翻译对viability这个词查了字典，然后决定进行反击。周恩来说：

> 任何国家决不能依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早已说过，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②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关于世界大势，周恩来说，中国对世界的前途做了最坏的设想，即苏美等从四面八方打进来，我们当然会蒙受很大的牺牲，但这样也可能最后解决问题。尼克松赶忙说，美国决不会同苏联一起来攻中国，这种设想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保持强大、独立，不被瓜分，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不可能被外力吞并。这番话周恩来不是第一次对美国

---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61页。

②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65页。

人讲，也不是最后一次讲，是毛泽东明确指示要讲的话。①

《上海公报》中的革命言辞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971 年 10 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基辛格提出了一份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草案。周恩来不满意，决定中方要起草对案，各说各的。毛泽东表示赞成，就中方对案的基本精神做了如下指示：

> 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打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也难。

对于据此指示起草的中方的公报草案，毛泽东表示满意："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②

双方在讨论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时，针对基辛格坚持要把"人民要革命"改为"人民要进步"的提法，毛泽东指示："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③ 直到 2 月 25 日，尼克松访华行程过半，双方还在争这个措辞。最后中方立场占了上风。结果就是中美《上海公报》中有关中方的革命立场的如下表述：

>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④

事后，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⑤

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说了一段后来流传很广的话：

> 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

---

①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 69 页。

② 转引自：魏史言：《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60 页。

③ 《从对峙走向缓和》，第 703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8 日，第 1 版。

⑤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639 页。

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不讲不行呢。①

（二）对“放空炮”的解读

对于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他说的这席话，基辛格的理解是：毛泽东意在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之上。”② 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也持类似见解。这种理解并非全无道理，但很不全面。

笔者的理解如下：

第一，由于中国国力有限，也由于中国出于国家安全计必须注意不要因为支援世界革命而陷入与美国的不必要的直接冲突中去，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开大会、发声明这类道义支持；但是道义支持也是支持，50～70年代中国的革命国家的形象很大程度就是靠这类放空炮的行动塑造起来的。毛泽东一贯重视舆论的作用，“放空炮”在他看来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放空炮”这个词就源自毛泽东。1963年12月，针对西方所谓“如果中国和北越放弃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美国就撤出南越”的说法，毛泽东指出：

> 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开些大会声援。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③

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笃信是至死不渝的，他深信其联美抗苏是对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矛盾的利用。因此，这些革命言辞就不仅仅是“放空炮”。

第二，在周恩来等与美国人的会谈前和起草外交文件时，毛泽东坚持要说出和写上激进的革命言辞，也是为了提醒手下干部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不要忘了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打消美国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及向中国的意识形态盟友表明中国没有丧失革命原则。

再以《上海公报》为例。前外交官王立认为，这样一份既有共同点，又有

---

①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纪要，1973年2月17日》，转引自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中国外交》，2002年第7期。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86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8页。

分歧点的公报，其作用，一是公开地与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二是向世界人民特别是左派表明了继续支援世界革命的立场，以免他们产生误解或意志消沉；公报这样写本身就是支援世界革命的一个行动。三是有助于打消美国的幻想。当时苏联领导人挑拨离间，他们自己天天与美国会谈，却攻击中美会谈是背叛原则，出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美国报刊也在误导读者，宣扬中国将对印支盟友施加压力，帮助美国从越战脱身。这种种反宣传说明，中国在公报中明确表明自己一贯支持革命的原则是必要的。① 除了前述的革命辞藻，公报中还有这样一席话：

> 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②

公报中提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乃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眼里仍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是美国在东亚的最主要盟友，是美军进行越战的后勤基地，朝鲜也是美日同盟的重要假想敌。这样的公报，对于越朝阿友邦的说服力无疑要比只列共同点的大得多。

第三，“放空炮”确实同时也是在思想上转不过弯的国内干部群众和国外盟友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策略，是对中国的新的国家利益外交的一个掩护。为此，在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人的私下会谈中及在双方公开发表的外交文件中，充满了革命言辞。毛泽东和周恩来几次毫不掩饰地向基辛格承认，偶尔放些空炮是为了记录在案。③ 关于公报的革命辞藻的掩饰性质，还有一个证据。1972年2月4日，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他与黑格的第一次会谈的情况汇报时，在谈到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公报时，毛泽东说：

> 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①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91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第一版。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第44页。

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罗！①

这句话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周恩来刚刚对黑格说过，中国不怕所有的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前外交官王立对此的合理解释是：毛泽东这席话的意思很明显，一是，四面出击、左右开弓的空炮可以放，实际上办不到；二是，这种内部看法，不要写在公报上，心里明白就行了。②

综上，“放空炮”是毛泽东兼顾联美抗苏的国家利益外交和革命外交的一个手段。有必要放空炮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空炮不空，邓小平外交革命完成后的中国为什么就不放这些空炮呢？

第二节　“文革”政治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复杂关系

当时国内仍在继续的“文化大革命”对于联美抗苏外交的影响有两个特点：一是并行不悖，二是复杂微妙。

一、使“文革”路线与联美抗苏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

中美是在超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的前提下实行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的，这就决定了内政上的“文革”与联美抗苏之间基本并行不悖的关系，这种关系类似毛泽东在印支革命和世界革命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方面均执行的切割政策。其主要表现有二。

（一）阻止江青集团夺取外交权的英明决策

在周恩来病重以前，外交决策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毛周体制；在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之后，他把这个权力交给了邓小平。在二度打倒邓小平之后，又把外交权交给华国锋，一再挫败了江青集团染指外交的企图。

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管外交的决策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1973 年 3 月 29 日夜，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

---

①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 90 页。

②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 90 页。

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① 这个决定表明毛泽东已在考虑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管外交的可能。一年后，中央开始酝酿出席联合国将于1974年4月召开的原料与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这是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召开的。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与会，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由谁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个会议，阐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重要问题的立场，为国际所瞩目。考虑到毛泽东年初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起草中的中方发言稿重点在于阐述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周恩来的病重，以及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宣布近期将召开四届人大，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义不言而喻。3月20日，毛泽东通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江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百般阻挠，毛泽东不得已在3月27日致信江青，表明这是他的决定，警告她不要再阻挠了。江青这才停止无理取闹。在当时特殊形势下，也只有毛泽东能够阻止江青的一切言行。根据毛泽东指示，4月6日，在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群众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主要党政领导人悉数出席欢送仪式。② 这就向国内外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邓小平将接替周恩来，辅佐毛泽东，主管外交。同样根据毛泽东指示，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成为第一副总理。会后，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包括外交。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在中美领导人的所有重要会谈中，江青集团的四个重要成员没有一个实质性地参与过，他们要么出现在纯礼仪的场合，要么在实质性会谈中做配角。

以上事实表明，毛泽东不相信江青集团有意愿和能力执行联美抗苏战略。

（二）意识形态领域对“文革”路线的坚持和对江青集团的重用

毛泽东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同时，对于“文革”路线却少有松动，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突出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拒绝全面的对外开放。对于1969~1971年中美秘密接触阶段美方数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毛泽东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贸易，中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

---

①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52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89~1690页。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① 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竭力利用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契机，试图在经济技术上对西方开放，引进了若干西方技术和设备。这件事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全面的改革开放（当时的语言叫“整顿”）势必威胁到“文革”路线，是他不能接受的。他把中美合作主要局限在国家安全领域。② 1974 年 12 月 17 日，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③ 即使是这点有限的对外开放，也遭到江青集团的阻挠。“蜗牛”事件④、“风庆轮”事件和“反华影片”《中国》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依旧重用江青集团。整个“文革”期间，文教宣传这类意识形态大权始终控制在江青集团手中。总之，毛泽东的做法是，一手用周恩来、邓小平搞联美抗苏，以对付苏联的安全威胁，一手用江青集团“抓革命”，来对付苏联的意识形态威胁。在他看来，坚持“文革”路线和联美抗苏都是为了解决苏联威胁问题，一个是内部威胁，一个是外部威胁，二者不可偏废。

---

① 《1972 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载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 285 ~ 286 页。

② 尼克松回忆其第一次访华时注意到：“在我与中国人会面的这五天，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经济的问题，一次也没有。他们只关心战略大事和苏联的军事实力。20 年后，我们所谈的几乎都是经济问题，并且是中国特色。”（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34 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709 页。

④ 1973 年底，四机部组织的彩色显像管考察团到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彩电显像管生产线引进事宜，美国康宁公司赠送考察团每人一个该公司自己生产的水晶蜗牛工艺品。江青得知此事后，于 1974 年 2 月 10 日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帝用这个办法来嘲笑中国的经济像蜗牛那样爬行，代表团接受这个礼品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还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要求退回礼品，向美国提抗议。在周恩来指示下，驻美联络处查明，蜗牛在美国象征幸福、吉祥，是流行的工艺品。政治局讨论决定，收回江青在四级部的讲话，不退回礼品，也不抗议，但撤销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合同。中国的电视工业由此耽误了几年。见：于光远：《1978：我经历的那场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229 页；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 11 月，第 180 页；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81 页。

二、从两次风波看“文革”政治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

下文拟以两个具体案例为例说明“文革”时期国内政治与联美抗苏战略之间复杂和微妙的关系。这两个案例分别是《新情况》风波和会谈风波。

(一)《新情况》风波

1. 风波的产生

1973年6月16~25日，勃列日涅夫访美，与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13个协定。就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1973年6月20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求见外交部负责人，要转交尼克松致周恩来的函。经毛泽东批准，6月25日，周恩来接见布鲁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会见中周恩来指出：我们对美苏签署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在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① 周恩来还说，尽管美苏达成协议，但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及军事争夺的势头并未减弱。《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目的是阻止美苏以外的国家发展和改善核武器，同时利用核对峙恐吓各国人民，干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霸斗争。26日，毛泽东看到周恩来和布鲁斯的谈话要点后很满意，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②

在美苏峰会尚未结束时，周恩来指示姬鹏飞外长：“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姬鹏飞随即向美大司司长林平传达周的指示。林平召集美大司一处（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和苏欧司一处（苏联处）副处长田曾佩商讨，统一认识后，商定由张再执笔写一篇调研文章。6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外交部新闻司的内刊《新情况》第153期刊登了张再写的《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文章说，美苏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骗性，美苏的真正意图并非是限制战略核武器。文章最后说，美苏两家谁也欺骗不了，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此文当天就得

①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01页。

② 宗道一：《1973年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始末》，《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5期，第32~33页。

到周恩来的赞赏。①

到这时为止，事态发展还算正常。美国对于勃列日涅夫企图借缓和营造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表象以离间美欧关系和美中关系一贯警惕，也意识到中国对缓和的反感，事先已把美方的想法和美苏拟签署的协议中可能引起中国不满的部分，特别是《防止核战争协定》，向中方做了通报和解释。② 第一章已提到，如基辛格所述，为了最大限度防止苏联利用《防止核战争协定》达到其离间美欧和美中关系的目的，美方在谈判中已经对苏方草拟的草案做了根本性的修改，使其从字面上严格局限于预防美苏间的意外核战争这一目的。苏方为了尽可能引起西欧和中国的疑心，本着聊胜于无的心态，不得不同意这些修正。事实证明，苏联的这个动机并非完全没有达到。除了中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也对这个协议不满。③ 周恩来对布鲁斯说中国将恪守《上海公报》原则，中国是现实主义者，这就暗示不会放弃联美抗苏战略，安慰了美国；又表示了中国反对缓和的一贯立场。所谓“空话”指的是裁军和缓和，“实事”显然指的是中美合作抗衡苏联。《新情况》上的文章，表达的也是中国警惕和反对缓和的一贯立场。

不料，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7 月 4 日，他把负责十大政治报告起草的张春桥和负责修改党章的王洪文找去谈话，说了下面这席话：

> 你们两位是负责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新情况》第 153 期提出的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

① 宗道一：《1973 年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始末》，第 32 ~ 37 页；宗道一：《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文史菁华》，2000 年第 7 期，第 21 ~ 25 页。

② 不限于 6 月 25 日布鲁斯转交周恩来的尼克松来信。

③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 360、382 页。

文，免得上那班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致上了他们的贼船。……要跟线不跟人。……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出修正主义，莫怪我事先没说。①

2. 风波的分析

毛泽东为何对这篇只有区区 3000 字的处级干部写的文章大动肝火？学界有两种解释。第一，毛泽东在此表达了其对美苏缓和的不满。②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由于周恩来是主管外交的，毛泽东是在借机表达对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批判极左路线的做法的不满。③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但仍有必要做些补充。

几乎同时发生的林彪事件和中美关系解冻，虽然是在不同领域，并且一个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但客观上都是对极左的“文革”路线的沉重打击，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既愿意又不愿意看到的务实的发展趋势。二者分别是中国告别“文革”路线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的两个里程碑。林彪事件促使毛泽东对极左路线进行了一定的反思，面对国内政治和经济乱局，他不得不倚重周恩来收拾局面，部分修正极左路线，包括解放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1972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对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

① 金冲及：《周恩来传》（四），第 604 页；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656 页；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第 154 页。

② 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第 16～20 页。

③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 262 页。关于周恩来对“文革”的不满，证据很多，这里仅提一例。1970 年 10 月周恩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接着提到了“刘少奇同志”。斯诺当即吃了一惊，但马上就明白，第一，周恩来内心反对打倒刘少奇和这场“文革”；第二，周恩来相信他不会把自己说的话统统写下来。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11 月，第 471～472 页。

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①

根据基辛格的回忆，在 1973 年 2 月 17 日他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说，中国还要派人去国外留学；中国人应该学习外语，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②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话："你们知道中国很穷，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女人太多。" 显然是怕基辛格不明白他的意思，几分钟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基辛格才知道他是有所指的，但指的是谁还是不明白。后来，基辛格助手洛德③的妻子贝特④给基辛格做了解释：激进派的头子江青正在兴风作浪，对现行政策发出挑战。1973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第三次会见基辛格。据基辛格回忆，"告辞时，毛泽东突然重新提到我们二月间谈话的主题，我们必须提防中国的女人——指他的夫人的阴谋诡计"。⑤

内政和外交是有内在联系的。对于批判极左路线和对外开放十分卖力的周恩来对于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抗苏决策同样充满热情，这可能使毛泽东不安。"对于周恩来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对其有的满意，有的则很不满意，甚至认为周是反对他搞'文化大革命'的。"⑥ 同时，他又高度信任周恩来对他的忠诚，离不开周恩来的治国理政包括办外交的杰出才能。毛泽东内心十分清楚，中美战略合作对于他一直笃信的"文革"路线有着潜在但巨大的腐蚀作用，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他所担心的右的倾向。加上林彪事件后他本人一定程度上认可的对极左的批判，右的倾向就更有可能占上风。毛泽东决心把这种风险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对于这段历史的基本背景和评价，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着最权威的表述：

---

① 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第 664 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第 87 ~ 89 页。

③ 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④ 一位中美混血儿，有名的中国通。

⑤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35 页。笔者以为，毛泽东这句话可能还暗指王海容、唐闻生和章含之这三位因为深受毛泽东器重而在当时的外交部有极大能量的女外交官，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她们的喜忧参半的复杂态度。此三人在后来的会谈风波中起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⑥ 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第 413 页。

> 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 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 1967 年 2 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①

1972 年 6 月初，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结合个人历史做一个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的报告。6 月 10 ~ 12 日，深谙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用三个晚上在会上做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报告特别检讨了他本人在两次王明路线时期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② 笔者认为，毛泽东此举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就是要警告和提醒周恩来这个中美和解的头号执行人以及所有高级干部以史为鉴，对外，在联合的时候，不要忘了斗争；无论对内对外，在反对极左的时候，不要忘了反右。

在 7 月 4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出修正主义，莫怪我事先没说。”联系上述背景，这席话的含义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周恩来所不关心的反对极右、坚持“文革”路线是大事，他所热衷的联美抗苏、国民经济是小事；这样下去要出修正主义。考虑到修正主义这个词在“文革”时期的政治含义，这确实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另外，外交是周恩来的主管范围，而毛泽东却撇开他，找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自己对外交部工作的意见，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毛泽东的不满也是冲着美苏缓和来的，而且这种不满在他心目中有意识形态含义。杨奎松认为，毛泽东缓和对美关系固然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考虑占了上风的结果，也是基于其终生的统一战线策略，即“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依然坚持列宁的时代观和世界革命理想。他批准联美抗苏战略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坚信美苏间的矛盾和冲突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而尼克

---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82 页。

② 宗道一：《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第 21 页。

松访华后美苏关系的迅速进展让他深感窝火和被动。这是1973年外交部内刊《新情况》风波和同年11月周恩来再次挨批的重要背景。① 笔者同意这一分析。但是杨文并没有对毛泽东对缓和的不满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行具体分析。

总的说来,《新情况》文章没有偏离毛泽东对缓和的批判,但是文章的重点是强调美苏缓和的欺骗性很大和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很浓,而不是美苏争夺大于勾结。这就触到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看待缓和不顾中国的反对依然大行其道的事实,还把这事与他所笃信的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理论联系在一起。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不可妥协,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正确地利用和激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其两败俱伤。如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成功地改善自己的处境并恶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处境,逻辑上就有三种可能的原因,一是理论本身有问题;二是理论没有问题,但对理论的运用有问题;三是理论本身和理论的运用都有问题。由此不难理解中美和解推动美苏缓和的现实给毛泽东带来的政策和理论困境。但他深信列宁、斯大林和他本人是正确的,认定认为美苏妥协大于争夺的人“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考虑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说了一句: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他的逻辑可能是:如果认可《新情况》的观点,那就不排除下述观点正确的可能性:美苏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是可以妥协的而且已经妥协了,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是错误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正在成为现实,美苏大战可以避免,欧洲不再是美苏争夺的重点,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必然东移,可能移到中国;甚至这篇文章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美苏缓和的骗局取得成功的一个实例;而且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可能导向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时代理论的怀疑。这样一来,他也就把捍卫联美抗苏战略与捍卫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了。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反对美越停战和联美抗苏的极左观点。

综上,毛泽东对第153期《新情况》的过火批评,同时反映了他对纠正极左政策的周恩来的不满、对缓和的不满、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坚持与辩护和其对

① 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第16~20页。

这个战略的独特的理解。在这个案例中，意识形态因素对于联美抗苏外交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后者主要表现为，这个战略的头号执行人周恩来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3. 风波的结束

7月4日当天，周恩来获悉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当即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林平，要求外交部长姬鹏飞向毛泽东和中央做检讨并撤回这期杂志。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7月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先由张春桥传达毛泽东7月4日讲话内容，接着，周恩来传达了6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并做了检讨。此时正值中共十大筹备期间，故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意见，对十大政治报告关于国际问题和任务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政治报告中关于时代没有变、列宁的时代理论没有过时、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和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的表述，就是这么来的。当天，周恩来将姬鹏飞的检讨报告、他4日致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林平的信，一并送呈毛泽东。周恩来在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上还加了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并在周恩来4日致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林平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还布置撰写了旨在批判张再文章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7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句话："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第二天，根据毛泽东指示，原文和《〈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除原发各部门外，还发往各驻外使馆、中直机关各部门及各省市区党委与革委会。①

至少，周恩来对于毛泽东批评他反对极左的意见内心是不接受的。据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七·四"谈话后不久，周恩来重新调阅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1972年12月5日致毛泽东的信及相关材料。这封信表示支持周恩来要批透林彪极左路线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正是

① 宗道一：《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第25页；金冲及：《周恩来传》（四），第604页；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56页；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第72页。

这封信促使毛泽东表态，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这次周恩来看完有关材料后，"啪"的一声把材料摔倒地上，骂道："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这是纪东在担任周恩来秘书的八年期间唯一一次听到的周恩来的"国骂"。①

毛泽东认为这件事还没有完，还需要进一步教育周恩来和党的高级干部警惕右倾思潮。于是不到半年，又出了一场风波。

（二）会谈风波

1. 风波的过程

1973 年 11 月 10～14 日，基辛格访华。期间，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三次非正式会谈。如前所述，12 日，基辛格对毛泽东说："我已经公开对你们的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这番对话前面也已提到过了。基辛格的意思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帮助中国，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有求于中国。这使毛泽东不快。②

11 月 14 日凌晨 1 点至 2 点 20 分，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举行第四次正式会谈，讨论敲定了会谈公报的措辞。会谈时，基辛格试探性地提出：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摧毁行动，中国希望美国做些什么？周恩来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说：这事需要进一步考虑。针对基辛格就此提出的有关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说："我们还要考虑。""要请示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③ 基辛格的建议有三，第一，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方的防御系统如轰炸机、导弹等。第二，双方签订一个防止意外核战争协议，美方已经拟好了文本。第三，为此二目的，需要双方建立热线联系。④ 另外，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谈到，解决台湾问

① 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第 154～156 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670 页。

③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 263 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里记载的周恩来的回答是："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670 页。

④ 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6 年，第 291 页。

题有和平和军事两种可能。① 至此，访问结束，基辛格定于14日上午启程回国。

离开前几个小时，基辛格突然要求再次拜会周恩来。周恩来刚刚入睡就被叫醒，立刻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可否答应。秘书回答说："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觉的，说什么现在也不能叫醒主席。"② 沉思片刻，周恩来决定按照毛泽东定下的上次会谈口径，再次会见。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谈。这是第三次非正式会谈，于上午7点35分开始。基辛格再次提出如果苏联准备打击中国核设施中国希望美国做什么的问题，再次提出建立热线联系等建议。周恩来依然按照原定口径回答说：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以后再说；一切都需要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③ 在外事活动中就重大问题的所有表态都要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这是周恩来一贯遵循的原则。每次中美高级会谈前，针对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问题，毛泽东都会事先定下方针和口径，会谈后都要听取汇报。自律甚严的周恩来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1972年3月3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解中美最高级会谈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大会上，曾引用了一句基辛格的话："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④ 这次也不例外。但是，按照国内研究"文革"时期中国外交的学者宗道一的说法，周恩来的答复还有一句：今后双方可指定一人交换意见。这个答复事先未曾请示过毛泽东。⑤ 在这次会谈中，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还重复了基辛格已经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即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战，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⑥

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参加了会谈、分别做记录和翻译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认为，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军事合作问题上，周恩来说错了话，右了。毛泽东抱着对周恩来批极左的不满，听信了这个说法，认为周叶

---

① 宫力：《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第676页。

②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263页。

③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264页。周恩来这次回答在《基辛格秘录》中的《会谈备忘录》里是这样记载的："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同你方协商以前，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美）威廉·伯尔编：《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1999年4月，第241页。

④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264页。

⑤ 宗道一：《"文革"中外交战线的一场风波》，《协商论坛》，2000年第3期，第33页。

⑥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0页。

二人在中美会谈中态度软弱，犯了错误。11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部分人员，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再次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还说，说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误的，要打。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介绍了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青误判形势，认为倒周时机已到，说周是"右倾投降主义"。一向很少动怒的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向毛泽东做了检讨，说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11月21日起至12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连续开会近两周，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谈中的"错误"。主要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叶剑英是陪绑。江青、姚文元提出，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会议后来变成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非政治局成员，如外交部、中联部的人员，包括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都列席了会议。①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会见前同周恩来"长时间热情握手"，说："总理啊！"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②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先后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判就此停止。③ 注意，毛泽东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江、姚二人给周恩来、叶剑英扣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丧权辱国"和"投降主义"的帽子。

---

① 关于这次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见：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0～1671页；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634页；《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264页；《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第176～178页；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第73页；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17页；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史出版社，第196～199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1页。

③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266页。

2. 风波的分析

这场风波的背景和上一次差不多，同时涉及缓和和联美抗苏问题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政上的分歧。这时，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搞得如火如荼，在江青集团的授意下，这个运动有针对周恩来的明显意味。“周恩来主管的外交成了江青一伙攻击的重要领域”。① 11 月访华的时候，连基辛格都注意到北京的政治空气和他同年 2 月来访的时候大不相同，周恩来处境复杂而困难。关于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二个事实。一是这次来访的几次会谈中周恩来明显失去了以往的激情，“第一次避免做能够活跃思想的精彩的长篇分析”。二是，在 12 日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后者第一次以明确、具体的语言代替了以往与美国人会谈时那种简短、充满隐喻的风格，这使得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开始明白“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②

但这个事件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毛泽东不愿意和美国进行具体的核安全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他宁愿让中美战略合作维持在默契和务虚的层面。而基辛格此番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试图劝说中方同意进行核合作。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部分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对毛泽东何以如此的原因做一个完整的解释了。

除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这一因素外，毛泽东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独特国家利益观、对美国祸水东引的怀疑、国内外极左派对联美抗苏的质疑使他面临的困难处境，和对美国借核合作染指中国主权的担忧，很可能都与他的这个态度有关。而所有这些方面，都与他所坚定信奉的列宁主义理论有关。

关于民族自尊和国家利益，明显的事实是：其一，中美合作是因为双方的共同需要；其二，当时中美均认为对方需要自己甚于自己需要对方，显然这与双方的民族自尊和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有关。由于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的民族观和国家利益观与意识形态有关。学界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毛泽东对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理解从来就是与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有资产阶级民族，也有无产阶级民族。正如杨奎松所指出的，在他看来，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

---

①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2 页。

②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二册，第 326、327 页。

阶级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唯如此，党与国，阶级与国家，在毛泽东看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① "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② 因此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公开挑明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美国的帮助这一事实。1972 年 2 月初，白宫国家安全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问做技术准备。2 月 4 日黑格向周恩来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看法时说，苏联正在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美国决心帮助维持中国的生存。当晚，毛泽东从前来汇报的周恩来口中听到这段话后，当即发怒到："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 "他替我们担心啊，猫哭耗子!"③ 逄先知和杨奎松都认为，11 月 12 日谈话中基辛格强调苏联可能进攻中国，美国决不允许中国的安全受到破坏，这让已经因美苏缓和而深感被动的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非常不满，甚至觉得是一种屈辱。④ 这种屈辱和他的阶级意识是有一定联系的。任何国家间的密切的安全合作都难免会突破其所持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族观和国家利益观，这也是事实。于是，周恩来、叶剑英没有当面拒绝基辛格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意图，在毛泽东看来有丧失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削弱主权完整的危险，事实上认可了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自尊的侮辱。因此他没有明确反对四人帮就此扣上的"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的帽子。事实上，周恩来没有断然拒绝这个建议，原因很简单，乃是因为兹事体大，需要请示毛泽东。

关于这个问题与祸水东引的关系，笔者的推理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是：既然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那么，不仅美国需要中国甚于中国需要美国，而且，中美具体的深度的军事合作也是多余的。不仅如此，美国人进行这种合作的建议，特别是提供核保护伞的想法，很可能是美国激化中苏矛盾、祸水东引的诡计。即使美国人没有这个念头，客观上也可能刺激苏联把锋芒转向中国。根据前文多次提及的美国决策者的意图，毛泽东的这个思路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基辛格此次来访数次建议进行中美核合作，很可能勾起了毛泽东对于 1958

---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第 469 页。

②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 年 8 月 8 日，第一版。

③ 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18 ~ 119 页。

④ 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第 19 页；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669 ~ 1670 页。

年苏联要求中苏建立联合核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二事的不愉快的回忆。在他看来，即使基辛格主观上没有恶意，鉴于两国在核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实际后果之一可能就是中国完全独立的核能力受到美国的某种控制。在中苏核战争风险并非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这是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承担的风险。

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除了在批极左问题上迁怒于周恩来，及如上所述的诸考虑外，可能还与下述考虑有关。在他看来，无论是黑格的言论，还是基辛格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建议，都表明美帝国主义想掌握这个国际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社会主义中国决不能让其阴谋得逞。周恩来固然没有答应美国人，但也没有做任何反击，这就是犯了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周恩来历史上就犯过这个错误。不断然纠正这个错误，美帝将得寸进尺，中国对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有丧失之虞。他明确否定了江青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定性：一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篡夺最高权力；这表明，他对自己的这位老战友还是了解的。但他始终没有出面明确否定江青、姚文元的“右倾机会主义”“丧权辱国”和“投降主义”的指控。根据“帮助周总理”的会议结束后乔冠华在外交部的传达报告，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是：“总的说来，是忘记了联合时要防右的规律，根本原因是忘记了主席的教导，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①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这种错误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以上两个案例再次表明，联美抗苏战略与“文革”路线之间，及其与革命外交之间，虽有冲突，但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关系。由于联美抗苏是毛泽东的坚定不移的决策，江青集团虽有不满，不便公开和直接反对。但鉴于外交和内政的复杂联系，江青集团在决策层内的存在和制约，周恩来和在他病重后主管外交的邓小平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提防这个极左集团的暗算和攻击。这类暗算和攻击并不局限于以上两个风波。前面提到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反华影片”《中国》事件，都是如此。在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集团的御用写作班子一再借批历史上的“大儒”来影射周恩来的“远交近攻”战略。在 1976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江青在一次高干会

① 转引自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第 20 页。

上说：“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① 总之，在联美问题上，江青集团的策略是，不敢攻击毛泽东，而是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不敢直接攻击联美抗苏战略，而是通过借古喻今、利用毛泽东对于主权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敏感而小题大做，以及反对有限的对外开放，来达到弱化联美抗苏战略的目的。

第三节　三个世界理论视角下的联美抗苏

毛泽东一方面坚信联美抗苏战略与世界革命从长远和本质上看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并非没有意识到两者间至少在理论上的冲突，也试图摆脱这种冲突。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的提出和实施，就是其摆脱困境、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更少冲突、更多一致的思想和战略基础的一个重要努力。

一、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接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说：

>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②

事隔半年多后，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

>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③

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说：

>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

① 宫力：《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第676~677页。

② 《十年文革大事记》，第666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88页。

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①

不到两个月后，1974年4月10日，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邓小平副总理在讲话中，第一次公开、正式地向世界宣示了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

>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②

这个讲话事先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代表了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最成熟最权威的思考。

二、三个世界理论的考察

（一）已有观点

毛泽东在此时提出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的意图是什么？如何评价这个理论？学界对此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专门研究该理论与联美抗苏战略之间关系的成果也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是李丹慧和李捷的观点。

李丹慧认为，三个世界理论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从1962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脉络是清晰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反帝反修反霸、特别是苏霸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这种探索、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过程，虽然是以世界格局从两级向多级格局的转换为前提的，但其始动力却是中苏分裂和反对苏霸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形成的过程，反映着60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成熟的轨迹：从反帝反修但美帝为头号敌人，到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再至头号敌人角色的变换，以苏联霸

---

①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88页。

② 《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演讲》，载彭军、陈晓雷、周慧玲编著：《中国领导人在外演讲纪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6、125页。

权主义为首要的斗争对象；从反帝反修、两线作战到集中世界上一切力量，一个拳头出击，抗衡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因而出现了重大转机。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着眼点过分集中于中苏关系，因此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有相当的局限性。表现为外交思维的矛盾性（理论出发点在于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其落脚点却又陷入了极其厚重的意识形态窠臼）、外交行为的矛盾性（一方面突破了意识形态框架，放弃以美划线的标准，把对外方针建立在比较现实的基础上，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摆脱以苏划线），划分标准模糊，缺乏科学性（既非完全以发达与否的经济水平来确定国家归属，又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后期的中国处于一种僵化而非灵活、单一而非多样的状态。①

李捷认为，毛泽东既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者。60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同样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如果说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作为阶级斗争来处理，那么，外交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把本来可以争取的大量的中间力量，不加分析地作为敌人来打击，其目的是试图使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结果是自我封锁，自我孤立。在周恩来等人的从旁推动下，毛泽东逐渐察觉了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极左做法对中国外交的危害，从理想回到了现实，重新认识时代的主流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其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就是继联美抗苏之后，继续纠正国际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外交的错误影响的一次认真尝试。这同样是一次自我否定。在这种否定中，中国外交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即从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革命外交开始转向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②

笔者基本同意以上分析，也有些细节上的不同看法。下面就这个理论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谈几点看法，也可以视为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化和补充。

（二）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兼容

首先，三个世界理论完全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为划分敌我友的标准与方法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在思想方法上和联美抗苏是一致的，至少是不冲突的。

---

① 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沈志华、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第23～24页。

② 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648～652页。

正如学界一致认为的那样，其划分标准是复杂的甚至混乱的。部分地以经济发展水平、部分地以对外政策、部分地以国力差异特别是军事实力来划分世界的主要政治集团。其中，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主要依据工业化水平，第一和第二世界作为整体与第三世界的区分除工业化水平外，还有就是前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区别了。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划分既是依据对外政策（前者搞霸权主义，后者不同程度受前者的欺侮控制），也依据国力。第三世界中，不管是依据现在的认识，还是根据“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标准，都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中，按毛泽东的最初表述，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注意，毛泽东是把“欧洲”而非“西欧”划入第二世界的。但是经毛泽东审定的邓小平的联大讲话似乎把这两国划入亚非拉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之列，因而属于第三世界。说是“基本上”，乃是因为邓小平演讲中有这么一句：“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① 罗马尼亚是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是可以算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的。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就属于第二世界了。笔者迄未发现中国官方对罗阿两国属于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正式表述。但有一点很明显，无论是哪种说法，依据的都是这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非社会制度。用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密标准来看，三个世界理论不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但是乱中有理。其一，完全放弃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标准。无论是前述毛泽东的三次谈话，还是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演说，没有一处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资本主义”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其二，它同时强调了综合国力和对外政策两个标准。这里有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第一世界都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第二世界几乎都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换言之，第三世界穷而弱，第二世界富而较强，第一世界富而特强。从这个方面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极。工业化水平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美苏是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总的说来第二世界国家比第三世

---

① 《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演讲》，载彭军、陈晓雷、周慧玲编著：《中国领导人在外演讲纪要》，第117页。

界国家综合国力更强。这里暗含着现实主义的逻辑，因为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国力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性因素。第二，第一和第二世界都是二战前已经独立的国家，其中大部分一战前就是独立的；第三世界大部分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两个事实合起来，就决定了三类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向：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国家，这是它和第二世界的最大区别；第二世界的主要任务是反抗第一世界的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只能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其对外任务是为这个目的而营造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就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其次，关于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任务，体现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本中的三个世界理论强调反霸甚于反帝，只字不提反修和反资，也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这类字眼。对于苏联，只强调反对其霸权主义，这是对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修正。这与联美抗苏战略部分地是一致的，因为在反对苏联霸权方面中美有共同利益；部分是冲突的，因为美国被定义为最大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一，而且这个理论在称呼两个超级大国的时候，在毛泽东在世时，都把美国排在苏联前面。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美帝和苏修“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还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但是这种冲突也是有限的。一定程度上，如李丹慧所言，“这时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① 无论在理论阐释还是实际操作中，中国都把苏联视为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的头号敌人。邓小平在宣示三个世界理论的那个著名讲话在提到美苏的时候，几乎都是同时批判两个超级大国，没有一个自然段是专门针对美国的，而有整整一个自然段是专门谴责苏联的。在另一段还特别指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② 这就暗示：为反对苏霸而联合美霸是合理合法的，这就进一步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了合法性。也仅仅是

---

① 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第 9 页。

② 《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演讲》，载彭军、陈晓雷、周慧玲编著：《中国领导人在外演讲纪要》，第 116 页。

暗示，毛泽东的谈话和邓小平的演讲都没有直接提及这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方面，三个世界战略还有一个特点，即重在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独立和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后胜利而非推动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邓小平的讲话中没有提到“建立国际新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个口号，而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联大已经公开提出了这个目标，但整篇讲话的基调与这个目标是相符的。和传统的世界革命战略相比，这个目标与联美抗苏战略没有冲突。因为两者涉及的领域完全不同。

第四，由于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重视安全、独立、平等这类国家利益，三个世界理论间接承认了现存国际体系的合法性，进一步放弃了中国的国际体系挑战者角色；这个理论指导下的7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中国外交，事实上更强调参与国际体系。表现为：注重与所有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支持西欧联合自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增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切构成了80年代邓小平外交革命的前奏。“文革”高潮期间，中间地带理论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一度销声匿迹。1974年提出继承中间地带理论，但革命外交色彩更淡的三个世界理论，是继联美抗苏战略和进入联合国以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进一步务实的信号。作为这个理论之事实上的核心内容之一的国际新秩序的诉求，和邓小平演讲中再次提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革命相比，一个重要区别是，前二者更强调改良现有体系而非推翻之。对国际体系的这种承认，与联美抗苏战略的逻辑前提也是不冲突的。当然，真正自觉地认识到、明确地承认和全面贯彻这个结论，需要时间。

第五，必须承认，毛泽东提出和实施三个世界战略，不仅仅着眼于联美抗苏。前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多少忽视了这一点。它是毛泽东为中国确立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世界抱负和他个人的世界革命激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到70年代中期时，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经独立，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艰巨的新任务，但是国际政治中依然存在的强权政治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妨碍着这个新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冷战感到厌倦，在对外政策上实行不结盟，在国内制度设计上多实用主义地采取兼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混合模式。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反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严重受挫，难以为继；其反帝反殖的世界革命战略则因为成功而难以为继。对于意识形态冷战和热战的厌倦、主权国家体系的普及使得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成为大多数国家的诉求，这对传统的世界革命战略也构成了有力制约。美苏争夺使得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世界的中小国家的普遍呼吁。核恐怖均势的存在使得世界大战更难发生。综合以上形势，可以说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革命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在。这个战略态势势必要求中国不仅要为了国家安全和摆脱孤立而调整传统的革命外交战略，而且必须为自己寻找新的国家定位。虽然毛泽东极不情愿放弃心爱的世界革命理想，面对这种"既不打仗，又不革命"的现实，① 也不得不做出局部妥协，为中国外交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寻求出路。联美抗苏战略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都是这种探索的结果。结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集体身份之外，又赋予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身份。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身份比起来，后两个身份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冲突要少得多。

（三）与联美抗苏战略的不一致

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延续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和战争与革命理论，表现为：其一，延续了把世界各国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列宁主义传统：第一世界是压迫民族，第三世界是被压迫民族，第二世界兼具两种身份。其二，强调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使得战争与革命不可避免。邓小平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

> 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②

考虑到邓小平演讲的特殊情境是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这不是一个宣传世界革命的合适场所，以及这一理论提出后中国继续支援部分国家

① 这是毛泽东1968年11月28日接见澳共（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说的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第504页。

② 《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演讲》，载彭军、陈晓雷、周慧玲编著：《中国领导人在外演讲纪要》，第118页。

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等事实，我们更有理由得出结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抱负比三个世界理论所反映出来的要大。三个世界理论的这一方面与联美抗苏战略是不完全协调的。

（四）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调整

从上述分析和这个战略思想提出的时机来看，很有可能是对“一条线”策略的出师不利做出的反应和对不久前提出的“一大片”策略的发展。如前所述，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视美国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老大，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不结盟，少数要么亲苏要么联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遍不相信中国对苏联意图的阴暗的描绘。在坚定维持西方阵营团结的前提下，发达国家尽可能与苏缓和关系。在世界左派阵营，甚至在中国内部，对毛泽东联美抗苏决策的怀疑也从来没有绝迹。这个理论照顾到了世界的现实，把美苏等量齐观，形式上还是美在前苏在后，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某种调整。它坚持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旨，但已是对这个统一战线的更间接更温和更委婉的表述。

由于其提出的时机和其表述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实际操作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学者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这时是否已被毛泽东放弃的问题。唐洲雁就认为，提出联美抗苏战略后，由于美苏缓和共同主宰世界趋势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美国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放弃了“一条线”和“一大片”，提出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三个世界理论。①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一条线”战略是80年代初才改变的。② 笔者同意后一观点。理由有三。

第一，邓小平在1982年底的一次讲话对于这个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 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个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③

① 唐洲雁：《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3期，第42页。

② 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③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7～318页。

这句话直接说明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放弃“一条线”策略。

第二，毛泽东在1974年1月5日会见大平正芳时再提“一条线”，并且首次提出“一大片”。一个多月后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这个时间关系表明，三个世界理论充其量是对“一条线”的调整和对“一大片”的发展。

最后，事实也是如此。第四章对此已有充分证明。

（五）对革命外交与联美抗苏外交之间张力的缓解

中国当时依旧部分坚持的世界革命外交和联美抗苏外交之间是有内在张力的，因为联美抗苏要求加强美国的力量，而世界革命要求削弱美国的力量。如果说，在这个战略提出以前，中国外交只有两个支柱，即联美抗苏和世界革命，新战略的提出添加了第三个支柱。三个世界的提出和实施使原来的两条支柱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中国外交开始恢复基本的平衡。故可以说三个世界理论和战略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补充，对世界革命外交的局部修正，是从传统的革命外交向和平与发展外交的过渡中的中间环节。故与李丹慧的观点不同，笔者以为，三个世界理论使“文革”后期的中国部分地从一种僵化而非灵活、单一而非多样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和联美抗苏一起成为邓小平外交革命的可以接受的出发点。如果说它僵化的话，只能是和后来的邓小平外交革命相比而言。① 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和联美抗苏一样，同样成为国外极左派的眼中钉。②

至此，我们可以对毛泽东时期联美抗苏战略与意识形态之间，特别是其与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之间的思想与实践上的复杂关系做一个比较公允的总

---

①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此文是由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授意、胡乔木主持撰写的。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13~14页。此文同时强调了三个世界理论对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和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指导意义。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也即成熟的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标准看，这篇文章同时反映了毛泽东的反帝反修反霸思想和尚在萌芽状态的邓小平的非意识形态外交思想，因此可以视为邓小平外交革命的前奏。

② 最激烈的攻击来阿尔巴尼亚。1970年起，阿党开始在国内公开批判中国的联美抗苏。从1974年起，开始公开批判三个世界理论。1977年7月7日阿党中央机关报刊登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该文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称“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称不结盟国家的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指责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第34页。

结了。

首先，传统意识形态基本没有遮蔽他对国家利益的清醒洞察和坚定维护，在力求兼顾国家安全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同时，在二者实在无法兼顾的时候，他是坚定地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在实际操作而非理论阐释上，联美抗苏是非意识形态外交的典范。

其次，由于毛泽东和美国领导人都充分意识到他们是在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合作的，以及毛泽东的巨大权威，世界革命、“文革”等意识形态因素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实践中的兼顾、平行和切割，是毛泽东处理意识形态因素和联美抗苏战略之关系的基本手段；这些不同的术语，反映的是同一种政策现象。换言之，毛泽东在政策操作上奉行了使联美抗苏战略与台湾问题、援越抗美、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相互隔离、并行不悖的“四个切割”策略，尽管他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与联美抗苏之间的理论上的矛盾。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和坚定意志，他基本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再次，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在实践上，意识形态因素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有限影响，都是复杂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兼具。积极影响包括：对世界“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的局部反省和修正，是毛泽东能够为国家安全而联美抗苏的思想根源，因而是这个战略的前提；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内政外交上都固守的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对于联美抗苏战略有着虽然曲折但却明显的推动和辩护作用；其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思维和策略也起到了同样的推动和辩护作用。消极影响包括：“文革”路线削弱了联美抗苏战略的主要执行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地位，因而牵制了这个战略；意识形态因素使得毛泽东对于具体的中美军事交流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使得这个战略同时处于只能做不能说的默契状态中和只能说不能做的务虚层次上；革命外交疏远了反苏统一战线所欲联合和中立的国家；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苏不妥协立场使得中国失去了大三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妨碍了联美抗苏战略效力的最大化。

第四，在对联美抗苏战略进行理论上的理解、阐释和合法性辩护方面，毛泽东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乃至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了实践上的高度非意识形态化和理论上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强烈反差。他的实践明显地走到了理论的前面。这是其外交革命的不彻底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和鲜明特征。例如，他同时运用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和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策略为其联美抗苏战略服务。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两种确实有高度的一致，但也有差异。利用矛盾的统一战线思维

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思维，使用的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等术语，建构的是敌人角色，强调的是社会制度对立和阶级利益。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才是非意识形态思维，使用的是安全、均势等术语，建构的是威胁角色，强调的是国家利益。毛泽东同时具备两种思维。而且，统一战线策略在他看来具有唯一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而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地缘政治，或纯粹的国家利益，则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如果毛泽东完全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用纯粹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透明眼镜而非帝国主义理论和反修防修理论这两副有色眼镜看待当时的超级大国争夺和中国与它们的关系，他对苏联和美国的看法将会客观得多，也将更容易发现和更有效地利用大三角关系中中国的战略空间，更客观地评价美苏缓和的现实，更客观地评估美国、苏联各自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所有这些假设，在邓小平时代都成了现实。

第五，综上，应该把联美抗苏战略实践上的非意识形态特征与毛泽东对其的理论阐释和辩护上的意识形态特征区别开来，把这一战略实践上的非意识形态特征与同时存在的革命外交和“文革”政治对这一战略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影响区别开来。

第六，历史地而非孤立地、抽象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实践，把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历史环境的客观制约性结合起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创造历史的主体能动性或社会建构的主观性来看，60 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上仅次于美苏的大国地位，和毛泽东所拥有的巨大权威，使得其有很大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国际战略格局乃至影响时代主题。从这一点看，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和由之而来的联美抗苏的格局，都不是注定的。1962 年，王稼祥等就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另一种选择。① 如果毛泽东能够采纳，中国的对外关系将会是另外一幅图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有异于毛泽东的政策设想，只是慑于王稼祥的遭遇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无法公开提出。②

---

①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王稼祥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中国所应采取的外交政策的建议，是正确的、清醒和务实的，更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如能采纳，中国将更早地走出国际孤立，摆脱国家安全困境，避免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其具体见解，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44 ~ 460 页；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556 ~ 560、563 ~ 564 页。对其见解的评价，见：李捷：《物极必反：60 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第 508 ~ 512 页。

② 见宫力：《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第 438 页。

另一方面，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其选择也要受到既定的历史环境的根本制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① 他的强烈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情结，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历史、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他本人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的历史、20 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氛围、美苏对中国的长期敌视和伤害等等影响的结果。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世界革命战略，对于彻底终结殖民体系、主权制度的全球普及，和在此基础上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彻底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自主地位，两极体现向多极体系的转变等，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仅仅因为这些问题与本论文主旨无直接关系，笔者才把主要笔墨用于革命外交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复杂关系包括其消极影响。总之，对于毛泽东的认知和政策，我们至少应该给予陈寅恪所主张的"同情的理解"。毛泽东之所以不是邓小平，既有其个人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制约。

最后，尽管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作为大战略家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毛泽东对于世界大势、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利益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因而能够与时俱进地适时进行政策的反思与调整。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就是这种反思和调整的产物。它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联美抗苏战略间的矛盾，同时是对这个英明的战略的一个潜在的、间接的坚持、调整和辩护。

总之，尽管有着明显的不足，对于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及与其相关的外交实践的基本评价，邓小平的下面这席话，依然没有过时：

>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②

① 《列宁全集》第 11 卷，第 197 页。

②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四月七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第六章

邓小平对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没有能够看到苏联威胁的彻底解除和中美邦交正常化，这两个目标是邓小平实现的。为了能够彻底洞察毛泽东的成就和局限之所在，有必要简单总结一下邓小平成功的原因。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完成毛泽东未能完成的任务，给联美抗苏战略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其原因，不全在于外部环境的对中国有利的变化，甚至主要也不是因为这个变化，而在于中国自身的思想解放和由此而来的内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其中思想解放是关键，其作用，就是彻底抛掉了传统意识形态这副有色眼镜，只剩下国家利益这副透明眼镜，并因而彻底看清了正在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和中国在这种改变中的国际环境中的真正利益。在建构主义理论看来，思想解放的作用在于抛弃了中国对国家身份的旧的认知和相应的国家利益观，代之以对国家身份的新的认知；由于身份决定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就彻底改变了。

不能否认邓小平面临的环境比毛泽东要好。1977～1989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战略格局对中国是有利的。1977 年 7 月邓小平复出后的大约头一年里，战略态势依然是苏攻美守，苏联一手抓缓和，一手大搞战略武器竞赛和地缘政治攻势，而美国依旧对缓和美苏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即坚决地对苏联打中国牌，迟迟下不了决心。但是这个局面很快逆转。1978 年，卡特在布热津斯基的敦促下逐步改变对苏和对华政策，使两国得以在年内实现关系正常化。1979 年，苏联在世界各地无休止的扩张影响的做法，特别是阿富汗事件，终于触怒了卡特，使之彻底结束缓和政策，几乎全盘接受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十年来中国对于苏联的战略意图的判断，返回全面遏制政策。1981 年开始执政的里根继承并强化了这个政策。1968 年以来美国国力的衰退主

要是意志力的衰退，这是苏攻美守的主要原因。美国的硬国力一直对苏联占有明显优势。卡特主义的问世和里根的执政，标志着美国彻底抛弃了孤立主义和缓和政策，基本恢复了对外政策方面的国内团结，重新坚定了打赢冷战的意志。为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大幅度上升，中国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为首的西方认定，中国的强大和繁荣符合西方战略利益。①80年代，中美军事合作达到了空前水平，中美在非军事领域特别是经贸方面的交流也迎来了黄金时代。由此带动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的全面发展，其中最有战略意义的一件事是，由于美国态度的改变，日本改变了在反霸条款上的态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1978年5月缔结，此举体现了中日联合抗苏的战略默契。美国对苏政策的转变和中美日欧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的形成，使苏联处于空前的战略孤立，苏攻美守变成美攻苏守。80年代苏联经济的停滞使其处境雪上加霜。苏联逐渐认识到其打赢冷战的希望极其渺茫，1982年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这年3月，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对中国发出了极其友善的信号。三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其外交革命。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和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为中国彻底摆脱北方威胁进一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但是，如果没有来自中国自身的两个因素，邓小平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一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的坚守，其二是邓小平的外交革命。

第一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坚守

邓小平继续了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不让任何其他变数干扰这个战略。在这些变数中，最大的困扰就是台湾问题。面对美国对台湾对抗统一的政策的顽固支持，邓小平秉承了毛泽东“台湾事小，世界事大”的战略理念，不以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战略合作的前提，同时也不放弃原则，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第二个重要

① 在1978年11～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其后的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这个主要是由美国人传递过来的信息被当作一个重要依据，向党的高级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李向前：《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变数来自邓小平在1982年确立的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这个政策拉开了中美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中苏之间的距离。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过早地终结联美抗苏战略。没有这种坚持，也就没有苏联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劣势，其对外政策调整和对华威胁的减弱以致消除，也就失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一个好的战略的成功，决策和执行同等重要，善始和善终均不可少。邓小平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坚持表明，他和毛泽东一样，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的大战略家。

谈及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于毛泽东联美抗苏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性的一面，不能不提到三件事。

其一，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不久，就在一次讲话中承认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指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① 在实践中，当时的他大力落实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战略。

其二，是上一章结束时提到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文章肯定“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要立足于早打大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要“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打败超级大国（引者按：这个词专指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②

其三，1979年7月的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的总结报告指出：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我们“一条线”的战略，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172页。

② 《人民日报》编辑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

③ 转引自：朱良：《胡耀邦与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第19版。

从这三个例子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撇开其中的意识形态用语，以上史实证明邓小平坚持了联美抗苏战略，这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苏联依然对中国安全构成头号威胁，其战略武器的扩充和地缘政治扩张正处在上升势头。第二，上述讲话和文章沿用了毛泽东对于苏联党和社会的性质的错误定性，也未能充分认识到“一条线”策略的局限性。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人不是神，他对毛泽东的失误的认识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工作重点的逐渐调整而逐渐清晰和成熟起来的。

第二节　邓小平的外交革命

这场革命从根本上说，有四点。一是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判断，二是外交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三是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四是指导方针的根本性转变和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执行。四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一）邓小平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判断

这个问题涉及对核武器性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时代主题这三个问题的判断。

首先，他认识到核武器的空前毁灭性和其对大国间的战争的制约作用。从80年代初起，邓小平就把制约战争的力量分为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威慑力量，以及以第三世界为首的世界和平力量。①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对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② 这就局部修正了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核战争不可怕的结论。其次，基于其对冷战的历史经验包括美苏各自的意图和弱点的洞察，逐渐得出了世界大战有可能长期避免的结论，进而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前时代的两个主题的结论，在事实上修正了由列宁所首创、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坚持和发展的战争与革命是当前时代的主题的传统理论。

---

① 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第20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57页。

（二）邓小平外交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

上述结论的得出，和他在内政外交上的高度务实、进而其外交政策的非意识形态转向，又是互为前提的。这个转向的基本内容，就是用发展的利益取代了革命的利益，用和平与发展外交取代了世界革命外交，用彻底的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了国际主义原则，根据传统的国际主义原则，对于他国他党内部事务的某些干涉是不可避免的。

非意识形态外交的具体表现是：第一，承认苏联东欧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早在 1979 年 7 月，在外交部召开的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多位外交官就对否认苏联东欧是社会主义国家、否认其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传统立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会上谈了几点个人体会。说：我们过去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应当把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① 从 1980 年到 1982 年，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逐渐采纳了这个结论。这个事实也表明，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其外交革命，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二，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其核心就是不干涉内政，承认每个党有选择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力，承认各国人民和各国党比中国人更了解自己的国情和需要。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分析国际共运的时候指出：

> 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不都是对的。……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②

① 马叙生：《结盟与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2 期；朱良：《胡耀邦与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南方周末》2011 年 2 月 17 日，第 19 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3 年，第 318～319 页。

在这里，在继承毛泽东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正确方针的同时，邓小平委婉、间接地批评了毛泽东在党际关系中特别是中苏论战和“文革”中以反修划界、唯我独革、光荣孤立的做法。否定了中苏论战的隐形前提：中国革命道路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唯一真理。据此，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并写进党章。其内容是：“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① 从1978年开始，中共就逐渐恢复了与除苏联和越南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关系，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了与各国社会党的关系，同一百多个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对于东欧国家实行“三尊重”的方针：尊重它们根据本国国情确定的内外政策；尊重它们同苏联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尊重它们对发展与中国关系的设想与做法。② 这就纠正了毛泽东在实施对于东欧国家的“一大片”策略时把党际关系上的不妥协与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截然分开的失误。

第三，在以上两点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在冷战结束前，就同除越南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质性地改善了国家间关系。

以上政策是对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路线的彻底抛弃。这些政策带来的一个认识方面的革命性后果就是，承认苏联对华威胁，仅仅是安全方面的，与意识形态无关。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的提出，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对于自1978年以后成为现实的越南对华威胁，和其对柬埔寨的侵略，邓小平的认识和对策也仅仅是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无论公开还是私下，中国从来没有说越南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也没有因为承认越南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是同志，而在惩罚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行径和反击越南对华威胁方面有任何犹豫。赵紫阳在1984年5月1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如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好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 这段显然反映了邓小平思想的表述，事实上承认了当时与中国交恶的苏联和越南是社会主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② 李小华：《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③ 赵紫阳：《政府工作报告》，1984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24页。

义国家，承认社会制度与一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必然联系，宣示中国与一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其是否遵循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与其社会制度全然无关。这就颠覆了传统的世界革命理论。

这些认识和做法，与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照。囿于传统理论，毛泽东不能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何以执行扩张主义政策，只能把此解释为对内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邓小平对于这个用传统理论无力解释的现象，没有深究也无意深究，仅对采取措施反击这种扩张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感兴趣。这也是一种实践上和理论上负责任的和科学的态度,① 因为这类问题和有关姓社姓资的问题一样，最终只有实践才能回答。

非意识形态外交的第四个表现是，逐渐但最终彻底结束了对他国反政府的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这特别体现在中国与缅甸、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中。这一点对联美抗苏也有意义，因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多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中国对抗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合作伙伴。所有上述政策调整向世界发出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信号：中国不再是革命国家，中国对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中国与他国的关系，仅仅取决于该国的对外政策和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进而，国家利益原则第一次成为中国外交至高无上的原则。

根据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国家利益”这个词在我国的正面意义上的使用，是冷战后才有的现象。笔者的尚属有限的文献阅读也证明了这一点。从现有公开材料看，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是在 1989 年 10 月 31 日，场合是邓小平与尼克松的会谈。会谈中邓小平指出：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

① 这个问题上，笔者很欣赏资中筠的开放性见解。其大意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意识形态的各国的内部制度与对外行为有没有关系？在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一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二是西方部分学者主张的“民主和平论”。前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殖民地已瓜分完毕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必然导致战争。与此相反，后者认为“民主”国家（即列宁所指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由于广大公众不愿意打仗，因此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根据列宁的理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消灭，战争就不可避免；而根据后者的理论推下去，只要所有国家都变成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就可消灭战争。二者的共同点是认为国家制度决定战争与和平。这个前提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大题目。见：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序言》，第 11 页。

> 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①

所有上述政策调整，更符合世界的现实，搬掉了来自中国自己的改善中苏关系、消除苏联对华威胁的一大障碍，使得苏联看到了改善对华关系、缓解两国间的安全困境的希望，进而鼓励了其实施对我有利的政策调整，也即从中苏和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停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支配印度支那的政策。毛泽东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应做何贡献的理解，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二是推动世界革命；重点恐怕还在后者。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二是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交恶，与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和做法有一定关系。在邓小平时代，非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的确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中国得以毫无顾忌地与美国进行具体的军事合作。② 这种合作的唯一障碍，来自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和意识形态偏见。

是不是可以说，约从1982年开始的中国外交政策就丝毫没有意识形态成分了呢？当然不是，任何个人和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里需要严格区别的是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和对外政策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合理的意识形态成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是邓小平理论。它们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来说，区别仅在于现在的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所理解和固守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的不同规划。美国学者史蒂夫·莱文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最小意识形态框架”指导下的政策，即由过去的“政策手册”变为用时再查的“全书”，但意识形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② 1979～1989年，堪称中美抗苏战略合作的黄金岁月。两国军事合作开始有了实质内容，两军在情报、训练、后勤、技术转让、军品采购和高层交往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高质量的合作。有关具体内容见：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72～2000）》，第90～95、180～184页。

仍旧发挥着说明和规范的功能。①1995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其首要特征是“高度务实、非意识形态的政策方针”。② 后一表述完全符合现实。前一表述用词可能不是很准确，但表达的是同一个事实。

（三）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对联美抗苏战略的意义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之所以不结盟，一方面是由于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感到结盟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就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也因为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如果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都可能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③

从纯粹地缘政治角度看，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和“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的反省的结果。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对苏对抗到底、绝不妥协的政策，和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两国关系的紧张，以及在方法上以反苏划界，目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固然加大了对苏联的战略压力，但也使得中国失去了三角关系的主动权，美国成为这个政策的最大得利者。邓小平主政之初，一度继续了“一条线”策略。但是到了80年代初，美国对于中国统一的顽强阻挠，苏联对华频频释放的善意，美攻苏守的战略态势的出现和邓小平自己对世界战略趋势的重新审视，使其逐渐得出结论：第一，苏联威胁正在减轻，中国以往高估了苏联威胁，中苏矛盾有所缓解；第二，里根政府强硬的对苏政策使得美苏矛盾明显上升，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和三角格局的地位客观上有所提高；第三，美国对台政策难以改变，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十分不易，中美矛盾有所上升。以上认识是其提出不结盟政策的主要背景。从此出现了联美抗苏④和不

① Steven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n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5.

② （美）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洪允息、蔡焰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329～330页。

④ 显然，在提出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政策之后，联美抗苏战略就逐渐被联美制苏战略所替代了，仅仅出于用词的一致性的考虑，下文中才继续使用联美抗苏一词。

结盟并行不悖的政策局面。在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这一政策局面主要表现为：拉大与美国的距离，拉近与苏联的距离。这一局面，同时牵制了两个超级大国，提高了中国对美国打苏联牌和对苏联打美国牌的效力，同时增强了美苏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

这里有一个例子值得一提。1983 年，中苏关系松动并出现过热的势头。一面是苏方急于举行高级会谈和外长互访，一面是国内各部门一哄而起竞相与苏联交流。邓小平深感不妥，及时纠正。指出，在三大障碍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保持中苏关系低于中美关系对我较为有利。指出：要把分寸掌握好。发展中苏关系仍要以消除三大障碍为条件。对苏联弯子不要转得太急，太急了易被对方利用，以为我有求于它。① 这一事例表明了在不结盟方针的指导下，在处理与美苏的关系中，邓小平高明的外交艺术。前文已证明，由于美苏缓和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不妥协的对苏政策，1972 年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中苏矛盾最大，而非陈毅和毛泽东所认为的美苏矛盾最大，这是中国的战略被动的根源。里根的对苏高度强硬政策和邓小平与美苏保持较均衡关系的不结盟政策，使得 80 年代的三角关系态势真正出现了美苏矛盾最大的态势。

与外交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方针有关的邓小平的一个主要策略思想是“不当头”。邓小平强调国际共运中的非中心主义。他说：“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② 他坚持不当头，主张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和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原则。在 1982 年就提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③ 换句话说，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世界革命、国际共运，都不再需要什么领导中心，需要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两席话，以平实朴素的风格，反映了他基于对 20 世纪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包括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而对国际主义原则的重大发展和对世界革命思想的深刻反思。

---

① 靳文：《新阶段、新思路、新点子、新发展——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点体会》，《世界知识》，2001 年第 5 期，第 4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9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16 页。

至于不结盟政策确立后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哪个更大的问题，笔者以为，从单纯的安全威胁看，由于三大障碍的存在，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但这个矛盾呈明显缓解趋势；从中国的领土完整方面看，美国对中国统一的威胁远远大于苏联，苏联对中国统一毫无威胁。故从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全局看，中苏矛盾与中美矛盾基本均衡。这样一来，中国就握有了三角关系的主动权。其表现是：1982～1989年，中国同时改善了与美苏的关系，实质性地降低以致消除了苏联的安全威胁。

（四）指导方针的根本转变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

指导方针的根本性转变和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执行，与以上政策的调整和局面的出现，有内在的联系。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领导人、外交界和理论界日益认识到所谓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一说的荒谬。内政上彻底否定"文革"、抛弃极左路线，与外交上放弃世界革命思维、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逻辑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明显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包括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自身实力的增强，是国家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的基础只有一个，即联美抗苏。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为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又一大基础，即中国的改革开放。① 在联美抗苏这个基础因中国的战略调整和苏联威胁减弱而不可避免地减弱的同时，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充实了中国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的战略基础。

邓小平外交革命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意义，还在于它消除了联美抗苏与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之间的紧张，恢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平衡。章百家认为，毛泽东的联美抗苏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严重背离。在"一边倒"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是高度协调的。在中苏分歧过程中，二者出现矛盾，但这一矛盾被一种更加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掩盖。中美和解使得外交与意识形态的矛盾已无法掩盖，尽管中国人暂时装作视而不见。② 这话有一定道理。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至上的非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联美抗苏战略完全一致。中国对这个战略的态度不再是遮遮掩掩，只做不说，而是正大光明、理直气壮、言行一致。中

---

① 李才义：《中美两国与20世纪三次国际格局变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6期，第58页。

② 章百家：《中国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载于《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第22页。

美战略合作也因而走出了默契和务虚的阶段，有了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就是具体的军事交流和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长达十年的密切合作。

总之，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代表了一场伟大的外交革命的开始，邓小平的联美抗苏战略标志着这场革命的完成。毛泽东的外交革命结束了中美冷战，邓小平的外交革命结束了中苏冷战。两场革命的合力，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格局。对于这两场前后相继的外交革命的深刻意义，国内学者黄仁伟的评价是最有代表性的："新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具有天然的对抗性。如果把冷战的历史环境包含在其中，新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选择的。但是，中国比任何一个大国更早地走出冷战格局，中国领导人比美苏两个大国更早地抛弃冷战思维。因而更自觉地提前实现中国的国际角色转换。"①

① 黄仁伟：序，见：胡键：《角色 · 责任 · 成长路径——中国在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5页。

附　录

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看联美抗苏战略的演变

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建国以后历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体现和代表着中共治党治国的战略理念。建国以来每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都有国际部分，代表着执政党对于国际形势和中国下一阶段外交政策重点的核心观念，也间接地反映了执政党对于前一阶段外交政策的反省和调整。因此，连续考察其具体内容就不难发现中共领导层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指导思想的变迁及其内在理路。鉴于联美抗苏战略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最高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战略考虑必然会在政治报告中反映出来。因此，对 1969 ~ 1989 年间的五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相关内容的考察，是了解联美抗苏战略的演变特别是其与执政党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对有关概念的定量分析

在这一部分里，笔者选取了与联美抗苏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 14 个概念，统计它们在五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出现的频率，并对此加以分析。这样做的基本假设是：一个词的出现频率与执政党对与此词相关联的政策或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成正比例关系。

表一　从九大到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国际部分中重要概念的出现频率：

届次＼概念	和平共处	世界和平	世界革命	世界大战或世界战争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
九大	2	0	1	3	13	0	1
十大	2	0	0	1	17	2	0

续表

届次 \ 概念	和平共处	世界和平	世界革命	世界大战或世界战争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
十一大	2	0	0	2	5	3	0
十二大	4	5	0	1	3	9	4
十三大	1	2	0	0	0	0	1

从九大到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国际部分中重要概念的出现次频率（续）：

届次 \ 概念	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修正主义	帝修反	资本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	复辟资本主义
九大	5	3	10	5	3	10	1
十大	1	1	2	0	5	2	1
十一大	3	1	3	0	0	8	1
十二大	0	0	0	0	0	0	0
十三大	0	0	0	0	0	0	0

说明：1. 该表为作者自制；2. 九大至十三大召开的时间依次是：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1977 年 8 月、1982 年 9 月、1987 年 10 月。

从表中可见，和平共处原则始终没有放弃。“文革”中完全放弃了世界和平的旗帜，表现为：这个词在九、十和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都没有。世界革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修正主义、帝修反和资本主义这几个词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中都没有，世界和平这个词则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中出现了，表明 80 年代中国开始修正以致放弃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和传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帝修反和世界革命这两个词只是在九大报告中才有，表明在联美抗苏确立之后，世界革命已不再是中国外交的第一位任务，“文革”高潮时期四面出击、左右开弓、到处树敌的极左的外交战略被相应地放弃。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的出现频率总的说来呈下降趋势，到十三大时完全消失，反映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逐步取代的过程。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这三个词，在九、十和十一大报告中都有，在十二大和十三大报告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表明中国对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否定的评价在 1982 年就放弃了。霸权主义和独立自主两个词的频率总的说来呈上

升趋势，反映出反霸思维和独立自主思维在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中不断上升的地位。总的看来，传统、极左和强调革命与战争的意识形态词汇呈下降趋势，在80年代急剧淡化以致消失，反映了中国外交逐渐务实的总趋势及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外交理念既有继承又有区别的扬弃关系，以及联美抗苏战略的意识形态背景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变迁。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在所有这些报告中，“联美制苏”、“联美抗苏”、“联美”这类字眼从来不曾出现过。这就是说，这个战略在政治报告中的反映，始终是间接的。对于九、十、和十一大来说，这是这一战略的默契和务虚性质的反映；对于十二大和十三大来说，更多地反映了这个战略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随着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政策的推行而下降的趋势。

二、对有关内容的定性分析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仅有定量分析是不够的。以下是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国际部分中与美苏关系、中国对美苏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直接相关的内容的概括和定性分析。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联美抗苏的战略思考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更全面准确的理解。

（一）九大政治报告相关内容分析

1. 内容摘要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没有过时，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无非两种，战争引起革命，或革命制止战争；当代世界四大矛盾的存在必然引起革命。

美帝和苏修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为了实现各自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美帝在走下坡路。

勃列日涅夫集团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其鼓吹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的实质，就是在党际关系中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在国际关系中当作可以随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

中国政府坚持通过外交途径，以现有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解决中苏边界

① 笔者在摘要中遵循的原则是：尽量忠实地引用原文，只是在为行文连贯所绝对必需的情况下才进行一些技术处理。

问题。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帝修反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①

2. 分析

报告中单独讲美国的只有一段，单独讲苏联的有五段；并且明确指出美国在走下坡路。这反映出珍宝岛事件后中国视苏联为最大威胁的真实心态，为毛泽东正在酝酿的联美抗苏战略预留了空间。

美苏并提的时候，总是美在前苏在后；这和帝修反的排序是一致的，表明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传统未变，这可能与安抚朝鲜、越南和许多更重视反帝或者仅仅反对美国的左派力量的策略考虑有关。

报告中共有两处谈到美苏既勾结又争夺，每次都是勾结在前，争夺在后，延续了五年来的传统，从而暗示了美苏调和矛盾共同对付中国的可能性。这也不奇怪。因为毛泽东做出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的判断最早只能是在收到陈毅等元帅的第一份国际形势报告之后，时间是 1969 年 7 月。

人不犯我的话，向美苏、特别是苏联发出了暗示：在战争和备战问题上，中国采防御姿态，不会主动攻击。

共有两个半自然段谈中苏边界问题，对于边界问题予以的篇幅之多在党代会报告中绝无仅有，反映了珍宝岛事件影响下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边界问题的表述向苏联发出了信号：中国事实上尊重现有边界，无意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这些信号，包括人不犯我那四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珍宝岛事件的刺激下苏联可能发动侵华战争的焦虑和力图避免这种局面的迫切愿望。报告对中苏关系给予的篇幅和发出的信号，很可能与珍宝岛冲突发生后 3 月 21 日柯西金力图与毛泽东直接通话但遭中方拒绝这件事有关。报告的有关表述是对柯西金的努力的一个最权威的、表示中方和平诚意的回答。

报告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明确地限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这是与整篇报告坚持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调是一致的。换言之，毛泽东这时依然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完全相容的，后

①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69 年 4 月。

者只适用于政府间关系，而且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中国与各国革命力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五项原则并不要求放弃世界革命。这是他自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贯看法。

除对越南抗美斗争和阿尔巴尼亚反帝反修表示支持外，两次明确提到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并表示支持。这是建国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对支援世界革命的最明确具体的宣示。

这也是唯一一次把准备打仗作为中心任务之一向全党提出的政治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对中苏大战可能性的高度重视。

这次党代会筹备和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刚刚开始考虑联美抗苏的可能性，但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报告的内容和基调，与之有关。熊向晖认为，从这个报告中，根本看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迹象。① 但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报告至少没有堵死打开这扇大门的可能性。

（二）十大政治报告相关内容分析

1. 内容摘要

我们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过时。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大乱对人民是好事，不是坏事。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

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是欧洲，西方总想祸水东引，苏修则是声东击西。

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改善中苏关系讲了许多废话，不如拿出行动来证明诚意。中苏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和平解决。

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

①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178页。

苏修与美帝的勾结妥协与革命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有原则区别，列宁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就是后一类妥协的成功范例。

我们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①

2. 分析

帝修反和世界革命两个词没有出现，而且在以后的党代会报告中也没有再出现。在谈到第三世界的觉醒和中国对外所欲团结和支持的对象时，没有一处提到已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反政府的左翼武装斗争；所正面肯定、支持的对象全部是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捍卫主权和民族资源有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排序暗示，革命的重要性下降。所有这些都表明，世界革命不复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中国开始成为含蓄和有限地肯定现存国际秩序的左派，而非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派。报告说“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以及在把美苏并提的时候，始终是美在前苏在后，既是一种掩护联美战略的宣传策略，也是毛泽东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真实意图的显露。

在战争与革命这两个列宁主义所强调的时代内容中，说主要倾向是革命，又说战争有可能制止，反映了经过1969年9月中苏总理会谈和与美国达成战略默契之后，毛泽东对于中苏和美苏战争可能避免的比较乐观的预期。

对美苏关系中争夺和勾结这两个方面，强调争夺为主。这个提法源自四老帅的报告，推翻了九大的提法和九大前的判断，直到80年代中期为止是中国决策层的一贯判断。这一点连同对与帝国主义的两种妥协的区分和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引用，以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提法，显然意在为利用矛盾、联美抗苏提供合法性辩护。

对缓和包括裁军的消极评价，对声东击西和祸水东引的表述，和对美苏争夺重点的表述，直到1981年也一直是最高决策者的看法，反映了对缓和可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孤立的焦虑。报告特别提到1973年6月美苏峰会，微妙地反映了毛泽东对缓和可能正在牺牲中国利益的焦虑和警惕。有关表述试图在对中国联美抗苏战略暂时和表面看来不利的事实面前，在国内外左派面前，为联美抗苏战略再次提供辩护。

---

①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

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和时代理论的坚持，是调和世界革命和联美抗苏之间明显冲突的需要，很可能既反映了毛泽东的真实看法，也是为联美抗苏战略进行辩护的策略。

报告对时代的看法、对美苏关系重在争夺的表述，对缓和的评价，和对两种妥协的区分，显然受到此前不久第153号《新情况》风波、包括毛泽东的"七·四"谈话的巨大影响。林彪事件和联美抗苏不可避免地带来内政外交上务实的趋势，同时带来国内外极左派的批判，美苏缓和加剧又似乎给极左派提供了炮弹，毛泽东面临既反左又反右的形势。"七·四"谈话就是这个背景的产物，十大报告也如此。

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原则的重申，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的重申，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力图避免苏联对中国联美意图做出误判，进而发起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愿望，是对苏联发出的重要和解信号。

区分中苏间的原则争论和两国关系的那句话，表明毛泽东依旧坚持"党归党，国家归国家"的原则，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认为中苏关系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毛泽东对苏联伸出的橄榄枝，也证明毛泽东依旧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

（三）十一大政治报告相关内容分析

1. 内容摘要

革命因素在增长，表现为又有一批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控制欺负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在广泛开展起来。

战争因素也在增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总有一天要打起来，这是其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只要各国人民紧密团结，做好准备，不懈斗争，有可能推迟战争。

苏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前苏美争夺的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争夺重点是欧洲；苏联企图侧翼包围欧洲；西方的绥靖主义只能助长苏修扩张野心，加速战争爆发。

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使得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

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

革命不能输出，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党同很多共产党有关系。这种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两回事。①

2. 分析

在建国后历次党代会中，十一大和八大一样短命。二者对内政外交设定的基本方针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被中央推翻。十一大对形势的估计和确定的方针，主要反映了党内“凡是派”的看法，或者说是毛泽东治国方针的惯性的影响。

凡是美苏并提之处，总是把苏联排在美国前面，这在党代会报告中是仅有的一次。明确提出苏联比美国更危险。这两点预示着，中国将更坚定地与美国合作抗衡苏联。

认为世界大战虽有可能推迟，但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结论，和十大报告中战争有可能制止的判断相比，对战争的前景更悲观了。这与70年代中期缓和盛行和苏攻美守的态势有关，代表着中国党对这种态势的反击。

报告引用了列宁关于要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一切利益对立和一切机会来获取同盟者的话，说其在当前反霸斗争中有重大现实意义。这是继十大之后，再次诉诸列宁的权威为联美抗苏作辩护，这也是党代会报告中的最后一次。

指出革命不能输出，在当时背景下，更多地反映了世界革命情结的进一步衰退和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进一步认同。将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分割的话，反映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事实上，邓小平一年多后就开始认识到，一方面同一个主权国家政府发展关系，一方面支持这个国家内部正在武装反对该政府的组织，确有干涉内政之嫌。这两段话也说明中国革命外交的传统即将走到尽头，因为感到有必要为这种做法进行这么高层次的辩护，其本身可以理解为开始反思的表现，曲折地反映了对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冲突的初步觉察和困惑。“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的话表明，这时依然坚持将亲苏的和独立探索本国革命道路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视为异己。

报告高度评价了三个世界理论，紧接着把它与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系起来，这表明，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辩护，确实是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考虑。

报告暗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所有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九大和十大

---

①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

相比，是一个微妙的变化。这应该视为邓小平复出产生的影响。

（四）十二大政治报告相关内容分析

1. 内容摘要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反帝、反殖、反霸是中国人民神圣的国际义务。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不结盟国家反对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的斗争，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大大改变了超级大国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中国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是真诚的，将不断扩大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合作。

中国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中日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长远利益，有利于亚太的和平和稳定；日本有些势力美化侵略历史、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不能不引起严重警惕。

中美建交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都是有益的，但是，美国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售台武器的做法，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美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中苏关系现状是由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造成的；目前，三大障碍对亚洲和平和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改善对华关系的表示，但是，重要的是行动不是言辞。

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柬埔寨人民、阿富汗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斗争；强烈谴责以色列在美国霸权主义的支持下对阿拉伯人民的侵略暴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

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①

2. 分析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成为国际部分的标题。不再把美苏并提，无论

①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是作为帝国主义，还是作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都没有；从此结束了三次党代会把美苏并提为中国和世界的头号敌人的历史。报告专门提到“美国霸权主义”，而不提“苏联霸权主义”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些变化，加上报告内容中对独立自主的表述，反映和宣示了邓小平与美国拉开距离、实行不结盟的既定决策。这是报告的第一大亮点。

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修正主义、帝修反、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些词全部消失，十三大报告中也没有一个出现。明确指出“中苏关系现状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造成的”。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非意识形态的外交革命已经开始并且不可逆转，中国已经给苏联社会性质平反，给苏共摘帽，不再将社会制度与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这是报告的第二大亮点。

继十大之后，十二大报告再次做出了世界和平有可能维护的判断。这同时反映了中国战略处境的改善和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报告提到日本历史问题和复活军国主义问题，这是十大和十一大都没有的，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固然与当时日本国内某些政治现象有关，也与结束“一条线”、现实估量苏联威胁有关。如果还把苏联威胁看得很重，就不会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

报告用了五个自然段谈第三世界和中国与它的关系，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谈发展中国家问题篇幅最大的，这与独立自主一起，传递出全方位外交的信号，是联美抗苏战略地位下降的又一个明显信号。

报告用了五个自然段谈党际关系，提出了四项原则，完全抛弃了“文革”时期把几乎所有共产党打入修正主义另册的极左政策。

总之，十二大报告彻底抛弃了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彻底抛弃了准结盟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降低了联美抗苏战略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

（五）十三大政治报告相关内容分析

1. 内容摘要

当前国际形势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我们欢迎美苏签署的中导协议和东西方的缓和。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是对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

中国将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①

2. 分析

这是建国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国际部分篇幅最小的，只提到美苏两个国家的名字。这应该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十二大确立的外交政策行之有效，没有必要出新；二是，国际环境比较有利，没有大的挑战：一方面，中苏关系正在明显改善中，另一方面，冷战尚未结束，中美关系也堪称成熟友好；联美抗苏和不结盟都在顺利的实施中。十三大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确立联美战略以来最乐观的。这也是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政治报告。把本国现代化的成功，作为对世界的贡献，这种提法也是第一次，再次但间接地确认了与革命外交的分道扬镳。

以上分析再次表明，毛泽东的外交革命只是一个开始，其内含的逻辑只是在邓小平的外交革命中才得以充分展现，成为彻底的现实。

①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1 月。

参考文献

一、经典著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9、11、12、13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毛泽东外交文选》，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恩来外交文选》，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周恩来选集》，第3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俄）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二、史料

1. 著作

陈东林、杜蒲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6年。

陈有为：《基辛格评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

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册），华文出版社，2002年。

符浩、李同成：《外交风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77年。

黄华:《亲历与亲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69年。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凌青:《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

刘杰、徐绿山:《邓小平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台海出版社,1998年。

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罗银胜:《红色名媛章含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罗银胜:《乔冠华全传——红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潘嘉、肖宏宇、王维编著:《中国领导人与外国政要会谈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彭军、陈晓雷、周慧玲编著:《中国领导人在外演讲纪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外交部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外交部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外交部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5~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年。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吴德、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熊向晖：《历史的脚注——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位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

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于光远：《1978：我经历的那场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于有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四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张神根、端木清华编：《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始末，1978～2008》，四川出版集团，2008年。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周恩来自述》，人民出版社，2006年。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朱洪：《将军外交家黄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俄）尼古拉·费德林：《我所接触过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

（美）威廉·伯尔编：《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1999年。

（英）爱德华·希思：《希思游记》，包振南、张明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文章

陈昊苏：《他在外交史上留下了英名》，《世界知识》，2001年第16期。

达州：《戴维本-古里安与中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世界知识》，1992年第4期。

方祖安：《周总理文革初期谈文革》，《世界知识》，1993年第6期。

胡孝文：《王光美：共和国第一夫人》，《世界知识》，2006年第23期。

姜长斌，高祖贵：《当代中美关系新视野（一）——从解密档案看中美关系》，《世界知识》，1998年第10期。

蒋本良：《“苏联侵捷事件”与中国策略》，《世界知识》，2001年第4期。

李群英：《胡志明的中国情》（下），《世界知识》，2008年第1期。

马叙生：《结盟与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齐欣林等：《打破对南关系的禁区》，《世界知识》，2001年第14期。

《人民日报》编辑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沈志华、李丹慧：《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http：//www.shenzhihua.net/yuejiutwo.htm.

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文夫：《走向正常化的历程：中苏关系大事记（1982~1988）》，《世界知识》，1989年第2期。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肖莹摘译：《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晤》，《国外社科信息》，1993年第9期。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

徐永军：《邓小平大手笔书写外交传奇》，《世界知识》，2004年第16期。

严家民：《“尽管狗在那里叫，骆驼队总是继续前进”——黄镇在使美的日子里》，

《中外书摘》。1997 年第 2 期。

张青：《流亡中国五年间——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哈努克在中国的生活》，《世界知识》，2003 年第 2 期。

张序江：《当年，“五二零声明”发表前后》，《世界知识》，2004 年第 12 期。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 年 1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8 日。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 年 9 月。

宗道一：《文革中外交战线的一场风波》，《协商论坛》，2000 年第 3 期。

宗道一：《1973 年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始末》，《党史研究资料》，2001 年第 5 期。

宗道一：《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文史菁华》，2000 年第 7 期。

3. 译著

（德）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 年 5 月。

（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 年。

（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法）伯纳德·克里歇尔：《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王爱飞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陈瑶华、方辉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吴继淦、张维、李朝增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杨静予、吴继淦、刘觉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四册，范益世、殷汶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

（美）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张志明、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

（美）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刘丽媛、马德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

（美）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吴继淦、张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施燕华、洪雪因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 年。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卷、下卷），裘安克等译，商务印书馆，

1979年。

（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陈丕西、杜继东、王丹妮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

4. 译文

（柬）西哈努克：《我所认识的毛泽东》，《中外书摘》，1998年第9期。

（美）刘晓原编译：《冷战时期大战略三角关系下的中国和东欧关系——中国、东欧外交官对话录（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美）刘晓原编译：《中国、东欧与越南战争（1964～1973）——中国、东欧外交官对话录（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1969年3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3月。

（美）《国家安全研究第106号备忘录（1971年2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3月。

（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1971年10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3月。

（美）《尼克松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年2月14日》，《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三、研究专著（含论文集）

1. 国内专著

（美）傅高义、袁明、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重庆出版社，2009年。

龚洪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宫力：《重构世界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

宫力等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宫力：《毛泽东与美国——毛泽东对美政策的思想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台海出版社1998年。

洪永宏等：《中美军事冲突前前后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贾庆国、汤炜：《棘手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瞻》，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毛泽东大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

黎青平：《毛泽东邓小平与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李小华：《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刘从德：《和平共处理论与现实格局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1年。

刘武生、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

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

石志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

苏峰编：《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吴学文等著：《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谢益显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熊志勇：《百年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熊志勇：《美国与中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薛谋洪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颜声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长征出版社，2002年。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

2. 译著

（俄）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寸宽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俄）尤里·加列诺维奇：《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孙黎明、吕东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俄）尤里·加列诺维奇：《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部彦秀、张瑞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俄）尤里·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飞舟、孟秀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法）薄富尔：《战略绪论》，钮先钟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

（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罗苏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贾宗谊、张胜平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三卷本），齐沛合译，三联书店，1973年。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常铮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

（美）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1989)》，丛凤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姜长斌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美）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洪允息、蔡焰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詹树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美）沃伦·纳特：《基辛格的总构想》，齐沛合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约翰·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

明、陈京华、赵滨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年。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 ~ 1980》，肖东庆、谭实译，三联书店，1982 年。

（英）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 ~ 1984）》，郭学德、朱耀光、黄飚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4 年。

（英）弗雷德·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

四、研究论文

1. 国内论文

曹桂生：《学习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丁诗传、王超：《“一条线”战略与“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评析》，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傅耀祖：《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外交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一），《世界知识》，2000 年第 24 期。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二），《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 期。

宫力：《毛周等人的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三），《世界知识》，2001 年第 2 期。

宫力：《美国水门事件与中美关系》，《文史天地》，2004 年第 2 期。

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中国外交》，2002 年第 7 期。

宫力：《中国援越抗美的历史回顾》，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 10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郭树勇：《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历届中共政治报告解读新中国外交思想发展趋势》，载郭树勇主编：《战略与探索》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何曜、任晓：《均势理论反思——兼论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论》，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洪兵：《中国与西方国家利益观的差异》，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 年。

靳文：《新阶段、新思路、新点子、新发展——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点体会》，《世界知识》，2001 年第 5 期。

李才义：《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 年第 6 期。

李才义：《中美两国与 20 世纪三次国际格局变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6 期。

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

1994年第1期。

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与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李丹慧:《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2001年9月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1期。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续)》,《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

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

李群英:《基辛格是一把钥匙》,《世界知识》,2008年第6期。

李向前：《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林蕴辉：《中苏关系恶化与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分歧》,《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期。

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罗时平:《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2期。

马骏:《两极格局下的无奈与选择：毛泽东大战略思想研究——兼论毛泽东调整对美政策动机》,《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

牛军:《略论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潘正祥：《中苏从结盟到对抗的经验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4期。

潘忠岐:《国家利益的主体性与中美安全关系》,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曲星：《中越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战略一致与策略分歧》,《国际论坛》,2000年第3期。

沈志华:《中国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1966~1972)》,http://www.shenzhihua.net.

沈志华、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世界知识》，2006 年第 17 期。

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 年第 1 期。

唐世平：《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中国安全政策的社会进化论诠释》，载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唐洲雁：《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3 期。

陶文钊：《中美关系：半个世纪的启示》，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 10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王辑思：《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思考》，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王辑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吴心伯：《试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 10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肖宗志：《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

阎学通：《什么是国家利益》，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 年。

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2 期。

颜永琦：《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线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 年第 1 期。

杨奎松：《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1949～1973）》，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杨奎松：《中国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

杨振亚：《切中要害，维护大局——邓小平对日工作的方针》，《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5 期。

叶江：《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1968～1973）》，载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美）翟强：《建立反对前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1972～1979 年）》，载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 年。

张清敏：《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世界知识》，2004 年第 4 期。

张润：《从建构主义的身份-利益理论看中国对苏政策的演变》，载姜琦主编：《俄罗斯重新崛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张润：《论毛泽东与邓小平联美制苏战略的差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6期。

周桂银：《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与启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

周建明、王海良：《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

2. 译文

（俄）I. V. 盖杜克：《被困三角关系：苏联与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姚昱、郭又新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俄）贡恰罗夫、乌索夫：《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俄）杰留辛：《回顾与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美）詹姆斯·曼：《国家情报评估与尼克松开启对华关系》，何慧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日）古森义久、幸赋康：《美国怎样看中苏和解-评介美国会一研究报告》，祝世璋编译，《编译参考》，1983年第11期。

五、博士论文

高飞：《从政治文化看50~60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学院，2003年5月。

胡晓丽：《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4月。

潘正祥：《从结盟到对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党校，1998年5月。

唐洲雁：《毛泽东的美国观》，复旦大学，2006年10月。

王成至：《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5月。

王新堂：《从血仇到友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1997年5月。

邢和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演变（1949~1976）》，中共中央党校，2004年5月。

徐红艳：《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1949~1979）——案例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4月。

张俊国：《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5月。

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5月。

六、英文文献

1. 史料类

Anatoly Dobrylin,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 ~ 1986),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1.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London and Toronto: William Collins Sons and Co Ltd,

Richard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78.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XVII, China 1969 ~ 1972,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XVII, China 1973 ~ 1976,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William Burr, ed. ,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William Burr, ed. , Sino – American Rapprochment and the Cold War, 1969 ~ 1972: Declassified U. S. Document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2.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rivat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Ceausescu", August 2, 1969, seen in William Barr ed. , Sino – 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 1969 ~ 1972: Declassified U. S. Documents, Number 14, Source: NPMP, NSCF box 1023, .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FRUS, vol. XVII.

Report by Four Chinese Marshals, " Our Views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s", 17 September 1969, CWIHP Bulletin, No. 11, Winter 1998.

Report of the Sino – Soviet Task Force, April 1, 1961,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Box 22 (Z), Kennedy Library.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3, October 1967.

Richard Nixon, "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 25, 1971, Harper & Row, Publishers.

《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9 日下午 9 : 40 ~ 11 : 00》，《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9 日下午 4 : 35 ~ 11 : 25》，《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10 日上午 10 : 35 ~ 11 : 55》，《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谈话备忘录，1971 年 7 月 10 日下午 12 : 10 ~ 6 : 00》, Chou En – lai, HAK, et al, Memorandum for Henry A. Kissinger, from Winston Lord, Subject: " Memcon of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Chou En – lai", July 29, 1971, NSC, Folder 3, Box 1033.

《周恩来、邓小平与胡志明的谈话，北京：1965 年 5 月 17 日》，Working Paper，No. 2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北京：1965 年 10 月 9 日》，Working Paper，No. 2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周恩来与黎笋的谈话，北京：1966 年 3 月 23 日》，Working Paper，No. 2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北京：1968 年 4 月 19 日》，Working Paper，No. 2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周恩来、康生与越南南方代表团的谈话，北京：1969 年 4 月 12 日》，Working Paper，No. 2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北京：1970 年》，Working Paper，No. 2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北京：1972 年 12 月 19 日》，Working Paper No. 2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1998.

2. 研究类

Bill McCloud，*What Should We Tell Our Children about Vietnam*，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Chen Jian，*China，the Vietnam War，and the Sino－Ameirican Rapprochement*，1968～1973，未刊稿。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Press，2001.

Douglas Pike，*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Anatomy of an Alliance*，Boulder，CO：Westview，1987.

Geoffrey Parker，*Geopolitics：Past，Present，and Future*，the Contiuum Publishing Company，1998.

Geoffrey Parker，*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room Helm Publishing Company，1985.

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 D. 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

James A. Nathan and James R. Oliver，*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Order*，Boston：1981.

Jussi Hannhimaki,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c J. Cohen and Emma Teng, eds., *Let Taiwan Be Taiwan*,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0.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Robert Dallek, *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7.

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 ~ 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II: The Making of a Limited War*, 1965 ~ 1966.

S. T. Ball,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ecturer in Modern History*, University of Glasgow, N. Y., London, 1998.

Walter Laf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92, McGraw - Hill, Inc., 1993.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Michael C.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Nayan Chanda, Secrets of Former Friend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June 15, 1979.

Steven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n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Zhai Qiang, Beijing and the Vietnam Conflict, 1964 ~ 1965: New Chinese Evidenc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Issue 6 ~ 7, Winter 1995/1996.

后 记

本书的基础是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博士论文的写作到本书的定稿，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没有众多师长和同学的鼓励和帮助，我是绝无可能走到今天的。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深深地感激我的导师、同济大学的杨烨教授。对我的学业和生活的无微不至的指点和关怀，让我感到她不仅是一位尽责的导师，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

还要感谢其他对本书做出了贡献的老师，包括同济大学的周敏凯教授、丁晓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范军教授、解超教授和唐莲英教授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汪宁教授。

我的多位学姐学妹，包括孙叶青、程丽娜、陈柯旭、张迎红、刘芳和徐静等，多年来一直分享了我在学业和生活中的苦和乐，我从中获益匪浅。

当然，这篇不成器的著作的一切缺点，责任完全在我。

作者于2013年12月

{
  "filename": "44CK5Ya35oiY6IOM5pmv5LiL55qE6IGU576O5oqX6IuP5oiY55Wl56CU56m244CLXzEzNTg4MzQ0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51b7\u6218\u80cc\u666f\u4e0b\u7684\u8054\u7f8e\u6297\u82cf\u6218\u7565\u7814\u7a76\u300b_13588344.zip",
  "filesize": 50085790,
  "md5": "b70cb86f9ed41e2c92676b608ff79700",
  "header_md5": "d4e1582f9903d23bac766f91738720b2",
  "sha1": "0e73f7694fc82a9d82010051bcd18182e8a3d411",
  "sha256": "a893d31adaa5ff59cab279619abab46794f0d876cfa14c13f3077a71810469a2",
  "crc32": 216595141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60683156,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
  "pdg_main_pages_found": 256,
  "pdg_main_pages_max": 256,
  "total_pages": 262,
  "total_pixels": 1150171248,
  "pdg_status_json": {
    "id": 1010,
    "action": "convert",
    "params": {},
    "result_code": 200,
    "result_value": {
      "image_stats": "aa: 48\r\n",
      "result_text": "\u8f6c\u6362\u5b8c\u6bd5\u3002",
      "conversion_time": "00:00:00",
      "image_count": "48/48",
      "dpi": "300 / 374 / 264"
    },
    "status": 2,
    "created": 1714657319,
    "updated": 1714657336
  },
  "filenames_to_pdgconvert": [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07.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08.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10.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14.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15.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22.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25.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36.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45.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49.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56.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57.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64.pdg",
    "\u00ed\u2562\u2514\u03a3\u2552\u255c\u2592\u2502\u255b\u2591\u2567\u252c\u2561\u2500\u2534\u00ac\u251c\u2514\u2510\u2563\u2566\u2552\u2552\u255c\u252c\u2558\u2564\u2568\u255b\u2510\u00ed\u2556_13588344/000067.pdg",